

Helen Foster Snow



RETURN TO CHINA

重返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200412776

I712.5
7

80403

重返中國
黃華題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刘炳章 王中一 隋丽君

卢佩文 王培清 房志平

译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做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做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

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

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挥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 华

编者的话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1907年9月21日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律师家庭，是当代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

她于193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年仅24岁，年轻美貌，才华出众。她先出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社交秘书，不久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1932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结婚。

“一二·九”运动时，她正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和埃德加·斯诺积极支持并热情地报道了这一爱国学生运动，并与学生领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她在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第一个向外界传递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信息，提前70天预测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继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保安后，海伦·斯诺也在1937年5月冒着生命危险，摆脱西安军警的监视到了延安。她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34位中共领导人，写出了《中国红区内情》一书（即《续西行漫记》）。这本书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使世人了解红色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激励了一大批青年人奔赴红区，投身革命。

海伦·斯诺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她

在旅居中国期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她向欧美各大报纸撰稿，报道中国形势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她和埃德加·斯诺是30年代远东最活跃的两个外国记者。

1938年，她和路易·艾黎等人倡议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后方农村创办工业合作社，发展经济，支援抗日救亡斗争。海伦·斯诺为了“工合”运动，整整奔波了10年，到处募集款项。

海伦·斯诺于1940年12月返回美国。1949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离婚。在麦卡锡时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国的活动，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她与美国社会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一所小农舍里，体弱多病，生活困难。但她始终满怀对中国的厚爱，认为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为了让更多的美国同胞了解中国，她顽强地生活和工作着。

1972年底和1973年初，她克服各种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和经济上的困难），重新踏上了中国大地，以65岁的高龄，继续追寻中国革命的足迹，向世界做出新的报道。

这本书，就是她重返中国的结晶。

在书中，海伦·斯诺以旅游札记的笔法，夹叙夹议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方面的图景，或者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在一个曾在30年代的旧中国生活过的美国老中国通眼中的图景。虽然她这次在中国所走的地方是有限的，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在基层参观访问时，大多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接待），但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智慧，以自己长时间积累的对中国的丰富知识，特别是以30年代在

中国的经历为基础，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海伦·斯诺的一些议论，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全面的，她所持的一些观点也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贯穿全书的她的一种精神却是令人敬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就是她观察和研究问题时的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观点。她是在理解中国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现在，通过世界范围的比较来判断中国的成就。

她每到一处，都会回忆这个地方在 30 年代是个什么样子；她每和一个人谈话，也都要尽可能地了解这个人过去的经历。她总是在不断的比较中来评判呈现在她眼前的一切。她一再指出：不了解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怎么能了解从中国旧社会产生的这个新社会的性质呢？她说，不能用西方尺码评判中国人，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背景来判断。

海伦·斯诺认为，中国是从一个错综复杂的混合制度中出现的，中国把几种革命重叠在一起了。解放前的中国既是原始宗族祭祖制（这是 2000 年前基督教革命的对象），又是“半封建制”（这是清教徒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对象），又是特殊的半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制（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凭自己的首创精神和个性，从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阶段中诞生出来，并在革命运动中加进自己的重要内容，发动文化革命来消灭上述各阶段的残余。

她在访问中感到，在新中国，旧宗教的精华正摆脱礼拜形式，以一种特殊方式发扬光大。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儒家的讲究礼仪的优雅风范，具有佛教的温和，实行天主教的宽恕、

慈善和认罪方式，同时如清教徒般以艰苦工作为美德，反对铺张浪费。这些特点的混合令人目炫，但尚未具体成形。而旧的文明留下来的则有隐秘性、不信任别人、喜欢正统、官僚政治等。她认为中国尚在改造中。

海伦·斯诺指出：中国在旧社会，个人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考虑或在体格上或思想上使自己有所发展。个人遭到家庭、家族和行会制度的束缚。现在，国家帮助发展体育，国家发工资给作家、艺术家。思考自由虽然不多，但人们已无挨饿之虑，且没有吸毒、酗酒。在社会主义下，个人自由大于儒教社会。她认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决非易事，甚至不可能。一切条件更便于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要进行的变革要比建立社会主义更巨大得多。

海伦·斯诺“从历史和世界图景中观察中国”的方法在书中的各个细节都能体现出来。她非常注意新中国丧葬制度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包含的革命意义，认为这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与摆脱迷信的程度的可靠尺度。她在同中国艺术家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性、阶级性时，她理解“这是历史问题”，欧洲艺术也有很强的革命象征。她一方面坦率地指出：作品也不能太美，歌颂得太多，那太理想化了。艺术的秘诀应是辩证的，应表现对立的方面。同时她也认为，在旧中国，劳动人民比在任何国家都受到轻视，现在给予劳动人民在艺术中的地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把旧的美学观念颠倒过来了。

海伦·斯诺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她认为中国的老干部是一批了不起的人，属于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优秀的人物之列。但是中国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情况。如果

青年能了解这些老战士的个人情况，他们给青年的实际启发就会大得多。她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充分肯定老一代的优秀品质。她在书中多次谈到，1966年以后长大成人的青年思想单纯得象一张白纸，这种情况很危险，需要加强教育。要让他们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更成熟一些。她指出，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古今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只学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指南，“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不过是分析的指南，需要有材料才能分析”。她担心，年轻人知识这么少怎么能从老一辈手中接班？

海伦·斯诺的另一个可敬之处是她非常忠实于事实，坚持客观报道。为了避免掺杂进自己的思想，她注意不用自己的话去写别人的观点，而是把别人对她谈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所以读这本书时能使人感到很浓的历史气息，重新听到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常常听到的语言。当然现在完全不必计较这些干部和工人、农民说的话妥当与否，它毕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纯朴的思想和感情。此书出版时，对个别段落做了些删节，相信读者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问题。

郭 琰

1991年9月

序

我的旅行的时间是从 1972 年 11 月 21 日到 1973 年 2 月 10 日。我拍摄了 1000 多张彩色幻灯片，其中一部分由我的代理人纽约市马格努姆摄影有限公司出售。

据我了解，30 年代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中国通中只有两人再次去中国，并且写了有关新中国的书。这两个人就是我的已故的前夫埃德加·斯诺（他在 1972 年去世）和我。在 1936—1937 年，我们俩首先去探索中国的共产党实验，并且出版了关于这种实验的书，虽然另外一些人也曾经到那里去过。在 30 年代进行过活动的其他外国人中只有两个新西兰人出版过谈新中国的书，他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个是路易·艾黎，一个是贝特兰^①（他写了一本供儿童读的书）。

^① 贝特兰，即詹姆斯·芒罗·伯特伦（1911 年—），其实是英国人，不过他曾任新西兰维多利亚学院英文讲师。他在 1937 年 10 月曾秘密去延安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发表的谈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译注。

经过 30 多年以后，陌生人把我当作一个活着的传奇性人物，读过我写的第一本书《中国红区内情》（1939 年）的人尤其是如此。我听说此书现在在中国被看作权威性著作，是中国出版过的由西方人写的两本最有影响的书（除了教科书以外）中的一本，另一本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国青年认为两个年轻的非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写的这两本书作了准确的估计。这两本书由于在重要关头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因而已成为他们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方面有什么秘密呢？秘密在于我们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写过这种书。埃德加·斯诺的这本书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一部权威著作。

我对中国人说，我想去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都从未去过的地方。路易·艾黎是在中国居住过的人之中足迹最广的一位，在外国人中间肯定是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所以，我的这个要求提出了一个难题。

我一直想去湖南省（埃德加·斯诺从未去过）。那是毛泽东的故乡省份，对他早年的成长发展有很大影响，它也是 1937 年曾在延安对我讲述过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另外五六位湖南人的故乡。我至今是一位天生爱钻研地理学和研究各种思想的探索者。

我抢到的第一并不太多，因为艾黎已经用了 45 年的时间，把每个角落都寻过了，真是一位马可·波罗式的人物。我作为马可·波罗式的旅行家所创下的一个重要的第一，是我第一个去了浏阳县的文家市。1927 年，“毛泽东主义”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因为那一年毛泽东正是在那里把当时各次农民

起义所剩下的队伍集合在一起（一共只有 1000 名农民，主要武器是红缨枪），然后把他们率领到井冈山上的安全地带。文家市是井冈山所属的那个山脉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曾经到过浏阳县。官员们告诉我，就他们所知，我肯定是 1949 年以来去浏阳的第一位外国人（不过这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我自己没有去向路易·艾黎核实，怕那样一来会把我自负的资本毁掉）。浏阳从 1925 年起一直不断地陷于内战或实行戒严，所以差不多对任何外国人都不会开放，除非 1906 年到 1924 年之间可能是例外。大概从 1924 年起，那里的农民是中国所有各地区中最革命的，那正是毛泽东 1927 年选中它为根据地的原因（他在学生时期曾经在 1917 年徒步旅行到那里）。

中国人提出有几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艾黎和任何其他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就那些博物馆馆长和官员们所知，至少自 1949 年以来他们从未去过。这些地方有：长沙的望麓园和韶山附近的银田公社（毛泽东 1925 年曾在那里建立农民组织，他去长沙也是在那里上小船），还有银田的一座地主庄园，共有 102 个房间。我把这张名单一一查对了一遍，下面是勉强可算是我第一个去过的一些地方（据人家告诉我，这些地方艾黎从未去过）：在长沙，有周南中学（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摇篮）和中国的耶鲁大学（自 1951 年以来没有任何外国人去过），还有一家妇女合作工厂（那里没有“外国人”去过，只有“老挝来的几个人”去过）。在上海，据那里的人告诉我，“除几位日本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以外”，我是 1949 年以来获准去参观以前的国际巡捕房和监狱的第一位“外国人”。我还是把李莉在新四军里的经历写下来的第一人。

还有一桩可能是我第一个做到的事情是，他们告诉我，一般说来，没有任何外国人考察过毛泽东故乡的韶山公社，因为来客只呆一天，没有时间进行考察，而毛泽东的亲戚们接待了我，那里 70% 的人都姓毛。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前往中国：昔日与现今.....	(1)
三分之一世纪.....	(2)
11月30日 印度新德里	(11)
12月1日 香港	(26)
12月2日 广州风情	(30)
沙面	(36)
广州市区	(46)
梅县的故事	(54)
12月3日 抵达北京	(59)
第二部分 重返北京	(65)
北京饭店	(66)
12月9日 团聚	(72)
乔冠华和龚氏姐妹	(87)
重返母校——现在的北大	(93)
哲学教授冯友兰.....	(105)

在北京的老中国通.....	(110)
新西兰人艾黎.....	(112)
黎巴嫩人马海德医生.....	(122)
维也纳人魏璐诗.....	(129)
八宝山——优秀共产党员的去处.....	(132)
“双十二事变”.....	(140)
同爱德乐共进午餐.....	(142)
同处理与日本复交事务的联络官廖承志的 一次谈话.....	(145)
回首往事.....	(151)
革命博物馆.....	(157)
12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162)
同邓颖超和康克清一起吃饭.....	(172)
北京协和医学院——现称首都医院.....	(182)
西长安街“居民委员会”.....	(186)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193)
中学“红卫兵”.....	(198)
小学“红小兵”.....	(204)
同一位共产党“老干部”的倾心交谈.....	(208)
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	(214)
国棉三厂.....	(226)
北京市地毯总厂.....	(237)
艺术家与革命.....	(245)
人民大会堂.....	(255)
紫禁城内的展览.....	(258)
考古发掘出来的珍宝.....	(261)

长城和明陵.....	(263)
北京体育学院.....	(272)
民族学院.....	(277)
芦沟桥农业公社.....	(282)
在华北农村的一个下午.....	(294)
12月23日 红星公社和那里的一个美国人	
家庭.....	(300)
在新北京过圣诞节.....	(310)
一位中欧人对中国的看法.....	(318)
12月31日 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	
午餐会.....	(327)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	(331)
第三部分 南京——九省之冠	(339)
到达南京.....	(339)
中山陵和廖仲恺墓园.....	(346)
和杨广立同进晚餐.....	(352)
与南京革委会副主任方明一席谈.....	(355)
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桥.....	(360)
光华东路上的第四无线电配件厂.....	(363)
南京妇女.....	(369)
第四部分 新旧上海	(375)
全世界独此一处.....	(376)
最后一批“老上海”	(394)
孙逸仙夫妇在前法租界的旧居.....	(402)

鲁迅纪念地·····	(406)
“40年的码头工人进城来”成了上海滩上的 常用语·····	(408)
《海港》·····	(414)
新上海·····	(420)
1973年1月25日 与关建谈妇女、流氓、 毒品等问题·····	(426)
同王一平的一次交谈·····	(431)
关于林彪、民主及其它·····	(439)
毛泽东和周恩来·····	(442)
动身回国·····	(449)

附 录

爱泼斯坦在海伦·福斯特·斯诺荣获“理解 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庆祝会上的发言·····	(468)
--	-------

第一部分

前往中国：昔日与现今

“要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首先当然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存在着，但是封建的小商业形式占主导地位，其主要基础是农村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同样，封建的经济形式存在，妨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性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这种革命将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取得胜利。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 1937 年在延安发表的谈话
(尼姆·威尔斯著《中国红区内情》)

三分之一世纪

我是带着在 1934—1935 年中国红军长征中用过的一把短剑开始我前往中国的行程的唯一的人。我怎样会拥有此物的呢？

在 1931 年我的第一次旅行中，我带了我的高尔夫球棍和网球拍，穿着一件皱薄绸上衣，在“林肯总统”号客轮的船头热切地凭栏而立，很像一艘老式快船船头的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雕像。我手腕上戴着一只银白色和青绿色的大手镯。我的轮船衣箱里有一件有皱褶和银白色花边的湖蓝色晚礼服和耿爱德^①写的一部叫做《中国币制》的厚厚的著作（以及我的长统靴）。我对中国感到高兴的是，中国用白银作为货币，而我们却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我到达以后不久，在我的生日那一天，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制。）我当时正在准备调换职业。原来的职业很好，是院外白银集团（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准备调换的职业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社交秘书，掌管礼宾和招待事务。（我必须参加外交人员考试，但是，靠属

^① 耿爱德，即爱德华·卡恩（1880—1962 年），是奥地利人，1901 年来华，曾任长春华俄道胜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赴美，常为纽约报刊撰写关于中国财政和商业的文章。——译注

于院外白银集团的参议院外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帮助，我得到了这个职业。)

船上除了我买了500美元一张的船票以外，还有12个旅客也买了这样的船票，他们都是年轻的海军人员，或者英美烟草公司人员。我们就要加入已经在中国的6000—7000个美国“纸老虎”和已经在上海的1800个美国“纸老虎”的行列。我们沿着黄浦江行驶，经过新英格兰拉塞尔公司的大片古老的红砖砌的货栈，该公司在大约1818年到1877年帆船时期曾经主宰同远东的贸易。

我们一块儿住上了美国在东方的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古老的浦江饭店^①，这是由美国的一艘早期快船的船长建造的。在这里，密勒^②曾经为《纽约先驱报》采访1900年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新闻，并且在1917年创办了美国在中国的第一家报纸。他的门生鲍维尔^③在1917年到上海后曾在那里住过。鲍维尔的门生埃德加·斯诺在1928年到中国。这3个人都上过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当过美国人在亚洲办的最好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这3个人都先后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级官员的“美国先生”。埃德加·斯诺是毛泽东的

① 原名礼查饭店。——译注

② 密勒，即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1868—1942年)，是美国报人，在1916年创办《密勒氏评论报》，曾担任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对外宣传顾问。——译注

③ 鲍维尔，即约翰·本来明·鲍威尔(1886—1947年)，是美国报人，曾任《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后来密勒把该报转让鲍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同情中国被日军逮捕。1945年其子来华恢复该报，后于1953年停刊回国。——译注

“美国先生”，是在去世以后得到官方举行追悼会的殊荣的唯一的人。他是在1972年2月15日在他瑞士的住宅中去世的。这3个人曾为国内的人仔细观察太平洋局势。我在1932年“在我与斯诺先生结婚时”也参加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在1949年离异的。）

从1940年12月起，我就没有回到过中国。我见过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是在外滩向我挥手的鲍维尔。当时他的报馆已经被炸，他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一年以后，他被日本人囚禁，他的脚因坏疽而被锯掉，他回国后因并发症而死亡。因此，当他的儿子威廉在他热爱的祖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省却许多烦恼了。

第一艘美国船启程去中国是革命的一部分。这艘船于1784年华盛顿生日——2月22日装载马萨诸塞人参从纽约出发。这次航行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在1931年从西雅图出发的那次旅行花了三星期。1972年，我再次去中国时乘的是喷气飞机。这一次我从纽约动身去中国穿的是一套上衣和裤子相配的女装和靴子（是羊毛里的，不是长统的）。我忘记带的唯一东西是我一向戴的大银手镯。我肩上挂着一台录音机和一台美国制的基斯顿万次闪光照相机。这架照相机值51美元，里面有一个电眼和内藏闪光灯（我先前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照相机）。我还带了我能带的所有胶卷，因为在中国买不到这种东西。

书呢？我带了一个箱子，里面有我已出版的7本书中的两本书，加上我的6本用油印机印的书中的两本书，虽然我认为中国人不想要这些书。我还带了我在1939年写的一本叫作《革命生涯》的书的中文译本，这本书是和《中国红区内

情》同时出版的。这两本书在中国都是畅销书。我还带了两三本大都会博物馆在 1972 年出版的叫做《在中国长城后面》的书，书里有我拍摄的 18 幅照片，这些照片曾同该博物馆中一百年以前收集的另外一些照片一道展览过。

但愿我能把这个照片集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不过他也许不喜欢这个照片集，因为这个照片集会提醒他注意在 1937 年同他离婚的妻子——那里面有埃德加·斯诺在 1936 年为他们俩拍摄的一张照片。（我知道你无法向中国人说明，编者在挑选这张照片时不知道有关这位妻子的任何事情。）

我无法带那个东西——旧短剑，这是一种被禁止的致命武器。由于有劫机者，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此外，在我的往返旅行中，我的照相机、胶卷、电池和维他命都必须带在身上，因为我担心在检查劫机用的武器时，这些东西可能被 X 光破坏。这真是累人。（在新德里机场，检查人员在看了我的中国签证以后把我的行李扣了两小时。我在回到纽约以前一直不知道我的行李是否用 X 光照过，也不知道所有的胶卷是否被破坏了，虽然我在香港被告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不会再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我的新照相机是否好用。）

我在纽约把短剑交给驻联合国大使黄华，请他送给周恩来总理供北京的博物馆使用。我的旅行正是黄华同志和在北京的另一个老朋友担任外交部顾问的龚普生女士一道安排的。这两个人都是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领袖。

要不是由于这个东西是毛的一个死敌给我的，它本来会是给毛泽东的理想礼物。此人就是共产国际中的德国代表李德，他在 1965 年还在东德指责毛。然而我可以把这个东西送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没有卷入这场争吵，虽然他也不喜欢

李德（这是乔冠华告诉我的）。

据了解，这把短剑是长征以前的国内战争和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最早的纪念物之一，是在1930年第一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中缴获的。在那次战役中，总指挥张辉瓒被俘，这是到那时为止被俘的级别最高的国民党军官。（我在1973年听说他的尸体曾放在湘江的一个木筏上运送给蒋介石。后来他的尸体被隆重地葬在长沙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过去为了锻炼身体，常常攀登那座小山。我也在那座小山上攀登了一段路。）

在1933—1934年，李德做了一次危险的旅行，前往红区首都去告诉中国人怎样干革命。这把短剑被当成很大的荣誉送给了他，他在大约8000英里的长征中曾经带着这把短剑，以及作为吉祥物从德国带来的一面薄薄的黑镜子。在这次长征的半路上，他在战略问题上同毛泽东发生冲突，直到两人“剑拔弩张”。

1937年我在延安停留的四个月中遇到李德的时候，他是一个面带愁容、独来独往、很难相处的人物。他颇不友好，我则忙于写三本厚书的大纲，并且拍了330张有关那个城市和到达那里的每个人的照片。他是一个典型的碧眼金发男子，细高个儿，由于长时间患痢疾而面带病容。

每当我带着美国人的友好而直率的态度冒昧地向他提出任何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时，他就要恶狠狠地向我大叫大嚷，活像希腊神话中的看守秘药的冥府守门狗一样。（毛泽东在听到我同李德发生争执时，就会变得大大轻松起来。）

李德未尝不知道我从西安通过内战前线暗地前往延安时曾遇到危险和困难，就像他在江西经历的那样。在我离开延

安的那天，他郑重其事地前来告别，不仅把那把短剑送给我，而且把他的吉祥镜也送给我了。他解释道：“这是我仅有的宝贝。”好像把王国的守护神交给我似的。

回顾起来，人们在这方面看到了一种富于象征意义的行为。欧洲的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最近曾对我说：“除了美国的埃德加·斯诺以外，你不能想象其他任何种类的埃德加·斯诺。俄国的或者德国的埃德加·斯诺是不可想象的。你也是如此。不要写一本旅行见闻录。你知道你是唯一能设法了解这些中国人的人吗？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深刻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国人（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人民）的真正愿望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是只想要他们的正当权利——他们可能还有其他愿望。我们必须了解并且设法了解实际情况。他们真正希望有怎样一种社会？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主义的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点肤浅的概念都没有，我们的了解多半靠读你过去写的书。你是这些人的传记作者，你应当告诉我们这些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了解中国旧社会的性质，因此你怎能了解从中国旧社会产生的这个新社会的性质呢？首先，你必须研究人类学，而不是研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你注意的是词句。中国人必须应付客观局势。”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回想往事。一切的基础是埃德加·斯诺和我都喜欢中国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他们是了解的。我们之所以喜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喜欢这种特殊的结合。在我看来，中国人和美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天然的朋友，而不是天然

的敌人。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喜欢同一本书：《西行漫记》，这是一件真正有某种魔力的事。埃德^①得到令人兴奋的第一次进行探索的机会。在中国，我听说这本书是西方人所写的已译成中文的最有影响的书（除了教科书以外），我写的《中国红区内情》同这本书一道被当成两部权威著作。然而在西方，我的那本书从1939年以来就被活埋了。要写这样的书，必须年轻，不怀成见，坦率，无畏，在思想上和地理上都是如此。我试图以一种枯燥、冷静和辛苦的方式一点儿一点儿地掌握内部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至少有一些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上面的那个人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们将永远不敢翻译我的书。我有一次要求一位美国学者就我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发表意见，他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要到死后才会受到赞扬。可是我还没有死哩！

最后，我送毛泽东什么礼物呢？在北京，我给了他一封信以及我过去写的一本书的中文译本。我在信中附了一张他同卡尔逊^②在一起的照片（是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以及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的一张照片，在那张照片中，埃德站在北京盔甲厂13号的房子门前，当时他正在写《西行漫记》。（我觉得似乎应当在这座房子上挂一个牌子，而不应当把这座房

① 埃德是埃德加的爱称。——译注

② 卡尔逊，即埃文斯·福代斯·卡尔森（1896—1947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到解放区观察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因在1942年率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而闻名。——译注

子拆掉。)

我还有另外一些长征中的珍宝。其中一件是一个带有两枚硬币的银链手镯。这个东西极为罕见，到收藏家手中可能值很多钱。硬币是1931—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铸造的。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得到这两枚硬币，他请人打了手镯，作为给我的圣诞节礼物。

这成了给江青的礼物，由她放在博物馆里。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文化革命的倡导者。我知道她对任何种类的珠宝都不以为然，在中国也没有人戴手镯。(这同印度多么不同啊!)

我的另一件长征纪念品是一颗喇嘛珠，是用来保证戴的人不会从马上跌下来的。这是罗炳辉将军在延安送给我的礼物，他说这是在长征期间西藏的一个喇嘛送给他的。(当我向毛泽东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微笑说：“但愿这是喇嘛送给他的。”)这是深色玛瑙的，中间有一道白线，代表天地之间的人。我请人把它做成一个独粒宝石戒指。当然，你不会见到任何死的或者活的中国共产党人戴着这种东西，但是可以把这个珠子送到博物馆里。我知道他们必须非常小心避免宽恕任何种类的迷信，因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他们没有接受这个戒指。我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的3月12日的收据列出：短剑、手镯、施乐(埃德加·斯诺)的图章、“人民抗日戏剧协会”的徽章，“好好保存供研究和展览之用”。(我把戒指交给龚普生，希望她保存。)

除了头巾以外，你很难找到任何东西可以作为给一个中国人的礼物。我的确带了大斯摩基山脉中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做的一些真正的珠宝(并非用作装饰的手工艺品)以及

另外一些什物。

在英格兰的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我买了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毛织品——送给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和龚普生的头巾以及送给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医生的袜子。（装在我的手提箱中的袜子和亚格拉^①的一块玉一同在路上不见了。）

送给我的一部分礼物是在2月初从上海邮寄的——我在4月收到。在这以前从北京寄的另外一些礼物仍然没有收到。康奈尔·卡帕曾经严格提醒我始终随身带着我的胶卷。但是我怕被偷窃或者被X光照射，因此我在1月初把我拍摄过的12卷最好的胶片留在北京，以便将来安全地带给我。这些胶片在5月间带到了。

我在这次旅行中几乎拍摄了1000张照片（彩色的幻灯片）。

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回到中国呢？埃德加·斯诺已经在1960、1964和1970年去过中国（是由他的朋友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安排的）。一个原因是，他对我说他的第一次旅行花了6000美元。另外一个人对我说，至少需要2000美元，再加上在中国每天花10美元的费用。

长期以来，我几乎一直置身于货币经济之外。在一个月当中，我卖了我的一部分老式家具，以及我从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带回的几乎所有东西。幸而我在荷兰和日本的发行人提供了其余的款项。

冬天是最不适于旅行的季节，但是旅行费用不到其他时候的一半。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当

^① 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我到达伦敦中国大使馆去领两个月的签证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订好旅馆房间，我甚至不知道向哪个机构为我的旅行提出申请，但是我希望自己出路费。我请在纽约的黄华替我办。黄华表示愿意为我的整个旅行付钱，但是我不能接受。我一向是独立的（埃德加·斯诺也一向如此），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成功的秘密（至少他的情况是这样——他成功了）。

我清楚地意识我所处的独特的地位——我几乎与世隔绝。然而正是这种情况使我的工作有可能进行。我不指望中国人了解这一点。实际情况是向我发出邀请的机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11 月 30 日 印度新德里

我在 1972 年 11 月 21 日离开纽约肯尼迪机场，只身踏上旅途。

每排有九个座位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型飞机的座位空得相当多，就像我第一次启程去中国时乘的“林肯总统”号轮船一样。这个长达 3456 英里的行程用了很多汽油，却只载了这么少的人！我仍然记得在 1964 年横渡大西洋时遇到十一级大风的可怕情景。老“毛里塔尼亚”号在 50 英尺的巨浪中颠簸呻吟，几乎要散架了。我不禁想到 1635 年把我的祖先带到波士顿的 350 吨重的“亚比该”号，这艘船在海上

航行了三个月，只差几个小时终于躲过了人们记得的最厉害的十二级大风，因而幸免于难。

感谢人类的这种创造，我只花了6小时又1刻钟的时间就到达伦敦，赶上在中国大使馆同宋之光大使夫妇共进午餐。宋之光是新四军的英雄，他有一张老革命的面孔——开朗坦率，富于表情，饱经风霜。

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开诚布公，我们把假面具丢了。”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新四军的人。后来我见过另外许多人，但是几乎没有遇到我的八路军老熟人。在共产党人1949年在中国夺得政权以前，红军只有这两支主要的军队，八路军在北方以延安和毛泽东为中心进行活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进行活动的新四军是陈毅指挥。陈毅在前不久去世以前一直担任外交部长。

新四军的人带着遗憾的心情对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像延安那样的首府，我们一直在移动。”

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因为我的丈夫和我都没有报道新四军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先是从我写的《中国红区内情》中了解到延安的情况的，这本书是1937年以后的一些年能看到的唯一关于延安的书。埃德加·斯诺的书是唯一关于从1935年到1936年的保安时期的书，那是在延安得到解放以前的时期。

我到费利克斯·格林和他的女儿安妮在伦敦的公寓访问了他们，他们的房间里尽是精美的中国古董。他是在50年代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的先驱。

我同一位老朋友前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辛克莱通了电话。我们有在1938年同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一

道创建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的经历。约翰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曾经无意中在这方面使我得到启发，他和埃德说服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使南京政府接受我们的计划。我们在北京的老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福·卡尔逊也赞成我们的计划，他把“工合”一词作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击队的口号，于是英文字典中有了这个词。（“工合”一词在中文中的意思只是在一道工作。）

在原来创建工合的人中，有两个人死于工合事业，埃德同他的特殊的朋友毛泽东一道在中国有点被神化了。埃文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捐躯，成了人民英雄。路易是中国现代的马可·波罗，休伯特·S·梁（梁士纯）在南京大学任教。对我个人来说，由于我在“工合”极盛时期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了10年，我似乎弄得山穷水尽。

我是多么热爱英格兰啊！我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周围散步了，那里是英国的神秘气氛的核心，我的那座1752年的房子上的常春藤就是从那里弄来的。我强烈地意识到不列颠帝国的衰亡。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我意识到在帝国极盛时期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庆祝会上奔腾的骏马的蹄子在很久以前已经变成邮票上的胶了。现在在中国只留下帝国的两块地方，这就是香港和葡属澳门。

然而我不赞成任何种类的帝国或帝国主义。我是受英国文明熏陶的美国人，我们那里的人甚至在1776年以前就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我对中国在延安时期围绕着毛泽东出现的神秘气氛是友好的。我看到这两点汇合的地方。我也看到在将来可能有矛盾的地方。

这些点汇合的一个地方是英格兰凯尼尔沃思堡的废墟。

在阴森森的迷雾中，我在这些象征着 1066 年威廉征服英国的诺曼底式高大方形城堡周围漫步。这些城堡大体上仍然保持威廉征服英国以后 600 年的样子，那时克伦威尔的大炮摧毁了英格兰的最后一个封建政权。

（我个人也遇到过“封建”城墙。1937 年，我被关在西安城里，不许走出城门。为了走出城门去了解毛泽东在延安进行的新实验，我不得不冒生命危险。我清楚地意识到，毛拆掉了中世纪的城墙，打开了中国的城门，就像我的一些清教徒祖先为了消灭英国的封建主义而做过的一样，在思想界尤其是如此。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北京的古老城墙是在 1949 年以后才拆掉的，城墙的砖被用来建造防范苏联的地下防空洞，而苏联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姊妹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1935 年，举行游行的学生被阻挡在这些古老的城门边上，既不许进去，也不许出来，其中包括中国在联合国的发言人黄华和我的另外一些朋友。）

我的两个点汇合的一个地方是福吉谷，这是美国反对殖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革命的神秘气氛的核心。在 1937 年，我已经知道延安是中国的福吉谷，对未来的规划就是在那里作出的。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应当在对照中国自己的经历并同其他像印度或者埃及那样的新兴国家相比的情况下对中国作出判断。从西方的角度，可以联系到先后摆脱部族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欧洲国家（至少其中一些国家是如此）的历史了解中国。然而中国正在设法缩短整个变革时期，迅速跃入现代社会主义。过去的残余自然继续存在。我知道中国人这样做是

非常勇敢的，而他们的成功对西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世界局势，除了走向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当我在伦敦的苍茫暮色中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俯瞰奔流不息的泰晤士河的时候，我感到一个旧时代已经日落西山，不仅新老帝国主义时代是如此，而且对照荒唐的自杀行径看也是如此。尼克松同北京搞缓和是地平线上的亮光，是照耀未来的灯塔。

我买了一张从纽约到香港的冬季双程票，只花了 877 美元，以伦敦为起点的一段是从海外空中旅行社买的。（如果买从旧金山到香港的双程票，要花 1272 美元。）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夜晚班机波音 707 型飞机从希思罗机场飞往新德里花了 10 小时，飞过苏黎世、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威特，在阿拉伯的迪拜停留。在外出后回来的几家严肃的印度人中间，我坐在恒河边上的一家地毯厂的有钱的厂主旁边。他对英迪拉·甘地总理又恨又怕。

“她正在使工业国有化。她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印度任何人拥有的资本不得超过 10 万卢比。”

我插嘴说：“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他愤怒地说：“也许她这样想，但是两三年以后，印度将会赤化。现在这不是我呆的地方，但是我能到哪里去呢？请你把你在美国的地址告诉我。”

帝国饭店是以前英国统治时期新德里的一家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旅馆，现在这家饭店由印度的一家私人公司管理。黎明时夜莺在花丛中歌唱。当英国人在 1947 年放弃印度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几千军队统治印度两百多年。印度仍然留在

英联邦，英语是在印地语之后的官方语文。

小型工业研究所所长 K·P·帕拉梅斯瓦兰前来访问我。他很聪明，口才很好，他说他很尊敬我，把我当作他的“母亲”看待，因为我是印度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之母。他还说，他写了关于这些合作社的第一篇报道，我的书是第一本教科书。这番话远比印度的所有夜莺的歌唱更使我感到愉快。

我被当作《中国为民主奠基》^①的作者接待，这本书是第一本谈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历史的书。孙逸仙夫人曾寄了一本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为 1942 年的印度版写了一篇序，主张在印度搞这种合作社。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主持这种工作，到 1972 年，工业合作社全国联合会有了 5 万个合作社，而在 1955 年只有 12000 个合作社。很久以前，尼赫鲁和圣雄甘地都曾经邀请我来印度，但是这次是我的第一次访问，虽然我的丈夫同这两个人都很熟。

塔塔钢铁公司首脑 K·C·马亨德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要求我当印度驻华盛顿的使团的顾问，并前来印度。在战后，新教团体联合机构的首脑 K·莫达克牧师也曾经请我前来印度帮助开展工合运动，因为他认为传教士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够好。

尼赫鲁一直渴望路易·艾黎前来印度，但是路易不愿考

① 印度阿拉哈巴德基塔比斯坦，1942 年。此书最先于 1940 年在香港由凯利和沃尔什公司出版，1941 年在纽约由现代书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将由 22929 密执安州，圣克莱尔肖尔斯市工业东道东 48080 学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在 1942 年和 1945 年用日文出版，在那里，有一个“尼姆·威尔斯缝纫合作社”，以我的名字命名。——作者

虑。然而我们为了帮助中国人都做了真正的个人牺牲，却没有为坦率而又豪爽的亲西方的印度人做任何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原因是原来的工合精神似乎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就像海军工程营的精神一样：困难的事我们多半会去做，不可能的事要多花一些时间。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不可少的，独一无二的。（事实就是这样，甚至在1972年那里的西方人也寥寥可数，其中十多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中国人达成的任何小小的谅解都会使世界旋转的轴心变得稳定，尽管他们不会拿着金盏花环欢迎你。

然而我爱有着多种多样的动物并尊重动植物生活的印度自然界。在其他什么地方我能骑彩象，逗友好的蟒蛇，拍摄同弄蛇人玩的盘卷成一团的眼镜蛇呢？在其他什么地方，有专为一位妇女建造的泰姬陵，在那里，游客仍然在她的墓上洒一些玫瑰花瓣呢？

然而节育是过良好的、有组织的生活的首要条件，在像印度、中国、日本和拉丁美洲这样的人口过多的地区尤其如此，要用国家的力量坚持这样做。

要实行节育，必须特别为妇女提供就业机会和老年保险，这样她们就不必生许多孩子来为她们养老。这意味着要深入农村，因为在那里，旧宗教一直强调建立大家庭和大家族。

必须对农村实行革命性变革——对农村的社会观念和经济状况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坐在纱车旁边的甘地只掌握了一部分真理——主张建立农村工业。在中国，毛泽东创造了“两条腿走路”这样一个字眼，意思是同时发展农村和大小工业，而不是像苏联那样首先在大城市建立大的国营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专政的权力基础。工合的原来的思想是不仅为城

市带来工业革命，而且为农村带来工业革命。

集中的大城市工业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最好的，而城市和农村分散的工业对民主社会主义和良好的生活是最好的，尽管效率不高。人的进步不能用钱衡量。

中国和苏联的分歧实质上涉及实行工业革命的方法。在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建立小单位，后来自然而然发展成大的、集中的单位。而在苏联，这是一种强行剖腹产的手法（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这样做是不得已的）。甚至在1972年，《诺韦斯特尼报》在谈到中国时还说：“由于依靠小规模的企业，他们只是使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保持下去……兵营、无知、专制和奴役成了今天中国的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印度，我听说苏联不赞成工业合作社，也不赞成小工业。苏联正在慷慨地帮助印度建立大的国营重工业作为权力基础，印度的工业化程度也许高于任何新的发展中国家。这对对外贸易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农村的亿万毫无购买力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承认大型重工业曾使孟加拉国在1971年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在这同时，中国边远的公社的家庭主妇则在一面进行生产，一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在印度，农村的家庭主妇仍然在庙里为多生孩子祈祷。

打桥牌叫牌的方法不止一种。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也不止一种。印度正在对几种方法进行尝试。

工业发展部长和K·P·帕拉梅斯瓦兰陪我参观了有68个外国参加的1972年亚洲博览会。在1947年，印度拥有不到22000个小型工业单位，现在则拥有30多万个小型工业单位，雇佣了420万人。自从1960年以来，国家提供给私人创

建工业的贷款多达 12000 卢比。

甘地夫人只是使除了钢铁和水泥以外的外国拥有的工业国有化。国家没有没收工业，只是取得 51% 的所有权，并且已经付了偿金。美国曾经在 1970 年帮助在孟买附近建立了第一个核发电厂。

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工业合作社，这体现在 1950 年的宪法和章程中。印度已经在通过国际劳工局把合作社专家派往国外——派往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和锡金，在那些地方，印度的合作社章程被当作样板。

K·P·帕拉梅斯瓦兰陪我参观了买马寺附近的德里老城区中的小工业合作社，指出在合作社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及男子和妇女很容易相处。他还打电话给亚格拉的分支机构，要他们像过去一样手持金盏花环欢迎我。

我单独乘汽车前往亚格拉。我乘坐的加尔各答制造的摇摇晃晃的“大使”牌汽车的司机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留平头的锡克教徒，名叫瓦利亚。他每月得到 27 卢比（1 美元合 7 卢比）。他靠这点儿钱养活一家四口，但是他娶不起妻子。他英语说得很好，他说他崇拜甘地夫人，要求我给他在美国找一个职业。他带着嘘声赶走克里希纳的出生地附近很有气派的长发信徒，把他们叫作“嘻皮士”，说在印度永远不会允许穿超短裙——也许除非是在“基督教徒”中间。他似乎把这些人看作危险的激进分子，虽然他赞成甘地夫人的“社会主义”。

在被金盏花环弄得透不过气来的情况下，我参观了亚格拉的 1500 个工业合作社中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参观附近的甘蔗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合作社首脑 S·C·戈卡尔给我每年

制造的 50 万双鞋中的一双鞋，这些鞋是卖给苏联的。缝纫机是胜家牌和德国和德斯马牌。

我观看了阿克巴和沙阿·杰汉建造的亚格拉巨大的红砂石堡垒。在这里，在 1857 年兵变中，简·福斯特·斯科特的丈夫曾同驻军一道被拘禁，那次有 1500 名英国和美国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其中 37 名是传教士。我得到简在兵变中写的信的稿本，并且同她的儿子詹姆斯谈了话。

他家的两位妇女曾经自愿为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她们两人都年轻、美丽，在霍利奥克山受过高等教育。她们两人为了能在国外当传教士，都嫁了长老会传教士。玛丽·福斯特·纳索在非洲年纪很轻就因难产而死，她在那里曾为年轻的妇女兴办教育。

简·福斯特·斯科特几乎在海上死去，后来在 1855 年又几乎因难产而死。她的第一个孩子死在亚格拉阿杰米尔门的教会的房子里，第二个孩子就是 1856 年在那里出生的。简在印度兴办了妇女的高等教育，在穆索里（兰多尔）创建了伍德斯托克学校。在这里，她当了 25 年校长，后来也被埋葬在这里。现在这个学校仍然是印度的这类学校中最好、最时新的，并且在伦敦有一个分校（尼赫鲁的侄女们也上过伍德斯托克学校）。

印度兵变发生在 1861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前不久。就在那个时候，哈里特·比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引发了这场大战”——林肯总统曾经向她这样说。当时在美国在启迪人们的心灵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然而简和玛丽是老的清教徒家族的移民和拓荒者，她们想白手起家，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80 年以后，我只

身到达亚洲。到那个时候，妇女已不必为了旅行而非嫁给旧式的传教士不可。我曾经为利用合作社把工业革命带到印度和中国农村贡献过力量，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传教士在80年以前本来应当做的事。同亚洲建立过的所有教会学校相比，这些合作社具有更多的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和西方化精神，使妇女身心得到的解放也更多。（连约翰·伯奇也知道这一点，虽然他的信徒们不知道。）

在19世纪50年代，以合作社为手段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达到高潮。当初传教士要是把这种进步的思想带到亚洲（这可以追溯到威克里夫^①），世界历史本来会大不相同。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重新装上风帆驶向帝国主义。印度兵变使开明的政策转变成支持当地统治者。同时在中国，太平军自称为基督徒，并且要求西方向他们提供切合实际的新思想，但是西方拒绝这样做。

1938年，中国的所有传教士都支持我们的工合运动，但是为时已经太晚。这不是埋怨历史，这只是就失去的机会发表意见。我同历史是合拍的。我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是专门写给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统夫妇看的，他们两人都赞成我们的工合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把这种态度化为行动，不过罗斯福夫人是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发起人。1945年罗斯福逝世是华盛顿转向新帝国主义的信号，接着不久在国内出现了麦卡锡主义。一小伙邪恶的顽固分子采取自杀的做法，干涉中国的不可避免的革命，从而破坏了一

^① 约翰·威克里夫（约1307—1384年），是英格兰神学家、哲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一。——译注

个世纪的中美友谊。这场革命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1958年以前的确一直支持工业合作社）。

到了1972年，印度和中国都不仅敌视美国，而且甚至在一些方面敌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当时已经抛弃了苏联的道路，不过印度在1965年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972—1973年美国同中国和苏联实现缓和是历史上的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而且出现了一种新形势，这就是在大的国家集团中有了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形式，而美国人在线的末端：

1、苏联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它的卫星国和追随者的经历相似（跳过新教革命，包含希腊正教宗法思想的残余）。

2、中国的列宁主义——毛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它正在争取影响“第三世界”。这些国家正在跳过整个历史时代，试图通过这座竹桥走到社会主义。对在我的有生之年中隐入祖先崇拜、部族主义、乡土观念或其他封建主义的社会或封建主义以前的社会的国家来说，公社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形式更容易过渡的形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赞成这种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

3、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没有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在新教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联邦国家等——逐渐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是新教徒发明的，它的法律原则载入宪法和章程中。这是建立了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框架的反封建革命的嫡生子。马克思主义是这种集合体的孙子，在新教徒的东德就是这样。人民党主

义是美国的形式。

4、“基督教社会主义”。这是天主教徒对他们的制度的称呼。这种社会主义或多或少跳过了新教改革，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在爱尔兰、意大利看到这种趋势，甚至在波兰、古巴和智利（阿连德）也看到这种趋势。法国和共同市场是核心，德日进^①是新的神秘人物（约翰教皇受他的影响）。保罗教皇在重要关头向毛泽东伸出橄榄枝，他在1973年说，他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包含着基督教义的精髓。在美国，肯尼迪派的民主党人和少数民族劳工运动不久可能支持这种天主教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往往会走向无政府主义，而不是走向有计划的、结构分明的社会主义。

5、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同另外一些伊斯兰国家一道声称正在尝试实行这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试图跳过整个历史时期，除了油桶浮桥以外，没有任何桥梁。

6、混合社会主义。这是印度实行的社会主义。印度可能用几股纱织成一块美丽的社会主义之布，并成为一种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因为生活中所需要的燃料、衣服和住房非常少。

美国的社会主义也许将是混合的，是从混合经济和成份异常复杂的人口中产生的。

^① 德日进（1881—1955年），法国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1923年来华考察，对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起了作用。他把科学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研究，遭到非议。——译注

在新德里，我前往比拉花园。在那里，75岁的圣雄甘地在1948年被一个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我的丈夫在他被暗杀的前几小时曾同他谈过话。我接着前往尼赫鲁陵墓，在那里陈列了许多照片，显示了西方化的印度的第一任总理在1964年去世以前的经历。尼赫鲁的唯一的儿子英迪拉在1966年得到这个职位。她已经被奉若神明，特别是在孟加拉国获得胜利以后。

有人对我说：“她敢做她的父亲永远不敢尝试的事情。”

当我沿着台阶走上有圆柱的议会大楼，到甘地总理的办公室同她谈话的时候，我几乎被铺出来迎接孟加拉国总统的红地毯绊倒。孟加拉国总统预订在那天晚上向议会发表讲话。

首先接待我的是她的秘书们，特别是斯里·马尔豪特拉。我们谈的主要是印度的5亿6349万人口中的节育问题。1300万人实行了绝育，但是出生人数增长率为2.5%。

甘地夫人身上披着莎丽，看起来真像一个希腊女神，而且她的举止也像一个希腊女神。她的权威原来是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后来她逐渐靠自己的本事运用这种权威，用风度、女性尊严和见识来运用这种权威。德日进坚决主张最大限度地培养妇女，要是他能活到看到她掌权，她本来是会成为他心目中的说明人类可以做到尽善尽美的例证的。

我同甘地夫人谈的主要是工业合作社，我告诉她“工合”一词现在在英文词典中可以查到。她也认为合作社是在工业化以前的国家的农村迅速实现工业和社会革命的办法。她接着非常认真地说：“在印度农村，几乎一切都必须改变。”

她对我说：“宗教是反对节育的。中国人说生一个孩子就多一张嘴和两只手，而印度人却说孩子是上帝送的礼物。”

印度和西方之间没有万里长城，只有敞开的门（和伸出的手）。印度的命运可能是终于成为东西方缓和的维护者，而这正是尼赫鲁一家的象征。

我一生中的很多时间都用于使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门保持敞开，但是我从来没有直接帮助印度，虽然每当我研究中国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到印度。然而我被邀请在1973年1月26日印度国庆节以贵宾身份再到印度来。（可是我返回时没有取道印度）。

我的印度之行使我得到很大好处。它大大缓和了我的一种愤懑，即觉得我为工合事业进行的10年工作，对我“自己的工作”（我的写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我没有写出一本象《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重要的书，但是我写了一本对印度有影响的书，一本对中国有影响的书，一本对朝鲜人和日本人有影响的书（《阿里郎之歌》）^①。所有这三本书都写得不好，是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写的。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心里始终想着在中国创建和维持我们的工合运动工业合作社，把我弄得身心交瘁。我一心想到一项完全正确的使命。我的确为工合运动进行了尝试，一切事情说干就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天性。这些书可以说是普通的烙饼，然而至少是刚出炉的烙饼。（就在这个时刻，我对水门问题的兴趣远远超过我对手稿的兴趣，因而我只好勉强为我的手稿打字。）

^① 我作为《中国红区内情》（1939年）的作者在中国很受欢迎，此书预定在纽约由普莱努姆·达·卡波出版社出版。《阿里郎之歌》（1941年）写了一个朝鲜共产党员，1973年由壁垒出版社再版，由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销售。——作者

12月1日 香港

瓦利亚在凌晨4点来帝国饭店接我，准备把我送到10英里以外的新德里机场，但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VC式飞机要到8点5分才离开。我去头等舱里占了3个座位。飞机飞上3小时经勒克瑙和加尔各答到达曼谷，在那里停了45分钟。

我在37000英尺高空可以看到恒河，它的河滩有好几英里宽，在一些地方发了大水。喜马拉雅山清晰可见，山上有积雪。我们飞过仰光时可以看到缅甸是一片汪洋和丛林。

我们在曼谷上空盘旋了20分钟，运河里的船看得很清楚，稻田一片葱绿。降落的飞机多种多样，有台湾的，有尼泊尔的，有加拿大空军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的妻子在机场一味抱怨。

在九龙—香港机场，我只看到中国人。我打了电话以后没有料到中国旅行社关门了，然而碰巧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把我带到他们的金门饭店隔壁的价格不贵的富士饭店，浦爱

德^①在中国呆了一个多月以后在回费城途中到了那里。我们同它的经理 Y·C·雷 (译音) 以及我们在香港的参加工合运动的老朋友 J·M·谭 (译音) 共进午餐。浦爱德 85 岁, 陪她来的是 17 岁的蒙特利尔人罗伯特·梅拉姆。梅拉姆背后带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金黄色发辫, 他的这条发辫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反感, 我听说一切合乎情理的联系都因此中断了。

浦爱德生于山东, 父母都是传教士, 从 1933 年在北京时起, 我就认识她。我们曾经一同战斗, 流血, 为工合运动的工作做出很多牺牲, 始终支持路易·艾黎的工作。

大约在 1925 年第一次到达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莫德·拉塞尔刚刚离开香港, 我听说她从北京寄出了 1500 张明信片。

《纽约时报》的最老的中国通蒂尔曼·德丁带了某种预防痢疾的新药访问我。他不理解为什么不允许他重返中国。

我以两倍的价格又买了一些胶卷, 并走到半岛饭店, 在那里, 从老渡船码头出发的船仍然在受保护的海港中航行。我已经感到人口过多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从飞机上看, 香港好像是在廉价百货商店的储藏室里堆着的一大堆箱子。只是因为外国保护, 这种畸形的东西就像癌块一样长大了。

我在 1933 年第一次见到这个美丽的海湾时, 肖伯纳呆在那里的一艘船上慷慨激昂地指责英帝国主义。山峰上的灯就像是婚礼蛋糕上的蜡烛。香港现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

^① 浦爱德即艾达·普鲁伊特, 是生于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 1912 年在大学毕业后回烟台传教, 后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 1960 年曾来华访问。——译注

要集中地（这是共产党人带着厌恶的语气称呼他们时用的字眼），然而这是一种空虚的、不自然的生活。其中一个人对我抱怨说：“我没有祖国。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他对我说：“这不再是英国的地方。它正在受中国人统治。他们想在什么时候接管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接管。”

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了。

当北京决定接管香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块东西不很容易消化。他们最好让英国人为他们管理一些时候。

香港原来只是一个35.5平方英里的荒凉而多岩石的小岛，常常受到台风袭击。香港在1841年被割让给英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主要供转运之用。1849年的淘金热使香港成为用于运送广州劳工前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外港，经过这些年，香港已成为世界上廉价人力的最大的出口中心。甚至在现在每月都还有大约一千名中国人进入纽约市，夺去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职业，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制止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外流——除了从香港和台湾外流的劳动力以外。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香港的时候，香港有2万外国人（除了武装部队以外），只有大约80万中国人。今天香港约有2万英国人和400万中国人，其中100万人是在1949年以后从大陆逃去的。

在香港和远东的任何城市，汇丰银行办事处常常是最有影响、最有气派的地方。在上海，革命委员会现在占据了这个地方。这个银行是在1864年建立的。部分原因是在我们的南北战争以后英国人接管了美国的贸易，而且充当英国银行

的代理商的美国拉塞尔公司破产了。汇丰银行在每一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都设有不对外的免费小吃店，不过只招待贸易界上层人士，决不招待任何中国人。

通商口岸的大班传统还集中在怡和洋行。该洋行是查顿医生^①在拉塞尔公司对贸易的垄断结束时创办的。查顿本来是该公司的一艘船上的外科医生。我意外地发现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生意兴隆，并且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代理商。当我在办我的双程机票事务的时候，我发现管事的是中国妇女。

香港的生意实际上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办起来的，那时由美国供应的原棉断绝，而代之以由中国供应。这场战争结束了美国在国外还在襁褓之中的“帝国主义”（虽然当时那只不过是贸易），而且这场战争还解放了南方，使它不再是英国棉纺厂的殖民地。黑人劳工被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被用来代替中国劳工，排斥中国劳工法则消除中国廉价劳动力洪流的威胁。

苏伊士运河是在1869年开凿的，然而香港从来不是英国的贸易中心，而是中国海岸和太平洋的贸易中心，美国在贸易中得到最大的份额。英国的企业界的高级人员通常是苏格兰人。（伦敦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都是如此。）

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了解不够。帝国主义对本国造成的损害比对殖民地造成的损害更大。就香港来说，其实英国人过去只是（现在也仍然只是）买办的买办，他们进行的是转运，

^① 查顿，即威廉·贾丁（1784—1843年），是英国人，外科医生出身，与马地臣合伙创办怡和洋行。他以贩卖鸦片致富，在林则徐抵广州前回英。——译注

而不是真正的贸易。国内的人民受到剥削，以便支付帝国的这个前哨的费用，但是利润并没有回到他们手中。主要作用是保护中国难民和他们的资本。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我眺望窗外的大海港时，我记得我上次在 1940 年 12 月，也就是在多层高楼出现以前的时代呆在那里的时候，香港是多么美丽的城市啊。尽管如此，那时我还是不喜欢它，也不喜欢它对人们（外国人或中国人）做的事情。

12 月 2 日 广州风情

中国旅行社的 K·C·陈陪我乘火车到同大陆交界处的罗湖桥。我到广州的来回票花了大约 8 美元。在我进出中国的两个月中，从来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火车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只有我一个西方人。每一个日本人都戴一个标志，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每一个人还都带了照相机和关于中国的学习材料。我来的时候正是日本人同中国的关系蜜月时期，那时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将承认中国。

我是在 1940 年年底被命令撤出远东的妇女和儿童之一，尽管我自认为算得上一个外国记者。日本在 1937 年发动进攻以后，到那时已经占领了中国沿海省份，在 1941 年偷袭珍珠港是不难想象的。我知道日军犯下的暴行，也知道中国有成

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我的 1972—1973 年的旅行中，几乎没有人提到日本人的暴行。然而有人愤怒地提到一种暴行——一个美国士兵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某一年强奸了一个中国女学生。这仍然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这种真正的愤怒只能用爱憎交织的关系来解释。中国人指望美国人以文明的方式行事。他们记不记得日本人不仅强奸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和女孩，而且有时候还在强奸以后用刺刀刺她们？在中国施犯的暴行太普遍了，因而没有人把这当作一回事。

我曾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试图帮助中国。

我后来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对乔冠华说：“我单独一个美国人呆在这里，周围都是这些满面春风、洋洋自得的日本人，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他们现在有外交关系，而美国却没有。”

他很快地说：“这是美国人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这种蜜月关系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请我谈话是重要的。他强调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他正好出生在日本，他做这种工作是为了履行责任，而不一定为了爱。

我很高兴，我对这些日本游客没有产生反感，尽管他们在中国正在取得坚定的地位，而我们仍然陷在越南的流沙里。我喜欢他们的容貌。我本来想找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交谈，可是我太胆小，不敢尝试。我在此行中看到一些外貌吸引人的旅客，但是我没有冒昧地同他们结识，因为这在中国不合乎礼仪。

为了乘火车到广州去，我们在深圳政府大楼等了 1 小时，

并在那里吃了午饭。我在阳光满地的平台上独自漫步，观看两个妇女洗桌布，在平台地上用棒槌打。中国不用漂白粉，白的都变成灰的，即使是干净的。

我有时间回想 1933 年我的第一次广州之行。那一次乘的是河上的小汽船，这是当时中国最容易得到、最令人愉快的交通工具之一。我的丈夫和我还去了澳门，访问孙中山的出生地。

在专用候车室里等火车的只有 5 个挪威企业家（其中一个造船商）、一个外交官和我。非常兴奋的日本人有自己的候车室。我是唯一的外国妇女——我在中国的大部分旅行中都是如此。

在伦敦的塞尔弗里奇公司，我买了一套又暖和又厚的驼毛女旅行服。无论是乘飞机旅行还是乘火车旅行，我都得穿上这套衣服，因为这套衣服体积太大，箱子里装不下。我在旅行时总是像一个葱头——衣服是一层一层的。我可以一件一件脱下来，也可以一件一件穿上去。广州位于潮湿的热带地区，因此我先脱下厚外衣，接着脱下旅行服的短上衣，再脱下西装背心，最后脱下毛衣。在中国，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四处乱扔，没有人会偷任何东西。

我料想中国人不会喜欢这种浅棕黄色旅行衣。只有深色才被认为对毛泽东思想合适。浅色被认为或者是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太容易脏，或者三者都有。然而我的衣着不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因为裤子够肥大，尽管裤腿太宽。（我过去在延安，由于穿了一些宽裤腿的裤子，曾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反感。我在街上穿了他们的制服，并且戴了墨镜，以避免尴尬。）

我买了太肥的裤子，带了一些滑雪衬衣，不过想在北京冷了以后再穿。然而这个计划肯定遭到我的翻译破坏，这位翻译说最好不要穿太紧的裤子。中国人反对任何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穿紧身裤——他们自古以来一向如此。

后来在寒冷的北京，中国人研究了 my 衣服。他们断定我的衣服没有他们的棉袄棉裤暖和，而且太厚、太笨重。友好协会的秘书长丁雪松带来了一件厚红毛裤（所有中国人都穿这种裤子，重复这一点不是一种国家秘密）。龚普生给了我一件用皮子做衬里的漂亮的绿织锦上衣。

在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一道进餐以后，邓颖超仔细看了我的驼毛衣服，问我在哪里买的，值多少钱。她注意我的鞋子。（中国人使自己的脚保持暖和，不坐在穿堂风里，因此很少感冒。）我脱下我穿的一只小山羊皮红便鞋，告诉她衬里是毛的。在我逗留期间，她经常打长途电话，访问我的健康状况。（我听说埃德加·斯诺去世曾使周恩来大为震动。）

在中国，除了外国人住的旅馆和人民大会堂以外，公共建筑物在冬天很少有供热设备的，虽然仍然用火盆。然而我在整个这次旅行中没有生过一天病。（我的一个翻译在上海的一次采访中受风着凉，患感冒卧床。）我在白天从来不睡觉。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注意体育锻炼。这很有好处。

中国人在室内和室外都穿棉衣，因此他们不觉得冷。关键在于血液循环——衣服决不能紧得妨碍血液循环。

当我在深圳的平台上漫步的时候，我心里算计着 1972 年在我之前有多少人来过中国。一家报纸报道说有 500 人，另一家报纸猜测有 2000 人。

我本来以为广州是外国人入境的唯一地方，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我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有两家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获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我清楚地知道，在所有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其他未建交的国家是小国和拉丁美洲国家。84个国家赶紧填补真空。然而没有它们的“国民”。除了外交官以外，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外国人长久居住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任何地方，估计这样的外国人只有几十人。在上海，唯一的美国人是耿丽淑，唯一的英国人是一位中国教授的妻子。不过在过去几个星期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到达上海，作暂时的停留。在我到达北京的时候，在文化革命以后被拘留的十多个外国人差不多都释放了。

了解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数目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8年（在日本于1937年发动进攻以后），在中国约有2万英国人，7000美国人，4000法国人，4000德国人，15万逃离苏联的白俄难民。日本国民（包括朝鲜人）有12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满洲，那里约有100万日本人（包括朝鲜人）和约8万外国人（几乎都是白俄）。不知道这些俄国人的遭遇如何。

我不知道1941年有多少外国人被关进日本集中营，其中包括我们在中国和菲律宾的一些朋友。我们是在很晚的时候回国的。当我打好行李离开我们的义和团公墓附近的房子的时候，美国公使馆卫队有22名军官，545名士兵，驻扎在那里的外国军队有1207人。自从1900年的义和团暴动以来，这支卫队一直呆在北京。

我听说北京政府除了处决过一名德国间谍以外，从来没

有处决过任何外国人，虽然曾经逮捕或者“拘留”过少数外国人。（在中国，我们一向用“外国人”一词指欧洲人，而不是指亚洲人。）

在我的整个旅行中，只有过一个反对外国人的事例。那是在广州东方饭店的电梯中，当时我独自大胆出来走动，一个中国男子凶狠地瞪着我，那副神气很像京戏中戴着面具的演员。

开往广州的火车像中国的其他火车一样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路基很平。为了防止茶杯倾倒，路基非平不可。中国正处于卢修斯·毕比时代，或者处于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有像天鹅绒一样下垂的花边窗帘、纯丝织锦被以及桌子下面的扩音器（这样就不致错过听歌曲《我们热爱毛主席》的机会）。你可以把扩音器关掉，但是我喜欢听现代式的音乐，而且录了一些磁带。然而京剧却使我倒胃口。外国旅客通常抱怨扩音器的声音太大，我也很怕这种声音，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这种声音。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对士兵们（火车上士兵很多）说扩音器的声音太大，他们就把扩音器关了，不过他们在关时没有露出笑容。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一样。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现在在中国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上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

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了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回想起来，我认为新中国最令人愉快的事情是人人对做好工作有一种自豪感，而且他们显然喜欢做工作，并且在这方面相互炫耀，并向来访问的人炫耀。

沙面

在广州东站，我遇到友协的刘先生，他说他在大学读了《西行漫记》。

我对他说：“你是我在新中国第一个结识的人。”

我很高兴，他原来是一个很讨人喜欢而又坦率的人，而且他为我拿手提箱和另外两个包，没有叫搬运工。在旧时代，如果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自己拿行李，会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丢“面子”的事情。我后来更加意外的是，两个女翻译显然非常带劲地拿着所有行李在火车上走上走下。邓秀梅在把我的很重的手提箱放到上铺的时候自豪地对我说，她身体“很结实”，因为她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这使我感到不安。自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干体力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地位标志，而且是一种保护色。我不想显得自己太差，我向她们指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提着一个购物袋就是到顶了。我在这次旅行中始终拿着一个漂

亮的购物袋，上面有一张大老虎脸——我没有让中国人知道这个购物袋是来自阿伯克龙比和菲奇公司^①的。

刘先生说，广州的友协有 10 个成员，不过“仍然处于转变过程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字眼。对于了解现在中国的一切来说，这个字眼是关键。

我问到薪水的时候，他说他的薪水是每月 70 元。

“够用吗？”

他强调说：“绰绰有余。我为我的两间住房和一间厨房的公寓房间付 3 元，为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伙食付 10 元。”

我气吁吁地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这样的话。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人。这是世界革命。你曾经诉苦或者抱怨过吗？”

他带着老练而幽默的神情看着我说：“我太忙了。我必须树立榜样。”

在新中国，诉苦和抱怨是禁忌的，就像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统治时期那样。“干部”正在忙着为“群众”树立榜样，群众则在忙着向干部证明自己在怎样起模范作用。人们的主要竞赛之一是竞相表现得高兴和乐观。这对老干部（这是用来称呼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的字眼）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由于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得了关节炎和体力衰竭，可能力不从心。（我呆在中国的时候，也没有人听到我诉苦或抱怨，这是肯定的。）

^① 该公司是纽约的一家著名的体育用品零售商店，在 1977 年因遇到财政困难而破产。后来该公司的老字号被一家新的连锁商店买去使用，除卖老的特有商品外，还卖有更广泛吸引力的商品。——译注

后来我发现 70 元似乎是中级政府职员（例如我的翻译）的标准工资。1 美元兑换 2.3 元，然而除非同生活费用联系起来看，否则这种比例是没有意义的。

我对刘先生说：“美国速记员平均每星期赚 100 美元左右，产业工人平均每小时赚 3 美元以上。”

他对我说：“然而这买不了任何东西。你买不了幸福。幸福是为未来而工作的副产品。我到这里来同你见面不是为了得到报酬。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改善中美关系的。在中国，人们不是为钱而工作。我们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这就是每一件事情的秘密。”

东方饭店（建于 1961 年）大得很，但是还容纳不下像我这样一个热心的旅客。不，我不想休息或者打开箱子，只想穿我的特轻的紫色旅行服（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颜色，对中国是完全不合适的）。

我吩咐刘先生说：“让我们首先开车到沙面去。”

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说：“沙面过去有一个牌子，上面写道：‘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我冒昧地说：“1933 年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中国居民人数比外国人多了一倍。”

他不以为然地说：“都是仆人。”

（实际上那里有 591 名外国人和 1056 名中国居民。）

这个牌子是一种神话，不管就沙面来说还是就上海的外滩花园来说都是如此，但是你永远无法使任何中国人相信这一点。不错，狗是不许入内的，中国人必须有通行证（根据条约规定，这是外国准外交区域），然而那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牌子（我有一次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执着地努

力了解实际情况的人。)

中国人很难相信外国人没有挂这样的牌子，同样，我也很难相信英国人会在一个无法带着狗走的地方生活。

我安抚着刘先生说：“我想照一张沙基惨案地点的照片。廖承志当时帽子上中了一颗子弹。他曾经向我谈了这方面的全面情况。”

我听说，除了波兰和北越的领事在沙面设有办事处以外，没有外国人是广州的居民。(这也是上海仅有的两个领事馆。)我从沙基惨案地点(沙面的外国人在1925年曾向示威的中国学生开枪)走向附近的桥。我在沙面的这座桥上站了一会儿，眺望珠江边将近40年前我的丈夫和我从汽船上登陆的地方。我回想我是我的家庭第一个在中国居住的人。然而我并不是第一个前来中国的人。我父亲的表兄弟海军军官坦纳上校(纽约州沃索人)曾经九次航行到中国。我继承了他的一部分文件，以及补充他编写的福斯特家谱的工作。我们两人都对太平洋地区进行观察，他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样做的，那次战争使英国人有机会夺取美国对华贸易的支配权。他第一次是在青年时代乘一艘船来到中国的，这艘船是在1857年兵变中驶到印度以后为英国载运供应品的。

当我走过桥像第一次一样站在那棵大榕树下面的时候，我又感受到这个老通商口岸的神秘气氛。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珠江水面上一度但见满载货物的快速大帆船的一片白帆，这些货物是丝、茶叶和大黄以及为妻子和母亲带来的绘有白地蓝花的柳景图案的瓷器。

有很长一个时候，沙面是中国允许西方人居住和贸易的唯一地点，但是根据1757年一项法令，广州成了同外国进行

商业活动的唯一港口。在沙面居住的一个美国人写了6部关于中国的西方经典著作中的1部——《广州的番鬼》。

1972年，除了两位领事以外，无论是狗还是外国人都不得在沙面居住。

沙面原来只是一个贫瘠的沙洲，后来外国人进行开垦，把它建设成东方的一小块西方文明绿洲。为贸易“经纪人”建造的大“工厂”——维多利亚式堡垒——仍然存在。它们的窗子很脏，房子里只住着穷人，洗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挂着。

我看了1967年建造的江上新桥。然而老桥的支架仍然留在那里，那是我在1933年看到它时完成的。爱德华·莱昂（埃德加·斯诺说，他是广州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唯一外国人）对我们说，在挖掘桥头堡时，发现泥土是红的，于是一些中国人想入非非地相信外国人为了交好运，在桥基下面活埋了许多女婴。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中国原始社会最古老的以人为牺牲品的做法。如果你知道这种迷信是多么厉害，你就会觉得中国在40年当中有了很大的进步。

1934年，我们的汽轮驶过黄埔的一个地方，那里一度有一些涂了油彩的大纸老虎站着，以阻止番鬼这种洋鬼子进来。这种图腾制度是守卫着每一幢公共建筑物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的祖先（虽然毛的思想并不是非外国的。）

由于对外贸易和外国思想的影响，广东省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场现代革命的摇篮（除了在上海开始的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外）。每一场革命都产生了下一场革命，顺次是：基督教太平军，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共产党人。

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到达广东省，最后天主教信徒号

称 300 万。然而今天的共产党人很反对天主教会，部分原因是天主教会反对节制生育，“崇拜偶像”（不只崇拜毛泽东），反对中国的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变革。直到 1973 年，梵蒂冈才转过来说，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方面的道义的社会主义”中有着“同基督教一致的东西”。

当我眺望沙面的古老堡垒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一家特殊的洋行是否还在。1807 年，美国的一家茶叶和人参商行用一艘美国船把马礼逊偷运到广州以后把他藏在那家洋行里。他是英国人，是前往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允许他买船票。詹逊斯·麦迪逊让他带一封信给美国驻广州的领事。

这是 1812 年战争以前不久的事，当时年轻的美国仍然在同不列颠帝国打仗，一个武器是从中国买茶叶，而不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买。（事实上，真正的美国人继续在中国同不列颠帝国斗争，并同日本人斗争。）

1824 年以前，马礼逊一直致力于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在这同时，他编了第一本华英字典。他只有一个信徒，此人是铜模工，曾抱着发现家的热诚写了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受到离广州约 30 英里的一个村庄的一位年轻广东学者注意，此人名叫洪秀全。他找到了在广州的浸礼会教士田纳西州农民罗孝全，同他一道学习了两个月。洪秀全首先使他的家乡的人信教，最后他的太平军天朝定都南京。这个天朝使约 5000 万人死去，不过也使几千万人成了信徒。这个政权从这里对南中国进行了 10 年统治，直到 1864 年为止。“太平”的意思是“大和平”，这些造反者着手净化中国，使中国摆脱过去和外来的满清王室。他们砸碎

佛教、道教偶像和天主教会的雕像，以及儒教的祖宗牌位。不遵守十诫的人可能被处死。通奸的人可能被处死，虽然洪秀全最后不止有一个妻子。洪秀全写了他自己的小册子，并且出版了几百万册。在英国和美国，教会人员祈祷他成功，直到中国内战中的恐怖行为使他们震惊为止。

洪秀全对清教徒式的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驯服的传教士，那些传教士研究圣经，而不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内战史。

洪秀全把他的老教师罗孝全教士请到南京，让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并帮助宣传新的基督教。然而他们在完全的浸礼问题上发生争执，罗孝全怀着义愤离开了南京。（中国的迷信从来没有比浸礼会教士中的这种仪式更厉害的了。）洪秀全宁愿在胸部用一块热毛巾。（中国人最不愿意放弃的古老习惯就是用洒了香水的热毛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这种热毛巾以及有礼貌地掘着的牙签仍然是一种点缀。）

对每个有关的人来说，决定性时刻已到来了。没有外国人赞成满洲王朝（该王朝后来在1900年曾命令杀掉所有在北京的外国人）。他们从远处观察太平军时所抱的谅解态度还比不上他们在共产党领导的清教徒式革命1949年取得政权时所抱的态度，共产党人到1966—1969年还在指责太平军反对过的同样的“四旧”。

当然，正是一个富于企业精神的美国人——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冒险的雇佣军人华尔打破了仁慈的中立，由满洲政府支付他和他的军队干的每一件事情。当初要是太平军出同样多的钱，他本来也会为太平军打仗的。他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取得中国国籍，在上海招募了两百名冒险军人。这导致

建立一支由雇佣的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在 1862 年把太平军赶出上海。在这里，华尔受伤致死。英国人让后来闻名于喀士穆的“中国人”戈登担任指挥，几个月以后，太平军垮台，部分原因是他们为一种现象感到震惊，这就是打他们的是外国“基督徒”，而不是反基督徒。不支持太平军这样一件事意味着中国对西方道德以及基督教的全部信任完全垮了。在这以后，几乎再没有中国人信任任何外国人了，围绕着基督教原则产生的混乱仍然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国人的头脑。把一切都笼统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设法区分西方文明的包含矛盾成分的精髓就不那么容易。你现在无法对任何中国人说，基督教起源于反对罗马帝国和当时的部落社会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不区分进步的宗教及其死敌。“所有宗教都必须取消。”此外，他们有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先知毛泽东的新信仰。他们特别反对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迷信的仪式。我听说广州没有任何种类的宗教在进行活动。

后来在南京，我在太平军的最后一个“国王”住过的阳光满地、宽敞的明代宫殿周围散步，这是迄今已发现、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的唯一地方。共产党人认识到太平军暴动的重要性。我想到在上海附近的松江为华尔建造的庙，有 40 年的时间，清政府一直为这座庙提供酒饭作为祭品，并烧香。但在孙中山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华尔的坟墓就没有人过问了。孙的父亲曾经是太平军中的一个造反者，孙本人是一个中国式的新教徒。

我没有问华尔的庙是不是已经被破坏。也许我的导游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这样一个人。然而这些中国人对“毛泽东

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很熟悉。（我想了解毛是否曾经有过其他任何外国朋友——我在1937年算得上一个外国朋友。答案是有疑问的：可能没有其他外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可能算一个；路易·艾黎也可能算一个。）

据我所知，在埃德加·斯诺逝世以前，除了白求恩^①以外，华尔是中国政府正式纪念过的唯一的非俄国西方人。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2月15日逝世的，后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这是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任何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举行的追悼会。他是在瑞士因患癌症去世的，他的骨灰被从瑞士运往中国，埋在北京的北大校园里。有消息说，中国的一个广场或者一所新闻学院也许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我在北京听说决定不这样做。1949年以来的政策一直是不以任何人的名字为任何东西命名，唯一的例外是一辆机车最后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你猜不到这是谁的名字。不是毛泽东！是毛泽东。）

在我们离开沙面死气沉沉的荫凉的外国庇护所及其空旷的街道，过桥进入市区，见到无数好奇的居民的时候，我要说我偶然想到何不照一张美国领事馆的照片，但是我决定不问领事馆在什么地方。刘先生切望我不要想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而是去看广州交易会。

美国领事保罗·豪斯顿曾经对我说，他最值得自豪的时刻是1927年他救了苏联领事馆的一些人员的性命的时候，他

^① 白求恩医生是一个自愿参加共产党军队的加拿大人。他在中国被奉为榜样。如果我们加上他和7个参加广州公社的俄国人，那就有10个外国人。——作者

把这些人藏在他的领事馆里，另外7个人在广州公社运动中被杀害了。要是我没有提到这件事，刘先生就不一定会再想到我了。豪斯顿的报告是我读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份第一手材料。当我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的时候，他曾让我看这个报告。一些中国人甚至直到文化革命的时候都从来不很喜欢外交豁免权的细致做法。

1927年12月，有5000广州公社社员被杀害。刘先生和我穿过摆满菊花的过道，登上公社烈士纪念碑（烈士的一些遗骨是从刑场的坑里收集起来重新安葬在这里的）。有一个纪念碑是纪念7个被杀害的俄国人的。然而我没有问这个纪念碑在文化革命期间是否已被破坏。另一个亭子是纪念在公社中阵亡的150个朝鲜人的。叶剑英在1964年10月1日写了铭文：“愿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他同陈毅一道是公社的领袖，这时候他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下面的第二号人物。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朝鲜人的故事，因为我曾在我写的《阿里郎之歌》一书以及关于广州附近的海陆丰的书中写到这个故事。

许多朝鲜人前往瞻仰他们的纪念碑。一个日本代表团已经在我到达以前两个星期在附近刻的铭文“全世界工人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面献了花圈。我在中国之行期间不断遇到成批的北朝鲜人，每批人都穿得保守而考究，留着短头发。在另外一些成都市，我还发现日本人向革命烈士献的花圈，但是没有乔治·米尼^①献的花圈。

^① 乔治·米尼是美国劳工领袖，曾任劳联—产联主席，直到1979年退休。——译注

我心目中的纪念碑是用纸做的，上面有印刷油墨。很奇怪，我仍然是一些中国人（和一个朝鲜人）的主要传记作者，然而中国人不希望把其中一些人的生平事迹印成书出版，这是为了保证历史按照他们的意愿写。

广州市区

许多世纪以来，殷红的鲜血一直染红广州街头，因为通常在这里，新中国不时地为同过去决裂而展开斗争。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控制着通往海洋的河流出口（现在仍然如此），阻止新的带民族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从长远看，不论对全世界的人来说还是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幸运的。日本人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更懂得这一点。要是中国人当初决定参加贸易战，而不是决定供应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话，没有人能够竞争过他们。

大多数华侨是广州人，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南方人。自从尼克松访问北京以来，美国华侨特别高兴，庆幸自己受到赞许，并有新的机会赚钱。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采取背叛本国人民的标准方针——到国外去寻找廉价劳动力，以破坏本国的工业。日本的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的配件正在由中国人制造，而在日本安装。我在交易会上没有看到任何中国人做的价格便宜的日子

本旗子出售，不过我如果看到这种东西，也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日本人每年都去参加广州交易会，1972年约有5000人参观。在头9个月中已有3500人参观。他们一看到价格就眉开眼笑，他们对价格比对工艺质量更注意。他们怀着敬畏的神情聚集在生动显示断肢再植的手术的展品周围。他们非常感兴趣地研究带有闪光灯的“海鸥”牌照相机、上海造的“长城”牌电表和“珠江”牌彩色电视机。他们还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我记得过去几乎所有外国缝纫机都是胜家牌的）。这些缝纫机和牌子是海鸥、孔雀、蝴蝶、飞人、飞鸽、华南，售价约130元，有些缝纫机的外表涂了高级油漆，像家具一样发亮。

我是在对外贸易部的这些大展览厅里参观的唯一西方人。（交易会是北京的外贸部长白相国倡议的。）我的想法很清楚：如果我是尼克松总统，我就会马上撤出越南；如果我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我就会使我的百万军队撤离中国边境。“体面的和平”是一个造成亿万美金的体面浪费的动听字眼，然而“有利的和平”——对不起，尼克松先生，谢谢你。

是的，美国人在交易会上买了东西——我听说买得最多的是自行车以及艺术品、手工艺品和瓷器。是的，中国最好的瓷器仍然是景德镇制的。我在照相的时候对刘先生说，我们的工业合作社在1938年保全了这些瓷器及其秘密——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莫德·拉塞尔为了这个目的把她的一些积蓄送给了路易·艾黎。提起这种事情来未免有点俗气，但是

我毕竟不是为了埃米莉·波斯特^①作这次旅行的，而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我一向认为真理从来没有损害过善行，也从来没有帮助过恶行。（但是我料想中国人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五千年来，他们一直持相反的看法。）

是的，刘先生知道路易·艾黎，而且很佩服他。他对工合运动也略有所闻。

他解释道：“我们现在把它们称做工业集体。”他陪我看了在城市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展品，例如稻草编的手提包之类的物件（同我在新德里的交易会上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那里仍然用“工业合作社”这个字眼；印度人曾当场从墙上拿下一件展品，作为给我的礼物。）

我咕咕浓浓地说：“在我看来，从地球那一边到这里来看这些东西是值得的。”我终于抓住工合运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这只是一比方），我在新德里也说过这样的话。

自从1958年以来，中国就不用“合作社”这个字眼了。在农村地区，公社处理工业方面的事务。这种区别中包含着很多对立统一思想。

现在中国的任何地区都不制造任何宗教题材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花神”和奔月的嫦娥之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例外。这意味着观音菩萨成了收藏家的收藏对象了。

我看到一个龙门仙女的象牙雕卖给香港的一家公司，卖

^① 埃米莉·波斯特（1872—1960年），是美国评论社交礼仪的权威，职业消遣小说作家和期刊撰稿人，她写的《礼节：社交惯例蓝皮书》印刷达90次之多。——译注

了7万元（约合3万美元）。另一组象牙马卖给九龙，卖了2万元。我为一张画有一匹带翼的白马的精致绘画拍了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有这样一个同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相似的东西。（绘制这张画也许是为了吸引希腊人参观交易会。）

主要的题材之一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明朝的郑成功。另一个人物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当然，毛泽东是同这些传奇人物并列的。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的另一个常见的题材是有着宝塔和架在河上的新桥的延安，用以制作的材料有时候是树皮、羽毛、刺绣、甚至是煤焦油。我在此行中难得见到一件这样题材的东西（是在韶山火车站见到的），我终于意识到我也许是在延安被炸平以前从一座高山上向下拍摄延安的照片的唯一的人。由于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喜欢实事求是的脾气，我曾几次提到这些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能大大改善中美关系。延安确实是一个美丽的梦境般的小城，有着古老的城墙和护城河，这是艺术品的重要题材，但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去掉这座桥。

是的，中国的新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做得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精巧——除了古董以外。我见到在广州创作的一件真正的杰作。这是在一块大象牙里面雕刻的一件显示广州公社起义的气韵生动的工艺品。线条是动的，在一切方面都是动的，连红旗都在飘动（虽然我怀疑当时是否有任何人拿着红旗）。这件工艺品的设计十分完美，但也十分自然。这是活的艺术和活的历史，任何线条都不死板。只有热爱艺术的人能做这种工作，也只有热爱革命本身并尊重人权作为一种艺术题材的人才能做这种工作。我很想知道共产党人毕加索要是能见

到这种象牙雕刻会有怎样的看法。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值千百万美元(也许是因为有一种无意识地希望有人死去的愿望,想看到人降低到一架有毛病的机器的零件的水平),而中国有这样一位象牙雕刻家却不为人所知。我听说从来没有人为这件工艺品照过相,我要求为它照一张相,可是没有结果。在中国设法了解艺术家的名字不完全是反革命行为,然而已经接近于反革命行为,因为丑恶的个人主义是不允许抬头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雕刻象牙(或雕刻其他任何材料)方面做得像这个广州人一样出色。我不会用罗浮宫里陈列的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领导人民》^①来换这个工艺品。然而,这件小杰作,用中国人一向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用的材料,表现并美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

我不是在广州看到这件工艺品,而是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看到这件工艺品,那里陈列了广州最好的革命艺术品。我对向导说,应当把这件工艺品送到国外去参加中国艺术品和工艺品的任何展览会,但是我无法说明为什么应当这样做,只能说这件工艺品体现了广州公社和新中国的精神。人们一定同参加过这样一个事件的人谈过话,以便把握住神秘气氛。

这只大象牙一度曾在非洲平原游逛过,在那里,我的老朋友黄华曾经设计过“第三世界”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以象牙为基础,而且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础。

^① 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的想象力丰富,才思敏捷,是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驱。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自由领导人民》这幅画的图片。——译注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没有忘记要求参观交易会上的出口盥洗瓷器，希望看到浴盆底上的鱼龙嬉戏的图案。（不，你在中国不再看到很多龙了。）是的，有粉红色和大青色浴盆。不，现在中国的私人住宅很少有现代化盥洗设备的，只有城市的一些住宅和国家新建的住宅有这种设备。“抽水马桶”（这是中国的称呼）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不利于积肥。中国人在田地里一向利用人粪肥，现在这种人粪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对他们懂得这一点感到高兴，这不仅因为我成了使用有机肥的园丁，而且因为这种回收利用粪便的做法使得千百万中国人没有必要涌入西伯利亚去寻找肥沃的土地，像俄国人担心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土壤中的生命被中国人赶忙进口的许多吨农药和化肥杀死，中国就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我被农民讲习所吸引住了，这是在1924年创建的一所训练农会组织工作者的学校。毛泽东选择了孔庙作为校址，孔庙是当时广州最有吸引力和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我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坐过的椅子上，刘先生为我照了一张相。

刘先生不得不专门为我开了广州革命博物馆，因为该馆已经关闭。对我来说，参观这个博物馆是重要的，因为我想了解中国人是否有在长征中携带的（装在美孚油桶里的）稀有的历史性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即使不是差不多全部）是1936年在保安交给埃德加·斯诺让他保存和加印的。另外一些是在1937年交给我的。在大约20张照片中，广州只有一张，北京革命博物馆也只有一张（是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该馆已经关闭，我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韶山有的一张同广州的一张是一样的，是在1935年拍摄的一张感光过度

的关于红军的照片。我在中国无法找到其他任何照片的任何痕迹，虽然人们很难相信埃德加·斯诺在1960年访华以后没有带回照片。他在1936年回国以后给了我一套照片，我仔细加以保存。但是他的原来的照片和两套照片的下落怎样呢？这些照片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历史性照片中的一部分。

除了副主任王首道以外，我不认识广东省的任何人。王首道是湖南浏阳人，我在我写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写到他的履历。刘先生给他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但是他说他太忙，不能见我。另一个地位高的老革命是陈郁，是本地人。在省政府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一，为的是保持平衡。

王首道在1926年上了广州农民讲习所。他生于1907年，在担任第一个湖南省协会的主席时只有23岁。他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任高级政治官员。他在1967年曾帮助组织广东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1969年他当选为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不记得见过陈郁，虽然在1937年他曾在延安党校任教。他在1902年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①，是老一辈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1925年的香港——广州罢工（这次罢工使香港瘫痪了好几个月），并参加了中国海员工会。他是广州公社的一位高级领袖，在1927年12月负责广州公社司法部的工作。到192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1931年11月在瑞金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他一定是关于这批人的那张有名的照片上

^① 即深圳。——译注

的一个人，也许是左边第一人)。他是1949年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位代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新政府。1957年他就任广东省长，后来当了若干年。1967年他担任广东省“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帮助组织了省革命委员会，并在1968年担任副主任。1969年他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的妻子袁溥之在1949年以后是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在1960年以后担任广东高等教育局副局长。

我觉得广州还没有从不久前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恢复过来。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广州既没有妇女组织，也没有工会组织（广州的确有工人代表大会）。这两个组织都“仍然在改造中”。红卫兵在街上武斗。（向我提供的背景是这样的：刘少奇曾主张在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前搞私人工商业，反对他的人担心“资本主义可能复辟”。中国人认为苏联所作所为“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只是说的是另外一套。是的，广州有一些人支持刘少奇以及“五·一六坏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布一个文件，指示文化革命应当如何进行。“坏人”利用“五·一六”这个名字，试图使人相信毛主席批准他们的“极左”做法。有人对我说，简单说来，文化革命就是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刘少奇〕。）

东鳞西爪：

广州街道上到处都是和善的骑自行车的人（中国的所有城镇也都是如此。工厂工人和士兵有时候站着乘大卡车（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人民中国没有一辆私人拥有的汽车或出租汽车。公家拥有的这种汽车也不是很多。

公共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造成的空气污染不严重，然而工厂烟囱喷的煤烟简直像是飘动的黑丝绒毯子一样。在工业城市中到处都可以闻到这种气味。这是我的这次旅行中的最不愉快的事情，尽管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有中央供热系统。有人宁愿穿着驼毛衣服呆在室内，也不愿到外面去吸污浊的空气。中国人高高兴兴地把这种可怕的空气吸进肺里，这是他们为了进入当今的化学—机器时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由于道德观念，他们永远不会抱怨健康受到损害，或者抱怨不舒服。但是一旦他们知道这使人民在物质方面造成多大的浪费，他们就会设法研究如何回收燃料的微粒。

梅县的故事

能够同老百姓接触是一件大事。我的最有价值的经历之一是同一位 50 岁的农村出身的妇女交谈，她名叫叶云（译音），广东梅县人。梅县在广州附近，离叶剑英将军的家乡 10 英里，叶将军家乡的人也姓叶。许多广州人也就是从这个地方移居海外的。叶云给我一条中国头巾，像她戴的一条那样的。我还在韶山合作社买了另一条头巾，因为这种头巾戴起来又暖和又方便。

这个妇女是在长沙友好协会工作的。我在湖南省期间，她一直同我们一行人在一起。我们坐在汽车后座上交谈的时候，

她有时候握着我的手表示真正希望同我结识。她矮小健壮，一点也不瘦，红润的面颊充分显示了朴实的美和农村人的健康体魄，这是一个典型的米勒^①笔下的农民形象。她告诉我，她年轻时读过我写的《中国红区内情》。她是暗地里从共产党委员会那里得到这本书的，这本书对她产生了影响。

她在汽车中对我说：“我读过你的书以后，对关于蔡畅和她的家庭的章节有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知道了她的母亲怎样为别人缝衣服以帮助他们上学。许多中国人读了你的书。我秘密地读了以后，在同志们中间传阅。读这本书的是地下工作人员。这本书教妇女表现勇敢。从1939年到1945年，我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并且对另外一些人施加了影响。”

可能没有中国人像我的丈夫和我那样写过一本关于1936年至1937年保安和延安情况的书。一些中国人像我们一样很想了解共产党人的情况，于是我们成了他们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写的书就有了特殊的地位。中国人也不写传记。

叶云接着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我们在乡下过着困苦的生活。在农闲季节，我们帮助别人盖房子。解放前，我们一家8口只有1亩地。我们租了一个地主6亩地。我们家族有8亩公地，大家轮流耕种。地租交给家族的祠堂。如果我们收到100斤粮食，就把40斤交给祠堂。在扫墓的时候，我们举行纪念仪式，吃整个家族的粮食。我的家庭有些时候种10亩地，由4个人来种。然而这不够我们吃，因为我们必

^① 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年），是法国著名画家，年轻时从事过田间劳动，以画农民题材著称。——译注

须向地主交租。我们每年缺4个月粮食，因此父亲必须做工挣工资。

“我家族有15个家庭，祠堂还在。1951年土地改革以后，祖宗牌位被砸了。现在祠堂是生产队的粮仓。

“我的父亲没有受过教育。我的母亲和哥哥只上过几年学。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常常说我们的运气不好。她迷信，因此她祈祷佛爷保佑我们。在阴历每月初1和15，她总是烧香跪着祈祷。我的母亲真期望佛爷保佑，我的父亲也有这种想法。

“我的两个兄弟和我上了学，因为我的父亲靠挣工资得到足够的钱供我们上学。1938年和1939年我受到我的教师们的影响，渐渐认识到我们应当抗击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日本人。学校里有一个共产党员，对我施加了影响，因此我在1939年参加了党。然而在参加党以前，我已经知道贫穷不是运气不好造成的，而是地主造成的。而我的父母只是在革命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使我的家庭发生变化的是土地改革。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同其他诚实的好人一道得到土地。我们家庭有8口，得的土地比小家庭多，因此生活也比较富裕。在农村公社里，节制生育还搞得不好。他们孩子越多，劳动力也越多，生活也越好。他们不认识人口过多给整个国家造成的危险。他们在本地没有实行节育的积极性。我个人忙着在城里搞节育计划，城里的节育计划搞得比较好。

“30年前，我离开家乡为共产党工作，后来到梅县生活过。不，我不想被埋葬在祖先的土地上。干部应当为火葬树立榜样。”

我们就节育和家庭制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想了解新的区域性公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旧的血缘家族公社相似。旧的血缘家族公社在她的村庄里仍然在实行，虽然这个村庄离广州这个中国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只有几英里。参加讨论的人不能肯定说大多数公社成员是不是同姓的人，并属于同一个家族。

我说：“孔子的供奉祖先和多生儿子的主张不是一种迷信。这是中国个人和家庭长久存在的秘密，是繁荣昌盛的主要手段，因为这可以增加集体的劳动力和安全。中国是供奉祖先制度一直延续到这一代的主要国家，这是同部落社会并存的现象，不是封建主义。”

参加讨论的人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我们已经取消供奉祖先的仪式，但是想多生儿子仍然有同样的作用。”

我说：“你们必须鼓励小家庭。国家或者公社必须保证为人们提供老年保险，使他们不必靠他们的孩子。不向任何有一个以上孩子的人提供老年救济，当然现在首先从新结婚的夫妇做起，既往不咎。你们还可以在就业方面给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人以优惠的待遇。”

由于我冒昧地提出建议，他们以略带严厉的口吻对我说：“我们赞成节制人口，但是我们不赞成马尔萨斯。中国有很多山地，可以种植，我们的产量在逐年增加。”

（我在印度提出过同样的想法，但是印度人不仅愿意考虑，而且乐于听到任何关于节育的新想法。）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以上孩子，叶云有好几个孩子。

推动中国的节育运动的真正力量之一是社区工厂中的妇女组织。叶云带我去参观长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那里的委

员会主任对我说：

“是的，我们鼓励节制生育。工厂支付绝育和人工流产的费用以及康复期间的工资。这个工厂中有10多个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许多人做了人工流产，我们简直数不过来。在座的有多少人做了绝育手术？”（有4个人举了手。）

她接着说：“我们工厂有140个工人，只有20个是男子。在长沙，现在许多年轻夫妇只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二三十岁的母亲仍然没有第二个孩子。”

我在户外一直戴着叶云送给我的这条湖南农民的红毛头巾，它使我免患感冒。然而流行的“干部装束”是不戴任何头饰，只是在最凛冽的寒风中戴上一个长毛围巾。我认为这是“五·七”干校锻炼出来的。

“哦，你有一顶中国帽子。”是陌生人通常向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对他们说：“我有两顶中国帽子。我喜欢农民装束。这是一顶中美友谊帽。”

在叶云为我送行同我拥抱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在巴黎的时候将戴你的头巾。”

回想我的这次友好访问，我非常懊悔没有显示出自己最好的仪容，那就是穿上棉“干部”服。说来可怜，中国人非常希望我在一切方面在一切地方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在来中国访问的西方人中，姑娘穿超短裙，男人留胡子和长发，因而同公众格格不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悲剧。

12月3日 抵达北京

飞机是在薄暮时分到达的。我不知道在机场会有怎样的遭遇。空中小姐给我拿行李。我拿着手提包和装有胶卷的红帆布包，独自走过尼克松总统到达时走过的一大段路。寒风刮起黄土——我清楚地记得，30年代我在北京各地骑着自行车时吹进我嘴里的就是这种黄土。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机场。我单独走到一个我认为是出口的地方，那里有一小批人等着。

我的两个老朋友在有士兵守卫的门外面欢迎我。

我一面拥抱龚普生，一面说：“哦，在这样凛冽的寒风中，你真不该出来。”她头上只围着一条薄薄的丝围巾。我听说她的身体很虚弱。

她似乎非常高兴见到我。她说：“欢迎回到中国，回到北京，你的老家。”

我说：“自从我们一道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你。那次会议是在40年代举行的。你的样子没有多大改变。”

这个戴着大眼镜和大皮帽，大衣领子向上翻的高大的外国人是谁呢？

“噢，原来是马海德！我先前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北京。”

我见到他又意外又高兴。

“我住在这里，不过路易不在这里，他要在山西呆几天。”

龚普生把我介绍给欢迎的人——友协和外交部的官员。

这些人坐进两辆黑色轿车，沿着一条约有100码宽、两边都是小树的大马路向前驶。这正是尼克松总统进入北京时走过的路，我和几乎所有其他美国人都在电视机旁着迷地注意过这条路。

马海德医生回忆说：“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呆在一间畜棚中，以为自己患了黑死病或者斑疹伤寒就要死了。当时你正在从延安长途跋涉到西安，我正在上前线。那是35年前的事了。”

我告诉他：“那年夏天，我在延安得了5次痢疾，体重掉了20磅。你以为你得了肺癆——你也掉了那么多磅。”

“不，我从来没有得过肺癆。”

“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你从1936年以来，一直在这里过着中国人那样水平的生活。你现在中国化了吗？”

他回答说：“完全中国化了。我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妻子，还添了一个孙子。”

这就是纽约州布法罗的马海德，他自愿当医生，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和他们的翻译黄华（现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同时到达红区。我是在一年以后在延安遇到他的。

我解释道：“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你的任何事，因为你希望完全保密。你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过任何方面的很多情况。”

他说：“你也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

“我从来没有你的任何地址。连我这次来也没有你的地址。”

汽车开往长安大街，目的地是古老的北京饭店。长安大街很宽，很整齐，我已经认不出了。我被带到三楼的一套漂亮的房间——第 345 号房间，在那里，欢迎的人中除了三四个人以外全都离开我了。

我对我的新朋友说：“这是我的丈夫和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住的第一个地方，那一天也像今天一样刮大风，天气很冷。那是 1933 年 3 月的一天。这些房间的天花板很高，法国老板把温度弄得很低，我差不多要冻死了。我们也许是这个地方的唯一客人。当时这个地方叫北京大饭店。”

友协的林晨希望立即安排我的整个旅行的日程表。派到我这里来的两个女翻译资中筠和邓秀梅也坐在大丝绒软垫椅上。在此行中，白花边沙发扶手盖巾经常掉下来。每个地方的西方新式丝绒面家具都有这种很松的盖巾，甚至在工厂中也是如此。这些盖巾除了颜色以外，一切都相似。要是在 30 年代，我会立即告诉中国人怎样制造 U 形的帝国主义椅套别针来系住花边。我甚至会建议他们用同样的椅套来代替。但是我压制了我的空想社会改革家的本能，没有拿这种东西代替。我喜欢老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我知道中国人认为这些花边是西方时新式样的顶峰。

我想：“中国仍然‘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是随便，不太认真。（然而我听说中国对时间不再“差不多”。一切都非常准时。事实证明情况正是这样。在我预先安排好的活动中，无论刮风下雨，接待委员会的人都在约好的时间以前站在户外等我。我在整个这次旅行中从来没有改变一次约会的时间，参观北京少数民族学校是例外，那一次我以为要得肺炎，整天卧床，结果并没有得肺炎。）

我筋疲力竭，又瞌睡又饥饿，但是人们是不会把这种五角大楼机密告诉中国人的。

我的旅行路线呢？我本来不指望事先安排旅行路线。我指望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我希望看到任何想见我的人。当然，我也不想错过任何地方，除非是我先前见过的地方。

我的先后次序呢？

在 1941 年以来的漫长岁月里，我一想到回中国，就首先想到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塔利撒·格拉赫和孙逸仙夫人（与其说她像中国人，似乎不如说她更像美国人。）我清楚地记得 1937 年同我在延安交谈过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马海德医生，虽然他似乎认为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而不是我的朋友。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同 12 年后统治 8 亿人的这些中国人的几乎是独特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我身上有这种特殊的神秘气氛（我知道他们意识到埃德加·斯诺身上有这种特殊的神秘气氛）。

我想得最多的是像龚普生那样的燕京大学学生。在 1935 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那些日子里，我热爱这些学生。这个纪念日就要到来，我想同他们当中的尽可能多的人重新聚会，但是我没有具体定下来。（我看了我的桌子上的日历以后发现，在人民共和国的重大事件中，没有提“一二·九”。新的日历中也没有提到 12 月 26 日毛泽东的生日，虽然在前一年的日历上提到过。）

我的友协向导带着新中国的高效率的工作人员的语调对我说：“你希望首先做什么事？我们通常在 8 点 30 分出发。我们可以去参观艺术品和工艺品展览会。这不需要预先约定。”他的这种语调一下子驱散了我由于乘喷气飞机而产生的时差

带来的昏昏沉沉的感觉。

“一定。”我很高兴，这个问题就定下来了。

晚饭送进了我的房间。我穿上了“维也拉”牌法兰绒长袖睡衣，爬上床钻进红缎子被窝。这件睡衣是我在伦敦买的，是专门为了在东方的这种不暖和的旅馆穿的，这种旅馆我记得很清楚。

我不久就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我想旅馆一定着火了，于是我拉开蓝丝绒窗帘，看看有没有烟或者暖气片。是的，有我从1933年起就记得的大暖气片，但是我无法把暖气关小或者关掉。我按电铃叫——不是叫“侍者”，你可以叫他“同志”，我的翻译已经这样对我说过。（在中国，人人都被称做“同志”，尽管等级有不同；只是有些人被称做“主席”，只有周恩来被称做“总理”。）

我用以前说得很漂亮的北京官话向收拾房间的“同志”谈了我遇到的麻烦，并且带他去看暖气片，向他表示我希望把暖气关小或者关掉。

他明确地说“没有法子”，并且打开又高又狭的法国式窗户，让带着浓煤烟和我的老朋友黄土的强风吹进来。

我大声说：“我以为你们中国人不再用‘没有法子’这样的字眼了。应当把这个字眼看做‘五旧’之一禁止使用。”

人们怎样用不抱怨的口吻向他们说明情况呢？我很快发现这家饭店没有经理（其他任何饭店也是一样），没有电话总机（我也从来找不到一本电话簿）。你有事只能对收拾房间的“同志”说，他再对翻译说。

夜晚暖气比白天热。经过一些时候，我终于发现第三世界的一块把白人妇女赶出亚洲的地方。原来这是北京的最好

的旅馆，是只招待要人的。因此来自非洲的花钱如流水的游客占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因为他们通常带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一道旅游。他们不习惯于穿任何厚的或暖和的衣服，更不要说睡觉时盖毯子，因此他们不打算彻底改革任何这一类的“四旧”。他们希望温度始终高到非洲赤道的水平，而且他们拒绝用毯子。预料另外一些客人会开窗子。（我可以指出，医院候诊室里这样的人很多。）

我在发现这种世界革命的礼节以前，曾经注意到这家饭店的餐厅中有很多非洲人，都是留平头，穿深色西服。然而也留平头的妻子们则穿她们的赤道服装——没有袖子的薄长外衣，光着脚穿凉鞋，孩子们则光着腿和臂。

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通常是餐厅中的唯一西方妇女，只是偶尔有另外三四个人呆上两三天。

第二部分

重返北京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语录》（这段文字是有人送给我看的，这是了解目前形势的关键。）

北京饭店

在我呆在北京的第一个早上，我穿着饭店提供的一双新的天蓝色橡胶拖鞋（我后来托人把这双拖鞋寄给我），在漂亮的大地毯上走动。豪华的浴室就像我记忆中的 40 年前的浴室一样，也许管道都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说这个饭店的水龙头是包金的，这些水龙头看起来的确像是金的，不是铜的。在早期建造浴室的日子里，有时候用了金子，不是作为一种奢侈品，而是像在牙医业中一样，因为金子是当时知道的唯一不生锈的金属。

我从我的三楼房间眺望窗外宽阔的街道，只见大群膝盖接着膝盖、慢慢移动、专心骑着自行车的人群，为数不多的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在中间的车道上行驶。我记得邈邈的骆驼队缓慢地从门头沟把煤运来，赶骆驼的人则直接从骆驼身上把毛弄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把毛捻成毛线。过去是两排人力车在门口等着，现在我看到的是大批汽车，司机们一边等着送外国客人开始一天的旅行，一边无意识地擦着光亮的车身。

我穿上我在伦敦买的供在“大寒”时节穿的衣服，成了

北京的身上唯一有驼毛的人。我知道“大寒”这个节气^①在1935年大约是在12月9日学生运动时到来的。

在走廊里，我不知道转向哪边乘电梯到餐厅去。我先转向左边，意识到这个厢房一定是解放后建造的，而不是解放前建造的。我转过身去，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原来的那个古老的电梯。管电梯的姑娘端庄、腼腆、美丽，穿着没有熨过的水手式宽外衣。她老是低着头看脚。

老门厅似乎一点儿没有变。是的，铺着红地毯的宽楼梯也没有变。我曾经作为北京的唯一时装模特儿，穿着海伦·伯顿用极精致的织锦做的、带有衣裾的文艺复兴时期式的晚礼服走下这个楼梯。海伦·伯顿开的出售东方珍品的驼铃商店已经被用作办公室。这个商店的房子仍然伫立在楼梯顶部，俯瞰着熙来攘往的客人，也许一个客人都不认得了。

我在古老的舞厅中漫步，那里面的镜子是依照凡尔赛宫镜厅布置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同各种各样的人跳过维也纳华尔兹舞，其中有纳粹分子，有法西斯分子，有斯堪第纳维亚人。我有时穿我自己的飘旋的舞服，有时穿海伦·伯顿店里向游客陈列的舞服。这曾经是远东的唯一有排场的舞厅。不错，你可以在其他饭店里跳舞，但是排场均比不上这里。你在这里也许能见到特命全权公使齐亚诺伯爵和他的妻子、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你也许会被介绍给前来参加宴会和看跳舞的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德日进，他是两千万法国男子中最英俊的人。你也许会看到当时担任美国公使馆卫

^① 此处“大寒”似为“大雪”。“大雪”一般大约在每年12月7日。——译注

队副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最英俊的人埃文斯·卡尔逊上校同他的妻子埃特尔一道进来。他也许会同我们的武官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上校和年轻的文化官员约翰·谢伟思（后来是麦卡锡时代的讼案中的有名人物）一道进来。除了埃德加·斯诺以外，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住在北京（的确也是住在整个远东）的最有名的外国人。我们还可以加上费正清夫妇（费正清后来成了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

餐厅同以前一样，至少看起来同以前一样。厨师头告诉我，他在北京饭店有42年了。我的汉语很差，但是我还是勉强问他我们曾经住过的盔甲厂和附近有狐仙的狐楼还在不在。他对北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说这些地方都还在。

纸老虎时期的旧北京的神秘气氛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往日我们常常说，北京的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你在这里能遇到从全世界各地到中国来旅游的每一个人，这是你在其他任何城市都做不到的。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人（实在的和潜在的）仍然到北京来，只是你无法见到他们。这是未来世界的不通到别的地方的十字路口。过去是欧洲人到这里来——日本人除外。现在有着各种肤色和条件、彼此敌对程度各不相同的每一个国籍的人都到这里来。当我呆在北京的时候，餐厅里有卢旺达的一家脸上毫无笑容的人坐在我旁边。有一次，最小的孩子摇摇晃晃走到我身边握我的手，她的母亲把他拉开了，连看我一眼也不看。

我渴望同饭店中的任何一个客人谈话，但是这不合乎礼节。到处都有一种彼此隔离、秘而不宣的气氛，几乎带有阴谋的味道。能够猜谁是新客人的唯一办法是读新华社的电讯稿，这是免费赠阅的，每天都送到房间来，内容是国际和国

内新闻摘要。(我呆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见到过其他任何出版物——除了政府印的另外一两种出版物以外；其中一些出版物用的是欧洲文字。)

我呆在北京的时候，几乎始终独自坐在靠近门的一张桌子旁边，不过偶尔也有人被介绍给我。我通常一点胃口也没有，不过我总是吃点东西，多半是吃中餐，因为菜单上有外国菜，也有中国菜。我过得很愉快，很兴奋，但是我觉得我的应酬太多，太疲倦，吃不下去。直到我停留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我才听说北京的这家饭店和其他供外国人住的饭店中的蔬菜是在专门的农场种的，吃了不会得痢疾。菜单上有莴笋和黄瓜。我是在看路易·艾黎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从他那里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我本来可以问我的翻译，但是这样做似乎不太适宜。我曾经问凉开水是否真煮沸过，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在每个饭店房间里，都有一个大保温瓶，通常是艺术品，里面有热开水或冷开水，但是我不想冒险。你旅行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两件事：不要受凉感冒，不要冒险吃冷东西，以免得痢疾。

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主要吃中餐，我的胆囊功能完全正常，这可能得益于这种伙食。

现在北京同以前不一样了。使馆区设在郊区，是新建的，同外界隔绝。外交使团有 1000 个外交官，其中 400 个是苏联人。西方报纸有 11 名记者，其中两人是路透社的，一人是伦敦《泰晤士报》的（戴维·博纳维亚），一人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伯恩斯）。外国记者总共有 30 人，东欧记者、日本记者和西方记者各占三分之一。

常住中国的新中国通同任何人往来，只是偶尔同一些

旅游者交谈。他们的处境很微妙，报纸上或者外交官说的任何话都很容易归罪于他们。我听说唯一进行社会活动的人是美国人朱利安·舒曼。

中国人的看法是，在有疑问的时候，不要采取行动。因此他们一般是不冒险的。所有外国人的消息来源都是新华社提供的材料——除了中文出版物以外。

北京的气氛是保密和相互隔绝，外交色彩极浓。谁也不希望别人引用自己的话，除非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提供一些不带刺激性的情况。做一个中国人的本领就是在一切大小问题上都会运用外交手腕。

“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不是很好吗？”这是观察家们在提到全世界各地出现的新缓和时发表的共同意见。

对旅游者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通过翻译做的。翻译既是一种相当于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的人，又是旅馆中通外语的接待员，还是朋友。第一号英文翻译是曾经陪同过尼克松总统的唐闻生。她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亲唐明照现在在联合国代表团中工作。第二号英文翻译也许是姚伟，他曾经执行过困难的任務，虽然他原来在1960年为埃德加·斯诺做导游时就开始出名了。在北京曾经流传过一种说法，说他曾经使约瑟夫·艾尔索普着迷。然而没有任何中国人能使威廉·巴克利^①（曾经同尼克松在一起）着迷。

我的第一号翻译和友协导游是一位极好的翻译。关于资中筠的另外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有一天天黑以后不久，我决定乘一辆出租汽车去拜访路

① 美国保守的政论家。——译注

易·艾黎。我知道打电话是不行的。于是我走到门口的问事处。我在饭店中找不到任何懂英语的人。有人对我说：“等一会儿。”我的一位翻译几乎立即从铺了红地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的神色很惊慌。

她解释道：“您要用车，随时都可以。那辆车完全由我们支配，司机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饭店里。”

听说我的两位翻译在饭店里有一个房间，同我的房间靠得很近，我感到很惊讶，但是在这次访问以后我再也没有麻烦她们了。

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出租汽车这样的东西，甚至在大城市也很少。只有得到一定地位的人才能用上一辆汽车。你也不能雇用一位翻译或秘书。对于一个从外面来的外国人来说，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官方渠道。人的劳动力是不能买的。我在延安已经碰到过这个问题。除非是由某人施加政治影响，否则你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我始终需要一个翻译，但是我无法雇用任何人来做这种工作，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苦工。新学生希望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事业上，而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身上。同我谈话的人甚至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但是我的翻译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当我问到个人问题的时候，他们特别厌烦，想把话头打断，但是我懂的中文足以使他们在大部分时间按照我的意思翻译下去。我从来没有表示真正赞赏他们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记得我是欠了债的。

在延安，我意识到货币经济中的真正民主性质。如果你能出钱买一个东西，你就能得到它。反封建的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民主变革。然而到头来货币经济只是使最平庸的人当权，

这些人除了会聚钱和赚高薪以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才能或能力。为赚钱而工作的人不是建立一种美好的社会的人，虽然这种社会可能是运用特殊的技能或天才的副产品。在货币经济中没有人是奴隶，尽管人们可能快要饿死了。人们可能由于缺少钱而成为囚犯。但是如果你有钱，而又买不到任何东西，你就会成为政治犯。中国正在设法应付这种两难局面。一切地方都实行一种以工分或者薪水为基础而不是以股份为基础的工资制。你能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东西，买不到的东西是例外，这就是不供出售的东西，例如汽车、翻译、《纽约时报》或者《真理报》。

解决这个自由和必然问题的真正办法是遵守法律原则，使个人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支持个人的力量是他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不是政治影响。中国还没有注意到法律本身的需要问题。

尽管我是实行货币经济的社会的一个公民，我还从来没有为赚钱而工作过。

12月9日 团聚

就我所知，在中国和我之间仍然实实在在挂着竹幕。

马海德医生在第一次看望我的时候说：“我们不断打听你为什么不回到中国来。”

谁能向中国的任何人说明我的特殊情况呢？为什么要破

坏这次旅行呢？哪怕是想想冷战麦卡锡时期的那些漫长可怕的岁月，都会破坏这次旅行啊！我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安乐窝里长大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怎么能理解这种看法呢？至少就钱的问题来说是如此。我几乎生活在货币经济之外，对我来说，哪怕只是筹措 2000 美元作为到中国旅行的费用都几乎不可能。可是我又怎能说明这一点呢？特别是因为我欠的税款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人怎么会愿意这样生活呢？

在中国的外国人靠货币经济生活的时间很长，他们不会忘记人要是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我听说，中国的任何人（连被“拘留”的人或失势的人）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更难解释的是，为什么我必须自筹路费，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中国的钱。我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在幕的两边，我的一切主张都是以这为基础。我的丈夫和我曾经模糊地意识到，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架设一座越过银河通往共产党中国人的桥梁的美国非共产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占据了一种独特的外交地位。在所有人当中，我是最了解埃德加·斯诺在做好两边的工作而不是一边的工作方面取得的罕见成就的。两颗行星在决定性时刻接近了。

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点的确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欢迎我们两人重返中国时所用的公式是：“你们是第一批。”他们没有进行解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话的意思。这话的意思是：你们是第一批独立的局外人来冒险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并说出这种真实情况的。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对为求知而求知的事业的一种真正的赞扬，就西方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作出了一种富于独创精神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我的遭遇同埃德加·斯诺的遭遇完全不一样。我们当初在美国好比同乘一个双人小木筏，但是他克服了困难，我却不得不用多种办法勉强活下来。他写的书和文章卖了以后使他得到足够的收入。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同他的公众取得联系，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国的任何人都觉得很难理解，既然埃德加·斯诺能靠写书赚钱，我怎么不能靠写书赚钱。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海德带着诧异的神情说：“你们都有这种了不起的知识和经历。你本来应当像埃德一样大获成功，甚至获得更大的成功，因为你作为一位妇女，有这样的不平凡的经历。”

他的话完全对，而且碰到痛处了。

我说：“这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卷入的其他事情太多，破坏了我的工作，想补救已经为时过晚。”

我很不喜欢谈我个人的问题。然而一件重要的事情卷进了我的生活。你无法选择时间和地点，像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期望的那样。我遇的情况是：我表现得不够坚强，在遭受1949—1950年时期的创伤（离婚、朝鲜战争、麦卡锡时代）以后，没有能好好地干。我可以写作，的确也写了大量的作品，但是由于肯定不会出版，我无法再写下去。我从来没有运用我拥有的全部宝贵的、独特的知识，而想到这样做的时候又太晚了。然而当初我要是能得到哪怕是微小的帮助，比方说每月能得到100美元的生活费，我本来是能干得很好的。然而我真正被压垮了。尽管这样我的确活下来了。

我向马海德解释说：“我把一生当中10年最好的时光用来为工业合作社筹措款项。我本来应当集中利用这段时间从

事我自己的工作，我也始终意识到这一点。我每个星期都想利用我拥有的全部特殊的材料，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只是做了一些资料工作。我不得不经常为替路易和合作社筹措款项操心。我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好工作的人，尽管另外一些人也工作。”

“路易知道吗？”

我说：“我想他不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好不提了。我从来没有向路易提合作社的事，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过合作社的事。我知道他丝毫没有想过筹措这种钱有什么意义。他从来没有卷入这个问题，至少没有像我那样。他认为这一切都像玩魔术一样。埃德也这样认为，虽然他对我为合作社花了这么多时间很不以为然。

对于这种事情，我除了怪我自己以外，从来没有怪过任何人，然而这仍然是一提起来就使人痛苦的事情。做事和写作是不协调的。你无法同时进行这两者。我的丈夫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集中力量进行写作。我习惯于无报酬地进行工作，我现在仍然有这种习惯。我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为金钱而工作，甚至没有设法使我的著作同公众见面。我在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大错误。我形成了一种超越于金钱概念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作态度，这差不多使我成了一个靠稀薄的空气生活的动弹不得的囚徒。

我不需要向龚普生那样的“一二·九”运动的学生解释这一切。我们在多年离别以后重叙旧谊。她的样子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在三年以前她遇到过许多问题，包括生了一场病。她对我说，要是我那时重返中国，她也许不会做“任何这种事情”。她十分费神照管我的访问，她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12月9日的团聚是分阶段进行的。正是在1935年的这一天，燕京大学学生打破所谓的“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走上北京街头，举行反法西斯爱国游行。学生会中有7位领袖。那时候我是多么热爱他们啊！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为我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是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杨骥、秘书长丁雪松以及林晨为我举行的。外交部的代表是副部长乔冠华、龚普生女士和凌志诚（译音）。特别的客人是马海德医生和他的美丽的妻子苏菲。我的两个新翻译当然也参加了。

接着，非常出人意料的人出现了。我立即认出他来。

“啊，是陈翰伯。”我张开双臂想去抱他，但是他本能地后退，像受惊的马看到新的笼头一样。（我们的老朋友黄华曾经在纽约同老朋友们拥抱，乔冠华也采用了旧派中国人非常反感的这种礼节。）

我大声说：“你曾经由于想帮助我而不得不躲避警察，逃到延安，从那时以来，我就没有见过你了。我最近发表了一张你在延安门前欢迎其他学生的照片。在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的新书《在长城后面》里的我的照片中还有一张你同黄华在一起的照片。这两张照片都在今年那里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展览过。我们希望在美利坚看到原来的照片。”

陈是一位记者。他曾经担任燕京大学在学生运动期间出版的刊物的编辑，以编辑身份到西安进行过一些鼓动工作。我们在1937年曾经一起进行过一种冒险活动。他预定要帮助我离开西安到红色首都延安去。一个雨天的早晨，他到达以后发现我躲在一个寒冷的仓库的米袋中间，警察正在守着。我奉令前往西安宾馆，他和我乘坐人力车，由警察陪着。他用

了假名字，躲了起来。

我说：“我在文化革命中为你们所有的人担心。”

我听说陈刚刚离开“五·七”干校。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告诉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成员”。后来据说他是该出版社的社长。该出版社负责出版政府的所有官方出版物。

告诉我：“我们都上过‘五·七’干校。”但是我不能肯定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意味着再教育，特别是针对那些受过西方式教育的人和操英语的人的。

龚普生对我发出邀请：“你可以马上去看看‘五·七’干校。”

原来“干部”上“五·七”干校是强制的，现在是自愿的，由有关部门轮流去。政府高级官员必须到农村地区去生活，“向农民学习”。他们必须干农场的各种脏活累活，包括堆肥和处理人粪便。这是一种使人失去社会地位的做法，即一种非资产阶级化的做法，这是建立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计划的一部分。

宴会是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北京烤鸭店举行的，不是在老的建筑物中举行的。当然，这个餐厅是有名的老餐厅的革命后代。这个地方一尘不染，而且有点西方化。在过去，北京烤鸭店非常脏。有些时候，我们只好闭着眼睛。但是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一面吃一面看着地板。长长的菜单上的每一道菜都是用鸭子做的。

这是我在任何地方参加过的最好的宴会之一。北京鸭是中国烹饪术的杰作，可说是尽善尽美。又大又肥的白鸭子是用催肥的办法喂养的，同喂养用来制肥鹅肝酱的鹅的办法一样。这种鸭子的肝过分发达，使鸭肉产生一种特殊的味道。赫

鲁晓夫对北京的这种菜着了迷，但是当中国厨师到达苏联教做这种菜的时候，仿造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饲养鸭子的方法不对（这是对世界革命的一种比喻）。

我喜欢吃鸭肉薄片，你自己把这种薄片放在未经发酵的面做的薄饼上面，加上新鲜的青葱条和花椒面，然后卷起来，就像白兰地油煎饼一样，这是其他任何薄饼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人喜欢在宴席上用圆桌，我在看围坐在一起的友好热诚的面孔的时候，注意到房间里非常安静，非常严肃。往日我们坐在鸽子笼式的小房间里，外面的喧嚣声大得使人听不见讲话声（喧嚣声大于宴席上的声音），但是你总可以听到有人在楼梯上大声宣布某人在门口留下多少小费。（现在在中国不允许收小费，这是为了维护劳工的尊严。）

乔冠华带头在宴会上讲话。他不请自到，为的是同我相识。我曾经在纽约同他见过两次面，但是没有时间交谈。他在1971年曾任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后来又不时到联合国去处理事务。

他打破沉寂，向我发动进攻：“你喜欢印度吗？”

我说：“甘地夫人现在掌权，事实上她被神化了。她现在做的事情是她的父亲和圣雄从来不敢尝试的。我听说她目前正在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我先前从来没有到过印度。有人说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进展使我感到意外。”

有人带着讽刺的语气插进来说：“但是你不知道谁为此付出代价吗？”

于是大家谈论孟加拉国是怎样使甘地夫人掌权的问题以及苏联问题。有人向我问到后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过苏联。我认为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逮捕以后，最好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害怕！”“害怕”两个字是用汉语说的。

但是有人对我说这只是一个差错，而且已经承认这是一个差错。她本来可以重返苏联，但是她拒绝这样做。

我咕哝说：“这比差错糟，但是我不想在中国花时间谈这些事情。我曾经感到这是从草原地带对所有对中国特别友好的美国人发出的一种冰冷的威胁，即使进行这种逮捕不是为了直接侮辱每一个这种美国人。”

我说，即使不把苏联加到单子上，我已经有够多的麻烦要操心了，我不想谈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听到我的这番话的人非常反感。对我说，你必须研究苏联形势，你必须了解修正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

但是有人对我说：这个问题太大，一次谈不清楚。

我说，世界局势似乎有利于一切地方的缓和，看来旧时代——帝国主义的旧时代——结束了。机会不应当错过。我发表意见说：“尼克松有权。你们可以同他打交道。”

有人向我进攻，问什么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不止一种，社会帝国主义远没有结束。你知道苏联修正主义者现在在我国边境附近有 100 万军队吗？他们为什么呆在那里呢？

我说出我的意见：“美国不希望苏联进攻中国。这不是主观愿望。我们现在有许多新问题要处理。”

有人要我解释为什么《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个很大的关于台湾的副页，里面说了台湾很多好话。

我说：“我读了这个副页。这只是一个出钱刊登广告性质

的副页。台湾必须为这个副页支付许许多多美元。不是这家报纸的政策有了改变。《纽约时报》也会为中国发表这种副页，如果你们愿意为这种副页拿出许多美元的话。看看这一页的底部，你就会看到‘出钱刊登的广告’字样。”

我个人对这个副页感到震惊。这个副页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我知道北京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决不会懂得这种事情，但是我对他们的真正伤感、失望的语调感到有点意外。

我冒昧地揣测着：“台湾希望离间中国和《纽约时报》的关系，因此他们出钱登这个副页。这是一种成功的手腕。”

然而中国人觉得这个台湾副页的意义远远超过我试图作出的解释，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责怪具体的人。我在向中国人说明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手法时仍然像许多年以前一样有一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沮丧情绪。他们把《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每一个字都不仅看成是明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且甚至看成是华盛顿的政策。在中国，出版物不受政府检查或控制的概念是不可理解的，就像在差不多其他每个从来不知道这种概念为何物的国家一样。我不责怪中国人过于猜疑。在这个问题上，事情毕竟也许要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

1971年，中国曾经欢迎《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和记者们——蒂尔曼·德丁、詹姆斯·赖斯顿、西摩·托平和他的妻子奥德丽。1972年，中国曾经欢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约翰·李。现在不让《纽约时报》的人进来了。任何人都很难理解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特别处境，特别是那些打破坚冰和披荆斩棘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一种外交战线上。“照常营业”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也不能想象编辑部是同广告科分开的，左手也许甚至根本不知道右手在

做的事。(一个编辑在几个月以后的确曾经对我说,他甚至从来不知道有关于台湾的副页。)^①

在这次宴会以后,有人多次向我问到这种问题。

这次招待会的主要结果是,我就苏联和修正主义问题向各种各样的人请教。

12月9日,我在北京饭店一间雅静的餐室里同龚普生和我们在1935年学生运动时期的老朋友阿瑟·张(张炜逊)博士及夫人梁思懿一起用晚餐。张炜逊夫妇以前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妻子梁思懿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和改革家之一——梁启超的女儿,体魄健壮,像运动员一样。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梁思永^②已于1971年去世。他是负责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家之一。他在30年代曾向我介绍过

① 对抗是这样出现的:北京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周南要求《纽约时报》不要接受反北京、亲台湾的团体的广告,而这些团体则抗议北京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1973年5月17日,《纽约时报》回答,它不会改变它的“把刊登政治广告的自由作为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政策。同时一篇社论说,《纽约时报》进行的唯一的新闻检查是不允许刊登进行任何种族的或宗教的攻击的文章。北京的代表说刊登反北京的广告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并暗示这种事可能影响向中国派记者的工作。A·O·苏兹贝格说:“我们努力保证广告的内容符合我们的高尚行为的标准,不违反宗教信仰。”如此等等。

经过22年,直到1971年4月11日乒乓球员访问的时候,才对正规的美国报纸记者发签证,虽然独立的自由撰稿人和新闻工作者已经进行了访问。《纽约时报》的马克斯·弗兰克尔已经随尼克松一行人到过中国了。——作者

②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判断,应为其兄梁思成。——译注

中国建筑的原则。我记得他说过，问题就在于重檐斗拱的大屋顶。

我上次见到他们大约是 1949 年在美国，那是在他们回中国之前。阿瑟是加利福尼亚一位生菜种植者的儿子，他父母现在仍住在洛杉矶。家里把他和妹妹康斯坦斯（张希先）送到北京上大学。康斯坦斯后来与唐明照结为伉俪，南希·唐（唐闻生）是他们的女儿。

阿瑟学成后当了儿科医生，在洛杉矶县医院里任住院医师。后来他又先后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和纽约贝尔维尤医院从医。1958 年，他担任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大约在 1968 年，他被任命为该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这对一个美国出生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他告诉我，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时曾到他们医院参观，同他一起呆了整整一天。

阿瑟是中国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医生之一，他们那家共有 600 个床位、270 位医生的医院既有西医，又有中医。虽然上海和广西约在 10 年以前就已经开始采用针刺麻醉，他们医院只是到 1971 年才开始采用针刺疗法。当然，针刺疗法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现在采用的新方法是用电而不是用手来捻动银针。我推测，针刺疗法是利用生物电引起神经冲动。作为一种依靠自身力量治疗疾病的方法，针刺疗法是对未来有机生命的一种贡献。

我没有问阿瑟的薪水有多少，但据说医生一般每月工资约 120 元到 160 元，折合美元不到 70 美元。他们的动力不是金钱，而是医学为公益服务。他们因自己的出色工作而真正感到自豪。

12月9日这一天，我未能同当年校内三位最重要的女学生领袖中的两位重新相叙。这两位就是李慧和张淑义。李慧在中国报纸上看到了我抵达北京的消息，后来她独自一人来北京饭店拜访我，过去那种热情奔放、直率开朗的性格已完全变了。她看来似乎很忧伤，她承认“我感到自己垂垂老矣”。这位当年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中文英文造诣皆高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她在外交人员中既教中文，又教英文。从她的突出的个性和学历来看，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她的丈夫叶德光在外地工作，但她给他写信转达了我的问候。

李慧来的时候神色严肃，十分理智，但是她胸前别着我自己在美国国内作为学生领袖担任学生会副会长时的旧校徽。那是我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作为纪念品送给她的。她植根于中国大地，出生在贵州一个翰林之家，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获得奖学金。我告诉她，1971年我在瑞典曾发表一篇有关她的文章，《瑞典国际开发署报道》非常喜欢那篇文章。

我从1950年在美国见到当时在那里上大学的李慧和她的丈夫以后，一直没有见过她。她把我托她带回中国的一份关于妇女问题的手稿退还给我。此手稿的一部分后来曾以《近代中国妇女》的书名于1967年在荷兰出版。自1950年以来，中国一直无人对此书感到兴趣。然而，我还是把它交给了龚普生，让它保留在中国，也许会有些参考价值。

我一直到最后在北京为我举行的送别午宴上才见到张淑义。李慧和龚普生也出席了那次午宴。她看上去依然很健康，很快活，因为是从“五·七”干校回来，所以脸色黝黑。她是在妇联专门办的“五·七”干校里。在文化革命期间妇联差不多停止活动之前，她一直在妇联担任负责工作：

张淑义和龚普生两人从燕京毕业后都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了10年左右的全国干事，然后又来美国。在纽约，张淑义同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一位学者徐永英结了婚。那个组织在美国后来被麦卡锡主义的镇压活动搞垮了，不过它迁到了加拿大。在那里，该学会在威廉·霍兰的主持下至今仍在继续活动。据她们告诉我，徐永英已经在前些时候去世了。

“我上次见到你是在19年以前，在美国。”张淑义在同我见面打招呼时说，脸上像过去一样总是带着微笑，两边漾出两个酒窝。她说：“那是在1953年。我儿子是在布鲁克林出生的。”

我还记得那一年她和丈夫同李愨夫妇一道在唐纳狄州麦迪逊市我的那幢小房子里过圣诞节的情景。那天她忙乎了一整天，辛辛苦苦地给我们包饺子、下饺子。所有做饺子的料都是她带来的。她刚煮出一锅来，我们就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光了，她又得再做一批。饺子是我爱吃的食物之一，是中国北方过节时吃的，与意式煮合子很相似（煮合子可能正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回来的）。饺子馅一般是牛肉、猪肉和鸡肉，剁成碎末，拌上生蒜、生姜和豆腐酱，再加入其他调料，它们用未经发酵的面团轧成的薄薄圆圆的饺子皮包起来，再把皮的两边紧紧地捏在一起。饺子包好以后就下到沸水里煮熟，然后捞出来，趁热蘸着醋、芥末、酱油等佐料吃。

在同苏联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裂的那些复杂的年代里以及在随后发生的文化革命期间，在中国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中国妇联国际部的工作。张淑义一直担任该部副主任。在中国，有组织的妇女比任何其他成份都更加面向国际。

张淑义看上去身体很好。她去了“五·七”干部以后，实

实际上看起来倒是发胖了。(也许这正是李愆所需要的——扎根于人民。)张淑义说她学到了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她过去20年里所不知道的或者说是没有学过的,这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包括如何耕地和从事农业生产。她说她特别学习了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运动中的三件事:(1)阶级斗争,(2)生产斗争,(3)科学实验。

“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几乎总是说他们“感到自己又年轻了”。

我在1972年见到了当年“一二·九”7位倡导者中的5位,其中包括在纽约见到的黄华。另外两位怎么样了?对陈洁的情况,我一无所知。陈的父亲曾当过溥仪皇帝的太傅。至于个子高高、和蔼可亲的学生会主席张兆林,我听说他早就去世了。一种说法是,他是在新疆被国民党的省长盛世才下令处死的。然而,陈翰伯在1972年对我说,他认为张兆林正在以前的满州的吉林大学任教。

在我1936年去西安时,张兆林曾陪着我在西安四处转悠。当时他正在西安当编辑。我那次西安之行一事无成,他又陪着我坐火车返回北京。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这个美国化的燕京—清华帮1935年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自己的特殊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在中国仍旧很有影响,尽管文化革命的矛头除了针对“四旧”以外,也是针对他们这样的“前资产阶级”的。

同“一二·九”人士的另一次重聚是后来在上海同休伯特·梁(梁士纯)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他当年是燕京新闻系主任,因此成了我们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一道工作过,1937年又一起创办《民主》杂志,

1938年再一次共同创办“工合”工业合作社。

另一位“一二·九”时期的朋友是当时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夏仁德。他是长老会传教士，燕京最得人心的教师。他也曾帮助我丈夫和我完成上述三项工作。我这次在北京听说，他已受到邀请，请他春天重返中国。我刚回到美国，他就写信给我，说他和他的漂亮的妻子路易丝将于1973年4月6日动身去中国。^①“一二·九”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是选学他的课程的选科生，如龚氏姐妹和李愨。另一些是选学休伯特·梁的新闻系课程的选科生，如陈翰伯和张兆林。

“一二·九”运动的那种特殊的精神现在仍在发挥作用，它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它是在中国联结东方和西方的无形的环节，它汲取了东西双方的精华。而这一批人则是周恩来的基本队伍的一部分。

在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的所有这些年里，大陆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个人联系全都中断了，直到尼克松访问以后才恢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无论哪一位中国人的任何信件，直到1972年才收到休伯特·梁的第一封信。

然而，我们终于恢复了1950年前后中断的联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恢复了，尽管每个人的言谈都很谨慎，除了有关个人事务的谈话以外，谁也不希望自己有关任何其他问题的言论被人引述。

^① 他们后来向我谈到他们受到盛大欢迎的情景，先后共有50多位朋友前去拜访他们。——作者

乔冠华和龚氏姐妹

乔冠华是燕京—清华帮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而且由于同龚澎结婚，他也成了“一二·九”时期的人物，虽然他在1935年“一二·九”示威游行的时候正在德国。^①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个子很高。他身材削瘦，劳累过度，十分健谈而有权威。作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他是中国同西方关系缓和的设计者。他的性格和言谈举止异常有感染力，他对人友好开朗，坦率直爽，通情达理，富有经验，是北京最西方化的人物之一。

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的时候，正是乔冠华和他的大姨子龚普生决定在北京安排一次追悼会，以对他表示敬意。那是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任何人举行追悼会。后来曾领着我去看那个地方，那是面对天安门的大门厅。在会上致词的是乔冠华。参加追悼会的人包括周恩来总理和夫人，孙逸仙夫人，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毛泽东送了花圈，他的夫人江青代表他参加了追悼会。这也许是中国历来给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表现之一，也是中美友谊的悠久传统的一个表现。

^① 由于乔冠华用过“乔木”的笔名，所以一度曾经引起混淆，因为另一位中国人也使用过同一笔名，而后者的真正姓氏是“胡”。——作者

乔冠华是在1950年第一次到美国的，是同龚普生一道去的。当时他是为台湾问题派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团长是伍修权将军。（有一则消息说，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大约在1934年到达江西后，伍修权是他的第一位翻译。）

在那以后，乔冠华在外交部担任过多项负责职务，自1964年起一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不论在任副外长之前还是以后，他都出访过许多地方。

乔冠华和龚澎1943年结为伉俪之后琴瑟和合、默契配合之好，确是不平凡的。他们夫妻相亲相爱，直到龚澎1970年因得脑癌而不幸去世。他们的结合真正是一种了不起的、硕果累累、成功的婚姻的范例。首先，他们两人当初都从事青年运动和新闻事业。

龚澎1914年10月10日出生在日本。她的父亲是安徽人，名为龚镇洲，是一位反对袁世凯的早期国民党革命者。袁世凯悬赏捉拿他，他带着妻子和刚满月的孩子龚普生逃到了日本。在他们一家三口藏在一条小船里的时候，孩子一声也没有哭。所以，母亲常说普生懂得在必要时如何保持沉默。（她后来真的成了一位办事十分谨慎的外交官。）

因为龚澎是在中国的国庆日出生的，所以最初起名为“庆生”。在他们回到上海的家里以后，两姐妹都到一所上等学校——圣公会办的圣玛丽女校——上学，虽然他们家并不信基督教。1927年以后，中国的学校制度很糟，女孩子们不好好学习，而是耽迷于跳舞。所以，她们的父母亲决定把两个女儿都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去读书，因为那里风纪好，教育水平高。校方规定一个月只许学生回家一次。龚澎当时参

加了校内的基督教活动。

两姐妹后来又上了燕京大学。李愨告诉我，1936年到1937年，她是龚澎的同班同学；龚澎学习非常用功，主要是学历史。她们两人当时都是学生会干部，李愨担任学生会干事长。她们两人还都是伦·赛勒的学生，赛勒对她们两个，还有龚普生，都有很大影响。

1937年日本在北京附近发动进攻的时候，她们姐妹俩从北京回到了上海老家。在此期间，她们又添了一个妹妹（现在是护士）和一个弟弟（现在仍住在上海）。

龚普生在上海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全国学生干事，龚澎则去汉口，然后又去延安，再由延安去太行山区前线，在朱德将军手下工作了一年。1940年，她“被调到重庆”，在周恩来手下工作。是共产党组织把她推荐到周恩来那里的。

黄华是在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红区的，他是自愿去红区的第一位大学生。但是据龚普生告诉我，龚澎并没有同他一起工作过，而龚普生自己在1949年以前也没有再见到过黄华。

龚澎作为周恩来的秘书，成了他的外事联络员。此时，作为报纸撰稿人的乔冠华则是周恩来的新闻联络员。他们两人在1943年成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中淮。中淮在1972年已经有28岁，是位研究员，已经结婚成家，而且据说很快就要当爸爸了。他们两人另一个孩子是个女儿，19岁，是部队的一名护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龚澎离重庆去上海，然后又去香港创办一家杂志，1949年后回到北京。

战争年代在内地生活是危险的，也是十分艰苦的。龚澎

工作得很努力，而且一贯认真负责。“她是个忘我的人，对同志一向都很关心。”她的姐姐告诉我，话语中带着深沉的感情。她们姐妹两个当中只要有一个因公外出，另一个就会替她照顾孩子，两个人互相都为对方操心。第一个得病的是龚普生，她的妹妹对她的关心比关心自己还重。两姐妹始终关系很好，很亲密。

龚澎年轻的时候容貌很漂亮，性格也很有吸引力。她的丈夫也是如此。早从1943年出前开始，他们就是周恩来同西方人士联系的主要媒介，在外国人中间名气很大，很受欢迎，换句话说也就是极其成功。

自1949年至1964年，龚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此后又升任部长助理。所有这些年里，她都充当周恩来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发言人。她以多年的工作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为其他年轻妇女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主要的新秀是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现任外交部副部长。

在龚澎1970年去世后，她的姐姐设法把她的照片和骨灰盒放在一位亲密朋友吴园甫（译音）骨灰旁边，在全国努力奋斗的楷模、著名的大庆“铁人”的左边。盒上只写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龚澎”等字样，因为这是“她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誉”。乔冠华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墓志铭”。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失去了妹妹的姐姐每个星期都出于哀伤而乘车去公墓，尽管她试图宽慰自己，觉着她妹妹“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在八宝山公墓，我在获得特别许可以后才拍摄了为最受人敬重的亡故者专辟的小骨灰堂里龚澎的骨灰盒的照片。这座骨灰堂里只有两位妇女的骨灰。除龚澎以外，另一位是

1949年以后曾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李是龚氏姐妹的好朋友。她生于1897年，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女儿，过去也担任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

龚普生不愿谈她自己。有人告诉我：“她是悄没声儿地在这里维系局面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她从1937年到1944年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学生干事。她首次出国是在1941年到1943年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945年至1948年，她又来到美国，在联合国机构内工作。她最后一次来美是在1950年作为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成员前来的。

她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结为夫妇，生了两个女儿，名字叫红红和慧慧。据她告诉我，她丈夫病得很重，此刻不在北京。

龚普生漂亮清秀，教养良好，仪态端庄，从容沉着，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主动精神。所以，我一直预料她会出任驻西方某国的大使。然而，她长期体弱多病。（据说她和她妹妹都抽香烟，而且她妹妹常常不断地吸烟。）

她还特别忠于友谊，努力使我以及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能受到尽可能高度的重视。1973年，她曾陪着伦·赛勒和路易丝·赛勒夫妇外出旅行。当时他们夫妇已经是八旬老人。她说，伦·赛勒是第一位介绍她阅读有关苏联的书籍的老师，例如莫里斯·欣德斯^①的《红面包》和《破土》。

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我一直替中国这个西方化的燕京——清华帮担心。有人告诉我，他们当时“靠边站”了，极

^① 莫里斯·欣德斯 1891年出生于俄国的美国作家。——译注

左分子接管了外交部的权，部长陈毅几乎被赶下台（人们告诉我，他是个好人）。有消息说，乔冠华和他的妻子及儿子吃了不少苦头。周恩来本人也成了攻击的目标。

龚氏姐妹和她们的朋友是继孙逸仙夫人那一代之后承担东西方联络重任的又一代中国人。然而，她们有一群人；而孙夫人在20年代到1949年之间几乎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只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及其子女鼎力相助。

龚普生这样一批人代表着西方在中国的影响中最好的方面。她受过最严格的清教徒暨新教徒的教育，并把这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善于同人打交道的外交能力结合在一起。她走上共产党的道路绝非偶然，因为对于像这样一种道德水准高、爱国精神强的人来说，除了这条道路以外别无他处可去。

龚普生到我那里拜访了好几次。她给我一件漂亮的绿缎皮袄，并且坚持要在我自己的毛皮短大衣还在缝制的时候（这也是在她的坚持主张下才做的）把她的毛皮短大衣借给我穿。

我问她，她的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她说，那是在1951年到一个村子里参加土改工作。她解释说，这样一些干部绝不会放过进村搞“四同”的机会。“四同”就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当先生。她说，你在那里可以弄懂你在为谁工作、你在为谁服务，生活的圈子打开了，扩大了。

她引述了毛泽东所讲到的“如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五个条件：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二、为人民服务。三、必须善于团结他人一道工作，并且爱护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

已被历史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①四、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到他们当中去学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干部不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干部必须坚持参加劳动。五、必须谦虚谨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重返母校——现在的北大

那天我已经起床穿好了衣服，独自一人站在旅馆窗子前，听着窗外北风呼号，卷起阵阵黄土撞击在窗玻璃上。我用布把窗台上的薄薄一层黄土擦拭掉。此时的气温是零下13度，不过我是到第二天才知道的。在类似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一片朦胧之中，我几乎无法看清早晨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1935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日子，北京的学生在12月9日走上这些街道举行示威游行，改变了中国历史。我的丈夫和我，还有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在一旁跟着游行队伍前进，每当警察向游行群众施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拍摄下来。

这天我打算去参观我的母校，那是在1934年至1935

^① 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督式的新道德观念——“爱你的仇敌”。这是毛泽东为了摧毁儒家“报仇雪恨”的旧族阀道德观念而提出的。不确立一种超越族阀的新方法并建立亲族联系以外的新的政治联系，族阀观念是无法打破的。——作者

年上的一所大学，当时是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该校在1952年已同著名老校北大合并。北京城里的北大关闭了，只有毛泽东曾经作为图书管理助理员而工作和学习过的那个房间仍然作为一处纪念地向公众开放。北大仍然以文科为主，附近的清华大学也仍然以工科为主。

我的两位翻译来了。我们乘电梯下楼，来到我们那辆挂着棕色乔其纱窗帘的黑色吉姆牌汽车旁。司机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仍在瑟瑟发抖，但他还是像通常一样和蔼可亲。这是一位标致的北京人，他说他属于某个总工会，但不是司机的总工会。

我们的车沿着宽阔的新干道行驶，两旁都是新栽的行道树，这正是当年燕京的校车常走的那条道。不过，那时的路面是铺了几百年的大石板，两块石板之间往往有很大的缝隙，对牲口和人来说非常危险，很容易把蹄子或脚崴了。现在这条路已经像其他街道一样铺上了碎石沥青。

我们驶经政府新建的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都是两三层楼的盒子似的现代建筑。我听说，每一片都有自己的理发馆、食品杂货店、百货商店和餐厅。

在那座可以容纳18000名观众的大室内体育馆前，迎着刺骨的寒风排着一条长队。那是为了买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冰球赛的票。北京还有一座露天体育场，可以容纳10万观众。

北京150多万辆自行车中的绝大多数在早晨一齐涌上街道。我们不断地掀着喇叭（所有的城市一律都得这样）从它们中间挤过去，有时还会遇到几辆由邈里邈邈的矮马拉着的农家大车，赶车人戴着带毛皮耳扇的帽子，看上去同早年一模一样。我对这些华北老百姓饱经风霜的脸庞有着多么强烈

的感情呵！那些大车上钉有阿拉伯数字的号码，现在全中国都用阿拉伯数字。

我们所见到的是北京 600 万居民中的一部分，这包括郊区和芦沟桥，市区居民只有 400 万左右。路上，学童们正匆匆忙忙跑着去上学，身上穿着沉沉的棉衣，走起路来颇有点像鸭子蹒跚而行。

路上的尘土比从前好多了。那时候，玛格丽特·布赖恩特（底特律人）和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燕京赶五六英里的路到城里去，同德克·博德^①和杰克·拉比诺维茨一道在许地山家里听他专门给我们讲佛教和道教。那时天太冷了，我们常常一只手扶把，另一只手则插在装满热栗子的衣袋里。车子时不时地会因为碰上老铺路石之间的沟豁而把我们颠下来。

燕京的大门仍旧没有变，中国式的门，上面是绿色琉璃瓦的顶。那些建筑物总的来说也没有变，是中西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产物，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现首都医院）很相似。一批代表在刺骨的寒风中等着迎接我们，我们准时到达了，他们也很准时。这些都是管理这所大学的“负责人”。

我们的车子很快开到了司徒雷登博士原先的住宅的会客室，然后大家围着一张长会议桌坐下来喝热茶。这张会议桌正是司徒雷登担任燕京校长时教授们开会所用的那张桌子。后来司徒雷登在 1949 年当上了美国驻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

3 个月之前，就在今年 9 月，北大听到了肯尼迪—麦戈文

^① 德克·博德又译戴尔克·博德，即卜德，美国汉学家，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的著译甚丰。——译注

主义的那一套令人陶醉的论点。这一派主张的3位著名人物在这里作了报告，他们是哈佛的J·K·加尔布雷思和瓦西里·列昂节夫，以及耶鲁的詹姆斯·托宾。

北大的人以诧异的口气对我说：“几乎所有到中国来访问的美国人都支持麦戈文。可是，尼克松却大获全胜，不是吗？”

在这间大屋子里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激情，然而这种资产阶级感情不敢表露出来。整个气氛是拘谨、刻板、挑不出错误而又不明确表态。你可以感觉到文化革命以后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人有一种前途叵测的不安定感。从1966年到1970年，除两个班以外，这所大学的所有各班都停课。1971年又开了几个班，1972年再加开了一些班。然而，整个形势是捉摸不定的。

坐在桌子前的7位^①之中最有权威的一位是解放军代表、北大革委会常委李家宽。他告诉我，他是在1956年16岁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此时他满脸倦容，嘴唇发青。会见时向我介绍了历史系主任魏玉海和该系的美国史专家王守山。王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有一位张群玉小姐，看起来像是一位严肃的革命者。据介绍，她是“解放前后北大的领导成员之一”，是“负责教育革命的”。她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研究俄罗斯的学者。倪孟雄说，北大图书馆里有我所写的《中国红区内情》，还有我的一些文章，他欢迎我作为作者前来访问。（我作为《密勒氏评论报》驻北京的记者曾充分颂扬

^① 这7位我以前一位也不认识。但是，原来燕京的伦道夫·塞勒教授在1973年重返该校的时候，曾同从前燕京的50位老朋友和学生晤谈。——作者

了燕京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最光辉的业迹)。

我问及历史演变经过。他们告诉我：城里的北大是在1898年创立的；1952年北京各大学和学院进行了调整改组，清华、北大、燕京三校的文科理科各系合并了。现在北京大学的文理科共有17个系，64个专业。

“解放以前，北大和清华是为蒋介石培养知识分子的，但同时也有过光荣的斗争传统。毛主席在1918年到1920年期间曾经到城里的北大学习研究，革命种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从1919年“五·四”到1935年“一二·九”，革命师生积极投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的运动。1949年解放以后，北大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毛主席领导下，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解放以前学生多的时候只有700到800人，解放以后达到了1万，包括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解放前，校舍面积是8万平方米，解放后增加到了50万平方米。”

在这间会客室里听到“一二·九”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犹如吹进了另一股冷风，因为那次运动在燕京之所以会爆发当然完全是由于美国人的影响。我为了帮助它搞成功，在这件事情上共花了6个月的功夫。

我抬起头来，看着墙上挂的大幅中国画，是徐悲鸿或齐白石画的马。过去我常去采访这两位名画家。在这里看到这些画仿佛是在异域见到故友。竹叶在中式窗子外沙沙作响，使我回想起很久以前如此光明、如此欢快的日子。

“解放前，这里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劳动人民是进不来的。解放后，我们招收了大量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我们招收工人农民，包括军人，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解放以后，工人阶级所占的比例增加了。文

革以后，做过实际工作的人的比例增大了。这些学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出，包括医药费和住宿费。如果学生在工厂工作满5年，上学时就能拿原工资。工作不满5年的，每月发给伙食费和零用钱19.5元。现在学生与教职员之间的关系也与以前不同了，学生参加管理学校。我们共有2200名教师，教授、副教授有200人，教职员和学生加在一起共计11000人。现有学生的数目是4300。”

“你的意思是说，有这么多教职员，学生却只有那么多？”

“是的，我们是说北大总共有11000人。往后学生会增加到8000人，因为以后要加上研究生、短期培训生和外国留学生。现在外国留学生很少。”

“解放以前，80%的农民是文盲，甚至有90%，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解放后到处盖起了各类学校。每个村子都有一所小学，每个公社都有一所中学。现在全国在校学生总数大概有1.5亿左右，占全中国总人口的1/5。”

“解放前，中国在文化上很落后，现在已经有很大进步。当时对于如何办学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毛主席的路线，主张学解放区的样子；第二种是刘少奇的路线，主张抄袭苏联的做法。这两条路线展开了斗争。高等教育机构中掀起了文化革命。刘少奇鼓吹的是教授治校，他排挤无产阶级力量。他的目的是要培养一批知识贵族。他主张的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践脱节，因而把学制拖长。毛主席说，不是中国，就是苏联，到底是哪一个？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教育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文革以后，我们努力实现教育革命化，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第二，我们努力把理论和实

践结合起来。

“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他说，青年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受教育者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谁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谁就是背叛革命。我们学校建立了一座工厂，使理科学生能够既劳动又学习。学生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到校外工厂去，以便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文科学生以整个社会为课堂，他们到校外去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掌握书本知识，并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在这一改造的方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现在正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的改造工作。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与伦比的。学制从五六年缩短为三四年。经过这一革命以后，学生从中学毕业时已经有两三年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现在用三四年时间就能掌握过去要花五六年才能掌握的东西。

“现在大多数学生自己就是农民和工人，所以他们在家里能同工人农民互相沟通思想，他们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他们完全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针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又发表了以下的论点：

“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三四百年。旧社会企图搞教育救国，结果失败了。1898年，在梁启超倡导下对旧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改革。在那次变法改革中办起了新学。北大就是其中之一。燕京是在20世纪初创办的一所教

会学校。

“解放前的教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后有了进步。但是，刘少奇干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劳动人民解放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站起来了，但是教育却落在后面。教育对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在长征中领导了革命，他领导了抗日战争。他还领导了继续革命的运动，并且坚持主张我们必须进行教育革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制度。但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现在正在总结出一套新的制度。我们必须有一套为无产阶级方针路线培养教育学生的制度。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尚不成熟。我们正在进行改造的试验。”

午餐是在司徒雷登博士故居的饭厅里吃的。席间，宾主互相随意交谈。

“埃德加·斯诺 1934 年到 1935 年曾在燕京新闻学院任教，”我说，“这个学院现在还有吗？”

“有。”这是我得到的回答，但从来没有想到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在座的教授中只有一位是我在燕京的时候就在燕京的。他就是周一良。他说他是 1935 年毕业的，但没有参加游行。他现在的工作是写有关亚洲国家的文章。

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一位教授被赶出北大。甚至连一位年已八旬的老教授——黄子通——也还留在该校。

是的，苏联现在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他们全都热烈地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席间曾提到美国年轻人蓄长发，留大胡子，穿希奇古怪

的服装。他们对此着实感到不可思议，但是都极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有一位的评语是：“我们不穿奇装异服，因为我们内心不空虚。”

我们前后一共谈了好几个小时才冒着狂风来到屋外。我们大家都一直穿着厚大衣，连吃饭时也未脱去，所以一到外面就感到冷得刺骨。

我们乘车从湖边驶过。30年代我曾在这湖上溜冰。我们养的两只灵猩常常在湖里游来游去，校园里的人看了都饶有兴味。在海淀，我们原来在军机处11号的住房已同整个地区一起被拆毁了，那个地方现在盖起了宿舍楼。原来的娘娘庙现在是一座制药厂。

他们非要我参观一下物理楼才让我走。学生们在那里制造电子设备。等到我上到二楼的时候，我感到冷得厉害，因而不得不坚持要赶快回旅馆，深怕自己得肺炎，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要病倒。

回到旅馆以后，我马上到温暖而宽敞的盥洗室里洗了一个热水澡。的确，对我来说，这是西方文明带来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这倒不是为了干净，而是为了在又冷又累的一天以后能恢复精神。

这是试图打破坚冰的严肃而沉闷的一天。我身子泡在热水里，脑中回想着在这所大学里如此明显地执掌着大权的那位军人的发青的嘴唇和布满皱纹的严肃的脸孔。而正是在这所大学里，美国教学人员过去曾经真切地努力向学生们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切精华，甚至还提及过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

仅仅在几天以前，我曾去过英国的牛津大学。在那里，不少世代的学生也曾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冷冰冰的教室里学习，但是，知识的灿烂阳光始终照耀得那些窗户窄小的都铎式建筑物^①一片光明。看到西方教育事业在那些座落于秀丽古城的漂亮建筑物内受到百般照顾，你就由衷地感到万分自豪。那里的第一座学院是在1249年创立的；而在中国，北大的启蒙工作却到1898年梁启超、康有为的时代才开始。我曾在12月9日的一次聚会中同梁启超的女儿一道吃午饭——由此可见，中国开始现代教育的时间竟是如此短暂。

我觉得我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他们在20世纪的严峻经历的（无论如何，我是经常这样来提醒自己的）。我们并不根据牛津大学1972年的情况来判断燕京或北大的严峻经历，尽管其崇高抱负已蒙上一层朦胧暮色而不易辨认。即使不说自威克里夫时期以来，至少也是从新教徒的宗教改革^②起，牛津一直在精心保护下茁壮生长，繁花似锦。而北大现在仍孕育着新的生命，但是其产儿可能是个讨厌而丑陋的怪物，也可能是豁达大度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确实热爱并接受西方文明的精髓。但是，我明白，我这一生所见过的人类最大的冒险和最大的实验正是中国人力图把几百年或几千年才形成的现代思想压缩到一个人的一生之内，也就是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的一生之内。他在自己的

① 指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兴起的一种哥特式建筑风格。——译注

② 指16世纪欧洲掀起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结果成立了一系列新教教会。——译注

有生之年发动了 1966 年开始的最近这次革命大动荡。

北大的情景使我联想到监狱里由于表现好而受到优待的犯人给参观者端茶的景象。那位军人是站岗的。不仅在校园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军人，而且自修室里也有年轻的女解放军。她们在保护什么呢？为什么需要武装力量呢？在北大，这支军队是在保护毛泽东所播种的中国未来的思想——他所构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这就像是皇家继承人的产房，全体廷臣都在场作为合法出生的证人。这是什么思想呢？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前无先例的社会主义。目的性尚不甚明确。

1966 年以后长大成人的青年人思想单纯得像一张白纸，上面只有毛泽东主义的印记，他们只学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指南——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除非你有历史材料可供分析研究，并且掌握有关目前形势的事实，否则学习这种理论是毫无用处的。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在中国有人对我这样说——“他们的脑子是真空。”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中国人也认识到这是很危险的。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最主要的莫过于对青年的教育。”但是，该教些什么呢？毛泽东提供了一种明光铮亮的思考问题的新工具，一种新的逻辑，但是并没有提供分析研究的材料。威克里夫和彼得勒斯·拉米斯^①也是如此，甚至黑格尔也不例

^① 拉米斯 (1515—1572 年)，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修辞学家。他的逻辑学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欧洲极为流行。1561 年前后，拉米斯改信新教，因而晚年遭到学术方面和教会方面的敌人日益剧烈的迫害，最后为刺客所暗杀。——译注

外。卡尔·马克思利用现有的历史来进行分析研究，没有任何清规戒律能使他割断其中的任何阶段。

毛泽东的这种新思想并不真正接受一些抽象的观念，例如抽象的持不同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一向是几乎任何中国人都无法理解的。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承认实验的权利，变的权利。这是它的要素，虽然这仅限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变。然而，毛泽东从本性来说是一位主张百花齐放的思想家，他从少年时期起就是一位天生的异端派。

11月间，在我来中国的途中，我曾经站立在牛津城内英国文明的一处圣地之上，那就是里得雷^①、拉蒂默^②和克兰麦^③因发表异端邪说和背叛玛丽女王，在1555年至1556年重新推行天主教时被活活烧死的地点。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死的——而这正是我从小就形成的自己的唯一的一项生活原则，我的绝对不变的特性。但是，我从来也未曾期盼任何中国人会有那样的想法。

在中国，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之前，旧政权还仅仅因为人们持有“危险的思想”就把他们活埋掉（由于木柴太

① 里得雷 (NICHOLAS RIDLEY) (1503—1555年) 英格兰基督教新教殉教士。在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继位后被捕，与拉蒂默一起受火刑而死。两人至死都拒绝否定自己的观点。——译注

② 拉蒂默 (HUGH LATIMER) (1485—1555年)，英格兰基督教新教人士，推进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徒玛丽一世即位后以叛道罪将拉蒂默逮捕，并于1555年处以火刑。——译注

③ 克兰麦 (THOMAS CRANMER) (1489—1556年)，支持英王亨利八世，推进宗教改革的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玛丽一世登位后长期被扣押，虽多次写出悔过书，最后仍被处以火刑。——译注

缺，用火刑烧死太费钱)。自 1949 年以来，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事情，至少没有真活埋过人。

中国的新思想积极鼓励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及一切工艺美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不主张单纯的模仿和抄袭。但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本身尚未成为常用的词汇。不过，现在正在大力摆脱一切旧宗教的蒙昧和任何一种正统观念（除毛泽东的一种以外）。

现在中国不是搞什么学术自由或任何学术研究风气的时候，现在是过渡和变化的时候。而单是由于 8 亿人为了找职业、求安全所发生的冲突，就有出现无政府主义和破坏的风险。

在 30 年代，燕京表面上灿烂绚丽，生气勃勃，骨子里却不仅空虚，而且深陷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中国的种种问题并未予以正视，奢华的西方化教育无大前途。当时的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纷纷奔向延安。

哲学教授冯友兰

在北大，正当我们围坐在会议桌旁互相交谈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传进了劲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同时又走进来一个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来者竟是冯友兰博士！他约莫有 77 岁，可是身体很健康，精神也很好，脑子像过去一样敏锐。

“喔！这么大的风，您真不该出来。”我一面同他握手一

面说。

“没关系，”他说这话的时候真是非常热诚，“欢迎你回来。”

他说，“过去就是这样的大风天，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去给你们上《中国哲学史》课。你知道吗？尼克松总统读过这本书。”

“就是德克·博德翻译的您那本书？当时我们那个班一共有4个人，德克，我，玛格丽特·布赖恩特，杰克·拉比诺维茨。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大摞笔记呢。您给我们讲的，我全记下来了。”

“对。尼克松总统来这儿的时候我见过他。那本书有些地方不正确。”——冯博士微笑着宣布说——“我在写那本书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我就不会那样写了。告诉德克·博德，我们欢迎他来中国访问。上次我得知他正在写关于中国法律的书。”

“现在他在人们眼中已经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大学者。”我说，“他现在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我们谈了一会儿张东荪教授。我上过他开的黑格尔逻辑课。

冯博士评论说：“他什么书都读，他是个折衷主义者。”

我说：“中国人很容易掌握黑格尔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我那时候总感到惊奇。”

冯博士阐述说：“中国哲学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思想。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马克思和列宁创立的，毛泽东继续发展了这一体系，把它同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起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那听起来不

大像唯物主义。你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吗？”我问。

“完全不是。”冯博士回答很快，也确实很正确。“说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并不等于是说精神能够改变一切。唯心主义者认为观念能够改变世上事物，而革命的内容远不只是一种观念。”

“您的脑子确实仍像过去一样，非常灵，非常敏锐。”——我怀着钦佩的心情说——“这一论点很有力。”

室内的另外7位没有一位听说过毛泽东的这句语录。我们本来是可能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的，而且实际上也快要开始这样一场讨论了，可是时间很紧。

“我对文化革命仍旧弄不明白，”我说，“这里面有什么新的地方吗？”

“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这是一种新的逻辑，是新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主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看得出来，冯博士的这一评价是经过慎审的思考以后得出的。他接着说，“苏联的问题就出在它还没有开展过文化革命。如果列宁能活得更长一点儿，他可能会第一个搞，可是他死得太早。我们不能等着工业革命先实现。首先有必要进行文化革命，虽然我们当然也必须进行经济革命。”

“您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变了吗？”

“是的，中国人的思想变了。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新的逻辑。文化革命终于在中国实行了人的世界观的革命。”

“这恰恰正是我到中国来所想了解的一点。我想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我尤其想知道是不是真正已经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苏联过去或现在都

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您这一辈子当中，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那当然是文化革命，它促使意识形态整个儿发生了变化。主要的成就是思想方法发生了变化，思想方式发生了变化，还有思想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冯博士的口气是断然决然的。

“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没有任何人比您更有资格作出判断。”我说。

冯博士谈锋很健，他说：“革命共分3个阶段——第一是政治阶段，第二是经济阶段，第三是文化阶段。政治革命是在1949年发生的。第二个阶段经济阶段是在1956年通过合作经济的建立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第三阶段是在1957年开始的，那一年毛泽东发动了教育革命。最后在1966年开始了文化革命，终于全面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

“您的意思是说，文革已经最后彻底胜利了？”我问道。

“我是说，前景是很有希望的。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非常暂时的。这一革命在我们学校里正在健康发展，它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出现过一些暂时现象，但是，整个来说，革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

“您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完蛋了？”我问他。

他回答说：“儒家思想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已经同统治阶级一起灭亡了，永远灭亡了。”

“听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说，“我呀，过去就讨厌儒家思想，甚至比毛泽东都更讨厌它。”

冯博士欣然一笑。尽管有人指责他早年没有对儒家思想

持否定态度，我却正是从他那里学到要憎恶儒家思想的道理。

我说：“您的案子在1935年成了“一二·九”运动中轰动一时的案件，因此您对中国的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当您和您的学生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不管是什么——而被捕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中国眼前就明显地存在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这是黄华所写的学生运动11月1日宣言中所列举的事由之一。”

当时在座的其他人似乎从未听说过冯友兰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有如此大名声，所以我认为说给他们听听是个好主意。

那时我一直上着冯友兰的课，可是有19名学生同他一道在清华被捕了。现在从我当时的笔记本上可以找到：1935年3月19日有9名学生获释，并且有人告诉我，自1934年11月起大约有200名学生和教师被捕，原因只是他们讨论了中国的问题。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我在下面列出的材料并不是从冯博士那里得到的，而是《中共人物志》上刊出的：他生于1895年，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约翰·杜威^①和弗雷德里克·J·E·伍德布里奇指导下研修哲学，1925年在哥大获哲学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应聘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重新担任这两项职务。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多本哲学著作。1946年至1947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任

^① 约翰·杜威（1859—1952年），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1920年曾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译注

外聘的短期讲学教授，第二年赴夏威夷。

他在回清华后于 1950 年参加了土地改革，并曾随一个代表团去印度和缅甸。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除其他活动和出版书籍外还曾作为代表去欧洲参加多次会议。1958 年，他受到指责，说他散布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10 年以后有消息说他在 1968 年 5 月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批斗了”。从 1954 年起，他一直是北大的教授。

冯友兰博士是他这一代人中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从信仰孔子转成崇尚杜威，后来又信奉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思想对他似乎很相契。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向人们揭示为什么中国需要毛泽东思想。

在北京的老中国通

在 1941 年以后的这些年里，每当我考虑要重返中国的时候，我都会首先想到我的老朋友艾黎、耿丽淑和孙逸仙夫人（她似乎更像是个美国人而不像是中国人），我还会想起马海德和我们认识或知道的另外几位。我所熟识的那几位在 30 年代都是一些极好的人，不但结交以后感到很有魅力，而且才能卓越超群，可以说是正在造就中的社会主义者。我所结交的中国人绝大部分也是如此。

他们决定与中国人民共患难共命运。这些西方人竭力想

安然度过艰苦生活和复杂的政治变迁这样严峻的考验。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首先，哪一类人会卷进去呢？

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或英国人中的老中国通在 30 年代没有任何一个人加入共产党，直到 60 年代也没有，只有格雷斯·格拉尼克和曼尼·格拉尼克大概是例外。我在 1937 年底只在上海同他们见过几次面，当时他们恰恰快要离开中国了，他们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多时间，负责编辑《中国之声》杂志。用艾黎的话来说，这些左翼的老中国通是“中国的学生”，他们随着中国的革命成长。1960 年，艾黎加入了新西兰共产党。另有几位居民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成为中国公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所认识的仅有的两位欧洲共产党党员（如果他们是的），是 1937 年在延安认识的李德以及同年在上海仅仅短暂地见过一次面的汉斯·希普。我非常不喜欢汉斯·希普，因为他对我和我的丈夫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诋毁《西行漫记》。（他去延安攻击埃德时，毛泽东下令让他立即离开。）

这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欧美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些背井离乡的靠生活补助过日子的谦卑的人，他们与一切都格格不入，只适应自己的小天地。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艾黎告诉我，他的各种费用开支和在新西兰出书的费用都由他自己负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 4 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北京的保卫和平委员会。同时，据她对人说，她一生都是靠自己来支付生活费用的。她既是作家，又是一位卓越的女实业家。

新西兰人艾黎

在新中国的外国人的固有核心和现在资格最老的一位是艾黎。他最初来中国是在1927年4月。他在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学校校长。他自己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身上还带着那时留下的伤疤。

在艾黎从山西山区回到北京以后，我应邀到他的公寓去拜访他。那是前意大利公使馆的一层楼，在四周围着高墙的“友协”大院里。我的司机和我先得在大门口的解放军警卫那里签字登记。我进去以后第一眼先看到一座环形大庭院，院里栽有各种树和灌木，还有几幢别的建筑物，其中包括“友协”的办公楼，我后来曾在那里看过几场电影。“友协”的人把艾黎称作“我们的常客”。

我来到长房廊下敲了敲门，他的男秘书出来把我领到起居室。在那里，我见到了75岁高龄的艾黎。他仰靠在一张明代的扶手椅子上，身后墙上挂着一幅宋代的轴画。他翘着一条壮实的毛烘烘的腿，两只结实多毛的手抱着膝部。他穿着卡叽布短裤，同我1937年11月底或12月初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所穿的短裤是一个式样，跟他在当童子军时所穿的裤子一模一样。（房里的温度是新西兰的温度，所以我很快就开始一件一件脱掉我那又重又大的驼绒衣服。除南京的旅馆房间以外，这是我在中国所呆过的最暖和的房间。）

艾黎的女管家把明代雕花方桌上的西式饭菜收拾干净，

我利用这个机会环顾一下室内四周的布置。两边靠墙摆着一排书架，艾黎从书架上抽出我所写的《中国工人运动》一书，说：“这是有关这个时期的唯一的一本书，非常宝贵。”

书架的顶层摆着考古发现的文物，柜橱里放着较小的古董古玩，主要是玉器。艾黎四处翻找了一番，最后拿来了一只玉制的弓箭手姆环，把它交给了我。那是明代或是宋代的，也就是说已经有600年以上的历史。（我把它系在一根皮带子上，把它当项链挂在身上）。

极左的红卫兵曾经来到艾黎的家，把他的古董翻看了一遍，说他是“大帝国主义者”，并且扬言要毁掉他收藏的古物，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做。

他的公寓的整个气氛是安适宜人的，公寓主人收藏的那些旧书以及从他身上所能感受到的西方文明的菁华和中国的精粹都令人感到欢愉舒畅。这是一个舒适的窝，隐居的好去处，安全的避难所。

我说：“我听说你现在已经相当中国化了。”

他马上应了一句：“我在中国感到很自在，在新西兰也感到很自在。当然，像我这样在中国住了那么久，必定有点中国化。”

实际上，他远没有像我看了一些新闻报道以后所预料的那样中国化。我们差不多好像是把1940年中断的谈话接着往下讲，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这使我颇感意外。曾经有人把他称作百分之三百派的领袖，意思是说他们这一批人共产主义化的程度三倍于中国人。另一种批评则说他只是引述中国人的话，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我发现艾黎非常通情达理，考虑全面周到，很注意长远观点，在这一点上甚至十分审慎。他

丝毫没有放弃他原来的西方道德标准，但是他赋予它们以社会主义的内容。

他说：“必须看到大事，而不能光看小事。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开展这一大运动，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有关清华的报道这样一类琐碎的小事上呢！在一场革命中应该料到会发生许多不幸的事。”

“你现在愉快吗？”我问他。

“嗯，我不怎么考虑这种事。”他回答说，“我到内地去，看到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使我感到高兴。”

艾黎就像佛陀盘坐在菩提树下一样，向世界各地前来拜访的个人和代表团提供明智的意见。在所有同他会见过的人的书籍和思想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影响。近来他冬天常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巡回作报告。

艾黎没有上过高等学校，但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在1972年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证书上称颂他是“军功勋章的荣获者，作家、诗人、翻译家，并且向他国阐释了中国的情况”。自1948年以来，他已出版了100部著作。

1972年3月，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建立了“艾黎档案馆”，一个负责组织艾黎75岁寿辰庆祝活动的全国性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罗列他的全部著作的书目，并另外出版两本书，一本汇编有关中国的论文，另一本则选辑认识他的人写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该委员会的计划书说：“他创办和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社为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的公社提供了蓝图。”

艾黎于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参加了和解团契。作为英国圣公会的教徒，他时常到上海大教堂去做礼拜。他还从

事童子军的工作。1929年，他在亨利·巴林（一所学校的校长）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据艾黎告诉我，亨利·巴林在1933年左右是“被上海的秘密帮派枪杀的，不是自杀的”。

艾黎在1972年告诉我（我从前没有听说过），大约在1933年，他的朋友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两位干事——耿丽淑和莫德·拉塞尔，另外还有艾琳·范德霍克（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她，艾黎对她究竟姓什么也没有把握），汉斯·希普（艾黎说他是同新四军一起被日本人杀害的）和他的妻子特鲁达，魏璐诗，马海德医生，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亚历克·坎普林。坎普林是上海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同艾黎共住一幢房子。（据艾黎告诉我，亚历克说他“在中国实在受不了”，所以后来他不知去向了。艾黎还说，“艾格妮丝有她的优点。她为革命工作，但不是间谍。”）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除艾黎外全都没有参加1938年创办工业合作社的工作，虽然耿丽淑和莫德后来在短时间内曾支持过“工合”，再后，魏璐诗在四川时曾参加过开办“工合”的委员会。那时，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不赞成办这样的合作社，认为它们是“乌托邦”和改良主义的玩意儿。他们也不赞成归工人所有的组织。就我所知，上述这个小组到1938年已不复存在，只有艾黎和耿丽淑仍留在上海。

据艾黎告诉我，他上面说到的那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里还有“两位中国人后来成了干部”，其中他提到一位叫弗兰克·林，另一位大概是吴楚飞。亚历克·坎普林手下的这两位在美国学成回国的工程师在1938年曾帮助艾黎拟订“工合”

的第一个技术计划。

当我在 1972 年向艾黎问到“林和吴”时，艾黎说，他最后听说的时候吴是在浙江当工程师，现在已经有些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从 50 年代起就没有再听说。我说有人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艾黎补充说，“很可能现在已经死了”。他说：“弗兰克·林现在住在上海，就在他参加工合运动以前所住的那幢房子里。他得了胃癌，已经动了手术。”

我同艾黎谈到他个人的历史，有一部分录了下来。我首先问到约瑟夫·贝利（裴义理）^①，艾黎说：

“裴义理是基督徒，是教士。他认为他应当到人民中间去，同他们在一起。他热爱中国人民。他不主张住在大房子里，而主张到人民中间去，还主张发展技术。他当时把世界上最好的技术白白浪费在中国。他还把青年人送到美国去培养成新的技术人员。一些项目开办了，又放弃了。下次又是样——他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娃娃也一起倒掉了。知识分子不会管，他们不懂得基本的东西。在过去，他们真是知识分子，毫无实践经验。现在新一代不仅有政治头脑，而且既懂理论，又能实践。裴义理要我到人民中间去，不要把假日浪费在日本这样一类地方。我接受了他的忠告，从事饥民救济工作。我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到人民中间去。裴义理的忠告使我们走上了我们后来所遵循的道路。”

^① 约瑟夫·贝利，汉名裴义理，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90 年来南京传教，1920 年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1903 年协助创立上海尚贤堂。他还创办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抗战前曾在西北创设中国工业技术学校。死于 1935 年。——译注

“我在上海当工厂检查员的时候看到了剥削，这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革命。所以，考虑到我的出身和经历，这就是我所参加的事业。我从1929年起投入了这一事业，竭尽所能来促进这一事业。我当时感到这是解放上海那些人的唯一办法。

“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是在1928年或者1929年，我去无锡。那时我正在研究缫丝问题。7、8岁或9、10岁的孩子无法忍受的条件下劳动。有一次，在无锡的一条街上，突然之间大家都朝着车站的方向跑了起来。那里有号手，士兵，还有一个骑马的人。6个青年男子被剥光了衣服像捆猪猡一样悬在竿子上，但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那个人从马上下来，拔出手枪，走到那6个人背后，朝他们一个一个地开枪射击。大家都拍手叫好，特别是所有穿长袍的商人。报纸说，前一天有6名共产党人被处决了，他们一直在组织丝厂工人举行罢工，争取改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姓名叫亨利·巴林，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我问他，这样一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最好。他当时正在积极帮助上海的地下组织。他说，‘好吧，我给你一点儿东西看看。’几天以后，他带来了几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些列宁的著作。他说，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看看它同你所知道的情况是否符合。我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开始为革命运动干工作。

“我在1937年从欧洲回来后在杨树浦曾遭到日本人的殴打。我那次到那里去是为了看一看有几家工厂是否还在，可是那里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我来到路边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地方都是空的，野狗正在从屋子里往外拖尸体。一批中国战

俘在街上站成一行，两个日本人正在用棍子抽打他们的脸，一面打一面还喊叫着。

“‘嘿，别打了！’我嚷道。

“这时，一大帮日本人都从一个警察分局里跑出来。他们把我的裤子拽下来，打我的屁股。当时，剥英国人的裤子是一种挺时兴的玩笑。有人举着步枪对着我，其他日本人就打别的那些人。我的司机怕得要死。市议会里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开了个大玩笑。他们笑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我只是闭口不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那些青肿的地方上了一两个星期的药。

“我下一次遇到麻烦是在我从武汉去广州领取宋子文让中国银行拨给‘工合’运动的那笔钱。这笔钱是供‘工合’运动在东南部开展活动用的。那是在湖南省。我是坐三等车离长沙的，座位就在厕所附近。车里非常非常热，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到处都挤满了难民。我穿着短裤、衬衣和凉鞋，而且到邵阳附近去了一趟，从长沙把一些机器疏散到了那里。头等车厢里有一些美国人。其中有一位来找我，他说：‘除非我能赚一百万美元，否则我绝不会坐这趟火车。’这些人同国防部里搞物资的一些国民党的人关系很密切，他们在香港买进物资，然后按自己定的价格出售这些物资，从中赚大钱。

“那个美国人问我：‘你同这些苦力一起旅行，这是干什么呢？你来同我一起坐坐，我们好同你叙谈叙谈，怎么样？’

“过了两天左右，我们到了广州，一路上每次碰到空袭都要停车。那时我胸前戴着行政院的证章。警察走过来把我抓住，他们说我是个穷白俄，这枚证章是偷来的，接着就要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打我。我拒绝跟他们去，尽管我只有孤零

零的一个人。我说：‘你们打电话到香港找宋子文，向他查问我。’

“他们走开了，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态度就变得十分谦恭了，他们甚至还帮我搭上了一艘船，我从那里到了香港。

“另外还有其他几次。我想，最糟糕的一回是那次离开宝鸡。我想大约是在1943年，我要往南去双石铺，然后再往北去山西。宝鸡城外最后一个检查站是在一处叫做益门镇的地方。小屋上的草席子没有盖严实，天气极冷。他们拿走了我的行李，对一切都非常仔细地进行检查。然后他们说，‘现在把衣服脱下来’。结果，在他们检查我的靴子和衣服衬里并且彻底检查整个卡车的时候，我就那么站着，身上没有穿什么衣服。他们怀疑我是想带什么东西到重庆去给八路军。

“我穿上了衣服，在路上第一个停车的地方，我要了4两白干、一点热汤、一些饽饽和羊肉，以给我自己增加点儿热量，好继续往前走。”

“这种事情常会发生，在中国南来北往是避不开的。”

“那些日子我跑遍了中国各地——回到广州，然后又去西北，再经过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又回到广州。我这样跑了8年，直到我在山丹安顿下来。我对那位艾里老兄^①所说的是，我不希望写成一篇英雄故事。你一定要把中国人的斗争写进去。说起来话很长，重要的事情是要从这一斗争中学到一些东西，从我们周围展开的这一广阔斗争中学到一些东西。

“把焦点对准整个这一斗争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中国在

^① 威利斯·艾里写了《中国的学生——艾黎生平》一书，北克莱斯特丘奇的卡克斯顿出版社1970年出版。——作者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我们就会改变世界的面貌。如果四分之一的世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以正确的方法走上这条道路的，那么，世界其他地区十分自然地定会起而仿效。美国一位参议员前些日子说：‘如果中国最后获胜，资本主义就丝毫不会有迅速扩大影响的机会。’我想中国人是决心要最后获胜的，而且现在总的来说正在全中国各地获胜。这是一场大斗争，现在尚未结束。技术上，我们落后很多，许多方面都落后很多。可我们确实正在同心协力地干着，干得非常出色。我认为这一斗争将会继续下去，而且保证这场斗争获胜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利益的。革命并不会突然之间就造就出一个新社会。必须教育人民。整个过程是个缓慢的过程。最近这些年来人们肯定已发生变化，政治思想与人民空前接近，但是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

我说：“我感觉出这是第一次到了帝国主义要完蛋的时候了。”

艾黎说：“如果中国能够站起来——它现在正在站起来，那将是帝国主义的末日。杜勒斯时期的美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俄国人现在也认识到了。所以他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他们认识到，天哪，再给中国 20 年时间，他们就对付不了它了。他们感到现在还能对付得了它，或许能对付。”

“你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我问道。

“它正在拼命地朝那个方向发展。你看看那么多美国公司都在到苏联去，大通曼哈顿银行、第一国民银行都在莫斯科开设分行，德士古到处设厂，利润保证可以汇往国外——各种各样别的工厂都到那里去，同日本人又达成了种种协议，基本上属资本主义性质。”

“那是不是就是你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我问道，“我的意思是说，修正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

“他们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子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他答道。

艾黎最终成了那些去中国的伟大旅行家中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的境况相当不错。

“在中国，无论是在村庄还是在公社里，在阳城、晋城和过去这一个月里我所去过的那些地方，我都感到很自在。我喜欢到这些地方去转转。我看到人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制造些什么东西，就感到非常愉快。这是对我力图做到的一切的一种酬谢。不论什么时候，看到这种克服困难、争取完成任务和共同努力的精神，看到人民靠自己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向国家交售粮食就感到丢脸，我都会感到振奋。这一切都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开始。人民正在站起来。这意味着自给自足，但并不仅仅是使自己的生活会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尊严。他们站在自己家门口，放眼看世界。他们对外面的情况非常感兴趣。”

只有思想上最不寻常的适应能力，还有最健壮的体格，才能经受得住艾黎那种生活经历。

艾黎告诉我：“我从1939年到1947年患了8年的疟疾，但是我去新西兰时一位医生把这病治好了。我得过伤寒。从1938年到1942年之间，我一直闹痢疾，是阿米巴痢疾。我乘卡车出过9次事故，这是指较大的事故，另外还有一些小事故。有许多次我所住的房子被毁了。解放前，马氏兄弟^①曾打

^① 此处指穆斯林头头马步芳和他的弟弟。——作者

算把我们在西北的人全部杀掉。”

我们谈到如何争取朋友和影响他人的问题。

我发表意见说：“有人对我说，不可能想像会有任何别的埃德加·斯诺，只有美国的埃德加·斯诺。无法设想会有什么俄国的或者德国的埃德加·斯诺。一个美国人来了，作为一位不抱偏见、坦诚豪爽的外来旁观者，看到了中国这一革命的奥妙所在。”

艾黎指出：“起先约翰·里德曾想在俄国做到这一点。”

1976年4月3日，艾黎从北京一家医院写信给我说：“马海德动了一次前列腺手术，现在正在楼上病房休养。我是在治心律不齐。”不久以前，他在动了胆囊手术之后曾得过严重的肺炎，马海德则犯了一场心脏病。

黎巴嫩人马海德医生

当马海德医生在北京机场迎接我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他有怎样一对棕黄色的大眼睛。镶在满脸皱纹中的这对眼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使人久久不能忘怀。这当然不会是一种探索的眼色，因为他已经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对这种东西感到高兴，而且打算在中国度过余生。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起他，是在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过红区以后回到我们的住宅的时候。

在这次访问中，他们两人一道旅行，但是马海德希望保守秘密，因此在发表的材料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埃德喜欢他。

埃德对我说，海德特别喜欢吃东西，他渴望吃欧洲食品。一年以后，在我自己要去进行访问的时候，埃德对我说一定要带吃的给海德，否则他不会欢迎我。

海德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机智、聪明，很容易交谈（虽然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谨慎得要命，也非这样不可）。他很讨人喜欢，诙谐，仍然有幽默感。他还有责任感，似乎很自信、果断，不像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我问他是否打算写一本谈自己生活经历的书，他说他决不写这样的书。

从1933年到达上海的时候起，他只离开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到黎巴嫩作短时间的旅行，为的是看望他的父亲。在那里，中国大使馆给他们用的黑色大轿车给他的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父亲认为儿子在中国一定干得很成功。第二次是1972年，那时他自愿同一批医生一起到瑞士，去照料最后一次患病的埃德加·斯诺。

马海德的父亲是从叙利亚（现在是黎巴嫩）来到美国的，他成了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贫困的工人。在那里，儿子在1910年9月26日诞生。马海德在贝鲁特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得了医学奖学金，后来到上海去实习。

他和日内瓦的两个同学对性病有专门的研究，收入很多，但是另外两个同学回国结婚去了。海德当了国际租界警察机构的一名医官，帮助写一本关于上海卫生状况的小册子。他已经逐渐带有激进的色彩。当他听说中国内地有红军的时候，他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自愿提供医疗服务。

在上海的孙逸仙夫人当时正在为埃德加·斯诺安排一次秘密的旅行，海德参与了这个计划，不过他们两人彼此都毫

无了解。在1972年，海德对我说，在他们到西安以前，他在火车上见到了埃德。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件事。他们一道做的这次旅行是他们一代人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旅行之一。

我不知道海德当过叙利亚天主教马龙派教会的祭坛侍者，但是我知道他的家庭是黎巴嫩人。我给了他一件希罕的圣诞节礼物，这就是我带到中国去的一些没药和用黎巴嫩雪松制的乳香。

在延安，海德同一个名叫周苏菲的美丽的中国电影女演员结婚，并生了一儿一女。

海德问我：“你想看看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吗？我住在那里。我们可以在那里喝茶。”

路易和我同他一道乘车到离颐和园不远的的一个古老的湖旁边，停在一座老式房屋门前。第一个天井又长又窄，里面有灌木丛和乔木，据路易说春天这里风景优美。我们在靠近主要天井的一间又小又狭窄的起居室里喝茶，吃了果酱和干酪（客人赠送的宝贵礼物），还吃了像英国小松饼的可口的烧饼。海德让我们看了他的照片集。他抱怨说：“你可从来没有送过我一张你的照片啊。”

他有一些黄华穿西装照得极好的照片，以及一些西方客人的照片。（路易·艾黎在他的公寓里也有几本照片集。你可以看到对寄居异国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多么宝贵，尽管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在我们离开以前，海德带着自豪的家长的神情领我去看住在另一个厢房里的他的儿媳妇和孙子。

他似乎十分安详而愉快，并不过于激动。但是他没有丧

失我一向喜欢的他身上的一种美国人的品质——敏捷的应答本领和幽默感。我没有忘记他那时常常来看我，并在窗子下面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当时我由于患痢疾，主要靠秘剂和米粥生活。

海德对我说：“1962年，我曾经到叙利亚去看望我的父亲纳霍姆·哈特姆。他曾经到黎巴嫩通过中国大使馆——国民党的大使馆——找我。他们要他去问叙利亚，北京在那里设有大使馆。当他问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大使要他过些时候再来，并且对他说：‘你的相貌同你的儿子一模一样。’

“大使请父亲访问中国，但是父亲说：‘叫海德到这里来。’我接到了一封电报，于是带着妻子和儿子上路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房子，一辆汽车和司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有要人参加的宴会，并请我们同大使一道吃过一顿晚饭和一顿早饭。这给我的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问我：‘海德，你有多少财产呀？’

“父亲承认，他曾经认为我是不肖之子，但是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知道自己错了。当然，我从来没有向他要过钱。

“我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姊妹以及一些表亲住在布法罗。我的另一个姊妹已经去世。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黎巴嫩人，我的家庭是一个天主教马龙派家庭。黎巴嫩大使有一次看望我，对我说他们的人口只有两百万，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基督徒。

“我在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但是我到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和查佩尔希尔上学，1929年我得到奖学金上了贝鲁特大学，后来上了日内瓦大学医学院，学习

皮肤病学和性病学。

“1933年底我到上海做实习医生，直到1936年为止。在上海，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还遇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和孙逸仙夫人。贫穷和我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我的父亲当过木匠、黄铜和钢铁工人，还当过小商人）使我倾向于社会主义。

“有两年时间，我想自愿到共产党地区当医生，但是这为时过早。当时正是长征时期。我为前往那里进行了3个月的尝试，终于成功了，那是在红军从瓦窑堡向保安移动的时候。我到西安去呆了1个月，等待地下人员同我接触，但是没有人来。我回到上海，为我做出的安排是在1936年6月同埃德加·斯诺一道去。我在洛阳同他见面，据我的记忆，大概是在火车上见面的。

“我们到了西安宾馆，一位基督教牧师看望了我们，还有王炳南和查尔斯——刘鼎。邓发把我们带到临潼。邓发喜欢埃德。埃德很诚恳，不贪小便宜。他从来不想得到任何东西，也从来不拿任何东西。他真诚地同情被压迫的人和被剥削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群居动物。但是他是典型的不善于照顾自己的人。他从来不操心，而且一向迟到。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某一边，这种感情在他写的东西中常常流露出来。”

当我第一次在共产党人中间遇到海德的时候，他不仅很年轻，而且很稚嫩。用路易的话说，他是“一个初学者”，虽然他很讨人喜欢。在那可怕的10年封锁中，他一直坚持工作，当时他得不到医疗供应品，主要在医院中进行培训工作。

从1945年到1947年，有两年的时间，出现了休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实行的政策是向双方都提供医疗和救济物

资。海德在北京呆了一年，代表八路军救济署所属的地区。但是在1947年内战恢复以后，他回到延安。3月间，延安在遭到美国提供的飞机轰炸后失守。在1948年冬天，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海德呆在北京附近的颐和园。

海德加入共产党方面不是因为他不珍视他的美国国籍，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如何担心失去美国国籍，他是多么切望对他的活动保密。1947年，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北京总部把他的护照延长。将近20年以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然而在文化革命期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作出选择，而不能犹豫。其中一些人成了中国公民，少数人还被允许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些人则遭到惩罚——不仅是作为公民，而且是作为参加了错误的派别的共产党人。

这是一件还没有广为流传的事情。约有10多个前外国人被“拘留”。我听说，要是他们被指责犯了罪，就会进行审讯，他们也就会被投入监狱。他们几乎遭到软禁，但是据了解，并没有受到虐待。

很奇怪，在中国人中间生活的人，怎能不懂得第一条生存规则：外界的人不要卷入国内内层政治斗争。然而在文化革命期间，一部分害怕、心虚、愚蠢的外国人试图表现得比极左分子还要左。由于中国实行保密，他们对牵涉到的实际因素和派系也许很少了解。为了得到国籍，可能有少数人试图显得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但是其他一些中国人也许不喜欢这种“中国人”。

无论如何，成立了一个“白求恩战斗队”，像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医生这样的人拒绝参加这个战斗队。他们在中国生

活的时间很长，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如何和何时不让自己遇到麻烦。他们因此而受到批评，并遭到一点儿骚扰。路易的养子迈克被打了三次，以示警告。路易受到批评，被说成是“帝国主义者”和古董收藏家（古董是极左分子扬言要摧毁的对象）。

海德心脏有毛病，体重过重，但是他仍然在北京皮肤病医院工作。他的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但是他比1973年《行列》周刊封面上刊登的照片漂亮得多。该刊发表了劳埃德·希勒写的一篇重头文章，谈他这个“最受欢迎的美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工作。著名的、老练的专栏作家安·兰德斯立即发现了海德的特殊品质，她在文章中写道：“她爱上了他。”

海德又像麻雀，又像中国人，他很善于适应环境，但是丝毫不放弃自己的基本个性。他似乎没有心理上的冲突，他不仅精神正常，而且能随遇而安。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幽默感，也就是分寸感。他生性开朗热诚，极善于应付一切局面，这是在大半生中在中国生活下来的必要条件。现在同过去一样，能同中国人相处是一种很大的本领和成就，因为中国以前是封闭的社会，而现在正在出现复杂的社会变化。俄国人从来不懂得这个过程，然而美国人海德也许是主要的范例。当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世界上的一种新人的时候，海德成为少数有像他那样的经历的人中的一个突出的人物。在他还来得及改变主意的时候，没有能写下他的自传或传记，这对于后世来说是极其不幸的。

维也纳人魏璐诗

魏璐诗是懂得如何在中国适应环境的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之一，从1933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她一直住在中国。她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有人把我介绍给她，但是我对她的个人情况毫无了解。我第一次听人们说到她是她在成都工合运动宣传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她在中国期间也在孙逸仙夫人手下工作过。

她穿了一身深褐色的中山服来到北京饭店同我一道共进午餐，厚厚的棉衣使她显得结实、矮小而有威严。她面孔红润健康，蓝眼睛炯炯有神，流露出亲切、智慧的光芒，她的金发已有点儿斑白。

她还到饭店拜访了文幼章。文幼章当过传教士，是加拿大多伦多人，是她在1938年前后在四川认识的。

魏璐诗对我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觉得我的根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得到友谊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24岁离开维也纳，我在那里没有根。现在我在中国新社会生活了21年，在这以前，我在旧社会生活了12年半。我在1935年的学生运动中开始与中国认同。

“我在1980年12月11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操德语的苏台德犹太人家庭。我在维也纳大学获得英文和德文哲学博士学位。我在1933年10月7日到达中国做为期6个月的学习旅行。我在上海最初的良师是路易·艾黎、莫德·拉塞尔

和耿丽淑，他们带我到里弄和工厂去。我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四川住了8年，后来我在1946年春天到了美国，一直呆到1951年秋天。我在那里同我的中国丈夫结了婚（他是1943年到美国的）。我在联合国无线电处工作。他患肺结核，留在萨拉纳克村^①，但是我带着孩子回到中国。那时我有国民党政府发的中国护照。我在1949年访问过中国，在1950年回到联合国。

“我的一个儿子在东北的一个拖拉机站工作，他25岁。他的弟弟在北京的一家为拖拉机制造零件的工厂。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我为他们翻译了吉卜林的诗《如果》。他们很有出息。我常常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好孩子，可以去擦地板；你们如果是坏孩子，也非擦地板不可。”

魏璐诗不仅能说汉语，而且能读、写汉语。“有25年时间，我用英文工作。现在我用德文工作。”

她在《中国画报》社工作。先前她曾经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来信》译成德文，这个著作还以西班牙文、瑞典文和意大利文出版。

魏璐诗要我在她的公寓房间共进午餐，离那里不远的动物园里养着熊猫和尼克松总统送的麝牛。我想去看看这些动物长得怎样，但是我不愿错过听魏璐诗谈话的机会，终于没有去看。

这幢小公寓楼是一幢管理得很差的难看的楼房，楼道和

^① 萨拉纳克村为纽约州东北部的一个游览胜地，原为一伐木村镇。1884年该村设疗养院后成为著名的结核病人户外治疗中心。——译注

门口很不干净。她的生活水平的确同中国人一样，并以此而自豪。天气很冷，她在室内室外都穿中国人通常穿的棉衣。我们吃了美国式的汉堡包和一种特制的维也纳果仁蛋糕。她的中国女婿来向她问安。

当我们谈到新年的时候，她说：“我是在1951年12月31日到达北京的。那是21年以前的事了，我感谢他们，甚至在最严酷的时刻，中国人都有幽默感。这有好处。不，我去的地方不多。最近我第一次到延安去，天气很热，我病了一些时候。在冬天旅行比较好。我没有可抱怨的，我认定既然中国人能熬过长征，我至少能用煤球炉。”

她带着崇敬的口吻谈到毛泽东，说毛泽东的著作在她看来十分有道理，这些著作教导她如何思考，特别是他写的《矛盾论》。他教导她在分析一种局势时要找到主要矛盾。她说：“毛泽东是高尚的、亲切的，例如他在有一次对埃德加·斯诺发表谈话时注意到，他们没有为女士们祝酒。毛是正确的，不是极左分子。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至于刘少奇，她说：“在1952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只是说学习、修养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完全没有谈到阶级斗争。中国像一座冰山，只有一小部分露出水面。在林彪时期，我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任何东西，一切事情都是逐渐发生的。毛泽东说，有拿枪的敌人，有不拿枪的敌人。我们不能以为人人都是善良的，有恶人和坏人。但是坏中可以产生好。”

至于苏联，她说，乔冠华说过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苏联是修正主义，因为它不帮助解放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相信有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中国的革

命必须走跟苏联不同的道路，不可能不走这样的道路。中国的立场是通情达理的和正确的，期望效法一个榜样不是马克思主义。1960年，苏联收回了它提供的帮助，但是有3年时间一直没有把这种情况告诉中国人民。苏联曾经答应提供原子弹和机器。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必须向苏联提供标准的蛋类和产品。中国偿还了欠的每一分钱，甚至赫鲁晓夫在要求偿还斯大林给中国的东西的时候，中国也偿还了。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赫鲁晓夫说，他知道怎样使中国屈服。苏联现在正在向美国和日本让步。

在每星期一次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俄国人总是带着在中国买的大包食品，因此他们那里的情况不可能太好。

节育问题：男女的结婚年龄分别为28至30岁和25岁。他们的工作单位给他们一间房子，但是要在他们成年以后才给。

八宝山——优秀共产党员的去处

全中国最革命的地方是离北京几英里的一座毫无建筑风格的小楼。这座小楼的长度不到50英尺，宽度还要小一些。这里有去世的领导人的纪念牌位和骨灰，这是中国人能得到的唯一殊荣。因为在中国，任何东西都不能以任何人的名字命名，任何人的生日都不能庆祝。

这是革命的，因为火化终于证明古老的儒家思想及其对死者的崇拜已经死亡。本来尸体要葬到家族的坟地上祖先长眠的地方，子孙后代必须遵守占卜者的适当的风水，否则坏运气将永远不会离开他们。

在这座小楼里，有在一个地方聚集的一批最优秀的男子和妇女的骨灰，这些人完全摆脱了原始的祖先崇拜，漫不经心地撇开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最后生活在他们长期奋斗争取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陪我到八宝山公墓，我们把整天的时间消磨在回忆过去和交谈中。龚普生坚持要我穿她的皮外衣，我自己的外衣是一件丝绵棉袄。

公墓由人民解放军战士守卫，进去的人必须有一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先沿着一条用石头铺的宽阔的路走到山顶。路两边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墓碑，这种墓碑通常比较大，上面有铭文。其中一些墓碑在文化革命期间已被推倒破坏，但是我们注意到“革命的国际友人”的墓碑都没有被破坏，虽然这个字眼包括印度尼西亚人、越南和其他国家的人。

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墓里也许只有几百个纪念牌位。在西方人中，有纪念牌位的只是四个妇女（全是美国人）和一个男子（名叫斯普林霍尔德的英国人）。这些美国妇女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曼尼亚·赖斯和索尔·爱德乐的第一位夫人鲁恩·爱德乐。最后两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路易说，曼尼亚·赖斯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他还说，属于“中国之友”的另一位在中国去世（不过在八宝山没有纪念牌位）的美国妇女是贝蒂·格雷厄姆。这是一位美丽的英国少妇。据路易说，她是由于卷入一场“爱

情纠纷”而自杀的。她当时同八路军在一起，我记得她当过《时代》周刊记者。

在北京，路易买了一些假花和小的盆景，放在墓碑旁边。他和我都带了照相机。我们首先瞻仰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墓碑。史沫特莱 1893 年出生于密苏里州，1950 年去世。她于 1941 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因病医治无效，在英格兰去世。她把她的骨灰和遗产赠给了朱德将军。朱德将军在她的墓碑上写了碑铭：“纪念美国革命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的最后的手稿是一部朱德传，这本书是在她去世以后于 1956 年出版的，书名是《伟大的道路》。从 1937 年 3 月 19 日到 7 月的第一个星期，她在延安为写这本书收集材料。在 7 月 7 日日本发动进攻以后，朱德太忙，无法继续接受采访。我在 1972 年同朱德谈话时曾经问他是否看过她的这本书，他回答说收到一本。

史沫特莱第一次是在 1928 年年底到中国的，她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就她的天性来说，她更带无政府主义色彩。她基本上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激进分子；她站在男子一边，或者试图这样做。在她一生中，不管她走到哪里（包括延安），她都要反对社会的权力机构。然而如果她活到 70 年代，她会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位受尊敬的模范工作者。（我们两人呆在延安的时间差不多相同，就是 5 月到 9 月，我们在 9 月一道离开延安。）她还出版了另外四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包括第一本关于红军的书——《中国的红军在前进》（1934 年），虽然这本书里并没有第一手材料。

史沫特莱女士在 1928 年到达中国以后就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她本人不是任何党派成员。在 1936 年和

1937年，由于种种原因，她受到美国共产党人的指责，在中国人中间，她找到了安身之所，其中朱德对她特别友好。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有一种天生的妩媚，是一位有真正的文学才能的很有教养的人。但是她有精神病方面的问题。她使我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试图在延安同她友好相处4个月。我不得不学习消除任何非基督教的精神状态，采取泰然容忍态度。我认为她的主要特点是无畏。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怕同别人为敌；她看来甚至是迎着危险上，并且化险为夷。通常用来称呼她的字眼是“母老虎”，她真正是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族女战士。她认为毫无理由同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发生争吵。跟有些中国化的文雅的外交家马海德和路易·艾黎不同，她从来不想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或者规章制度。她在临终以前不久还参加了纽约基督教贵格会的一次会议。

我们三个在困难时期认识她的人站在她的骨灰前面，都有一种大体上相同的想法：对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感到惊讶。要不是有治外法权，首先就不会允许她在中国登陆。

我们仁立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墓碑前面安放她的骨灰的地方，对这位20世纪的不朽人物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她于1885年生于内布拉斯州弗兰德，1970年3月29日死于北京。她继承并充分发扬了美国文明中的瑰宝。她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以一篇论“祈祷心理学”的论文得到芝加哥大学的学位。她代表转变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教道德的精华。她在以72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去中国之前不久，在洛杉矶参加一位论派教会。

在苏联的 1917 年革命以后 4 年，她到那里去看“未来”，在那里呆了 30 年。1949 年，她由于被诬告是美国间谍而在莫斯科被拘留了 5 天，不过她在赫鲁晓夫时代得到平反。我在北京听到有人说：“这只是误会，已经承认这一点。”然而这也被认为是对其他每个对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一种警告，因为她曾经一直在以比对苏联共产党人更热烈的言词颂扬中国共产党人。

她第一次去中国是为了写她的谈 1925 年至 1927 年的国民党革命的著作《中国大众》，后来又回到中国几次。她最后成了一个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她说她在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以前从来不懂得哲学，也从来没有掌握哲学；毛泽东主义同美国人的头脑特别合拍。我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思想的精华是变化，而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也是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倾向于为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这种态度是同建立美国实验的清教徒革命背道而驰的。

我 1972 年在北京曾经问魏璐诗：“斯特朗女士出版了多少本书？”

“我记得她在 80 岁生日时说她写过 30 多本书。他们打算在这里出版她写的 6 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大众》是在北京用英文出版的。我手头有她写的唯一的一本小说《奔腾的河》。”

这些书取得的成就是其他任何女记者或旅行者所望尘莫及的。且不说别的，单是这些书里收集的信息就够可观的了。她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报道国际事务的女记者。

斯特朗女士（没有人随便地称她安娜·路易斯）原来在某些方面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而且她

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一向是如此。然而当她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时候，她接受了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女权主义”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张。她本人是得到解放的美国妇女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受到损害。她情绪稳定，并且有一种天生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本领，这使她得到保护。

她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她觉得她有某种神授权利，她在一切场合（不管是重要场合还是次要场合）都运用这种权利。她专横，有女王气派，在一切场合总是颐指气使，有时候简直达到滋扰公众的程度。有些人认为，她在莫斯科被捕正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他们就是想去掉她这个眼中钉，而他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她从72岁到85岁呆在北京的最后岁月里，她始终保持颐指气使的神气。路易·艾黎和马海德被看成是听命于她的仆从，他们也心甘情愿地以许多方式帮助她。

我问路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过得愉快吗？”

他回答说：“她过得愉快。能为她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感到很高兴。我还听说，中国人觉得她每月写的《北京来信》在国外很有影响。她在那里出版这种信，寄给约21000个订户。换句话说，她很受到赞赏。

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是她写的书《中国大众》可能是中国政府用英文出版的唯一的还在世的西方人写的书——除了可能已印刷过的用于教育目的的老经典著作以外。北京政府没有用英文出版过埃德加·斯诺的任何著作，除了重印老的1938年版的《西行漫记》，我从1949年以来也没有见到中国政府用中文出版过他的任何著作。我写的《中国红区内情》一

书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听说埃德加·斯诺写的《旅行于方生之地》一书最近用中文在香港出版，但是没有在大陆出版。路易对我说，在出版还在世的或前不久去世的西方人写的书方面有某种禁忌。

如果你能理解这种禁忌，你就能理解中国人。这种态度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2000千年前，秦始皇和焚烧老经典著作的做法。中国人对写的字仍然有一种几乎带着迷信色彩的尊敬和畏惧。在古时候，连写字本身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此他们感到的书本身拥有的力量是西方世界完全不了解的——原教旨主义者心目中的圣经看来也许是例外。在中国，书有其自己的生命。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检查书刊的本能不是新东西。旧的统治方法是删去书刊中除了当时的当权派认可者以外所有对过去或现在的提法。欧洲在宗教法庭时期也有过这种精神状态，为的是破坏新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争取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都是真正的记者，他们都一直是记者。他们都不关心理论，只要有可能，都避免参加委员会或者卷入所谓的“实践主义”。他们的职业是根据事实进行写作和报道。幸而他们一直表现出这种令人尊敬的埋头苦干的作风，否则他们就写不出这些书了。

我真的喜欢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按照自己的意识生活，直到生命的尽头。她异常坚强。她是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同她正好相反，我从来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做过任何事情，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我特别钦佩她的勇气和成就，尤其是她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保持

自己本色的气概。

我认为路易和马海德医生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到过这个公墓，从他们发表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唯一受到损害的外国人墓碑是斯普林霍尔德的墓碑，他的一个黄铜浮雕像被破坏（我不知道他的其他任何情况，陪同我的人似乎也知道得不多。^①

中央的小陵墓守卫得很严密，但是他们允许我们进去，并允许我拍了一些照片。我猜想那里的纪念牌位也许不到 150 个。人们看到装有骨灰的小骨灰盒，上面或者旁边有一个装在玻璃框里的照片。

我拍了那里的仅有的两个妇女的纪念牌位的照片。这两个妇女是龚澎和卫生部长李德全，她们两人都有西方思想，受过新教徒教育，受到女青年会影响。

我还发现了徐海东将军的照片，他在 30 年代对我的丈夫和我特别友好。他是前不久才去世的。他手下的宣传工作负责人是黄镇，黄镇在 1973 年担任第一任驻华盛顿外交联络处负责人。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有甘泗淇，他是在 1964 年去世的。

^① 到目前为止，得到以一座建筑物命名和举行生平事迹展览会的殊荣的唯一西方人是白求恩医生。他是加拿大人，曾经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过八路军，因得不到青霉素而死于败血病。他是毛泽东亲自公开树为“学习”榜样，从而为 8 亿人中的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唯一外国人。

白求恩医生的第一个口译员是路易·艾黎的中国养子迈克·艾黎，展览会上展出的白求恩的一部分纪念品就是迈克·艾黎收集的。他“在 3 月 18 日当了口译员，白求恩在春天到达以后，随第 120 师一同到了黄河边上的一个县”。——作者

很难了解到高级领导人的确切情况。我听说肖克仍然活着，10多年前就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贺龙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去世，他从来没有“逃往莫斯科”，像谣传的那样。我听说贺龙1927年“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从而建立了红军。他是林彪的敌人。

据周恩来的妻子对我说，在1949年以前进入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老战士只有800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死了，或者“变坏了”。然而据我了解，没有一个政敌被处决。政策一直是让他们能活下去，为他们悔改归队敞开大门——这是毛泽东的说法。例如邓小平1973年在北京重新得势，不过部分原因是他反对林彪。

我们匆匆看了一下在这个公墓边上的一个大火葬场，这个火葬场是供整个周围地区使用的，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双十二事变”

我看了看我的饭店房间的西式办公桌上的台历，没有看到关于1936年12月12日这个日子的说明。这一天，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逮捕。在这以前大约两个月，我同我们的朋友燕京大学学生张兆林一道离开西安。当时我的丈夫和我正在北京同夏仁德和他的妻子一道吃饭，贝特兰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消息。这是我在中国度过的全部岁月中最最富于戏剧性的时刻，这是学生在1935年发动的“一二·九”运动的顶点。

一年以后，这种向左转的局面发展到军队中间，引起这场反叛和兵变。这场反叛和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建立民主，以便能动员人民反对日本，并为此目的同红军合作。

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在圣诞节获释而改变想法（他在反共问题上精神不正常），但是压力还是很大，因而带来了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时期。

我听到街上有人大声歌唱，于是我站在尘土很多的窗槛前面，看在路上走的一些愉快的男学童，他们都穿很厚的衣服。这些是我在中国之行中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坐在铺着玻璃板的桌子旁边吃早饭的时候，我的两个译员坐在一旁，安排一天的活动。我脑子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我想让人修我的玉戒指，并且买一些好的丝织品为我的朋友鲁思·费思做衣服。我特别希望得到一些有中式扣子的老式蓝工装上衣——大都会博物馆的韦斯顿·内夫希望得到一件这样的衣服。我切望得到一件新衣服，因为我喜爱的旧上衣已经陈旧得能送进博物馆了。

我们到外国人买东西的友谊商店去。我买了一些纸餐巾以代替擦面纸（在中国买不到），但是没有看到合意的丝织品。我发现现在中国人不大穿老式的上衣，那里流行新式的钮扣。

在一家熙熙攘攘的百货商店，我发现了一种上衣，同我的旧上衣不大一样，我买了三件。我在到了长沙以后，才找到一种较好的上衣。

对我来说，按照 2.30 元换 1 美元的兑换率，中国没有东西便宜。在 30 年代，这种兑换率从 4 到 10 不等。但是共产党政权的成就之一是币值稳定。

我们看了一些珠宝商店，把我的戒指留下来修理。我听

说中国的所有商店都是国家拥有的，店主是领薪水的雇员。

街上的商店橱窗是敞开的，这是一种新事物。先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人偷东西。

同爱德乐共进午餐

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中间的两个主要经济专家是所罗门·爱德乐和柯费兰，他们两人先前都曾经在亨利·摩根索和哈里·德老斯特·怀特领导下的财政部担任过高级职务（怀特在麦卡锡时期自杀）。财政部在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时期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我曾经在华盛顿在他们中间进行游说，为我们在中国的工合事业争取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没有成功。爱德乐曾在1941年9月代表财政部到中国去过，他是同我商谈过的人中间的一个。如果你能清楚地了解经济形势，你就不大可能戴有色的政治眼镜看世界。你就更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符合美国的长期共同利益。

爱德乐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帕特住在和平宾馆，但是柯弗兰已经习惯于住在一个中国人的住宅中，他在离开医院以后正在那里休养。我在圣诞节前后拜访了柯弗兰夫妇，在这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们。

马海德医生把爱德乐夫妇带到北京饭店同我一道进午餐。爱德乐夫妇都是细而长的身材，都是出生于英格兰。在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帕特不笑，不讲话，也没有表现出高兴见到我的样子，甚至在我称赞她的漂亮的中国女旅行服的

时候也是如此。这套女旅行服的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她在这上面没有穿其他衣服。爱德乐比较好交际，可以看出他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这同他半生时间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和财政问题完全没有关系。他的《中国经济》一书是《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7 年在纽约出版的。

他向我问好，对我说：“我住过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但是我的约克郡口音始终保持着，虽然我也到过牛津。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一个政治动物，或者是一个住在城市的动物。”

我问道：“你现在中国化了吗？”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

他发表意见道：“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我希望恢复我的公民籍。不能根据 1940 年的公民籍法取消我的公民籍，这是不合宪法的。你离开国家 5 年就要失去公民籍。我从 1950 年起在英国住了 3 年，没有回去。”

我说：“那是麦卡锡时期。”

“我在 1909 年 8 月 6 日生于英格兰利兹。我在 1941 年 9 月第一次到中国去，后来回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从 1944 年 7 月住到 12 月底。我在 1945 年 5 月、6 月和 7 月又到那里，是在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前不久到达的。我在 1947 年 12 月离开中国，1962 年回来作为一个居民在这里定居。从 1957 年到 1961—1962 年我访问过中国。”

我们谈到金本位。

我说：“英格兰是在 1931 年 9 月 21 日取消金本位的，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们常常认为人类是被钉在黄金做的十字

架上的。”爱德乐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的兄弟戴维把我唤醒，告诉我赎罪日发生的这个新闻。我赶紧穿起衣服去看报纸，结果没有去犹太教会堂。”

爱德乐的另一个兄弟名叫索尔，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人们常常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①

爱德乐说：“延安是世界上唯一使我赞同贝拉基^②的主张的地方。他主张绝对的意志自由。当你看到延安往日的革命司令部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说：“革命在中文中的意思是变革命运。这个国家过去把命运看成是完全不可改变的，现在却最主张自由意志，像毛泽东教导的那样，这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经济决定论现在怎样了？”

我们谈到中国，但是同我共进午餐的伙伴们不愿预测未来。他们说中国正处于转变时期，我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最难改变的东西是转变教育。整个方针都要改变，现在还没有教科书。”

午餐后，马海德医生把我介绍给红头发的法国人玛斯琳·罗丽丹和著名的荷兰摄影家约里斯·伊文思，他们正在拍

① 这里的“索尔”和上面提到的爱德乐的名字“所罗门”的爱称“索尔”在英文中只差一个字母，故易相混。——译注

② 贝拉其主义主张自由意志。贝拉基是公元360—420年的英国神学家。他到罗马以后对道德低落感到震惊，尽管这种情况被看成是“人的弱点”而受到原谅。他反对圣奥古斯丁的完全败坏和束缚意志的学说，这种学说把本应归于人的过错归于上帝。他相信人性的力量，他说：“我应当怎样做，就能怎样做。”他说，人只要愿意，就能过无罪的生活。人能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作者

摄一部关于“文化革命后的中国”的影片。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会晤过约里斯，当时他和已故的罗伯特·卡帕一直在西班牙和中国工作，而且已经有世界上两位最优秀摄影家之称。约里斯受到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接见，为顺利进行工作做准备。江青在1966年以后在中国的电影界、摄影界、歌剧界和“文化”界占统治地位。

伊文思和助手玛斯琳年轻时在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囚禁过，她的手腕上还留下一个烙印。

海德和我回想起一些小事。他说王安娜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一个贵族家庭，她先回到东德，后来又回到西德，在那里出版了《我同毛斗争》一书。她在1954年同王炳南离婚。王炳南1936年在西安任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在促成双十二逮捕蒋介石的活动中起过作用。王担任过驻波兰大使，大约在1975年，他担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同处理与日本复交事务的 联络官廖承志的一次谈话

中国最忙的人是廖承志、周恩来和乔冠华。他们要处理纷至沓来的要求改善外交关系的事务，其中同日本复交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廖是这方面的联络人。他和他的妻子经普禧正在对外友好协会总部等着接待我。这是前意大利公使馆的一座楼房，隔着花园同路易·艾黎的楼房相望。

对我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个轴心国之一的公使馆同廖会见是略微带有一点儿戏剧性的事情。有一阵子，

盟国似乎已经战胜轴心国，但是在1972年，我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和德国复兴的“奇迹”。且不说意大利，那里的法西斯分子在30年代执行以战争对东亚、欧洲和非洲的尽可能多的地区进行帝国主义占领的计划时，是决不可能梦想会出现这种奇迹的。我还异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花了很多钱为这种复兴提供补助，而我们国家却因此走了下坡路。

我向廖打招呼道：“令堂能享如此高寿，多难得啊！她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我到南京的时候打算登紫金山，在令堂和令尊的墓上献一些鲜花。”

廖用极好的英语说：“是的，家母是很了不起。她想埋葬在家父的同一个坟墓里。”

“你一辈子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她为你操多少心啊！她担心要完全绝后了。”

廖诙谐地笑道：“这个，我有7个孩子。”他一面说话，一面调整他的助听器，并且嘟哝说周恩来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榜样。

我说：“这是一个神秘的数字。”

廖的母亲何香凝是去世时没有火化的少数中国要人之一。她在1878年生于广东省，几个月以前才去世，终年95岁。她的丈夫廖仲恺在1925年被右派分子暗杀，当时他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有45年多时间，她和孙逸仙夫人这两位遗孀几乎单独屹立着，像是黑暗、荒凉、波涛汹涌的海角的两座灯塔，她们不仅代表原来的国民党左派，而且代表1905年在中国开始的革命的精神和灵魂。廖夫人在1924年甚至发明了到现在仍然流行的革命的短发型。

我说：“我很高兴，能在孙逸仙夫人健在的时候回到中

国。”

他说：“我将给她打电话说你来了，不过她身体不好。”

他和他的姐姐辛西娅（他说她身体很好）同孙逸仙夫人好像是一家人。在廖承志被蒋介石的国民党两次投入监狱的时候，这几乎像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个养子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逮捕。廖在1925年以后在中国像是一种皇太子式的人物。他决定参加得胜的一方——共产党人，这两位遗孀也同这一方结盟。孙夫人从1949年起一直担任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廖夫人从1954年到1959年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以及许多荣誉职位。自从20年代以来，一提起她们两人的名字，华侨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孙中山的信徒和财政上的支持者主要在华侨中间。

廖承志1908年出生于东京，当时他的父亲和孙中山在那里流亡，进行政治活动。他的父亲生于旧金山，他的信仰基督教的祖父在一家美国银行里工作。年轻的廖承志先生在日本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上学，后来在中国的广州基督教学院上学。

1925年，他成了一位学生领袖，在沙基惨案中他的帽子中弹，那一次外国卫队在广州外国租界附近的沙面桥头屠杀了约108名示威者。廖1937年在延安向我谈到他的生平时说，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国人竟然向被认为是中国“最反动的、亲英国的学校”的广州基督教学院的学生开枪。我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记载了这篇谈话。

1927年，廖上了早稻田大学（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学生约有4000人），但是不得不逃走。他曾经在德国和欧洲做地下工作，组织外国船上的中国海员。他在1932年一回到上海，

就在公共租界被捕（我在1973年拍摄了监禁这些犯人的小房间），接着被送往南京，并有被处决的危险。他的母亲非常气愤，她和孙逸仙夫人一道救了他的命。

他曾前往鄂豫皖苏维埃，并同徐向前（仍然活着）一道参加长征。不久我在延安遇到了他，他在那里因患痢疾卧病在床。他当时担任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的主编。

在1938年统一战线时期，他领导八路军在香港设立的公开的办事处。然而在1941年，共产党的新四军遭到进攻以后，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他。他在狱中得了严重的肺病，几乎没有痊愈的希望，因此他在1946年获释（当时为了避免释放犯人，许多犯人被杀害了）。

我对廖说：“我上次见到你是30多年以前在孙逸仙夫人在香港的住宅里。我从来没有料想到日本会在美国之前有一个大使在北京。”

他没有就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向我发动进攻，而是赶忙十分友好地解释说，他接过他的联络员职位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由于他出生于日本。

1949年廖担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和他母亲领导的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他从1959年至1967年担任该委员会主任）。这些年来，他担任同日本事务有关的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和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并且进行了其他许多活动，包括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旅行。大约从1960—196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1964年还在东京设立了他的联络处。

他从1945年至1949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1967年以前担任中央委员，但是他的名字没有列在1969

年选出的委员名单上。我听说他在文化革命期间曾经几次受到指责，但是在我到达北京的时候，他刚刚东山再起，至少在同日本有关的问题上是如此。我听说指责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太西方化。他是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基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

廖是外交部顾问，并且仍然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他对我说，他在1927年以前参加共产党，远在那时参加共产党的仍然活着的人只有大约800人了。我们谈到1927年的广州公社，他说叶剑英和陈郁是仍然活着的参加广州公社的人。

当我们谈到我认识的人时，他说，自1949年以来，吴亮平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职位；朱光死于心脏病。他说，张文彬是他个人的朋友，1943年秋天在江西省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被国民党杀害；关向应在1940年死于肺病。蔡树藩在一次飞机坠毁事件中遇难。

我把我1937年在延安拍摄的一些照片拿给廖和他的妻子看，还给他一些照片，请他送给王震（现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徐向前、肖克（仍然活着，但是曾经误传他早已死去）、董必武（共和国的代理主席）、姬鹏飞（外交部长）等人。我曾经写过所有这些要人的生平事迹。

廖在看大都会博物馆的照片集时，看到陈列的照片中有徐蒙楚（译音）的面孔，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我为人们单独拍摄的最好的照片。他对我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人，很反动，你应当从这个照片集中撕掉这一页。（很难使任何中国人相信，这张照片只是用于摄影的，而不必提他现在或者过去是怎样的人，做过什么事。在另一个场合，我看到他的名字旁边有“被捕”字样，但是没有提到消息来源。）

在我离开这个大房间的时候，廖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内容是说，尽管“我们”正在结识新朋友，但是并没有忘记老朋友。

由于路易住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我去拜访了他。我发现他正在看美国杂志《每月评论》，他的明代古桌上放着一盆开了许多花的一品红。他当时正在治疗脸上的皮肤癌，因而他的脸也红得像一品红。

我们谈到中国的老卫士。

他说：“老干部是一批了不起的人，属于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优秀的人物之列。”

我接着说：“我不能想象任何地方会有更好的人。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有关他们的个人生活的任何情况，他们似乎不想让人们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如果青年了解老卫士的个人情况——像我在1937年记下的34篇自传中提供的情况，那么老卫士给青年的实际启发就会大得多。如果埃德没有记下毛泽东的自传，他们连毛泽东的情况也不会知道。我听说，除了我在《中国红区内情》一书中提供的情况以外，他们仍然不了解有关朱德个人的任何情况。”

路易指出：“朱德是一位伟大的老人。林彪诬蔑他反对毛泽东，这完全是臆造的说法。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历史上都有许许多多很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像在这里这样带领世界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前进——这是空前未有的伟大业绩。

我们谈到其他国家缺乏领导，路易说：“卡尔逊本来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位领袖。他有必要的条件。”

我说：“是的，我一向期望埃文斯成为这样的人物，但是他没有保全自己的观念。我听说，尽管他的心脏情况很糟，他

还是抽香烟，甚至在他的臂膀瘫痪，动弹不得的时候，他还是照常抽。此外，他经常过分劳累，过分紧张。我很高兴，你和海德都不吸烟，这有助于你们保持健康。”

我的吉姆车的司机还在等着把我送回北京饭店。

回首往事

我在旅行中通常每天晚上都很疲倦，一到七八点钟，就要上床，但是由于回想起“双十二事变”，我有一段时候没有能入睡。

我把胳膊肘放在窗槛上，长久陷入沉思。我的目光越过宽阔的长安街，转向老使馆区。那里过去有一个缓斜坡，这是在1900年义和团袭击使馆以后在使馆区周围建立的一个由开阔的空地组成的防圈。中国旅行社大楼屹立在角落里。在日本1937年占领北京以前，外国人习惯于骑着马在这个缓斜坡周围闲逛。这是神秘的纸老虎的一个主要特点。我眺望我们过去常去的一个角落，我们曾经在那里看到我们的矮马咬马嚼子，马夫拉着它们等我们到来，我们到跟前后用胡萝卜和苹果喂这些烈性子蒙古矮马，使它们把我们当成朋友。我的丈夫和我养了一匹半矮马——我有一匹，埃德有半匹，那是他同牙科医生杰克·沃尔夫合买的。

我们有时候带着我们的白猎狗戈壁同矮马一道到缓斜坡上去，如果那里骑马的人不太多的话。我们当时住在附近的煤渣胡同21号。这种中式的房子仍然在，但是已经破旧不堪，

我简直认不得了。

我在1972年带着怀旧的心情眺望使馆区的时候，意识到我是在回想30多年的往事，这段时间的长度大体上同从1900年义和团造反到30年代外国人来华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1949年，中国接管了使馆区的大楼，后来只有一些外交人员即同北京关系友好的人员住在使馆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在老的法国公使馆处理政务，一位法国妇女曾经带着她的猎狗在那里住过，这条猎狗在每年的赛狗会上都要同我的戈壁比赛。匈牙利人仍然占有在奥匈帝国时期建造的那座富丽堂皇而又优雅别致的大楼。

我没有要求看美国公使馆卫队的场地，我们曾经多次在卫队副官埃文斯·福·卡尔逊上校和他的妻子埃特尔家里过夜，因为城门已经关闭，我们无法回到我们在海淀村的另一处中国住宅。当埃文斯在中国的任期结束时，他对红军的朱德将军比对在世的任何其他军人更钦佩，他最崇拜的人还有乔治·华盛顿和罗伯特·爱·李。在这里铸造了埃文斯和斯诺夫妇最先为了工合运动而建立的友好关系，而路易·艾黎在20年后终于住进了意大利公使馆，那里一度是法西斯分子的天下，由齐亚诺伯爵和他的妻子、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当家作主。

新使馆区在主要市区外面的东北郊，离中国工人阶级的公寓住房不远。人民解放军士兵在使馆大楼门口守卫。在3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信任中国卫队，连有钱的中国人也雇用白俄。

这个新使馆区容易受到袭击，但是北京的任何爆炸活动都会很快引起国际纠纷，而使干这种活动的人受到指责。只

是在 1967 年，中国极左分子的示威曾经使这个使馆区成为一个恐惧和恐怖的地方，不过红卫兵曾经奉令不要干扰外交部及其活动，闹事的头子后来被投入监狱。英国代办和他的使馆中的妇女遭到袭击和侮辱，大楼被焚烧，这使周恩来非常生气，当时他也成为了极左分子的攻击目标。

外交人员的足迹不得超出市区外面几英里的地方——除了颐和园、长城和北戴河海滨以外。（我曾经同哈里·普赖斯夫妇一道在北戴河海滨度过两个夏季的一部分时间。）到其他地方旅行需要得到批准。他们同一切事物隔绝，渴望得到任何一点一滴信息。人们随便说的任何一句话到头来也许会被外界的某个政府机构看成是重要言论。我避免同一些大使馆接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按照北京的礼节，旅行者不能同外交人员谈话。中国人倾向把任何渴望得确切的信息的学者或者外交官看成可能是间谍。

往日，在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英帝国，辅助它的是法国。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支配通商口岸，后来美国从 1945 年到 1949 年插了手，虽然先前美国的政策是主张中国独立和中美友好，并且常常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想法。英国是在 1950 年第一批承认北京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人直到前不久还拒绝互派高级别的大使。他们仍然不信任英国人，因为英国人似乎不够精明，没有像诡计多端的法国人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把他们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个人派到北京去。

1964 年戴高乐派一个名叫艾蒂安·马纳克的社会主义者当大使，从那时以来，法国人在同中国人的关系方面一直处于有利地位。他们正在从他们的法国革命的祖先和他们的

1870年巴黎公社的祖先那里得到好处，因为中国人特别钦佩巴黎公社，而且对拿破仑作为一个军人很感兴趣。法国人和中国人还试图打破核垄断。中国不完全信任任何人，但是巴黎一直是他们在欧洲进行外交活动的中心。

我不打算把时间花费在旅游活动方面，至少不到过去熟悉的老地方去。可是我还是再次去天坛散步，我们过去常常在天坛的辽阔的公园里骑马。小殿堂已经重加粉刷和修理，一些场地已被学生用来进行农业实验。

紫禁城离北京饭店不远，我步行到了这个地方。这里过去很荒凉，可以听到空地上的回声，现在常常挤满了中国的游客和全家出游的人。太庙是有独特气氛的宏伟建筑。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家庭住的地方是征服中国达3个世纪的满州皇帝处理朝政的许多内宫之一。

城墙是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外国人最喜欢的北京的东西之一。我们先前曾经带着狗在城墙上散步，并且同宋哲元手下拿着大刀守卫城门的士兵谈过话。这是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些消磨时间的少数没有人群和疾病的地方之一。现在我还记得，我曾经在这个古城墙上同耶稣会科学家德日进一道散步，他利用我为他的深奥的新哲学进行宣传，这种新哲学包含在后来出版的《不寻常的人》一书和其他著作中。他带我去看耶稣会在17世纪前后建造的观象台，我仍然有一张他为我拍摄的照片，内容是通过大星盘进行观察和沉思人如何做到尽善尽美。我曾经认为他狭隘、偏执、守旧，但是我像别人一样爱他的品格和魅力。他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核弹出现以前，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他的想法的重要性，不过我并不反对他的大部分想法。

除了前门和鼓楼等少数城门和城楼以外，北京的城墙已经被破坏。在中国的外国旅客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沮丧。北京是世界上富于神话色彩的城市之一，部分原因是它有古老的城墙和城楼。它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连老使馆区都有其奇妙的历史。它有 600 多年前建造的明代老屋和许多满洲宫殿。现在当你驱车到处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似乎大部分被推倒了；新建筑物没有特点，没有建筑风格，只有一两幢例外。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能像新德里和旧德里那样在城外建造另一座新城市，来容纳 700 万居民中其余的人。城墙上的砖被用来修建防空洞和地下铁道，因为在 1969 年同苏联对抗时开始执行大规模修建防空洞的计划。

世界上最令人难过的事情恐怕莫过于在北京看到防空洞并了解到有关防空洞的情况了。难道中国人真的没有想到在一场核大战中这种东西毫无用处？旅游者们目瞪口呆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哪怕是用来对付常规轰炸？人们一再说：“只要中国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核战争之害，就不会有和平。”中国人是否想到，核散落物会毒化空气、水和土地，而使人类没有可以居住的地方？这些是关键问题。

正是这种情况，使尼克松总统前来北京成为在 1972 年震撼中国的每一个地下隧道和世界其余地方的大事。

北京城墙边上我喜爱的一个地方是东南角落的狐楼，它现在仍然在那里，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荒凉，连蝙蝠和燕子都被 DDT 毒死了，更不用说狐仙早已被毛泽东思想消灭

了。①我们曾经租下盔甲厂 13 号靠近这个楼的一个有围墙的大院的一半房子，埃德加·斯诺在 1936—1937 年在这里写下了他的《西行漫记》。我两次试图找到这座房子，都没有成功，不过街道仍然在那里，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这是一幢平房，两边各有两大扇英国式的拱形窗。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住在一边，我们住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个门廊。我们的房子在街道靠近城墙的一端，是最后两三座有围墙的院子之一。后面是义和团公墓，1900 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就埋葬在那里。我无法找到这方面的任何东西，当然一切都被夷平了，基石也被用来修建防空洞了。

这个地区是一个乱糟糟的地区，重建工作正在进行，气氛很令人不快，我的译员和司机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同我们合作，回答我们的问题。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的摇篮，因为这两件事情确实是 30 年代中美关系的象征。这幢房子还曾经是一些处境极为困难的逃往北京的东北难民聚会的地方，他们在

① 在路易·艾黎的住宅，我们翻阅了西伦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他说老考场在观象台附近）。朱利叶·布雷登的《北京》一书在第 30 页写道：“我们从哈德门外面的城墙东南角眺望狐楼的堡垒，据说狐楼里有一个狐狸作怪。”这个建筑物在 1901 年被俄国人击毁，没有修理。蝙蝠和燕子在黄昏飞到那里，那里有元、明、清三朝武士的鬼魂。东边城墙旁边是观象台，是忽必烈汗在 1280 年在东南角修建的一座塔楼。1685 年，法国的 6 个耶稣会教士赠送了一些铜方位仪和一个地球仪作为礼物。路易十四把这些东西送给了康熙皇帝。——作者

西安的朋友决定在 1936 年 12 月逮捕蒋介石，这件事在当时被称为“双十二事变”。

我的《中国红区内情》一书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梅德赫斯特公寓写的。这个地方不难找到，尽管换了名字。友协为我拍摄了这幢房子的一张照片。这是 1938 年中国的工合运动的诞生地。

革命博物馆

我很想参观北京的革命博物馆，但是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博物馆现在不开放，而且近期内也不会开放。我猜想准是正在换展品，把有些展品拿掉，其中大概包括所有提到林彪这类人物的展品。我想问一些问题，于是博物馆的几个头头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来看我，保管部主任也在其中。主任是位女士，名叫周础，曾是新四军中的一位文艺工作者，不过她没有受到国民党在 1941 年发动的那次有 9000 人丧生的袭击的伤害。马海德医生也来了。

我最想知道的是他们保存着哪些长征照片和文物。工作人员已经查过，说博物馆内保存的照片很少，长征时期拍的照片他们一张也没征集到。我对他们说，1937 年王震给过我一张他在红军第六军团长征期间同苗族人谈判时拍的照片。这张照片 1972 年还在大都会博物馆内举行展览时展出过。罗

炳辉将军也给过我一张照片，那是长征结束时（1936年）在甘肃拍的。徐海东则给过埃德加·斯诺一些在他独立进行的长征结束时拍摄的照片。我对他们说，有关长征的一些书籍曾发表过一张或几张据说是长征期间拍的照片，特别是有一张毛泽东骑在马背上、颈间围着围巾的照片。但我发现这一张是在长征之后拍的。

我对博物馆的人说，在延安时，人们给过我几张长征时的照片，不过我没带到中国来。我还说，人们送给过埃德加·斯诺十几张长征照片；我们1936年在北京洗印了老照片后，他给了我一套，我至今仍保留着。他们查过了，在北京找不到任何有关埃德加·斯诺向任何人送过任何这种老照片的记载，尽管他们保留着他在1936年拍的电影，也是有关红军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以“一二·九”示威结束的，我也有过这部电影的一部拷贝，还有几部在菲律宾拍的电影的拷贝，但我在1965年把这些拷贝还给埃德加·斯诺了，尽管他手头至少还有两部拷贝。）

这件事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原以为埃德加·斯诺早就把这些老照片还给他们了，至少会把翻印的照片送给他们。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处理这些堪称无价之宝的原物的。由于这些照片（其中有一些是印在蓝色晒图纸上的）在长征途中被带着辗转各地，它们全都被揉搓得很厉害，并留下了水渍。

就我在此次访问期间所了解的而言，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在中国是全都没有了，只有1931年的中央委员会在江西拍的一张和徐海东的那个军在甘肃拍的那张曝光过度的照片除外。这后一张照片我在好几个博物馆都看见过。在长征期间，为了确保安全，这些照片原件是装在美孚石油公司的

油桶里携带的。

“你我是从事同一职业的，”我对周础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档案保管员。我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都保留着。从1958年到1961年，我把我的收藏的好几箱资料都寄到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一起寄去的还有我在中国所拍照片的900来张底片。我担心我的房子会失火。”

博物馆要求我把我的《延安笔记》一书寄给他们一本。

他们带来了一本精美的相册，里面镶有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红区拍摄的所有照片的洗印片，那是他无偿送给他们的。我翻看了一遍，没发现少掉什么。

我1937年去延安时拍了330多张照片，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印了小型接触印相片带到北京来了。我拿出这些照片给博物馆的人看。有一些印得很黑，博物馆的人认为这是摄影技术太差，不过他们很想要其中的一部分。我解释说，这些照片由我的代理商——纽约的马格纳姆图片公司处理，他们所卖出的我的任何照片的收入有50%至60%归我。

你要是不曾试图向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解释过资本主义的运转过程和照片代理商是怎么一回事，你便不会知道人们对这种事会怎样地困惑不解。马海德医生极力消除他们的某些疑惑。结果是，他们拿去了我带来的三本书，暂时借去拍下书中的插图。（我把这几本书送给了外交部图书馆，因为他们说，我写的所有的书这个图书馆都想要。后来我又听说，我拍的所有照片，不仅仅是在延安拍的照片，中国人也都想要。）

1937年夏季，我用照片的形式记述了作为一个小城、也作为共产党人的会合地延安的历史。（埃德加·斯诺1936年

不在延安，因为延安直到那一年的年底才被攻占。他那时是在保安。)那些照片中有一些是现已失宠的人，如彭德怀和林彪。(后来有人告诉我，人们看到我的照片中有这些人，很“伤感情”。)我听说，博古的离婚妻子刘群仙早就死了，而林彪在1937年以前的最好的朋友聂鹤亭，则似乎没有谁知道。

我的照片中的有些人的照片；博物馆工作人员从来没见过，他们甚至没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我开始感到，我的书和照片也许是使这些人永垂史册的唯一记录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博物馆送给我一本相册，里面全是毛泽东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是路易·艾黎的中国养子迈克^①拍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据我所知，摄影者的名字通常是不提的。

海德（我总是这样称呼他）医生留在饭店吃了午饭。我问他是否知道那个叫李德（奥托·布劳恩）^②的德国人的情

^① 我在路易的家中见过迈克和他的妻子。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同他共进家庭式早餐。迈克英语讲得很好，他头发已经花白。他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极左派“整”过3次。在1931年发生大饥荒时，路易收养了两个无家可归的中国男孩。当时迈克11岁，路易的《黎明的孩子》一书就讲到过迈克的事。另一个男孩叫艾伦，1972年的时候他不在北京。

路易对我说，迈克是1918年出生的，1937年9月去延安抗大学习。他9岁那年就参加了革命（《放牛娃》一书谈到此事）。路易1939年冬至1940年春以及1940年至1941年期间曾两次去延安。迈克后来当上了工程师，并被任命为边区工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迈克1946年同他在延安认识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作者

^② 另一个人告诉我，奥托·布劳恩的儿子死在延安。说他娶了个俄国太太，并说他不仅还活着，而且是作家联盟的第一书记，颇有影响。——作者

况。在我到延安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了。海德医生对我讲了这样一些事情：他是个孤儿，在德国当过面包师学徒。他1918年在德国参加了革命，最初是以擅长设置路障而出名的。他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被派到中国。起初他在白区，后来到了江西。长征期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把他清除了。他恨毛泽东，毛泽东也恨他。他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在东德写反毛泽东的书籍。但海德医生从未见过他写的书。李德1937年在延安离婚，他和那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不久就死了。他第二次结婚娶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女人。海德医生说，李德1939年回德国后，他再也没听到过这个消息。

我们回忆起往事。海德对我拍的每一幅照片都看得十分仔细。他是对这些照片那么熟悉又那么感兴趣的唯一在世的人了。由于某种原因，中国人没有这种历史感和重大事件感，只有对毛泽东的照片除外。

海德对我说，在1936年的保安时期，一个理发匠把他的整个铺子都用江西的邮票裱糊起来。海德揭下了几张，送给在中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一两张——后来，这一两张邮票竟成了英国国王的收藏品。

12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我在中国受到破格接待，据说这不仅是礼仪问题，而且是人们的自愿行动。我的到来使北京有点难办，但我是凭着我自己的“《中国红区内情》作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有人对我说，他们很少提到任何书籍，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这是好书。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位妻子洛伊斯曾在1970年陪他到中国进行他最后一次访问，所以这有点儿让人糊涂，因为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有过两个妻子。12月14日我受到正式接见之后，海德医生给我寄来从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剪下来的消息（还配有一幅照片），并说：“我羡慕你，也祝贺你。”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以前也曾常常想到，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中国呆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对他的业绩却大加宣扬；海德医生自1933年来中国之时起，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为中国人服务的事业，然而他却没受到过任何夸赞。

我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你们二位曾是第一批到这里来的外国人。”这是指我的丈夫和我是1936年和1937年到共产党控制区访问并在1938年和1939年发表过关于那次访问的书和文章，尤其是有中译本的这种书和文章的第一批外国人。

这个说法最初是在1938—1939年前后使用的。当时汉斯

·希普到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攻击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他立即离开，说：“我们知道埃德加·斯诺是什么人。他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我们也知道你是什么人。”毫无疑问，毛泽东意识到，对那本书的攻击也就是对他本人的间接攻击，因为书中的材料首先是从他那里得到的。

去大会堂应当穿什么衣服？中国人无论男女向来穿深蓝或黑色的“中山”装。但男式和女式是不一样的。有一次在上海的友谊商店里，我看见一件极考究的蓝色毛料“毛式上装”（这是外国人的叫法）。它是穿在一个人体模型身上的，我想试一试。我的陪同和营业员简直吓坏了，连声说：“啊呀，那可不行，你不能试，那是男式上装！”我也就没有试了。男式和女式的一个区别是，女式不能用贴袋，只能用不大看得出来的口袋。

“中山”是孙逸仙博士的另一个名字。他发明这种式样的衣服是在1924年前后，当时他的党（国民党）正在根据俄国人的建议进行改组，所以这种式样同苏俄也有些瓜葛。孙博士最初的两件“中山”装挂在他上海的家中的衣橱里，我拍下了它们的照片。这种上衣有着立得很高的中式领子，可是现在流行的女式上衣领子比较低，向两边翻着，扣子则总是现代的、西式的。如今再钉中式扣子（除了最上面的扣子之外）可就守旧得不合时宜了。妇女通常穿白底黑布鞋，男子则穿西式皮鞋。

如果你记得自1924年以来中国革命者一直穿着几乎同一式样的制服这种衣着方面的教条主义，你就会明白“修正主义”这个词多有分量。中国是极端革命与极端保守这两种

倾向的奇怪的统一体。它的习俗的一成不变是别国所没有的。

“大会堂里有暖气吗？”我问。

“有的”人们告诉我。

不过，中国人所称的暖气同美国人所称的暖气可大不一样。我本想穿林赛普雷德公司的毛料长裙，再披上带流苏的斗篷（苏格兰出品）。那是我带来要在正式场合穿的，而且在第一次宴请我时我也穿过。但是我担心感冒或鼻窦发炎（当时很有发炎的征兆），所以决定把所有驼毛衣服和滑雪服全都套在身上，尽管这种衣服的不合规矩的鲜艳颜色在照片上显得很扎眼。

到正门后，我还没来得及摘下帽子，朱德将军就走上来，以延安方式用双手同我握手。这是真心实意的欢迎，用年轻人的话说，这是“震颤式”的带电作业。

“只是为了能再见到你，绕半个地球到这里来也是值得的。”我向他致意说。

“欢迎，欢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词，同时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龚普生把我的大衣挂好后，很高兴地站在一旁看着我们。

这不是朱德第一次欢迎我了。1937年，我刚到延安，他和毛泽东就来看望过我。“你很勇敢哪！”朱德当时说，这是指我在西安戒严期间跳窗户跑出来秘密逃往红区的事。35年之后的这次握手也是在表达这同一个意思。我依然记得，在延安同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握手——更不要说同毛泽东握手了——是多么使我激动。

要不是我在1937年勇敢地面对过危险和困难，朱德在1972年也许不会那样接见我。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一

种很平常的欢迎。他还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后来把次谈话发表了。

“你读过我在《中国红区内情》一书中写到的我采访你的访问记吗？”我问。“老早以前读过，”他回答说。

“你看到过史沫特莱去世前写的有关你的那本书吗？”

“看到过。”

他陪我走到一张很软的西式扶手椅前，那是2月间尼克松总统坐过的椅子。我的翻译资中筠坐在他身后。还有13位中国人围成一圈坐在那里，一句不漏地注意听我们谈话。

“看到你气色这样好，我感到很高兴。我想这一定是你生活有节制的结果。”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注意到他的牙齿没有脱落，两鬓刮过、理成平头的头发还没有全白。他当时已经86岁了，而且患有糖尿病，可是他的体格健壮简直不减当年。

朱德接见我的前后，正值他的生日。^①

① 我曾同路易·艾黎谈起朱德的出生地仪陇（他生于1886年），他去过那个地方。他说：“那里是山区，要过几座高山。山脚下光秃秃的，根本没有土，只有山顶上才有土。朱德所认识的人、他住过的房子、还有那所学校也都在山顶上。学校门口挂着一块匾。另外还有他在仪陇县教过书的那所学校以及他从前到成都去时所走的路。”“到那个地方去很困难吗？”我问。“在深山沟里，进山后要走很远。”他说。我说：“我很想去看看。我喜欢呆在这种人物生活过的地方的那种感觉。例如到弗农山去，站在乔治·华盛顿的安息之地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极其激越的感觉。我在延安时，我感到自己是在福奇谷（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带领军队安营扎寨之地——译者注）。要知道，我们美国也有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作者

“朱德同志一直坚持体育锻炼，”周恩来的夫人插话说。“他到夏天仍然在北戴河游泳，很注意身体。”

“我也曾在两个夏天到北戴河游过泳，”我说，“我也一直积极主张从事体育锻炼。每年的4月至9月，我依然到大洋里去游泳。我记得以前中国根本不重视体育。”

朱德点点头，微笑着表示赞同我的话。

“埃德加·斯诺的书中说你80多岁了还打篮球。”我说。“他一直渴望见到你，可是一直未能如愿，是不是？”

“噢，他见过我。”朱德回答说，“1970年斯诺先生到这里来时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们当初是有分工的，”我说，“我丈夫负责写毛泽东、周恩来、徐海东和彭德怀，我负责搜集另外34个人——其中包括你的自传。这34个人也就是在他1936年离开保安时还没有到达延安、因而他未能见到的那些参加长征的人。你记得史沫特莱发现你把你的经历简要地讲给我听了的时候她发了多大的脾气吗？她对你非常崇拜，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别的外国人写你。”

“是这样。”朱德朗声笑道。

史沫特莱小姐毫无顾忌地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大发雷霆，怪他不该在我刚到不久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了——他的生平当然是我争取搞到手的第一个目标。史沫特莱的一通埋怨使他大为惊讶。在延安，谁也不懂什么叫抢新闻，也不明白她何以希望完全垄断朱德的生平报道。她也对我大动肝火，不过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笔记本撕掉，尽管我很理解她的愤怒。

“我想借此机会对你说，我对你在延安时给予我的关照是多么感激，以及所有外国人对此都是多么感激。”我说。

“我想你大概知道你对埃文斯·卡尔逊上校有很大影响，你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军官。”

朱德对那些设法进入红区的外国人采取如此友善的态度以及我们这些外国人全都那么喜欢他、敬佩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是那样非同寻常，我一直都无法理解。史沫特莱给予他的回报是时时处处维护他，尽管他是个男子。（也许正因为他是个男子，要知道她从未同哪个女人亲近过。）她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四处搜集有关他一生所到之处和所经历的事件的材料，用来充实她为他写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她有一次对我说，能结识他，她在中国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就是值得的，哪怕从未结识过任何其他中国人也罢。这不仅仅是一种英雄崇拜，远远超过了英雄崇拜。同其他人一样，我对朱德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结识他是东西方之间的一种真正的沟通，这本身就是一种国际间的谅解。实际上，他本人就是真正的中国的体现，他的根就在旧中国的遥远的内地省份四川。但是，我们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从心理上说他也许是中国所有最高领导人中最为“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一位——而这种“现代化”与“西方化”不是由于他所受过的教育，而是他的选择和他的天性使然，而且绝无任何“排外”情绪。人们一直用他们家是客家人这一点来解释他的个性何以会与众不同，但我不能肯定情况是否真是这样。

朱德是一个绅士，非常了不起的绅士（儒家称之为“君子”）。在北京，外国人至今在提到他时仍然称他为“那位老绅士”。这个同西方传统、特别是英国传统有着种种历史联系的称谓对他是最贴切的了。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都是完全值得钦佩的；而且他愿意以身作则，这也正是乔治·华

盛顿（埃文斯·卡尔逊心目中的另一理想人物）主要的特征。

有一件事很能解释他为什么对外国客人抱有异乎寻常的负责精神。这事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它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文幼章^①告诉我的。1972年12月，他恰好也住在北京饭店。

很久以前有一次朱德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当时他藏到了四川泸州的一位传教士家里。那位传教士是查尔斯·乔利夫牧师。他得到一位姓熊的厨师（在传教士批准的情况下）的帮助，装扮成厨师的助手。厨师也称“大师傅”，而“大师傅”正是朱德的绰号，或许这就是从上面讲过的那件事来的，尽管带有传奇性质的版本还有许多。

朱德年轻时还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学过体育，如打篮球等。

朱德早年参加过1911年的孙中山革命。他意识到孙中山采用的军事方法起不了作用，于是便决定自己去寻找共产党。1922年他在柏林找到了共产党。在柏林，他结识了周恩来，加入了党的新支部。他还在哥丁根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回国后，他于1927年在南昌帮助组建了红军，1928年后担任了共产党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同毛泽东（作为政治领导人）共事直至年老退休。1956年，他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至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入政治局。

^① 许多年来文幼章一直定期地在他在多伦多的家中出版有关大陆中国的刊物。他同他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在中国传教多年，他本人生于四川。当他以75岁高龄到北京时，他受到了特殊的接待。他说，温哥华的威尔莫特也曾率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过。——作者

从1949年至1959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后，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目前，另一位1911年革命的参加者董必武担任共和国的代主席。这三个人再加上周恩来总理，就是体现着中国革命的依然健在的主要人物。他们各自都称得上传奇人物，虽然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雄踞这个王国的最高官位。1937年在延安时我同他们四个人都进行过交谈。

虽说朱德来自边远的四川那个排外主义的大本营，但他却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质。然而，红卫兵在1967年贴出的大字报却用“大军阀、大野心家”这种最不恰当的字眼攻击他，尽管他在那年10月份国庆活动期间曾同毛泽东并排站在主席台上。这些红卫兵根本不了解朱德的历史，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还是他的政治或军事经历。

关于他个人的经历，最可靠的中文材料来源至今仍要称他于1937年对我讲的、后来写进《中国红区内情》的那些东西了。我听说，现在各“五·七”干校都在以此为学习材料。

朱德在1972年曾对我说，毛泽东是革命领袖，说他支持他和他的“正确路线”。

“在你这一生中，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在大会堂这样问过朱德。“最剧烈的变化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这22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变化更大。总的来说，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努力的结果。”

这时，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讲话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你那时到延安来过。后来又是解

放战争，接着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你 1937 年到延安，到如今已经 35 年了。这 35 年中，特别是自 1949 年以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上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着我们谈到了蒋介石。

邓疑超说：“全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问蒋介石怎么样了，他那顽固的反共态度当然没有变，不过他在台湾是越来越孤立了。许多国家同他断了交，承认了新中国。所以说蒋介石也有了变化。你几十年没来中国了，你能在这个时期来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你来了，我们欢迎你，我们希望你在中国多呆些时候，多看一些地方，了解了解新中国和中国发生的新事情，这样你就能得到新的材料去告诉美国人民。”

龚普生插话说：“你可以写写你的老朋友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的许多事情嘛。”

“我觉得最剧烈的变化是计划生育和实行火葬，因为这两件事意味着整个古老的儒家体系被最后摧毁了，完结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多要儿子、人丁兴旺的观念被最后打破了。”我说这话时，屋内响起了惊讶的感叹声。

“我们大家都是无神论者。”朱德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迷信。我们所实现的最大的变化便是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这场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旧的习惯、传统、风俗、政策和行事方式。这变化不仅在你提到的两点上，而是整个国家制度都变了，人民也变了。”

邓疑超说：“只是由于国家制度变了，你所提到的两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当然你看到现在中国的坟包比以前少了，这是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

朱德说：“不仅是坟包有了变化，其他的一切也都有了变化，像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一样。现在同延安时代大不相同了。你既然到中国来了，我们希望你能再去一些别的地方。你会看到一切都变了，人变了，思想也变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开口说：“也不必全部实行火葬。农村就采取深埋的办法，这并不占用农田。”

“确实如此”，我说，“这样也许更好一些。不过，这个变化不像火葬那样剧烈。”（我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我本人就不愿意死后被火化。）

“人们总是不愿被投入火炉内，不管是活着投入还是死后投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朱德站起来握手道别时又补充说道：“老一代越来越老了，总有一天要死去的。但是新一代在出现，革命会继续下去。”

我知道朱德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倡导者，这是他夫人在1937年告诉我的。我还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受到自制、节欲和努力工作、奋勇杀敌的严格训练，并以此来消耗他们的年轻人的精力。他在1937年对我说，起初，强奸是要治死罪的，由于杀一儆百的缘故，后来就没有这类问题发生了。

毛泽东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激进的反儒派中国人。到他去世时，中国将遇到一个以什么方式埋葬他的重大问题。从文化革命中可以看出，他平生最不妥协地加以反对的东西便

是整个宗法制与祖先崇拜。他主张计划生育，但这并不是他特别着力追求的目标。

丧葬习惯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与摆脱迷信的程度的绝对可靠的尺度。在像埃及这样一些地方，膜拜死者的习俗依然存在。新教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禁止为死者做弥撒或祈祷。我本人是坚决主张敬重死者和记录他们的业绩的，但不是用造得很大的坟墓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办法，而是用家谱和史书来做记载。

在旧中国，尸体被看作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认为在它被埋在坟丘之下的地方，祖先的鬼魂徘徊其间，把崇拜祖先的后人放在坟上的供品一点点吃掉。老年人最关心的是能有自己的棺材，而且时常在死前就夜夜睡在里面，使自己能够早些适应。由于中国木材短缺，弄副棺木可算得一笔很大的投资呢。

同邓颖超和康克清一起吃饭

朱德在大会堂接见我之后就先走了，因为他吃的饭食有特殊要求。接下来由邓颖超和康克清——她们是当今中国屈

指可数的几位女领导人中的两位^①——在安徽厅设宴招待我。

她们同朱德一道在大会堂门口迎接了我。邓颖超同我握了手，康克清则同我拥抱并亲吻我的双颊。她对欧洲的迎客方式如此熟悉，真让我吃惊。有人对我说，他们三个人一道接见外国人，特别是朱德接见外国人，是很少有的事。

这两位妇女都是当时仍处于“冬眠”状态的妇联的领导人；她们两人的婚姻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婚姻。邓颖超于1925年8月同周恩来总理结婚，至今仍为千百万摆脱古老的儒家家族传统、步入现代世界的人树立楷模。在儒家的家族传统中，妻子是家庭的抵押品，而不是平等的伙伴。康克清是1929年在井冈山上同朱德结婚的。

^① 我在写《近代中国妇女》一书时，列出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的10位中国女领袖人物的名单。现在仍然是这10个人，只是要加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人物，1969年同林彪的妻子叶群（她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一起进入了政治局，是最先被选到政治局中的女性。在1969年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还有12位妇女，其中包括邓颖超和蔡畅，另外还有9名女候补委员。与此同时，截至1972年，我的10人名单上死去的两位是李德全和何香凝。两位名作家尚健在，我在北京见到了冰心，但丁玲自1959年前后起就一直挨整。孙中山夫人仍然是共和国副主席；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仍然是台湾的第一夫人。我最初的10人名单上还有1907年被处死的秋瑾和1908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作者

我们一共 13 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①我环顾四周，看到的都是黑发剪得很短的脑袋，女士们也都是 20 年代时的那种短短的直头发。在 1927 年那时候，女孩子剪成这种发式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人们可以想到，这发式也同制服一样，是一种值得骄傲的革命传统。

在场的其他人中只有“一二·九”时代的龚普生和陈翰伯（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是我的老朋友了。其余的都是友协和外交部的官员。

“周恩来知道你在这里，但是他让我转告你，他工作太忙，今晚来不了。蔡畅也问候你，但是她身体不好，今晚也来不了。”邓颖超这样开始了宴会桌上的谈话。她又说：“你在 1937 年冒着生命危险来访问我们，可是我们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连点儿糖都拿不出来招待你。现在我们有糖和酒了，我们把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来欢迎。”她边说边举起酒杯，提议为欢迎我而干杯。

我的一侧是邓颖超，另一侧是康克清，她们都用筷子往我的盘子里夹各种小吃，盘子里都堆满了。我们的盘子旁边放着正式的铅印菜单，最后一道是哈密瓜。这顿饭是中国最高超的烹饪艺术的成果，但是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些美食上。两只带柄的西式玻璃酒杯里盛着白色的茅台烈酒和红色的甜葡

^① 一位年轻的女摄影师拍的正式照片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拍进去了。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友协秘书长丁雪松，接下去是邓颖超站在我旁边，再下面是朱德和他夫人康克清。康克清右边是龚普生，她旁边是陈翰伯。后排左起第四人是我的翻译资中筠，她的右边是另一位翻译邓秀梅。她们都是友协工作人员（友协共有工作人员 200 名）。其余的都是友协和外交部的官员。——作者

萄酒。

邓颖超情绪很高，眼神之中闪耀着真正的生之欢乐。她讲话很有权威，有一股命令的味道。上一次见到她是1937年秋在西安（那时我曾与她同住一房间），当时我觉得她是个很平常很随和的人。而今，虽说她已70高龄，可她却有一种非凡的魅力，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充满信心的个人品格中，而且甚至表现在她那异常白晰、富于表情的脸庞上。我发现她的手很纤小，牙齿很好，只是有点暴突。

中国人一贯把邓颖超看作在各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外交家。作为总理夫人，她不大抛头露面；但在私下里，她同他亲密无间，什么情况都了解。在旧中国，裙带关系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则很重视在消灭儒家思想的其他残余的同时消灭裙带关系。在中国，我就这个问题同许多人辩论过。我的看法是，如果某位官员的妻子够条件，那她就应当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就应当是一位伙伴，而不是靠“裙带关系”成为红人。当然，如果她不够格，那么，血亲或姻亲就显然是应当回避的裙带关系了。我还认为，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也需要一定的权威，需要承认她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我可以看出，裙带关系总是在这条微妙而危险的分界线上蠢蠢欲动。在苏联，妻子也是得不到公开承认的。

我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后，康克清在征得邓颖超同意的情况下，摘下她身上的毛泽东像章，戴在我的胸前。

“我现在非常赞成周恩来的对外政策，”我说。

他的夫人赶紧纠正说：“不是周恩来的政策。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不是周恩来一人决定的。”

“和缓的政策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我又说，“而且不仅

仅是中美之间的和缓。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旧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逐渐结束，我希望我们都能活着看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关于帝国主义终结的问题，我认为这不那么容易。”邓颖超说，“这取决于世界人民的革命，取决于美国人民，取决于另一个超级大国即苏联的人民中开展的革命进行到什么程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埋葬帝国主义。”

“看来，全面缓和的局面正在出现。”我说。

“当前世界总的形势仍然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尼克松总统的侵略政策没有变。美国人民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美国人民反对尼克松政府进行的侵略战争，但是眼下美国人民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尼克松进行侵略战争的程度。”邓颖超讲话带着一种权威性。后来我听说她当时无疑是代表周恩来在讲话。

她接着说：“就拿越南战争来说吧，看来尼克松总统并没有诚意解决越南问题，在越南实现和平。今年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和黎德寿已经达成了协议，原来说协议要在10月30日签字，但是一直拖到现在。他们（指美国政府）仍然在耍花招。”

在中国，我多次发现，前去访问的反尼克松的美国人（去访问的人大部分都是反尼克松的）都极力对中国人施加影响，使他们反对尼克松，其主要方式便是称尼克松“阴险狡猾”。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看待他，但他们通常很小心，不发表任何评论。

我向邓颖超索要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她说：

“从1927年到1937年，在蒋介石统治下，到处搞大屠杀，环境十分危险，所以照片全都丢失了。我没有年轻时的照片，所以也没法送给你。”

我问我此行应当特别看些什么。大家告诉我要去大寨、大庆、西安、延安看一看。康克清建议我去看看红旗渠，她不久前刚去过那里。但是我们都觉得去这些地方太冷了，于是便决定给我放些内部电影看一下就行了。

“你在这里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邓颖超在道别时说。

“我还会再来的。”我说。

从1927年到1966——1969年的文化革命，邓颖超和她的朋友蔡畅都凭自己的能力成为中国居于领导地位的女共产党人。她们于1945年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最早的女中央委员。她们被称为“老大姐”，这是对妇女的最高尊称了。与此同时，她们还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妇联一度在诸如离婚这类的问题上拥有准司法权力。

邓颖超1903年生于广西南宁。寡居的母亲是一位自我谋生的教师，只有她一个孩子。13岁那年，她进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学习刻苦，8年的功课两年就学完了，但是身体也因此累垮了，患了肺结核。她是1919年反对日本的“五·四”运动中的一位学生领袖。当时她领导的妇女爱国会同男学生进行了合作，这些男生中有一位是她的特殊朋

友——周恩来。^①

她当教员的时候，每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辛勤地工作，以致又把身体累垮了。1923年，她第一次遇到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时没有妇女参加），与此同时她帮助创立了天津的妇权运动。1924年，她当上了共产党的妇女书记兼《妇女日报》的主编。她同时还是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党员，曾当选为省的代表前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在广州，她与周恩来结了婚，并担任了共产党妇委书记。

她23岁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同孙中山夫人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等著名人物的未亡人一起工作，这两位夫人在自1924年以来的近40年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崇拜偶像。

1927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消灭左翼势力和共产党人。邓颖超当时在汉口和上海参加危险的地下工作。她唯一的孩子于1927年死于腹中。

1928年她被派到莫斯科，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那里呆了6个月。回国后她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工作实在无法开展，党中央在1932年迁到江西为止。

在1934—1935年的6000英里长征期间，她和蔡畅身体都不好。但是康克清对我说，“这没什么，就象每天散步一样。”

① 1972年，邓颖超要求我对已发表的作品中的一些错误加以更正。她说，周恩来没有在南开大学就读，而只是参加了那里的学生运动；她本人不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她从未同周恩来一道被捕过。她说她1937年逃离北京时没有化装成保姆，也没穿佣人的衣服，而是穿的知识分子常穿的那种黑白两色印花衣服，也就是我的《近代中国妇女》中描述的那种衣服。龚普生补充说，周恩来上的是天津的南开中学，而不是南开大学。——作者

1937年内战开始停战时，邓颖超秘密地来到北京地区，目的之一是来治病。日本于7月7日发动进攻后，她不得不在我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乘火车逃到西安。她刚刚安全抵达西安，在红都延安逗留了5个月的我也到了那里。她邀我与她同寝一室。

抗日战争期间她和周恩来担负着设法同蒋介石及其妻子宋美龄建立联系的艰巨任务。1947年重开内战后，他们夫妇回到延安。1949年成立全国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任妇联第一副主席，蔡畅任主席。

邓颖超和周恩来都不曾到过美国，蒋介石政府在1946年曾两度拒绝给邓颖超发放护照——一次是要去巴黎参加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会议，另一次是去纽约州的南科特赖特参加国际妇女大会。

邓颖超担任过的职务太多了，以致在《中共人物志》中开列了两整页。她可能是妇女成功地担负起如下几项极微妙职责的首屈一指的活典范——既是一位总理的模范妻子，又是为妇女权利而斗争的领袖，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堪称样板的“老大姐”。

这样一位女性不仅仅需要有极巧妙的外交技艺和魅力，而且邓颖超还从未失去她的女性的天生资质（这种资质保证了婚姻的成功），她具有明显的女性特点。下面是一个例子：

我们告别时，她望着我的绿色羊皮手袋，用手摸摸我新买的伦敦驼毛衣裤，问这问那，其中包括询问衣服的价钱。她还看了看我的毛里棉鞋，问我冻不冻脚，还说她很喜欢我从巴黎买来的那顶绿色带绒球的毛线帽。在我整个旅行期间，她不时问及我的健康情况以及我冷不冷。

邓颖超是一位有魄力的行政官员，但她是以女性的方式而不是以男性方式履行她的职责的。她懂得一方面保持一个女人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又投身于难以想象的艰巨工作的诀窍。她不是通过给人以假象来做到这一点的，而是通过谦逊、清白、温柔以及掌握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切艺术来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通过“勇猛固然好，谨慎更重要”这样一种认识，通过不事张扬来做到这一点。

虽说中国妇女可以干与男子同样的工作，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界限之内，男女之间的区分一直是非常明显的。

康克清的体格很健壮。像她丈夫朱德一样，她平生一直是体育爱好者。她尊重邓颖超的意见，但是她快言快语，非常想使我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客人。

“我在《红尘》一书中发表了你在1937年对我讲述的经历，”我说。“这人们最爱读的一章，广播电台、教科书中也选用过。有些评论者说，这不过是用来进行宣传的谎言。他们不能相信这样的经历是真有其事的。你是一位极了不起的人物。”

“不要把我估计得太高，”她说。“像我这样一个人，若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早就不存在了。就是活下来，也一定会成为旧社会的牺牲品。”

“在你的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的变化。”我又说了一句。

我把康克清在1937年送给我的长征时期西康少数民族妇女的原版照片还给了她。这时我们又讨论起长征期间是否拍过任何照片的问题。

“没拍过，当然没有，长征时我们没有照相机。”邓颖超

说。

“这张照片我是从别人那儿弄到的，大概是在长征结束的时候拍的。长征期间没拍过。”康克清证实道。“我们那时没有照相机。”

（她们两人长征时不是一路。但是王震所在的那个军团至少在长征期间为他拍过一张照片，那是在他同少数民族谈判的时候拍的。他在1937年亲自把那张照片送给了我。）

1937年我认识康克清的时候，她像一位威武的斗士。她那时的雄心是在正规军中当一名指挥男人的司令官。看来，这些年中她的性格变得温顺多了。她1912年生于江西，1个月的时候就被送给一家穷苦的佃户，那佃户于1926年当上了村农会主席。她14岁那年就成了10个村子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队长。

她对我说，1927年2月国民党开始在这10个村子进行大屠杀，“有上千名农民惨遭杀害”，尽管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6岁那年，她逃离家乡，以一名游击队员的身份加入了红军。在红军中，她从墙上的标语口号中学会了读书写字。

当时朱德将军是红军各军团的总司令。她同他结婚成为他的第四个妻子时，他的第三个妻子刚被敌人抓住并处死不久。

“长征期间，我一直同朱德在一起。”她对我说。

这两个体魄健壮的人都替别人分担负担，帮助体弱者，为人树立榜样。“我们没要孩子，因为这会妨碍我的工作。”她解释说。

她第一次出国是1950年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1953

年去过北朝鲜。1965年她第一次担任重要职务，即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她的丈夫至今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与此同时，她担任过许多团体，主要是妇女、儿童和农民团体的职务。不过她一直没当上军团司令。1949年她当上了妇联的儿童福利部主任，同时也是妇联副主席。

你若见到康克清，那就是你了解中国老百姓之谜的最好机会了。她不是参加革命，她本身就是革命，她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她也确实像她所扮演的这一角色。朱德选她为妻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重要的社会力量与军事力量的会合。

北京协和医学院——现称首都医院

我第一次在这家医院门口拾级而上是在1933年，当时我们称它为协和医学院。我去那里是要拜访该医学院社会服务部主任蒲爱德。当时这种社会服务机构在中国尚属首例。我去找蒲爱德是想请她帮助一位西雅图的认识论者实施他的计划。此人很喜欢一个被人利用来在火车上行乞的小孩，想为她找一个好的住处，以后还要供养她。蒲爱德进行调查后认为，这个小女孩现在这样的境况要比换个方式好得多，因为她家里的人对她照顾得很好，而她则能挣来养家糊口的很大一部分开销。这家人还以为他买这孩子是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他们一大帮人从家乡赶来，坐在协和医学院门前

的台阶上，想尽可能多要一些钱。这位好心的美国人当然只得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他考虑要寄些钱给她。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家庭作为一项善举兴建并提供资金的，开办于1916年，主要目的是训练中国医护人员，尽管中国人直到1972年仍称它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当时，美孚石油公司是在中国经营业务的最重要的美国企业，它的洋铁桶和灯盏成了家庭用品。因此，由戴维·洛克菲勒1973年到北京安排美国银行业自1949年以来同中国的第一次联系，这是很合适的。他的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同中国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作出了安排。1972年至1973年我在中国时，美国银行的支票到哪儿都兑换不成现金，因为中国人抵制美国银行的支票，但是在饭店里可以兑换旅行支票。

30年代，人们曾说协和医学院的琉璃瓦顶花了100万美元，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座灰砖建筑物是一种中西式建筑相结合的试验，就像燕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一样。

协和医学院的出名是《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的功劳。他介绍1971年7月他在这家医院作阑尾手术（术后作了一个疗程的针灸治疗，效果很好）的那些诙谐有趣、引人入胜的文章，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针灸热。针灸的应用在中国也迅速增加了。

赖斯顿的好奇心和苏格兰式的幽默使整个医院为之倾倒，尽管他是西方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中最大的帝国主义宣传机构中的几只新闻老虎之一。他离开这家照顾周到的医院的病床后不久，这家医院的名称就由“反帝医院”改成了“首都医院”。他的阑尾真应当保存在琥珀中，至少应当保存在茅

台酒瓶子里，因为这是最先使中美友好得以恢复的器官。

“我们很高兴为他服务。”给他治病的外科医生之一这样告诉我，这时外科主任在旁点头表示赞同。这位主任刚同一批医生访问美国归来。

亨利·基辛格为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而秘密到中国是7月9日至11日的事。这次秘密访问结束时，赖斯顿的阑尾正在从事这项事业，要求反帝的手术刀来解决问题。那时正是炼制中美和解仙丹的术士们忙于把干戈化为银针的令人振奋的时期。

中国被《纽约时报》的旅行者们迷住了——不仅仅是詹姆斯·赖斯顿以及托平夫妇，还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更不要说老中国通、该报驻香港办事处的蒂尔曼·德丁了。接着便发生了那次可怕的背叛——1972年秋，该报出版了篇幅很大的副刊，为台湾做广告。而在此之前，他们曾像寓言中所说的那样，把这些狡猾的资本家毒蛇放到自己怀中去暖和过。中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感到自己被打了一记耳光，于是，以往那种爱与恨的关系又恢复了。

我们到中国时，有两个问题问得最多：《纽约时报》为什么要给台湾做广告？你对基辛格先生看法如何？

他们真挚地邀我随时再到中国去，享受社会主义公费医疗待遇，免费做胆囊手术。马海德医生建议我去做这种手术。他说：“你会得到非常悉心和充满爱心的照顾！他们会爱你爱得要死。”这最后一句话从好几重意义上说都让人心惊肉跳。还有什么地方的人会这样讲话？我有点儿担心他们会在做手术做到一半时开起讨论会来。

我带去了4月间拍的X光片子。中国人担心地说，我没

有再做一次检查是不应当出门远行的。他们坚持要我在北京再拍几张 X 光片。从片子看，胆管可能不堵塞了。（吃了两个月中国饭，可能便病情好转了。）

给赖斯顿治过病的医生很多，其中的两位，张孝骞医生和外科主任医生为我做了检查。放射科主任是位女士，是龚普生的朋友。我还检查了眼睛。没患肺结核，也没患肝炎。

这家医院每天诊治大约 2500 至 3000 名患者，但其中只有 100 人接受针灸治疗。由于大厅里有大批候诊的人在耐心地等着，我和我的翻译有好几次都找不到该去的地方了。外国游客有一间特殊的候诊室，里面有一些罩着镶边椅套的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些穿着夏季服装、冻得发抖的从“第三世界”来的人，主要是非洲人和巴基斯坦人。

这些医生的工资在中国算高的，每月 150 元，不到 70 美元。他们每年用 6 个月的时间到公社或工厂去培训“赤脚医生”，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全国建立起一支公众保健工作者大军。

但是，协和医学院仍然保持着连续性，这些医生和护士中有些人是在这里受洛克菲勒的教师们培训的，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学过英语。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于 1916 年建立了这所医学院，当时叫协和医学院。到 1921 年，协和医学院的大楼开放为一所医院。史迪威将军的一个女儿于 1921 年出生在这里，这是最早在这里出生的美国婴儿之一。日本占领时使用过这所医院。1951 年共产党接管后，它变成了一个政府设施。考虑到这段充满危险和变化的历史，这座圈在高墙之内的建筑应当说是保护得很好的，尽管它的绿色琉璃瓦房顶显得很陈旧了。

西长安街“居民委员会”

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中国主要是在地方一级进行治理的。过去是由“保甲”（即由住户和村庄组成的组织）和宗族来处理本地的问题。皇帝毕竟太远了。（“皇帝同我有什么关系？”）

共产党试图用居民自治和地方负责的原则，即用“居民委员会”来代替宗亲原则。在中国，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被组织在某个集体中。这种城市居民组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它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特别是，它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居委会以及居委会中的年长的家庭主妇们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没有街头犯罪和吸毒等现象。

我们乘坐挂着褐色窗帘的吉姆牌轿车来到北京西城。我的翻译告诉我说：“每个地区都有好几条胡同，一些胡同组成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些居委会中的家庭妇女在社会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她们为人民服务，在自己办的街道工厂中工作，用闲暇时间搞缝纫、画画儿或从事其他活动。退休的男子也做这些事情。居委会中男女都有，但主要是家庭妇女。城里没有人民公社，但是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这种组织。每家每户都被组织在居委会内，关心集体的福利。”

我们受到街道革委会女主任袁旭春、居委会副主任以及

西长安街居委会的一些成员的欢迎。这个革委会管辖有 35 个居委会。我要参观的居委会的主任叫赵来琴。

“北京市西城有九个街道革命委员会，西长安街是其中之一。”人们向我介绍说。“它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领导之下，是本街道的政权单位。本街道叫西长安街，是北京主要街道之一。我们有 100 名工作人员。我们的革委会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于 1968 年成立的。成立革委会之前这是个城市人民公社。我们的革委会管辖着天安门以西、西单以东的地区，东西宽 3.5 里，南北长 5 里。我们有 180 条胡同，两万户居民，人口有 8 万。我们领导着 5 家大厂，共有 1700 名工人；有 14 所小学，共有 700 名教师、14000 名学生，外加 7 个托儿所、幼儿园。幼儿园共有保育人员 200 名，有 800 名孩子。”

就在讲话的人兴致勃勃作着介绍的同时，我环顾这间粉刷得很白、挂着白色窗帘的房间，心想这种成功的自治办法确实令人自豪。

“这 35 个居委会共有 80 个生产组，每个生产组都有些服务设施。这里的这些小工厂大都是在 1958 年大跃进期间由家庭妇女们创办的。起初是一些生产小组，在 1958 年至 1962 年期间发展成了工厂。他们干的大都是手工活，例如为国营大厂搞加工等等。刚开始我们没有机器，后来我们自己造了机器或者用我们自己挣的钱买了一些机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工厂所应当有的起码设备了。工人中有 80% 是女的，20% 是男的。这两年又有些学生到这里干活。

“现在我们能生产 10 多种产品，例如用来喷洒杀虫剂的一种电动机部件和汽车打火器，还有门锁和医疗设备。”

我们在这个地段参观时，袁旭春继续向我们做介绍：“这

个居委会会有3条胡同，190户，2400人。这里的人也同北京其他地方一样，解放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物价不稳，到处闹病；吃不饱，穿不暖。我们都是这里的劳动人民。过去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只好讨饭。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住的房子也很破。以前这附近有一条臭水沟，死孩子、死狗、死猫都往那里扔，气味难闻极了。人们常说这里是刮起风来三尺土，下起雨来泥浆路。

“解放以后，人民站起来了，当上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政府关心我们的生活，改善了生活条件。那条臭水沟填平了，现在成了一条路。物价稳定，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

这些同我握手的当地居民确实彬彬有礼，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院子的大门全都开着，而若在以前，一定是时刻栓着的。我拜访了10号院的一名妇女，名叫张云英。她说：

“我父母解放前给地主干活，全家7口人从来没吃过饱饭。有一次我父亲病了，地主把他踢出来，全家人衣食无着，他只好把我的两个妹妹卖了。”

“解放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有7个孩子，5个已经在中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还有两个仍在念书。我丈夫和我都工作，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居委会的组织情况怎么样？”我问。

“居委会会有13名成员，1名主任，3名副主任。我们用业余时间工作，不拿工资，是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号召自愿干的。”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把居民们组织成5个读报小组，每组有两人负责。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报纸上有关国内外大

事以及人们所做的好事的文章。我们一般是学《北京日报》，也有的学习《人民日报》。大多数居民都表现出学习热情，但也有个别人不一样。4号那家的男人一开始不想参加学习小组，但是后来我们动员他参加了，这样不仅对他自己好，对大家也都好。后来他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当上了一名负责人，知道的事情也比别人多了。

“通过学习，我们掌握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例如，31号是个大院，有90户。张迅明的妻子死了，撇下4个男孩，大的14岁，小的8岁，谁也不会做饭，谁也不能自己照料自己。邻居们帮他们家做棉衣，拆洗被褥。这个院子的居民都互相帮助。

“还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例子：46号院里有11户人家，除了一位现在60多岁的老太太以外，其他都是双职工。参加学习小组后，这位老太太现在在为其他几家做些杂事，帮他们管管报纸和牛奶瓶子之类。她有事时，邻居们也来帮助她。有一次她女儿临产，邻居叫来出租汽车帮忙把女儿送到医院，出院时又去接她女儿回来。

“居委会的第二项任务是响应政府号召，确保人们守法。我们特别在妇女中开展了教育，鼓励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下乡去。

“第三项任务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指示组织居民进行生产。我们有5个生产组，其中3个是一起干活，两个是在自己家里干。我们画国画、缝纫、画蛋壳——你得先把蛋壳掏空才行。我们的刺绣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也用在儿童服装、被褥和枕头上。我们参加生产一方面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家挣钱。

“还有一项任务是组织打扫环境卫生。一名委员负责检查卫生，特别是在节假日。每逢‘五·一’、国庆节和新年，我们都开展卫生运动，进行打扫。

“我们还开展保健工作，建立了一个防治流行病的诊所，重点在预防。

“我们帮助社会教育青年。节假日组织一些活动，请老革命来讲述他们所吃过的苦，使年轻人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接下去她谈到的是我万没想到的问题！没用我发问，袁旭春很不经意地说道：“我们鼓励计划生育和火葬。我们要求妇女采用节育办法，给她们讲节育的意义，现在这里死了人全都送去火化，火化费国家给出一半。”

“这是我来中国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握着她的手说。“这说明在地方一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什么也不比火化和节育更具有革命意义。这表明城市工人阶级确实在发挥领导作用。”

正是在此刻，我认识到中国是真的行动起来了。过去，穷人家为了大操大办地举行葬礼或庆贺得子，往往弄得倾家荡产。这种仪式是宗法性祖先崇拜和对死者的膜拜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觉悟。现在没有那种铺张的葬礼了，以前那些纸做的东西也不再用了。这些迷信的风俗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有什么人死了，我们就开个追悼会，颂扬死者做过的好事。”

“举行这种追悼会要花多少钱？”我问。

“我父亲的葬礼花了28元钱。退休工人的葬礼通常由国家出钱。本人没工作的由子女出钱，不过子女在工作单位都

有保险，一部分费用就从这里出。”

我们谈了这样一些问题：我建议各家买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写上纪念死者所做的“好事”的话，以取代以前的祭祖牌位和大型坟堆，他们很感兴趣地听我说。

这是我此行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我感到我同这些妇女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友谊。国家出火化费，国家还支付老年保险金，这是件大事。这样一来，从经济上来说，就不需要生更多的儿子，无须子孙满堂了。

我们参观了一些居民的房舍。每家都有一张毛主席像，一棵生长着的花草，一部收音机、一只闹钟、一只很大的花暖瓶，还有一只花洗脸盆。有的洗脸盆上画的是熊猫，有的画的是《红色娘子军》之类的新舞剧的场面。椅子是西式的，通常带点老式雕花。枕头全是绣花的。

这些房子都很老。我猜想其中有一两座大概是以前的满族府邸。当我带着一种新的轻松的心情走在这些古老的高墙深院之间的时候，我不再怕鬼、也不再迷信了。我被中国这些胡同中发生的奇妙变化而深深地吸引了。

但是，在这中间，我注意到院中防空洞的活板门。这些人并不知道核散落物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感到一阵阵颤栗。这情形就象从前把纸老虎张贴出来防范外国入侵者一样。

有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为家中有人当兵而感到骄傲。各家的墙上都挂着家庭成员的照片，而当解放军的人总是居于荣耀的地位。有些解放军的照片甚至被贴在电线杆上！

我拜访了有9户居民的居民小组组长的家。她有3个儿子在军队里，两个儿子在工厂中，还有一个在念中学。书架的上方挂着毛主席像和《红色娘子军》招贴画。她在做颜色

鲜艳的儿童服装，蜂窝状的针脚缝得很漂亮。

“我们响应‘五·七’指示，组织起生产组。”她对我说。“有的人可以离开家去外面上班，离不开家的可以把活儿拿回家做。”

她为她的3个当兵的儿子照片和她家的地道——感到自豪，她对桌上那本小红书十分恭敬——那里面装的可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啊。

我们参观了一间明亮干净的屋子，十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在那里往丝绸或卷轴上画老式的画。唯一新的东西是他们正画着和很自豪地挂在墙上的熊猫，这是他们拿出来卖的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这个中美恢复友好的标志使我们从地道里走出来时带的那股寒意消退了一点儿。

在疾病防治中心，我让人在我的虎口部位扎了一根针，想体会体会是什么滋味。这是一座现代化建筑，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小煤炉，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坐下来边看那张供针灸和节育用的人体结构图，边同那里的人谈这些问题。这间医务所有四名女“工”，其中一人是牙医。

“我们以前是家庭妇女，什么都不懂。”她们告诉我说。“经过培训后，我们现在是赤脚医生，还会扎针。”

由于屋里很暖和，我借此机会向陪着我的这些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在这个居民区里，你们觉得最难办的问题是什么？”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大多数孩子是好的，但也有几个不好。这些淘气孩子都是没有父母、没人照料的孩子。”

“为什么要取消公社？”

“在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我们发现人民公社比较适合

于农村，但城市需要有国家政权单位。革命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的单位。文化革命以前，在城市里只是实行了生产一体化，而现在我们把国家政权同生产结合起来了。警察也归革委会领导，我们主要是让他们指挥交通。也有些警察是维持法律与秩序以及处理民事问题的，但是由革委会负责。文化革命以前，警察的权力不归公社管。”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我参观的第一所中学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在那里，我受到戴着红袖章的友好的红卫兵的欢迎。他们挽着我的手臂，簇拥着我走进楼内。有人对我说，这里以前是英国的一所教会学校。

老师（他们中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和学生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同我座谈。主持座谈的是一位上年纪的男子（他是校革委会副主任）和一位上年纪的妇女（工宣队队长）。

我问，文化革命后，学校里主要的变化是什么？主持会的男士对我说：

“这是教育方面的一场革命。主要变化有：（1）重视思想教育。因为我们知道一所社会主义学校应当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使他们树立起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我们已经使学生的世界

观发生了初步的变化。以前读书是为了个人名利，现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改变。

“（2）我们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过去是理论脱离实际。文化革命之后，学生们在学习和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我们每年上8个月的课，到工厂劳动一个月，到公社劳动一个月，寒暑假两个月。我们有一个校办工厂，使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学会生产；这是一个生产汽车零件的工厂。

“我们学校在接受劳动人民子弟入学人数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三十一中有13岁至17岁的学生1700名。除了1912年修建的教会学校的老楼之外，1953年又盖了一座新楼。

每上两堂课后，学生们有一段做操时间。此刻正是课间操时间，我们便到操场上去看那1600名参加者做操。泥土夯实的操场上扬起一片黄尘，落在学生们的身上。这些学生留着清一色的短发，男孩的头发跟平头差不多。教员是一位青年妇女，身上穿着臃肿的运动服，袖口和裤脚都扎了起来。她做的是文化革命之后推广的很有劲的新体操。在这同一时间，全中国各地都在做这套体操，其中有一些是老的太极拳动作。

人们告诉我，学校内不准吸烟，学生中也从没有人吸过烟。

由于我们的日程是机动的，我们决定去看看学生从事实践的车间。这里不仅生产零件，而且还维修学校使用的各种机器。教师也和学生一样轮流到车间里劳动，或者一年，或者半年。我看到在那里劳动的学生是初中二年级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这些15岁的女孩子的额上全垂着几绺长头发，盖

到眼睛上（这是全世界的女孩子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的发式），尽管她们周遭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有人向我介绍说，有些老车床是新工厂中废弃不用的，也有一些是买的新的。

这所学校发明了一种新式变压器，可把 220 伏电压变为 6 伏。他们为师生们制造的绕电线的机器感到自豪，那是把一台织鞋带用的机器加以改装制成的。

人们对我说，每当三十一中的学生看见 130 型卡车驶过，他们就激动异常，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生产这种卡车的零件。

接下去我们在一个上英语课的班级的后排坐下来，边听老师讲边看课本。课本的封面上印着熊猫。我问能否送给我一本，但人家说没有多余的了。人们告诉我，中国各地的所有学校都开设英语课。我同那位教员握手表示感谢，又向全班同学挥手致意，他们为有一名外国人来听课而乐不可支。

此后我们回到会议室继续座谈。我们坐下来后，革委会副主任对我说，他读过我的《中国红区内情》，感到我 1937 年的延安之行非常重要。

“文化革命时期的青年希望继承延安的革命传统，”他说，“刘少奇的罪行是抛弃延安的革命精神。他引导学生把政治同生产劳动、同工人农民分开。毛主席说过，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像长征一样艰难曲折。他们在解放之前进行的长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解放后，我们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有了很大的进步。毛主席在 1949 年说过，我们夺取了政权，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那些步要由青年们去完成。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朝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行的长征中迈出了第一步，沉重的责任落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毛主席开创了革命事业，我们要把这场革命继

续下去。

“但是，我们仍然处在文化革命的斗批改阶段。我个人的体会是，这场文化革命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现在我们怎样来巩固政权、把革命继续下去直至实现共产主义呢？我们要努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说过，这场文化革命是必要的和及时的。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在我们学校，我们也开展了教育革命。我们想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肃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建立起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我们正处在建立这一无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

“帝国主义者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今后的三四代人身上，中国有可能像苏联一样蜕变为资本主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过这样的话——说要等上三四代人的时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接班人应当在阶级斗争中锤炼自己，也应当在同工人农民的结合中锤炼自己。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参加了革命，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1934年至1935年我曾在燕京大学读书，”我对参加座谈的人说，“我曾置身于‘一二·九’运动之中，因为那场运动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北京向来是在中国学生中起带头作用的。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革委会副主任代表大家说：“‘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我参加过1946年的学生运动。当局当然是反对学生运动的。我记得，在1946年年底，发生了美军强奸一位姑娘的事件，学生们组织了示威，领导者则是学校中的中共

地下党。1947年5月举行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反对重开内战的示威，北京的学生差不多全都参加了。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恢复和发扬‘五·四’和‘一二·九’的精神。所以说，北京的学生是有光荣传统的，解放后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我们现在的条件更为有利，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

北京的学生最先站起来，发起了文化革命。红卫兵运动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中开始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写信支持清华附中。当时大学、中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是1966年7月。

“红卫兵对文化革命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在后期也犯了错误，但只是很少一些错误。文化革命前，学生们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为个人名利而读书，忘记了革命的宏伟目标。文化革命中，师生们对刘少奇不满，希望继承延安抗大的革命传统。刘少奇压制学生，不准组织红卫兵，于是他们起来造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听说组织了红卫兵，就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刘少奇不准学生革命，派工作组去压制他们。他往我们学校派了一个工作组，不让学生组织红卫兵。当然，工作组内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他们是受了刘少奇的欺骗，不知道两条路线的区别。

“文化革命前，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刘少奇的路线。我们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所以我们成了革命的阻力。因此，学生们贴大字报批评了我们。文化革命过程中，教师和干部的觉悟提高了，我们也同学生一道批判了刘少奇。

“文化革命期间，各校师生受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分成

了两派，我校也受了影响，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认为那些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可能仍然是好同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坏分子’，存在意见分歧。1967年年底，我们统一了看法，然后又成立了革委会来领导学校。在统一看法方面，人民解放军和工宣队起了很大作用。”

要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而且不要用你自己的话写出这些观点，因为这会带上访问者所持观念的色彩。你得仔细地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把他们说的话准确地报道出来，用这种办法掌握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中学“红卫兵”

“红卫兵”是中国中学的群众组织。毕业之后他们就不再是红卫兵了。小学的群众组织是“红小兵”，他们也戴红袖章。进入中学后，他们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先进组织是共青团，团员的年龄必须在15岁以上。我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参观时，人们向我介绍说，共青团是“一直有的，但在文化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了，直到1970年才恢复”。三十一中既有共青团又有红卫兵。“共青团的要求更高一些。”

这些青年组织树立标准和榜样，并起辅导员的作用。三十一中有800名红卫兵，约占全校学生的一半，其中的一半是女生。

会议桌旁，我坐在两位红卫兵女领袖中间，她们眼睛望着我，不时露出微笑。

“学生们通常到二年级时申请入红卫兵。要加入红卫兵，他们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德智体全面发展。德的发展意味着他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还得学习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例如像东北长春市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著名工人陈泰山（译音）那样的人物。他们还必须忠诚老实，不说假话。”

另一位女红卫兵说：“我们当然也重视学习。我们早上到校比较早，来打扫教室。我们时刻关心集体，互相帮助。我们从思想上和智育方面帮助别人，到同学家中去帮助他们。谁需要帮助、谁有困难我们就帮助谁。”针对我提出的问题，她说：

“智的发展意味着获得文化知识。首先学习态度要严肃，学习目的要明确。我们以前也这样做，但现在更加强调这一点了。这适用于所有学生，但红卫兵应当做得更好，不仅在这方面，在所有方面都要更好。”

革委会副主任说，这个革委会是1967年11月成立的，18名成员中有4位红卫兵。委员会由三方面的人组成：（1）工宣队成员4人；（2）教师代表6人，其中包括校长和党支部书记；（3）群众代表——教师3人，学生4人，还有一名木工是代表工人的。

这所学校有3个红卫兵团。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红卫兵解释说：“在课堂上，我们注意听讲，积极回答问题，开动脑筋。我们总是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善于学习，鼓励大家努力获取课外知识。我们不仅重视自己的学习，还帮助学习不大好的人与我们一道进步。我们互相帮助，不仅在学习上互相帮助，而且在思想上互相帮助。”

我们配合老师的教学。

“为了在身体方面得以发展，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天天参加长跑。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目的也要明确。不论是课外活动还是体育课上的活动，我们都要积极参加。冬天我们开展长跑运动，长跑的距离是1500米，但可灵活掌握。有的人跑的距离更长些，这要根据身体状况而定。我们还举办象征性长跑活动，到12月26日那一天跑到韶山（毛泽东在湖南的诞生地）、井冈山（红军在1927—1928年所在的地方）和越南。要是你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就能成为红卫兵。”

至于纪律，“红卫兵不仅要学习好，他们还应当在课堂上帮助教师。要是有什么学生淘气，红卫们就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使老师能顺利地上课。在红卫兵们的帮助下，淘气的学生不仅克服了他们的反社会的问题，还加入了红卫兵。

“碰到老师生病了，红卫兵就在课堂上学习，就好像老师在场一样，晚上照样做家庭作业。我们都是小老师。现在我们学生的地位和老师一样了。

“我们实行学生自己管自己的办法。这是从成立红卫兵以后开始的，虽说以前也有一点。现在红卫兵在学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老师给上课，学生则学会自己管自己。”

陪我参观学校的红卫兵们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们为自己的刻苦精神、为自己的责任感到自豪。他们所实行的原则，他们的精神，很像主日学校的学生、男女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以及其他一些旨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团体。人们告诉我，红卫兵帮助老年人提东西，搀扶他们过马路。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永远不说假话，勇于探求真理。在旧中国则没有教育孩子不说假话这一条——说假话是这个老的文明社

会的最坏的特征之一。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是带头实行这一革命原则的人之一。毛泽东不许人说假话、说大话。

这些红卫兵确实具有一种圣洁的品质，如果我们给这一品质所下的定义是“人的个性发展超越了自我和内集团（即家庭）的范畴”的话。他们反对古代中国所有老的宗教和迷信——儒教、佛教和道教。清除这些宗教是革命的一部分。对于基督教，除了知道它多少是属于“帝国主义”范畴的东西之外，他们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鼓吹基督教的几乎所有基本原则。不过，他们反对和平主义——相反，他们被教以好斗的精神。他们说这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侵略。但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有逆来顺受的成分。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暴力行动，始终主张遵守纪律——不能自行其是。文化革命期间，有些红卫兵打过人民解放军战士耳光，而这些战士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他们打，因为他们奉命不得还手，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中国新一代红卫兵也采取了与这些战士相同的态度。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是纪律严明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真正负起维持学校秩序的责任。

红卫兵所具有的不同于旧中国的其他新思想是：他们反对报复，而报复曾是儒教的封建宗法制的根本教诲之一（毛泽东教导人们不要报复）；从理论上说，他们并不盲目遵从长者，但是他们却能同老师合作，尊重所有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的人；从原则上说，他们是爱国的，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家庭和宗族。最重要的是：他们力图做到不仅不同于先辈，而且要越来越好。他们作为一个集团，其任何态度都没有丝毫反社会的性质。他们对于反社会的个人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而不是加以惩处。

由于进行了上述种种教育，中国不存在青少年犯罪问题。那里根本没有不正当的性关系，没有性病，没有吸毒现象，而且青年人中几乎根本没有犯罪的。红卫兵树立榜样，其他人效而仿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同 17 世纪的清教徒革命有些相似，只是这里没有宗教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当初，清教徒们力图使人类的成就达到最高限度，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反对浪费，反对任何形式的放纵；他们主张增加生产并为了未来而进行建设。这也是当今中国青年的主要特征——他们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还面临着人口过多的大问题，因此他们需要时时把他们的精力用于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不能像一般少男少女那样行事。

我离开这所学校之前，学生们为我表演了歌曲，是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演唱的。歌声十分洪亮，再大的礼堂也能听见。伴奏的乐器是手风琴和小提琴。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唱的是湖南民歌《浏阳河》。我确实喜欢这首歌，后来我还拍了歌中所唱的浏阳河的照片。这是我喜爱的民歌，就像我喜爱古老的英国歌曲《绿袖套》一样。

他们还唱了《红太阳照边疆》、《新疆人民歌唱毛主席》、京剧《龙江颂》片断以及由小提琴伴奏的另一支老的歌剧选曲。

我要求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给我听，说我记得那支歌最初是在 30 年代唱的。人们告诉我，它至今仍然是国歌，但却没有唱。

这些学生所受的是反帝教育，然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

国民却不抱敌视态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人们告诉我，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把“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

在三十一中我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欢迎。当我离开那里时，聚集了一大批人把我送到门口。男孩女孩都来同我握手道别，看得出他们对于结识我确实感到高兴。

我曾对他们说，我对领导问题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高中读书时曾被选为一个比他们的组织还要大的学生组织的副主席。当时我也得为别人树立榜样，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得留在学校里从事学校的活动。也许因为我提及了这一点，红卫兵领袖们对我更有一种亲切感。我还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20年代），我们所受的清教徒原则的教育同今天的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差不多。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原则被摈弃了，姑息迁就就成了时髦的做法。

在中国，我多次听到“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青年”的说法。从文化革命时期的青年人的表现来看，这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现实的和紧迫的威胁。千百万青年正处在“改造”（这是他们的说法）过程中，真心实意地由孝顺变为政治上的虔诚。

我感到欣慰并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中国青少年受到的教育大都是经过修改的以前的童子军准则中的那些原则，只是用毛泽东代替了“上帝”。童子军精神是英美清教徒文明的实质，也是——特别是在山丹——我们的“工合”的基本原则。路易·艾黎曾是中国童子军的一位积极领导者；埃德加·斯诺曾是一名雄鹰童子军；我也参加过类似的童子军组织，而且还有些乐天派思想。童子军制度于1910年起源于英国，当时是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穿制服，头

戴红箍，还有一些其他标志。

美国的《童子军手册》所阐述的准则是：“童子军成员应当可靠、忠诚、助人、友善、有礼、善良、服从、欢快、节俭、勇敢、清洁、虔敬。”童子军的诺言是：“时时助人，体格强壮，头脑清醒，道德高尚。”今天在中国的学校里，孩子们所学到的也是这些戒律，只是做出了新的革命解释。以往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虔诚的孩子是“忠诚……友善、有礼……服从、欢快的”，但那只是在宗亲和家族的道德范畴之内，而不是对外集团实行的。因此，中国人现在是在力图用这种新的道德准则和心理来弥合宗亲制度同新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裂隙。他们鼓励核心家庭，力图打破宗亲与裙带关系，消除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的隔阂。

苏联的少先队员也受到童子军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教育青少年们永远遵守集体的纪律，不要自行其是。“工合”在汉语中是协作的意思，而这也正是路易·艾黎在其合作社运动中所坚持的东西（这一运动起源英国，当时是新教“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小学“红小兵”

小学中的群众性组织是“红小兵”，其宗旨与红卫兵相似，红卫兵只在中学里才有。红小兵和红卫兵都是共产党实现社会革命化过程中的左膀右臂；他们都戴红袖章，都自己推选干部。为什么称“兵”呢？虽说在旧社会“兵”是令人厌恶

的阶层，但如今却是个光荣的字眼。今天，高级干部的子女争相参军，这说明了真正的权力所在。

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同外部敌人和“帝国主义”斗争，而不是在自己的队伍内部斗。在自己队伍内部，是教育孩子要彼此合作和“为人民服务”。西方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幼年童子军。以身作则是重要的，此外还要灌输责任感、起模范作用，并且有一套高尚行为准则。

是些什么准则呢？像士兵一样，他们被教导要有勇敢精神，不能有和平主义思想；要从事体育锻炼；最重要的是要守纪律和举止得体。

小学教育的作用是使学生以后愿意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劳动，因此要教他们具有“无产阶级”思想，不是轻视体力劳动，而是尊重体力劳动。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教育他们要诚实，说假话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受钦佩的事情了。

人们应当牢记，中国的未来是在这一代身上——这些儿童的数目有一两亿。他们的态度正被塑造得适应这种未来：今后，在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内，只是为了生存就必须勤奋工作和提高生产率。

然而，他们决不是被教育成机器人，而古代中国的儒家教育则是培养机器人的。“自我教育”是目的，孩子们从日常生活的榜样中学习辨别是非。一般来说，为公众服务和清教徒原则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的——例如浪费和挥霍就是决不允许的。认真的态度是理想的品质中很重要的一条。红小兵开会宣传“好人好事”，用扩音器和黑板报加以宣扬。孩子们自写剧本，歌颂“好人好事”。做好事受到感谢时不说自己

的名字，只说“我是一名红小兵”。这是“学雷锋运动”的一部分。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所以他成了这种童子军式行为的英雄人物。（在长沙，我看过一些木偶表演，演的是小孩帮助推车或解救各种危局的事，而且做了这类好事之后不留姓名，说“我是向雷锋学习的”。）

这些思想大部分都充分体现在清教徒式童子军和霍雷肖·阿尔杰^①作品中所描绘的美英文明之中，所以人们很难意识到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人是多么全新的东西。中国人不仅在学习集体的合作，而且在学习自力更生。

以前的孝悌之道现在变成了效忠于社会，其虔诚的程度则是完全一样的。家长们居然允许学校来掌管对他们子女的培育，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但他们却为此感到自豪。现在，所有中国人都有一种新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使他们的子女超过他们的任何前辈。

红小兵的作用之一是使人们不忘“过去的苦”，办法是让上年纪的人来“忆苦”，使孩子们珍惜他们这些“在蜜罐里泡大”的人今天所享受的幸福。这是弥合代沟的办法。有一次，红小兵展出了一件一位黄包车夫的家庭穿了三代的破棉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培养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教师的批评。教师也虚心地问学生来批评，特别是本着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来提出批评。毛泽东是中国每个儿童的楷模，在世界历史上还不曾有活着的人得到过如此殊荣。

^①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年），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宣扬诚实勤奋、不屈不挠的精神能使善良的孩子得到报偿的思想。——译注

在红小兵中，偷窃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把捡到的东西归还失主。破坏行为也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孩子们学习对学校的桌椅等进行简单的修理，以便取得经验。红小兵积极帮助其他同学学习或者在他们生病时帮助他们补课。

创造性：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所提出的批评主要是说中国的制度扼杀创新精神和创造性。然而，实际上他们正在鼓励和教育孩子们具有创造性，尽管主要是在工业、农业、工艺美术和戏剧方面，这还是千百年来第一次。孩子们不仅被教会唱歌，而且被教会欣赏西方音乐和古典音乐。毫无疑问，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革新精神、创造能力都强得多。这是毛泽东的理论的一部分。在成年人的文学艺术事业领域，则是另一个问题。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各种年龄的中国人都不仅有戏剧才能，而且有不慌不忙当众演说的非凡本领。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神童。在政治艺术和社会艺术方面，中国人是无与伦比的。只是在谈到个人成就与发展，诸如伟大的著作及绘画、音乐和哲学杰作的创作时，中国人才显得不够格。换句话说，西方人认为，那种需要独自奋斗、需要个人的创造性智力发展和天生的创新才能的成就在中国不受鼓励，也没有得到发展。

中国的儿童非常聪明，中国的成年人智力发达，但是一个人口过多的社会的沉重负担使得她现在的成就水平仍然很低。就像以前在儒家正统社会——在那种社会中创新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中一样，社会很快就会使个人处于他应有的地位——8亿人中的一部分。

同一位共产党“老干部”的倾心交谈

以下是一位居于负责职位的共产党“老干部”对近来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大致想法。他获准对我作了如下解释：

“我不明白那些老共产党员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自己靠边站，也允许别人强令他们靠边站？”我挑开了话题。

“我们并没有反对文化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是他的愿望，他的命令。后来是林彪干扰了这场革命，我们是因为他的缘故才进行抵制的。在政治机构内，林彪的计划是保密的，但是他那个集团最终隐藏不住了，他只好逃走。

“我们清除了刘少奇之后，我觉得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还存在，敌人会采取新的形式。”

（讲到这里，在场的另一个人插话说：“我读到这段话时，起初还以为毛主席指的是国民党和日本人呢，没想到还会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

“林彪问题比较复杂，”原先那位讲话的人接着说，“尽管他讲的话同毛主席所说的是直接矛盾的。说得干脆一点，林彪是把毛主席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说过了头。不能说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顶点——它还在发展，也必须发展。”

“你是否永远不会反对毛泽东的任何命令？”我问。

“我们从内心里热爱毛主席。我们这些老干部接受我们下属中的年轻人和其他人的批评。受到批评对我有帮助，我应当对此负责。我本应多用些时间同下属们在一起。

“这不是老一代同年轻一代之间的斗争，而是毛主席同另一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受到攻击的是陈毅，而不是毛主席。没有人敢攻击毛主席，于是他们就攻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我们开始意识到，不仅仅是年轻人在发起攻击，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唆使。所以我们就对林彪进行反击。林彪利用了军队，军队中也有两派。一派（一小撮人）是他的忠实走狗。同志们有一度根本看不清林彪的阴谋，林彪策划谋害毛主席，篡夺权力——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林彪感到自己这些年的行动被发觉了，所以当他认为他的阴谋败露了的时候，他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他想谋害毛主席。林彪不光是想利用军队，而且想利用其他权力机关。要在革命或反革命中夺取政权，就必须动用军队。林彪是党和国家的叛徒。我们不知道他同苏联方面联系的详细情况，但是他采取的最后行动是投奔苏联。”

“苏联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攻击毛主席。”

“文化革命期间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林彪高喊支持文化革命的口号，然而就是在那个时期也是有斗争的。有些斗争是内奸唆使的。我们的斗争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了。有一次，外交部被占领了将近两个月才把坏人揭露出来。当时共产党做了牺牲的准备。

“中国人以前阶级觉悟不高，我们以为党警惕帝国主义就够了。可是国内还有旧残余，尽管我们知道人是可以变的。

“为了取得信任，这些坏人不得不干些好事，不然他们

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在一开始，1949年解放时，毛主席没有发起文化革命。他等待了17年，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自我暴露。谁都会犯错误，可是在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最终能分清谁好谁坏。

“所以有必要进行文化革命，是因为阶级敌人越来越猖狂。但是，经过17年之后，人们能把两方面分开了。文化革命是人民的巨大胜利，他们认清了极左派和右派的面目。毛主席相信群众，让他们参加斗争，而不是把变革端到他们面前。

“每个学校都分两派。你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得考虑自己参加哪一派。于是人们就自己教育了自己。

“17年来尽管有些干扰，毛主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17年来的这些成就。毛主席总是力挽狂澜，他的指示总是正确的。共产党本来可以抓起一些人来，但是这不是好办法。最好是让人民学会去识别那些暴露出来的人，而不是把那些人关起来或者杀掉。

“毛主席不光是相信群众。毛主席的意图直到文化革命才变得明确了。是文化革命普及了毛泽东思想，导致人们对他的思想更深刻的理解。它使我们更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更富有理性，更加自觉。

“一开始，在毛主席的路线同刘少奇、林彪路线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攻击。此外还有代沟问题。人民解放军接到一项四点指示，要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服从了。

“林彪只有一小撮人。他若掌握着整个军队，也就用不着搞阴谋了。林彪是法西斯，他并不拥护社会主义。他抓了

一些人。但是人民是拥护毛主席的。林彪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去实施他的计划。

“我们不需要监狱，但是我们需要军队，我们不能进行和平过渡。我们需要一支出色的人民解放军。我们需要这支军队来抗御侵略者，维持治安，防范国内的反革命。今天，青年人认为最好的职业是参军入伍。他们热爱军队。”

“要是毛泽东去世，会出现什么局面？”我问。

“毛主席去世也不会发生麻烦，因为人民现在已经觉悟了。毛主席本人曾说过，他希望培养千百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站在前列的还有 100 万在抗日战争初期于 1935 年、1937 年和 1938 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

“文化革命是好事，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斗争。我们的孩子们没见过地主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地主了。他们心地纯洁，做好事，但是他们若是不知道有阶级斗争存在，又怎么能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呢？他们需要更成熟一些。他们希望解放台湾。但是当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便需要认真地思考。

“我当时就置身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国不会挑起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们也不怕打世界大战。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保持警惕，发动世界大战就比较难。

“援助第三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帮助已经取得政治独立、希望获得经济独立的被压迫人民。我们主要是用政治和经济援助支援他们，但是不能要求特权。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的专家的生活水平应当同当地人民一样，要

拿低工资。苏联人领取高薪，要求最优越的条件。我们认为我们应当与当地人民过同样的生活，不能有优越感，要完全平等。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讲过，为应付战争，要做好三件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美国可以自行其是，中国也可以自行其是。但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道路已经开通了。尼克松总统说，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们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越南局势改善之后，可以就台湾问题达成谅解。”

“你们想到过能加入联合国吗？”我问。

“亨利·基辛格大约是在 26 日离开这里的，有些同志去为他送了行。他说他认为中国得不到足够多的选票加入联合国。我们也这样想。我们没有准备。联合国内进行了热烈的辩论。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基辛格是在飞机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一些小国问：为什么不准我们同中国建立关系？在那之前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 50 个，一周前已经增加到 88 个了。

“我们的宣传教育提纲是：（1）永远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2）努力实现对外关系正常化，日本已经同中国建了交；（3）遵守万隆会议 5 项原则——实际上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 10 点原则。我们一如既往地遵守这些原则。”

“现在中国国内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问。

“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需要是培养我们的年轻人。只要老干部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以后要去世的。我们的革委会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这种培养的一部分。例如，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就是毛主席的侄女王海容。她至

今仍然骑自行车，可是她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现在当上了外交部长助理。象她这样的人还有一些。”

“我现在正在中国寻找社会主义的新人，”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自文化革命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变得更有觉悟、更有感召力、更有教养了。他们懂得深入进行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道理。毛主席为文化革命规定的‘16条’触及到人的灵魂。文化革命是个全新的事物。以前我总认为，中国变了，我就自然而然会变。但光是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得努力改变自己，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你得经过许多变革和许多阶段。现在，革命为共产党员规定了更高的标准。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我现在不是在延安的那个时代了，我们还没有最后造就出社会主义新人。”

“那时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吃过不少苦。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很舒适，医疗条件也不错。物质环境的优越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我们不要因为舒适而变得腐朽。社会主义的新人应当能吃苦，能抵制舒适的生活。我们到农村去就是为了过艰苦的生活，恢复以前那种精神。如果我们吃老本，那么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即使家里有地毯沙发，我们也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以前的阶级斗争你可以识别出来，现在就很难了。这种敌人你是看不见的。因此，我们需要用更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这就需要刻苦地学习。我们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分歧，得要有锐利的目光才能发现矛盾，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矛盾。”

“我是在中国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来到中国的。”我回顾说。

“是啊，你在这里是一位特殊人物，你了解我们的痛苦和意愿。我们教育青年的形式之一是吃‘忆苦饭’，让老工人和贫下中农讲过去的苦，我们吃他们以前过苦日子时吃过的饭——人们那时吃的是今天用来喂猪的东西。我们用各种办法教育人民牢记过去。

“夺取政权难，保住政权更难。”

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

此时我是在去往中国新机构之一——离北京 26 公里（从我下榻的饭店算起）的一所“五·七”干校的路上。那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我乘坐的黑色“吉姆”平稳地行驶在以前叫作安定门路——现在的人民路上。我们是在驶往朝阳区的方向。郊区的干旱是很明显的。8 月份以前一直没下雨，而 8 月份下雨，对农民来说已经太晚了。他们正忙于冬季的农活——保墒、平地、积肥。田里还有人在摘棉花。硕大的白色北京鸭在运河中凫水，全然不知道它们会在厨房内遇到什么命运。

城里是不许养狗的，我在整个这次旅行中一只狗也不曾看到。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看到过几只喜鹊。使我惊奇的是，我竟然看到了几头奶牛。在中国北方，直到 30 年代还几乎根本没有奶牛，尽管他们有耕牛。

“去年这些公社挖了一条防洪渠——完全是靠几十万民

工用手工挖的，”我的一名翻译解释说，“用了1个月的时间。”

我注意到，有些村庄盖起了砖房，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土房，但建筑式样基本上还是老一套。一队马车迎面而来，车上装的是运往城里的蔬菜。拉车的马匹鬃毛蓬乱，车把式穿着鼓囊囊的棉袄，头戴很暖和的毛皮帽（大概是山羊皮）。路上还有一些或推或拉的手推车。

路上我问及公社实行的法律。我的翻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各公社都有自己的规定。此外还遵照中央的规定办事。”（我一直未能得到一份这些规定的文本。）

“每个县都有一所干校，培养干部为人民服务。”我的一位翻译解释说。“这是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每所干校的情况都差不多。这所干校只为北京市东城的人服务。”

该干校建在一处平坦的地方，到处是飞场的尘土。我们进院时，一批欢迎的人正等候在户外的一块大黑板的旁边。那黑板上点缀着图案，用漂亮的印刷体写着：“欢迎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当然，我拍下了站在黑板前的这些新相识的照片。

干校负责人赵志平和革委会的15名中的大多数成员坐在一张长桌旁。桌上摆着几盘水果，每个人面前有一杯热茶。

“苹果！”我兴奋地喊起来。“一定是从朝鲜进口的。你们现在也种苹果吗？”

“当然，我们这儿种苹果。”

“这所‘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的两项指示于1968年11月7日创办的。”赵开始介绍情况。“五·七”指示发表于1966年，另一项指示发表于1968年10月4日，也就是4

年多以前。已经有 3300 多名干部在这里学习过了，其中有 2800 人已经回到了原先的岗位。我们现有 350 名学员，半年一期。我们还有 100 名干校工作人员和工人，总共是 450 人。所有学员都是东城区领导成员和来自工厂、医院和学校的干部，还有几名中小学教师。我们的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教育人，培养无产阶级干部。我们教育干部的途径有三条：一是通过上面所说的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主席的《实践论》。基本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侧重自学和读原著。”

我环顾这间干净简朴的房间：它是一座现代式样的建筑，有几扇大而明亮的窗户。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像，脸上漾着神秘的微笑；另一面墙上则是表情严峻的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像。

“我们的教育取决于学员们的认真态度和互相帮助。要是有的问题在讨论中解决不了，革命委员会就来帮助大家。学员们边劳动边学习——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农忙季节劳动时间长一些，农闲时学习时间长一些。通过认真的学习提高了觉悟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路线的积极性。”

一家百货商店的党委书记总结了他自己的体会：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后来在北京一家私人店铺当学徒。解放后这家店铺成了国营企业。我入了党，成了一名领导成员。我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由于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我没有‘政治挂帅’，而是制定了一些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规章制度。我进货时不考虑工人农民的需要。于是群众对我们的商店有意见，提出批评。我还受到一位领导同志的批评。

“通过学习我有了深刻的体会。要是不经过这种锻炼，那就难以保证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分清两条路线，才能不犯错误。我很快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从现在起，我每天都将学习一两个小时。”

我注意到大门上写着几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此刻，那位发言人解释说，这几个大字曾是“抗大的口号”。

“那所大学创建于1937年。”我插了一句。（我没提及林彪曾是该校校长，并被学生们奉为各方面的楷模。）

“我知道。”他说。“我在那里上课就用你的书做教材，特别是关于朱德委员长的那一段，这是很了不起的经典呐。”

从这时起，屋里的气氛似乎变得热烈起来了。

“延安郊外还有一所党校，”我补充说，“那是一所干部进修学校，跟抗大不大一样，倒是更像你们现在办的这种学校。抗大的主要对象是新到延安的学员。”

看来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所学校，至少是没有怎么重视过它。

干校负责人看起来有50岁左右，脸上刻画着饱经沧桑的皱纹。他的样子像个“老革命”，但我没敢冒昧地问他个人的经历。

“我们刚来这里时，不得不先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此同时自己动手盖房子。我们不能老住在农民家呀。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自己盖房子，另一种是伸手向政府要。最后决定艰苦奋斗，采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办法。大多数干部根本不知道怎样盖房子，也缺乏信心，他们主张向中央求助。他们在讨论中提出让别人给盖房子，尽管改造思想的任务不

能由别人来完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一致同意自己动手盖房子了。原定100天内盖好300间，由于学员和工人们以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1个月就完成了310间。在学员们欢欢喜喜住上自己盖的房子的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政治路线教育。

“我们从建校之初就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造一切，不仅盖房子，还种庄稼，养猪，做饭——全都是学员们自己干。我们做到了粮食、蔬菜和肉类自给。

“我们的学员们意识到，伸手求援和自己动手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有觉悟的表现。

“女学员也同男学员一样参加了盖房子的劳动。这所干校通常有大约40%女学员，现在有35%。

“到这里来的学员都是些领导同志。他们以前是指挥别人的，现在来当普通劳动者了。他们在原先的岗位上领导，有架子；但是他们到这里来却穿上了劳动服，官气也去掉了。

“此外，有些到这里来的干部根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通过盖房植树等体力劳动使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发生了变化。”

东城区的一位干部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我1938年参加革命，吃过不少苦。解放后我进城担任了领导职务，有汽车和专职司机。我很少参加体力劳动，没有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所以群众在文化革命中对我进行了批评。到这所干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主要的教训是我过去没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产生了贪图安逸的思想，革命意志衰退了。我找到了犯错误的原因，决心变革我自己，但这谈何容易。

“有一次我被派到城里去拉粪，这里去北京往返 25 公里。我要去掏粪的地方正是我以前当领导的那个地方。开始我喊不出口，声音卡在嗓子里出不来。我想到，普通工人能喊出口，我为什么不能？我记得我在解放区参加大生产的时候，一点不感到难为情，现在就不好意思了。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作祟。于是我批判了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积极地投入了我的工作。我吸取了修正主义路线毒害我的教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教育我能上也下。”

“附近的贫下中农看见副区长去城里掏粪，心里都很高兴。他们说，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进城掏粪，这样的干部我们欢迎，因为他既能在上面工作又能在基层工作。”

干校负责人说：“无产阶级的意思是‘没有财产’，许多干部在这所学校里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参加体力劳动使他们树立了把防止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事业进行下去的坚定信念。”

我本想谈谈“无产阶级”这个词的含义，因为我在 30 年代时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词的意思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理解。我便冒昧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古罗马，无产者并不仅仅是指最下层的没有财产的公民，他还被看作是一个只能用生儿育女来为国家服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才是真正的无产者——在旧中国，妇女们连拥有自己的 proles 的权利都没有。在拉丁语里，proles 是‘子女’的意思。我在中国的那个时候，妇女显得比男子更为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革命。在旧中国，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无后而终。要是这种态度不改变，人口

过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祖先崇拜的基础是要有 proles，即有后代。”

但是中国人并不想深入探讨术语问题。在这所“五·七”干校存在着那么一点儿男子气氛，因此妇女问题并不构成一个单独的问题，也没有人给予注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永远不是妇女之友。

他继续作介绍：“我们在这里采用的第三个办法是组织学员们到村子里去同村民们打成一片。每个学员都要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到公社里去向贫下中农学习，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农民，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前年夏天有一次，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说附近的农田被水淹了，我们放下饭碗就去救援。赶到那里后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水灾，而是水坝决口了。十几个人跳到水里筑起一道人墙。水很急，人站不住，于是又跳进二三十个人，组成了三层人墙。最后，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水被截住了，桥被保住了。我们有义务帮助农民免受损失。”

“有没有人溺水而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以前在中国北方没有多少人会游泳。

“没有，大家都没出事儿，连头一拨跳下去的人，连不会游泳的人都没出事儿。这件事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关在屋子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参加实践，就不能真正理解所学的东西。还必须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生产目的而进行科学实验，以便加深认识。

“我们这里采用的三种办法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改造学员的思想。通过参加生产和学习，学员们改造着自己，老干部焕发了青春。”

被提到的另一个事例是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的经历。这个副局长是一位眼科医生，他“通过在这里的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主动下农村为贫下中农治眼病。“一位老大娘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也不好。他想，要是他在城里为她做手术，那肯定能把她治好；而要是在乡下做手术，那就很可能失败，他就会丢‘脸’。老大娘说，‘我的另一只眼睛就是因为我看不起病才瞎的。现在毛主席派你到这儿来了，要是不成功，你可以学习，要是成功了，我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出力了。’这番话在他头脑中引起了斗争。他想到，这位老大娘所想的只是社会主义建设，而我却只想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面子’。

“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虽然身在干校，却还没有根除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他决定就在老大娘的家里为她作手术。经过周密的准备，手术成功了，老大娘重见了光明。她感动得热泪直流，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件事使这位医生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说：‘我治好了老大娘的眼睛，但是她提高了我的继续革命的觉悟。’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要想做好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一辈子不能停。”

后来我们参观了这座农场。发言人说：“4年来，我们不仅培养了干部，还得到了物质成果。我们共生产了95万公斤粮食——稻米、玉米、大豆和小麦，10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700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们干校只有4年的历史，还是个新生事物，我们仍然在学着改进工作。现在我们规定学员在这里的学习期限是半年，有些人想呆得久一些。我们相信，要是他们能呆得久一些，他们的收获会更大。这样，在职干部的轮换时间就得拉长。当然，农活是有季节性的，最好不要

把季节打断。我们是有缺点的，希望美国朋友一会儿给我们提提意见。”

我们参观房舍时，我觉得其中有一些好像是用我的老朋友们盖的——那些漂亮的灰色大方砖像是从城墙上拆下来的。革委会副主任证实了这一点。

“这所干校养的猪都住在宋代的宫殿内，”我说，“由大学毕业生负责照料它们。你们不觉得它们被宠成了肥头大耳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了吗？”

我说这话时正望着一头硕大的白猪，它自得地卧在它那两居室的猪圈的平台。那猪圈是由宋朝或元朝的砖块砌成的，又干净又气派。照料它的是一位蛮漂亮的共产党女干部。为了卫生起见，她穿着一件白大褂，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她对它讲话，它哼叫着作为回答。

“我总是听人家说，只要有条件，猪是比除了猫以外的任何其他动物都爱干净的动物。这里的情景就证实了这一点。”

旁边有几头牛和它们的充满自豪的饲养员。这些牛也都住在同样的砖砌宫殿内。

这里的路是夯实的土路，扫得很干净，两旁是栽种不久的苹果树、桃树和核桃树。

在一间宿舍内，我们看到4位妇女和3位男子围在一只小小的煤炉旁，一面吸着一氧化碳一面逐字逐句地认真学习《反杜林论》。他们中有3位是中学教师，1位是一家大型服装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发言人是北京市教育局的一名干部，他是8月7日那天来的，要在这里呆6个月。

我一边摘下毛线手套，凑到炉边暖和我双手，一边说：

“毛泽东学英文和强调拉丁化，这是许久以来我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记得在延安时徐特立是很主张实行拉丁化的。”

“是的，我们需要改革中国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是要花很长时间的。现在小学在教拼音字母，这是 1959 年或 1960 年开始的。”发言人对我说。

他们中有两个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但已经忘了。“我们现在跟着收音机学，学得很起劲。”他们对我说。“在中学里，英语是一门重要课程。”

“你们对联合国有什么看法？中国学校里讲课时能讲联合国的情况吗？”

他们不肯明确表态，只是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设法发挥更有益的作用。”

这所学校不是公社，除了生产以外，它的其他开支也像其他学校一样由国家提供。

这所干校的医务室给人治病既用中草药也用现代药物和方法。我看到那里的医生给病人开了中药藏红花。大蒜被用来防治感冒。

干校有自己的伙房和食堂，由学员们担任工作人员。饭食的品种很多，是道地的北京风味，因为许多学员大概都是北京当地人。在中国北方，大白菜是主要菜蔬。

我们参观了干校西面的公社。公社的党委书记给我们讲了村史：“解放前这个村子很穷，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贫农以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而今住上了新房，有了自行车、缝纫机。现在我们又在盖 20 座新房子。我们村有 100 户。过去我们的子女上不了学，现在全都上了小学和中学。我们有一些工业。没有乡办工业，农业就不能发

展，因为村里需要电，需要水等等。每个公社都应当有自力更生的工业。”

下面是一个棘手的、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提了出来并得到了如下介绍：是的，农村人仍然想要儿子，但是思想先进的青年人不想多要儿子。人们接受了计划生育。迷信已基本上不存在了，没有焚香祭祖这类事了，但墓还是要扫的。是的，妇女现在同男子平等，同工能同酬了。

“我们干校中没有人想多要儿子。”陪我参观的人中有一位这样说，但他们对上述介绍的其他部分没有异议。

我们谈起苏联。“它不代表工人，它现在有一个特权阶层。”人们要我读读1963年的那些有关苏联的文章，因为那是最好最近的解释。

“办干校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同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既可根除修正主义又可根除教条主义。我们干校希望在今后四五年内，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一位干部都能来学习学习。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派干部来学习的全盘计划。”

“你们说的干部是否仅仅指共产党员？”我说。

“不是。我们这里既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干部是指领导者、负责人。”

他最后说：“我们在这里以延安精神教育人，教他们继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我读过你写的书，包括有关跳舞的那一部分在内。我们这里也跳舞。”

一些男女学员为我这唯一的访问者表演了歌舞。他们全都穿着大棉裤，但是女孩子们穿着很合体的衬衫，发辫随着身躯甩动（只有一个女孩是短发）。屋子很大，窗户很明亮，地是夯实的土地，舞台是水泥砌的。屋里当然没有什么取暖

设备，我们呼出的气像一炷炷冒烟的香。

我本不大想在那低矮的硬板凳上久坐不动，尽管我那穿着毛皮镶里的皮靴的双脚并不太冷。演出的节目有：《我们走在“五·七”大道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五·七”战士插秧忙》、《我爱北京的毛主席》、《南泥湾》（是歌颂王震和抗日战争的）等等。由9件乐器组成的一支乐队为演出伴奏，一个敲红鼓的女鼓手，两个手风琴，几支黑管，一支笛子，还有一支仅有几根弦的奇妙而原始的中国式小提琴。这种小提琴发出的是真正中国式的声音（我很爱听）。

我不是由于寒冷和出于礼貌僵直地坐在那里，而是被这演出吸引住了。我入迷地听着看着，完全沉浸在这种演出的特殊气氛之中。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奥列佛·特维斯特一样，我没看够。于是他们又演了一个《打场舞》，一个歌唱海南岛的女声合唱以及一个新疆舞蹈。倒不仅是因为那些姑娘娴雅可爱，还有她们表达自己全部体验的那种奔放和狂热。共产党高级官员和领导者在这里与普通农民和工人一起跳舞，表现得那么谦逊、那么单纯、那么真诚。我既喜欢他们的舞蹈又喜欢他们的音乐。

有位学员在北京的一家照相机商店工作。我访问以后，他给我寄来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我向前探着身子、看表演看得入迷的姿态。

我们告别时，发言人说：“中美两国人民向来是好朋友。许多中国人羡慕你去过延安，写过一本有关延安的书。我们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除了那本《中国红区内情》以外，他们对我发表过的其他作品大概从来没听说过，尽管我还写过另外三本有关延安时代的书。

国棉三厂

回想起这次参观，我认为这是整个这次中国之行中最愉快的一次访问。那天天气晴朗，到处弥漫着乐观气氛，“今天的甜”的气氛，这真的是“新中国”。这项小小的活动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是因为革委会主任刘澈的缘故。这位上年纪的妇女，面孔很漂亮，举止很优雅，而且待人和善，性情开朗。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友谊，以致在为我举行送别宴会时，她也应邀出席了。这有好几个原因。

当然，这次参观是在朱德接见我之后进行的。那次接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我的总的态度。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刘澈本来也会为我做出同样的努力的。

我的翻译对我说过，国棉三厂算不上最好的厂，也不是最差的厂；该厂是50年代建成的，是个中型工厂；后来建的新厂比它强得多。

宽敞的接待室窗明几净，里面摆着一些软软的西式大椅子，照例是带镶边的椅套，照例是带玻璃板的桌子。屋内很暖和，连门厅也很暖和。

刘澈一同我握手，延安气氛立即就弥漫开来了。

“非常欢迎你。我读过你的书，注意到书中的照片。我还读过斯诺先生的书。这两本书对我是有影响的。我从1939

年到 1945 年是在延安的。”

我看到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另一面墙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公共场所都是这种格式，尽管有时没有恩格斯的像。）

接着，她不拿笔记本向我介绍起情况来：“我们厂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1954 年筹建，到 1957 年投产。厂区面积为 4.2 万平方米，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生产区，一部分是生活区。我们厂是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地建设我国工业的教导建立的。你大概知道，解放前，纺织厂是属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器都是进口的。

“建厂计划由纺织设计院制定。我们使用的机器全都是由中国的工厂制造、由工人们自己安装的。

“我们厂有纱锭 87000 锭，织布机 3200 部。我们分做 3 班，24 小时生产。每班 8 小时，中间有半小时吃饭时间，所以上班时间是 7 个半小时。每年的产量为 1 亿米，除供国内消费外，还向 16 个国家与地区出口。

“我们有 6400 名职工，其中 70% 是妇女。女工居于主要岗位，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7 个车间中有 4 个是由妇女担任车间主任。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人能办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办到。中国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年年超额完成任务。除了超额完成任务以外，工人们还年年搞技术革新。工人们制造出把棉纱同化纤混在一起的自动化机器，他们还发明了自动取锭机和自动为织布机喷水的机器。以前工人们不得回来回走动，现在有了自动人

行道。我们的党和政府关心我们的职工，在建厂的同时为工人修建了住宅，单身职工也不例外。我们有 40 栋楼。单身职工每月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钱极少。”^①

我们参观了工厂。在明亮的纺织车间，我得知女工的平均工资是每月 58 元，同全厂平均工资一样多。比较老的工人拿 78 元左右，但由于青年人太多，平均工资比这要低。人们告诉我，上海和天津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些。

机器的噪音很大，但是操作者那红润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神情。见到我走过来，他们便鼓起了掌。

“我们需要想办法减少噪音，”刘澈抱歉地说，“聋哑人喜欢在这里工作，这种人都很聪明。”

“我很清楚地记得无锡缫丝厂和上海棉纺厂中那些面黄肌瘦、满脸汗水的姑娘们的模样，”我说，“中国劳动力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其中大多是女孩子。”

公共浴室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工厂食堂每人每月只收 15 元，伙食极好。

公费诊所既能做手术又能开药（中西药都有），还可以扎针。为女工服务的妇科、产科和儿科还会传授计划生育知识。产假为 56 天，工资照发，分娩可去诊所，也可以上医院。56 天后，可以把婴儿送到托儿所，以后再送幼儿园。退休者有退休金。

“新社会的老工人都很幸福。他们热爱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忘记同旧社会相比较。”刘澈说。“我们在党和政府

^① 这想必是指单身职工住的那种许多人同住一个房间的宿舍，已婚职工住的是公寓。——作者

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有缺点，管理水平不够高，我们缺乏管理这种大厂的经验。我们工厂的清洁卫生还不够好，还需要大搞发明创造。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急起直追。我们常去参观其他地方的先进工厂，向它们学习。”

四周用彩色粉笔画出很好看的图案的黑板报上画着图表，写着有关竞赛活动的数字。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刘澈是个东北人，一问果然不错。我同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东北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在1935年到1937年期间我研究过东北难民问题，而且我喜欢他们那种性格，山东性格。在中国，人们对东北人的看法就像美国人对西部牛仔地区的人的看法一样。他们面色红润，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擅长户外劳动，还总是骑着鬃毛蓬乱的马。他们确实是征服了荒蛮的边疆人。东北过去一直是1911年以前统治中国的满族人的狩猎地，当时汉人是不许在那里落户的。从1911年至1931年，东北就住满了汉人，主要是来自山东的汉人，共有3000万。

山东——东北人很“老实”，意思是说他们是诚实、单纯的乡下人，可靠、真诚，但不是特别聪明，几乎都是农民和工人，因为旧社会上层人物信奉的儒家学说没有在东北扎根，尽管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

实际上，社会主义为东北——山东人创造了真正的机会。在我1972—1973年访问中国期间，我常常发现自己在倾听一些看样子很坦诚、直率、开朗和真正友好的、具有一种特殊的老百姓气质的人讲话。

“你一定是山东人吧？”我常常会这样问，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在外交界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她以前的指导者康生都是山东人。起初，东北人或山东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极少，现在就不然了。这意味着农民和工人阶级类型的人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地位。当我同别人谈起这一新现象时，人家告诉我，由于山东太穷，山东人都到外省谋生去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后，那里的人民感到愤慨。许多人逃到关内，成了难民，但他们时时想回到家乡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许多东北人就在你到延安的前后去了那里。我是1939年11月到达延安的。在那之前，抗战期间我在山西做过群众工作。我在延安的女子大学学习过，还当过延安妇联的主席。我是1941年在延安入党的。”就这样，刘澈对我讲起了她的经历。她接着说：

“在延安，我做妇女工作。我从未参加过军队。国民党封锁过延安，企图摧毁它。我们用土办法进行生产，用纺车和原始的方法织布，这还真发挥了作用。由于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敌人的封锁失败了。我曾组织妇女纺纱织布。

“在日本侵略之下，人民，特别是河南人民受了许多苦。河南的妇女善于纺线，而且她们中有许多人到了延安。我们纺出了很细的毛线和棉线，再把线织成布。”

“你感兴趣的事情，那时我也很感兴趣，特别是通过工业合作社把女难民组织起来从事生产这种事情。路易·艾黎是1939年到延安开始创办工合的。”

“我听说过路易·艾黎，但是我没有在这种合作社内工作过。”她说。

我们谈起了东北和“双十二”。我向她谈到我在1936年采访少帅张学良的情景。那次采访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他的东

北难民军队同红军之间的统一战线。

“他在台湾仍然被蒋介石关押着。”我说。

我问起工会的情况。她说：

“文化革命之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工会，但是文革期间不活动了，因为有许多其他群众组织在起作用。自从1968年4月成立了革委会以来，我们一直打算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现在工人们正在选举代表组建职工代表大会。^①

“有些工厂已经有了职工代表大会，有的还没有。不论是职工代表大会还是工会，我们都视为用共产主义教育工人的大学校。”

1968年成立革委会时，刘澈被选为21人的革委会的主任。

“工厂中有军队的代表吗？”我问。

“有。我们厂有一支军宣队，军宣队有一名成员参加革委会。”

我们谈起青年问题。她说：“毛主席说过，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因此，教育青年是革命的一项巨大的任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组织青年工人学习马列主义，听老一辈忆过去的苦。我们常请老工人讲他们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我们还请老干部讲述以往的革命经历，请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讲述他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的青年人去老式煤窑参观，去访问农民，以便使他们懂得革命的成功是多么来之不易。”

^① 这次会见后未出两周就下达了一项全国性的指示，让组织工会，而不是职工代表大会。——作者

我问起共青团的情况，团委书记（是个姑娘）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她是1972年被选为团委书记的。

“今年，我们厂已经有700名团员了。”她告诉我说。

她以好奇的目光望着我，同时又有点若即若离或者说是羞怯腼腆。

“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充分肯定老一代的优秀品质，”我为老一辈作起宣传来，“因为老一代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们还有不少老干部呢。”我的话很快被订正了。

我仔细地审视着她的脸，心中很清楚地知道：不仅中国的未来，连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也大体上取决于这些青年人是怎样想、怎样做的。从1966年到1969年，他们把中国搅了个翻天覆地，“老干部”在受到十几岁的娃娃们“批判”之后靠边站了。

把我同他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桥梁就是我的《中国红区内情》这本书了。那姑娘告诉我，“许多年轻人都读过它。”

“有许多外国人参观过国棉三厂吗？”我问。

“有过一些。”她回答说。“11月间我们接待过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有日本人来过吗？”

“还没有过。”

“那好，这是我比日本人先来过的地方。”我高兴地说。“你们的生产成本是不是比日本低？”

“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加拿大、瑞典和越南。”

“我希望你们邀请一些美国工人到中国来。”我建议道。

“我们对美国工人是友好的，我们尊重美国的进步人士。”

我们很愿意同美国工人接触，他们有一些长处，值得我们学习。我只是毛主席的思想教导出来的普通一兵。”

“我本人做的工作很少，还犯过一些错误，”刘澈说，“但是我现在正在群众和党组织的帮助下改造思想，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我们仍然处在‘改’的时期。”

我看得出，这话不仅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那位共青团领导人听的。在中国，到处都有人这样煞费苦心地去弥合代沟，以便医治青年人的攻击造成的创伤，重新确立“老干部”的权威。

我不知道乔治·米尼^①若是看到这个女孩子所体现的中国青年的风貌会作何感想。我曾听人说过，这些中国青年除了毛泽东之外，不相信任何人。她接着说：“卡尔·马克思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主席也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全世界劳动人民应当团结起来消灭压迫和剥削，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期望的事情。”

“在美国，工人阶级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说，“大多数学生也不知道。”

由于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我们便朝食堂走去。那是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摆着长桌长凳。一些工人，全都是男的，分成一组一组地聚在一起。看见我走来，他们鼓起了掌。

“他们在开会吗？”我问。

“是的，他们在讨论生产问题，每天都要开这样的会。”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

^① 乔治·米尼（1894— ），美国劳工领袖。——译注

北方饭菜。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此外还有别的品种的面食，有的外面还有一层芝麻，看起来、吃起来都很像丹麦糕饼。大米饭和小米饭是用大锅做的，各种肉类炒菜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的胖胖的炊事员们都穿着白大褂。

“你们的厨房是我在中国见到过的最干净的厨房。”我对他们中的一位说。“饭菜的价钱怎么样？”

“价钱不等。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一份。现在我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蔬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毛8至2毛钱；大白菜是5分钱，加上米饭是1毛至2毛；豆腐菠菜是5分钱。我们还有豆浆。”

“我记得以前劳动人民每年只在过年的时候吃一顿肉。”我说。“牛奶和豆浆只有少数外国人和他们的厨师才听说过。”^①

我尝了几样菜，味道确实很好。

“这里的工人比我们美国工人吃得好，”我说，“至少午饭是这样。你们获得的维生素比美国工人多，食物也更新鲜、质量更好。我们的人午饭只吃三明治或汉堡包加上番茄酱。他们喝咖啡和汽水太多。我们的人吃肉太多，但肉太多没有必要，甚至有害。不过我觉得他们中吸烟的人比你们少。”

这间房子里的人显然个个都很快活，都感觉到生活的美

^① 1934年，在燕京大学工作的夏仁德试验过做豆浆的新主意，他的孩子不得不喝他的试制品。我从未尝过比那更难吃的东西！——作者

好。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他们彼此都有好感。他们的食物在更大程度上保持着天然状态和有机质，尽管据我所知那里面可能含有杀虫剂和化学品的成分。但是，不论怎么说，一切都没有经过多少加工。

接下去我们参观了子弟学校。学生们看见我，热情地鼓掌欢迎。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一摇一摆的，男孩子们几乎都理成平头。这座工厂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学生们毕业后“被分配去参加工农业社会主义建设”。

在为不到7岁的儿童办的工厂幼儿园内，孩子们也坐在同样的课桌旁。我们来到这里后，由男孩女孩一起演出的歌舞在钢琴伴奏下立刻开始了。一名男孩领头。他致了欢迎词后，主要女演员踮起穿着凉鞋的脚尖跳起舞来。演出的内容有：舞蹈《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工业学大庆》，《妈妈是医务战士》（跳舞的人背着她的药箱），《我们的妈妈都为人民服务》，《我们为妈妈而自豪》以及《我们要走妈妈走的路》。

有一首歌是《妈妈是个好社员》，可是城市里没有公社。我想大概全中国都在唱这支歌，把它作为一种标志吧。

在这个以前实行家长制的国度里，却没有人提到父亲。

还表演了一个手鼓舞和身穿民族服装的新疆舞。

孩子们扯着嗓子唱。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表演。对这种当众献艺，没有谁忸怩或怯场。

阳光从大窗户照射进来，屋里很暖和。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毛衣毛裤，打扮得漂漂亮亮，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是要拍电视呢。

压轴节目照例是在毛主席巨幅照片下高唱《我们热爱毛

主席》。带头的男孩向毛主席敬了个礼，高喊“我们热爱毛主席”。

我在写这次参观的时候，脑子里依然浮现着这些漂亮幸福的孩子们的身影，浮现着他们那漾着微笑的脸庞。教师们也是这样的表情，充满着爱和自豪。弄明白这种付诸实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超越黑暗的魔鬼工厂的时代。

最后我们参观了为这里的工人们修建的两层楼的现代化住宅。对他们来说，这种有电灯有暖气（虽然我并没觉得多暖和）的住宅简直就是宫殿了。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住在一套两居室房子里的一位老年妇女接待了我。这套房子的租金加上暖气、煤气和用电的费用是每个月11元（没有暖气的季节是8元）。夫妇俩都是本厂工人，每月工资都是78元。他们两人以前都是上海的童工。

“解放后纺织厂的条件大不相同了。”女主人边喝着热茶边说。“以前资本家不关心我们的健康，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根本没有通风设备。在夏天，我们只好把冰块放在桶里降低室温。”

刘澈说，上海和北京冬天虽然很冷，但同与西伯利亚交界的东北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她告诉我们，1948年东北解放后，她在那年冬天带了一些人到那里的工厂去工作，但是国民党破坏了供暖系统，他们只好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工作。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国棉三厂本身就是一个村镇，它是实行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地方单位之一。

北京市地毯总厂

这天清早，外交部的龚普生前来接我去一家现代化的大工厂看织地毯。那厂房有高大的窗户，光线很好。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是地毯生产中心，但现在公共场所使用的特大号地毯则是天津生产的。北京的这家工厂还生产挂毯。该厂有9家分厂。

革委会的人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代表革委会讲话的是一位年纪不大、长得很漂亮的妇女。她是这家市属地毯厂出席1969年的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叫赵淑珍。

“我1940年年底离开中国时带走的唯一重要家具是一块9英尺宽、12英尺长的地毯。”我以这个插曲表明了我对这里的兴趣。“这块地毯是我买来的全北京最漂亮的地毯——金黄色的底上有一枝梅花和一些雕花图案。那是驼毛织的，不怕虫蛀。每当阳光照进窗户时，整个房间都映得亮堂堂的。”

还有一点我没说：这件又大又重的宝贝在用了10年之后，被我卖给了一位朋友。

使我对这家工厂发生一种特殊的、强烈的、很带个人色彩的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在1950年成立的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人1937年占领北京之前，最好的地毯是像仁立地毯厂这样的外国人开办的厂家生产的。珍妮特·费奇·休厄尔曾当过该厂的设计师。像现代刺

绣品等产品的出口一样，现代风格的地毯的出口业务最早是由传教士们办起来的。

我在该厂参观的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像我原先那块地毯那样颜色好看、图案别致和毛绒那样厚的，尽管总的来说这家工厂的地毯生产技术看来并不比过去差，甚至还强一些，因为人们告诉我，现在所用的化学染料着色力强，而且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现在不用驼毛了，只用羊毛，中国自产的羊毛。

“剪剩的羊毛下脚料拿去沤肥。”有人这样告诉我。

“我们继承并发扬了我们民族的艺术传统，而且有所革新。”我在参观一排排男女工人聚精会神搞设计的情景时，有人对我说。那些人中有一位女孩子家在我以前住过的海淀区，于是我同她合了一张影。“解放前地毯的产量很少。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们产品最大的买主。织毯的工序仍然是手工操作。我们觉得这太落后，正设法用机械化来节省时间，与此同时要保持手织的效果。我们的工作还大有改进的余地，所以希望你参观后多提意见。”（在中国，每次参观之后总会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的产品花色品种很多。有一种是艺术地毯，有一种是带彩色图案的，还有一种单色提花图案的。”（我亲眼看到工人们用电剪制作这些图案。这种电剪是大跃进的产物，自1959年使用至今。）

图案主要是从书上找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创造的。我想看看社会主义地毯上是否有龙的图案——果然还有。新的发明是在地毯上织出棋盘和乐器的图案。

挂在墙上的一块样毯是“长沙的一处唐代古迹，毛主席在那里读过书。日本人很喜欢这种花样的地毯，买去了许多。”

“日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唐朝时从中国学去的。”我说。“但是把毛泽东和唐朝结合在一起真是妙不可言。我到长沙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毛泽东学习过的地方。”

我在织毯车间走了一圈儿。只见地毯从上面垂下来，技艺高超的织毯工坐在长凳上工作。他们都戴着帽子，为的是不让碎毛落到头发上。（我在离开那里时建议他们再戴个面罩。）

北京织的最宽的地毯大约是 20 英尺宽，天津还能织更大的。地毯的生产成本是每平方米平均 150 元。

人们向我介绍了一位“来自天津的老师傅，他干这一行已经 50 年了”。人们还解释说：“文化革命之后，我厂招收了一些新徒工来培训。我们这里有 1000 多名徒工，他们是老工人的接班人，各分厂加在一起有 3000 多名。他们经受了文化革命的锤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因此他们掌握技术也比较快。有了这些新生力量，我们的文化和体育生活也更丰富了。昨晚我们还开了歌舞晚会，一直演到 9 点钟。”

工人们做工间操（这比喝咖啡休息强多了）时，我们来到一尘不染的大会议室，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铺着华美的桌布，十几只茶杯冒着热气。屋内新喷的漆闪闪发亮。人们向我介绍说，这家工厂是 1958 年至 1960 年建成的，是“新”跃进的产物。

“过去只有男工可以织毯，现在女工占全厂工人的 54.2%，有吃奶孩子的妇女每天工作 7 小时。毛主席特别关心女工。其他人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天织毯 1 平方英尺。”

这是讨论计划生育问题的一个好机会。

“以前人们不愿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原则上几乎没有人

反对了，”人们介绍说，“这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妇女的健康是必要的。我们工厂里不需要妇女组织，但是妇女也有些特殊的问题。在乡下，我们还有专门的妇女组织。我们仍在试验摸索。”

另一位介绍情况的人说：“当然，我们在推广计划生育。我们主张进行输精管结扎，但这要由男方自己来决定。有些男子做了这种手术。避孕丸主要是女用的。我们主张晚婚。我是29岁结的婚，现在有个3岁的儿子。我不想再要第二个孩子了。”

“党员和革委会成员应当带头，坚决完成这项任务。”一位革委会成员说。“我有两个孩子，小的今年14岁。当然，我在实行计划生育，树立榜样。昨晚我们还开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晚会呢。”

“我在设法了解城市工人在促进真正彻底的变革方面是否在负起责任。在中国，没有比计划生育、输精管结扎和火葬更彻底的变革了。”我这样开始了我的调查。

“不错，我们确实在发挥带头作用。”革委会主任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实行火葬，工厂有一笔火葬费基金。不过我们还有旧思想的残余，公公婆婆们仍然想要孙子，而不想要孙女。有时一位工人有了女孩，可公公婆婆还想要孙子，这样，年轻的夫妇就得说服父母不要坚持要两个以上的孙辈。但有时说不通，他们的父母逼着他们再要一个孩子，看看能否有个男孩。于是，年轻的夫妇为了家庭的和睦，只好再生孩子。现在，革委会中的老同志正在帮助教育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火葬和提高妇女的地位。”

“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革委会成员们所起的带头作用，”

我热情地说，“这是预示未来的晴雨表。妇女组织的情况如何？”

“全国妇联的主席仍然是蔡畅，她仍然受到中国妇女的敬重。在工会组织内，妇女事务由妇女负责，但是我们没有单独的组织。然而，我们在妇女中的工作从未停止过。每年3月8日，我们都庆祝国际妇女节；对妇女的特殊问题，我们也给予注意。例如，在怀孕期间和分娩之后，在哺乳和月经期内，我们还是给予特殊照顾的。妇女若有经期不适，可以干些轻活，或者休病假去治疗。有些妇女不肯休息，但班组长强迫她们休息。”

“我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觉得中国有组织的妇女比男子更具有国际主义思想。”我说。

“今年我们隆重地庆祝了‘三·八’妇女节，男人们没有表示反对。我们妇女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承担了一半工作，所以我们顶起了半边天。’男人们说：‘在我们工厂，女工比男工多，所以说你们顶起了多半边天。’平常我们也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三·八’节时集中进行这种教育。男人也同我们一道庆祝‘三·八’节。妇女注意同男子保持团结，因为妇女的解放是同男子的解放分不开的。就社会主义而言，这是阶级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

“不知道工人的组织情况如何？”我问。

“工会的名称改成了职工代表大会，因为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期间站起来了，希望改变以前的名称，以便显示这是一个由工人代表组成的组织。我们地毯厂各分厂都已经组织起了职工代表大会，而我们总厂的职工代表大会还没有健全起来。各分厂的代表大会现在仍在以前的工会的范围之内工

作。职工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职工进行教育的组织。”

“我还是没搞清楚权力的性质。”我追问道。

“革命委员会是行政机构，我们总厂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成立的。在此之前，各分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总厂革委会不是选举产生的，有些是分厂革委会成员，有些不是。革委会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革委会只是一个‘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三结合’的意思是有老干部、中层干部和青年工人参加。我们总厂革委会有13名成员，其中包括3名红卫兵，两男一女。”

“文化革命期间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当时社会上有两大派，我们厂两派都有。当时这里很乱，直到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领导人参加了学习之后，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了政治觉悟。去年，全厂职工都学习了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

“两派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忠于毛主席的。在对立中，一派称另一派为保守派，坚持说‘我们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我们总厂没有发生武斗。对立情绪表现在一派头头不肯同另一派的头头坐在一起。这不是年龄或性别的分歧，只是意见分歧。最后，‘三结合’的形式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当时你们这里有红卫兵吗？”

“在开始时，青年工人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组织起来造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反，造以彭真和吴晗为首的前北京市委的反。”

9
B

“年轻的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市委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认识到这一小撮人是错误的。老工人懂得了他们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还要受二茬罪，于是他们也支持起红卫兵了。”

坐在桌旁的一位姑娘是个红卫兵头头，说话很有份量：“吴晗的前市委组织班子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青年人从一开始嗅觉就很灵敏，识破了他们的面目。我们同刘少奇进行了斗争。我们厂的老工人也觉悟起来了，认清了形势。例如，老工人听说，刘少奇说什么剥削有功，说什么没有资本家工人就没有工作可做，因此这不算剥削。刘少奇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没有看到资本家是寄生虫。老工人听到这些胡说八道都很气愤。他们说，劳动人民才有功，剥削者怎么能有功呢？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驳斥他的谬论。工人们写道，我们通过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知道解放前是什么样的苦日子。

“老干部关心红卫兵小将，因为他们知道年轻人通常有些幼稚。所以，当年轻人在帮助老干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时，他们并不生气，而是说，我们也使他们受到教育。”

我会见的所有人都很注意外交辞令，老中青的谈话不仅是说给来宾听，也彼此说给对方听。现在一位“老干部”出来赞扬年轻人了：

“现在参加革委会的红卫兵都工作得很好，举止言行和所做的事情都比以前更好了。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些人犯了极左的错误，但他们通过提高政治觉悟学会了改正这种错误。

“红卫兵也分成两派，观点不同，因而起先不能坐在一

起工作。自从召开了党的‘九大’之后，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现在能齐心协力地一道工作了。

“我们厂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停止生产，就是在激烈辩论期间也不曾停产。学校的学生停课搞串连，但我们全厂广大职工一直坚持上班。只有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出去搞串连或者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大辩论，让工人边工作边听他们辩论。

“我们还处在‘改’的时期，新的领导班子和行政班子还有待完善，不过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主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领导班子团结在党委之内，革委会是党委的行政机构。党委书记也就是革委会的主任。我们全厂有党员300多人，占全厂人数10%以上。”

他们说不出各派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但他们承认参加两派组织的妇女不到全厂人数的54.2%。

我对这家地毯厂的访问是很值得的，讨论是坦率、真诚的。我们甚至提到了下面这个敏感的问题，人们向我发表了如下看法：

“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是有双重目的的。他们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卫星国，1969年在珍宝岛这样试过。我们打退了他们，现在准备再次打退他们。坏蛋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进攻我们。文化革命使林彪的亲苏集团没能得逞。另一方面，苏联把精力放在东方或者装作把精力放在东方，也可能是要以此欺骗西方，使西方放松警惕。他们的政策有着双重目的。”

这次参观后没过几天，新年指示就宣布要成立工会，而不是职工代表大会。几个月后，重新成立了全国总工会，并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工会代表大会。这说明共产党感到自己的

力量已强大到足以控制工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了。在30年代，共产党曾认为自己的党员能占人口的1%也就够了，而现在，他们似乎认为，他们需要约占人口总数10%的党员，至少在一些重要部门是这样。

艺术家与革命

我于1933年年初首次来北京时“发现”——这是西方人过去常用的说法——中国的左翼画家。在著名的耶稣会教士德日进的帮助下，我得以把这种新艺术作品首次送到西方去展览。这是在西方举办的最早几次现代中国艺术展览之一。^①这些作品在欧洲巡展了一圈之后，不知失落在什么地方了。安德烈·维奥利曾赞扬这些作品说：“它们已近乎艺术中最了不起的杰作……永远以压迫和血泪为题材。这种悲惨的见证感人至深。”

^① 这一展览是1934年3月14日至29日在巴黎拉博埃西街30号的比利埃美术馆举行的。参展的作品有14幅油画、19幅素描和51幅木刻。我为《亚洲》杂志撰写了第一篇介绍“中国新艺术”的文章（1935年7月）。我还同王钧初探讨了写意技巧，并用他介绍的材料为《亚洲》杂志写了《中国的四位绅士》一文（1935年12月）。王送给赛珍珠一幅卷轴画，画的是《水浒传》中的和尚捶打山门的情景。我的《中国的左翼画家和现代艺术》一书是有关这一时期的唯一著作。——作者

1972年重返北京后，除了得知王钧初（胡蛮）还活着，但因重病在身不能同我见面之外，关于这些艺术家的境况我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王钧初近年来专门研究中国美术史）。在1935年年初，中国的左翼艺术家全都由于他们所称的“白色恐怖”而从北京消失了。在白色恐怖下，一首诗、一幅画都被看作是能给国家带来危险的东西。这种局面（今天在中国依然如此）曾使我对艺术家和作家们倍增钦敬之情。我听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王本人逃到了莫斯科，到1939年他回到中国，在延安教书。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这一批人于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吼虹艺术社，直到1929年他们才开始做一些更带革命色彩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到东京去过一次受了影响的缘故。在东京，他们同日本左翼艺术家进行过交谈。

我1972年至1973年访问中国期间只同很少几位艺术家交谈过。在巴黎，我同政治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艺术家一起吃过饭，这就是头发花白的中国大使黄镇。几个月后，他到了华盛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的第一任联络官。他是跟着毛泽东的红军第一军团在1934—1935年进行过长征的人中唯一当上了大使或外交官的人。他在长征期间画了一些长征素描，这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因为长征期间没有拍过照片（只有红二方面军拍过一两张）。我在《红尘》中发表了他的一些素描，其中包括通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这一著名事件的场面。北京的革命博物馆给了我一本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照片集，其中包括一些为黄镇的长征素描拍的照片。

在同一本书内，我还发表了廖承志的自传和他为红军中的一个通信员画的几张可爱的钢笔画中的一幅。那是他在1937年送给我的。他的母亲何香凝不久前刚去世，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女画家之一，因为她年轻时曾在日本学习过美术。

我很想了解一下中国艺术界的现状，但是我在北京会见过的唯一重要的艺术界人士是另一位老革命画家，名叫邵宇。我们交谈时他为我画了一张速写。他是以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身份到北京饭店来看望我的，还拿来了一些作品给我看。后来他送给了我12张我喜欢的画和木刻的彩印张。^①他对我说，他们出版的“严肃”的艺术书籍的发行量可达每种100万册。

邵宇看起来像位艺术家，不仅思维敏捷，而且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他像看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似地望着我，因为他很久以前就读过我的《中国红区内情》一书。我对他也是这样看的，把他看作一个幸存的奇迹。

^① 这些作品是197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的作品中的一部分。1973年5月出版了一本共收入96幅作品的画册，大部分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创作的。这本画册发行了40万份。其中有59幅作品印了彩色单张画，每幅印了2500万张，其中有一些画的是毛泽东。我选的画中有一幅是广东美术学院毕业生汤小铭画的《女委员》，它表现的是新一代“新妇女”的形象，画得很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兵在台风中爬到电线杆上修理电话线。最有趣的是传统风格的水彩画《南方——油城》以及一些城乡风光。这些画作为一种构思是成功的，但却没有多少生气。有一幅还挺欢快，画的是一群姑娘在公社的农田里喷农药。

所有这种印制的画都在城乡出售，用以支付成本。历史上不曾有过哪位西方画家的画能向公众出售2500万份。——作者

邵宇同宋之光一起在新四军的政治部中工作过（他在那里搞过木刻）。我告诉他，我11月间在伦敦同在那里任大使的宋之光一起吃过饭。于是我们彼此便以朋友相待了，因为宋之光是他的个人朋友。

“国外对文化革命有误解，”邵宇说，“以为我们不想再要中国的传统艺术了。可是我们的展览中展出了传统画家的古代风格的作品以及一些运用外国技巧的新作。这些作品刻画了工农兵和妇女的形象。”

他还向我做了这样的解释：“艺术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如果艺术家不能同工农兵结合，他就不能描绘出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至于思想嘛，如果艺术家不同工农兵结合并为工农兵服务，也不能表现他们的英雄形象，那他画什么呢？那他当然就只能有资产阶级艺术思想了。文化革命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对老艺术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是他们思想上的一次革命。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工农兵中的业余美术工作者，这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来描绘彼此的形象。我们在培养大批这样的人。”

“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的美术工作者无须为生计担心，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收入。美术学院和政府根据每位美术工作者的能力和实际情况发给工资。”

邵宇对我说，他在出版社工作，同时还做共产党的工作，并在学校中兼课。他说，中国艺术家的生活与他最近访问加拿大和法国时所看到的情形迥然不同。他说，在蒙特利尔，画家们都集中在一条街上展览他们的作品，有些不得不靠卖画挣钱；有些乐师在大街上拉小提琴。他还说，法国有5万名画家，但只有大约200人生活得很好。他在巴黎参观过一个

画家居住区，还参观了卢浮宫和一些博物馆。他对欧洲和美洲的艺术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他们抛弃了优良传统，所换来的只是抽象的东西”。

中国人同加拿大的美术家进行了座谈，发现他们对中国很友好，愿意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有些人接受他们的人生观，但也有些人说美术家应当崇尚个人自由。中国人发现，“加拿大的大多数画家都是抽象派，而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说他们不愿为资产阶级画广告，所以就以抽象艺术来逃避这种事”。中国人听说，美术界是商人们的一统天下。加拿大人还说，他们对社会不满，不想用艺术来表现它。

“法国美术家非常友好，但我们很同情他们的贫困。”邵宇接着说。“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画家生活永远有保障时，他们很不理解，说是如果画家拿了政府给的薪水他就不会有自由。我对他们说，对自由的解释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了自由，资产阶级就会认为他们没有自由。自由不是抽象的。我们表现社会主义，并不认为这对我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构成什么限制。当然，我们将不允许有反对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自由。我们现在就不允许有这类自由。中国的每一位美术工作者都认为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是一种光荣。这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还有人批评我们说，中国画家只有共性没有特性。我们说，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范围之内，我们的画家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创造性。”

“这是个历史问题，”我插话说，“两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连在艺术方面也不例外。中国现在只不过是把我们西方已经取得了胜利的几场革命——例如

反部落制和宗法氏族制的革命、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等，更不要说社会主义革命了——重叠在一起罢了。艺术向来不是存在于真空内的。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艺术曾是反‘部落制’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部落制终于被基督教摧垮了。这是一种宗教艺术，是新的封建主义的表现。这是一种集体艺术，正如教堂是集体建筑一样。这种艺术促进了欧洲的文明。基督教革命的象征是圣母与圣婴。在中国，佛教的观音就是象征，是外来的反对古代儒教和道教的象征，是用来取代原始图腾中道家的王母娘娘的。今天，观音被取缔了，王母娘娘则允许存在。为什么？因为王母娘娘没有任何意义，对国家或社会主义不构成危险。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艺术的主要锋芒所向是针对反映古代儒教和道教的象征主义与抽象主义的。在古代儒教和道教中，谈论男人与女人几乎是大逆不道的。

“欧洲反封建革命的艺术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否定，是对人——包括作为女人的女人，而不是作为宗教人物的女人——的歌颂。如果你在产生伦勃朗和他的《夜巡》的那个禁欲主义时代去过荷兰，你也会有同样的看法。你若在法国革命之后访问过巴黎，你会对《自由引导人民》倍感亲切。

邵宇觉得我误解了他，颇为激动地说：“我的确到卢浮宫参观过。我们当然承认伦勃朗的伟大，我们当然钦佩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我们意识到中国画家可以吸取它们的方法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当然钦佩象法国的米勒这样一些创作了不朽的农民形象的画家。总的说来，中国画家仍然把18、19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画家看作最伟大的画家，他们不仅是浪漫派，也是现实派。我们当然认为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是天才，而且也认为戈雅是天才。中国也受到印象派的影

响，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进行了一次色彩方面的革命，不仅是凡·高和莫奈，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充分认识到吸收欧洲的传统为中国服务对我们是何等重要。”

“鲁迅把德国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我也在中国。当时介绍来的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家的作品。你们现在还模仿她的作品吗？”我问。

“珂勒惠支同情工人阶级，但她也受到历史的限制。她的情绪是消极悲观的。那不是社会主义的情绪，”邵宇回答说。

“你说得不错，”我说，“那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东西，是丑陋的、批评性的、可怕的，但却是有觉悟的。不过，你们的作品也不能太美、歌颂得太多。你不能以为老是笑容可掬牙就不疼了——那太理想化了。”

屋里的人不喜欢对他们的新绘画的这种批评，也根本不理解我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对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的攻击。

“伟大艺术的秘诀在于它应当是辩证的，”我又郑重其事地补充说，“它应当表现对立的方面。丑与美相比较才能产生效果和运动，才能创造价值。至少在写作方面是这样。除非是针对表现出来的悲观而言，否则乐观就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含义都是由其辩证的对立面决定的。”

我们当时坐在北京饭店内我那套大房间里，冬日的阳光泻进屋内，照得满室生辉。我一边谈话，一边一张张翻看着那些印制的作品。

“我拿给你看的这些大部分都是招贴艺术作品。”邵宇赶紧指出这样一点。“我们有些画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出版了许多严肃的绘画作品集。这种画册一印就是上百万册。你现在

看的这些作品不久也要出画册。我们还有一本西汉时代作品的画册，里面所收的都是文化革命期间出土的作品。

“我们的原则是鼓励高水平的画家为工农兵作画。我们反对只要求水平低的画家去做这一工作的主张。高水平的画家像没有受过良好训练、天赋不太高的画家一样，有义务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作。”

我们谈到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时，邵宇说：“文化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两年以前，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文化革命带来了更多的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和由工农兵创作的作品，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从工人和农民中涌现出了大批艺术工作者。北京举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时间有三四个月，可是没有外国人看过这些作品。

“在文学艺术方面，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政策。

“我们用传统的国画表现社会主义的现代题材，我们也运用外国传统（油画）表现社会主义形象。

“《红色娘子军》、《红灯记》和《白毛女》等京剧样板戏在以革命精神教育老一代和年轻一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样板戏还使业余画家和专业画家创作出了许多绘画作品。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现在培养年轻的新一代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他们是新型的艺术工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保持并继续吸收老的绘画风格的遗产。我们充分发扬山水花鸟等老的绘画传统，以爱国主义教育年轻一代。

“我们中国艺术工作者把促进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视为一项光荣的任务。”

当我翻看这些作品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民间艺术和“无产阶级”艺术的范例，因为这种“无产阶级”艺术才是1966—1969年的文化革命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劳动人民比在任何国家都受到轻视，在以长指甲和缠足作为身份标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在艺术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总的来说，人体，包括妇女的躯体，是决不允许表现的。只有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才能意识到歌颂人体之美，特别是劳动人民的肌肉——更不要说大脚板的劳动妇女了——所具有的革命性质。这把旧中国的整个美学观念颠倒过来了。

在中国，最革命的艺术品莫过于四川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泥塑《收租院》了。（不过，那一双双瓷眼睛却让我感到恐怖。）这组泥塑的用意是表现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不过对我来说，其效果却是歌颂了他们淳朴的尊严和美好的人品——就是一个游客也能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发现这些美质。这组泥塑于1966年至1967年在北京美术馆展出了许多个月，成为文化革命的前奏。

当然，中国工人和农民更喜欢的还是有毛泽东以及白毛女、玲玲、兴兴的形象的作品。不过，作为一个老中国通，我清楚地记得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如何轻视体力劳动者，不拿他们当人看待，视他们如牛马。中国人至今仍对男人和妇女拉车（黄包车是已经取缔了的）的现象感到难为情，要是谁想拍下这种“丢人”的场面，他们一定会感到愤懑。但是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我本人认为，从事这种诚实劳动的人体要比那些不敢看他们的人更美。这种人体是可以入画的，而且可以成为佳作。但是坐在喷放废气的汽车的方向盘后面的人却是无法入画的。

在中国，我的同情一直在劳动人民一边——因为他们从躯体上和品格上说都比那些靠他们的劳动来养活却又非常瞧不起他们的衰颓、腐朽而又无用的知识分子美得多。在西方，体力劳动者同轻视体力劳动的人之间的差距从未像中国这样大，至少我们还是从事锻炼和运动的。

看完那些画后，我选了其中最好的一张。我说：“这些画里最好的要算是这张用传统的写意手法画的熊猫了。它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中国公社农民到尼克松总统到乔治·米尼到勃列日涅夫，都会愿意把这张画贴到墙上。这正是中国同西方之间所缺少的那个联系纽带。这位画家是第一次真正把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看，这熊猫的眼睛中闪耀着社会主义乐观之光。”

“这是一位老画家画的。我认为他为促进中美之间的友谊以及中日之间的友谊发挥了作用。”邵宇表示同意地说。

“中国送给尼克松总统的两只熊猫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外交官。”我说。

（我没想到我讲了这番话后会同那么多的熊猫打交道：作为送别时的赠礼，邓颖超送给我一盒九只瓷熊猫，以此象征中美友好。）

“你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改进工作的批评意见？”这是临别时的例行要求。

“这些画我全都喜欢。”我说。“你们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并且正在填补以往中国艺术中的空白。”

我知道，有一个大可挖掘的领域在中国是不得不回避的，因为它面临着使它喘不过气来的人口过多的问题。妇女的美是不能歌颂的，除了作为一名女委员、穿着长袖衣服的形象

之外，尽管现在可以让部分赤裸的男子充当模特儿了。这样做有 8 亿条理由，外加上出生率年年上升这一条理由。像劳伦斯的《平吉》所画的那种系着资产阶级的粉红色锻带、衣服带有粉红花边的形象在中国连想也不曾想过——这幅画在西方大概仍是最受人喜爱的。中国超越了艺术上的整个“平吉”时代，现在歌颂的主要是油井和荷锄的男人。

人民大会堂

我获准同我的两名翻译——资中筠和邓秀梅一起参观人民大会堂时，大会堂内空荡荡的。这座建筑宏伟、宽敞、高大、明亮。它代表着中国的 30 个省市，里面还有一个台湾厅。整个建筑内有 100 个房间和休息厅。

除了门口有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外，大会堂没有其他防卫措施。我们拾级而上，从高大的石柱中间走过去，进入主接待厅。12 月 14 日那天，朱德夫妇和邓颖超就是在这里接见我的。这也是接见国家元首的地方。

中央大厅的四周有一圈边厢。大厅内是大理石地板，上面铺着红地毯。大会堂内的地毯大极了，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毯。

挂着红色幕帷、两边饰着旗帜的主会议厅内有 3600 个座位，边厢内有 3500 个，边厢上面一层有 2500 个。每个座位都有一副耳机，供同声传译使用。同声传译可译成 12 种语言。舞台可供 500 人同时登台表演。这是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地

方；这是1969年举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地方；这里也是举行“声援”某个国家的大型集会和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

会议厅的浅褐和红色相间的墙壁用了五层压缩木板，可以吸音。“在每个座位上都能听得清。”人们向我介绍说。

大厅的天花板上是一颗“照耀中国的红星”。我走进时，人们把它开亮了。毫无疑问，埃德加·斯诺1960年来参观时，也一定为他开亮过。这颗星的周围有三四圈灯，构成一幅葵花图案。年轻的女导游说，这些灯“象征着共产党领导”。她一面撩开挡住眼睛的刘海儿，一面补充说：“这灯光呈海浪形，象征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

各省的大厅都很宽敞，墙上或展柜内展示着各省的特产。四川厅内挂着一幅熊猫画，还有竹帘子和棕黄色地毯。不过，带有玻璃板的桌子和带椅套的西式椅子（这种家具所有大厅内都有）并没有什么四川特色。

湖南厅很亮，有一道饰有著名的长沙刺绣的大屏风，那刺绣上自然绣的是毛的故乡韶山。（后来我到长沙时，人家也送给我一小块漂亮的长沙刺绣品，同样是绣的韶山。）现代化的西式椅子和另外一些陈设是“20个红卫兵用三个半月的时间制作的”。

辽宁厅内挂着一幅用黑色沥青制作的表现抚顺煤田的画，还有一幅鞍山冶炼厂的钢铁工人的画。另外一些艺术品是用铜线、钢板做的。在大连柜里，则是用贝壳做的艺术品。刻在一幅不锈钢板加玻璃上的蚀刻画描绘了这个东北省份的工业概貌。这幅画重2.2吨，光亮的表现反射出地上的红地毯。墙上还挂着一幅描绘公社景象的画，那是用高粱做的。

新设的台湾厅内有一幅郑成功的画像。他是明朝末期的

人，1661年到了台湾。厅内还有一幅郑成功的画像的复制品，那是郑成功的一位第九代后人（没写出他的名字）捐献给北京政府的。“他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荷兰人是从中国手中把台湾夺去的。”人们这样向我介绍。在一个玻璃展柜内，放着一件台湾土著居民穿的缀着一串串珠子的服装。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广东厅，那里有一幅画画的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建筑之一——广州的孔庙。毛泽东曾在1927年把它变成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那幅画的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幅素描画的是广州的珠江老桥；另一幅画的是为过去以船为家的人修建的新型渔村。一些木刻画表现的是青年们修的水渠、涵管之类。此外还有一些广州木雕和海南岛的木雕。海南岛是宋氏姐妹们的家乡，也是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发生的地方。

三个中央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也各有自己的厅。

我们的参观到宴会厅结束。10天前刚在那里举行过招待几内亚总理的宴会。宴会厅内可坐5000位宾客；若是吃自助餐，可容纳10000人。两侧各有一个厨房，还有一个供乐队演奏的边厢。天花板上是和楼下会议厅内一样的葵花灯，象征着“人民心向共产党”。

我们离开大会堂时，我拍了一张红色幕帷上按照毛泽东的手迹剪成的白色大字——“艰苦朴素”。

“这是新英格兰清教徒们的提法，”我评论说，“只是我们说的是：‘艰苦朴素，思想高尚’。”

这座大会堂于1958年10月28日动工，1959年8月建成，用了10个月的时间，参加修建的人是不拿报酬的志愿人员。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体现了大跃进时代的热忱。

我的一些朋友参加了大会堂的修建。在宴会上，邓颖超让参加修建的人举手，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北京城建设计院（一个建筑师组织）会同“干部和技术人员”设计了大会堂。其中，一位主要人物是我在30年代常与之讨论中国建筑问题的现已过世的梁思成。

紫禁城内的展览

中国在发展新的工艺美术品的同时，仍保留着传统工艺美术。现在农民和工人收入多了，能买一些工艺品作为家中的陈设了。你常常可以在他们的酒柜中看到这类东西。但是“无产阶级”艺术没有市场，有的只是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市场。

在17世纪修建的紫禁城内举办的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几乎都是传统工艺品。带宗教色彩的东西是不许参展的，除了道教的王母娘娘或她的几个仙女以外。佛教的偶像观音属禁止之列。一只象牙塔有500个人物，花了7年时间才刻成。一件漆器要喷22000层漆。一幅唐代的绘画被绣在丝绸上。还有一幅用头发绣的长城，几匹唐三彩的马。丝绣上的花朵美丽极了。

我所感兴趣的是文化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展览上没有毛泽东的形象，但他的出生地韶山是随处可见的，还有许多表现延安、包括毛住过的窑洞的物件。一幅画以遵义会议为题材。还有一些描绘的是长征过雪山的情景、白求恩医生及几个与他在一起的医务工作者，还有一条通往云南省的铁路。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老题材之一，还有汉代以前的一次农民起义。有好几幅是徐悲鸿那有名的六匹马。

哪些是新的、带创造性的东西？我所见到的最好的油画是一个头戴安全帽的钢铁工人，高炉的火光映红了他的脸。一些油画上画的是几个健壮的男工和几个妇女。那几个女主人公是《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中的芭蕾舞演员。还有一些有关“非洲觉醒”的题目。有几幅油画画的是越南和柬埔寨的战士。

最了不起的是用极小的小字刻在象牙上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他的一些诗词。还有一些木雕表现的是城市青年到公社学习务农的内容。

总的来说，看到中国人还在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照搬老的题材和老的手法，这真使我感到失望。但是这个展览是根据需要举办的，据说对所谓“无产阶级”艺术或任何新的手法的需求是很小的。换句话说，展览中表现“文化革命”内容的作品极少。

最受欢迎的题材是熊猫，有用老的高超的写意手法画的，有瓷的，有绣的，用各种技艺来表现。一顶假发套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还有一些洋娃娃。我听说中国孩子很喜欢洋娃娃。

展品上都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抹煞个人的做法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的工艺美术品何以缺乏创新。

我是参观这一展览的唯一的外国人。但中国人却很多，每天来参观的有七八千人，其中有不少人民解放军官兵。（军人到处旅行，你在中国的每个旅游点都能看到他们。）我由女馆长陪着参观。她不时动员周围的观众让开，以使我的参观不

致耽误时间。那些军人虽没有笑脸，但还是让开了。

参观快结束时遇到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有人搬来一把椅子，我坐了下来，周围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一圈中国人，全都瞪眼瞧着我。康民忠以前是一位钢琴家，现已在东北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半（我想这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对人态度和善，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长得一表人材，看上去有些腼腆。“我们应当实行‘古为今用’的原则。”他说。正是为了这一点，他学了古代乐器，还对一些老民歌做了改编。

他奏的乐器是古筝。那是一种很大的长形乐器，带有头发或丝线做的弦，平放着演奏。这种乐器早在 2700 年以前就有了，只是现在又做了改进。它由朝鲜传到了日本。康演奏了一首两千多年以前的秦代的乐曲《渔舟唱晚》，还奏了屈原的《离骚》，这是“反对外国侵略的古乐曲之一”，接着他又奏了一首经过改编的民歌。他演奏的音乐优美动听，令人心驰神荡，而且也不特别原始。

这位音乐家的手非常灵活，演奏起来使人觉得他的指关节都成了双的。我听过一个故事——可能是不真实的故事——说中国最出色的钢琴家之一在文化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打断了手指，作为对他使用“资产阶级”的外国钢琴的惩罚。我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在我看康演奏时，却不由得想起了这个故事。我真希望人们从未对我讲过这样的事情。我还听说，文化革命期间任何钢琴都不许演奏。不管怎么说，文化革命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钢琴演奏音乐会是由弗朗西斯·鲁茨·哈登和她丈夫举行的那一次，那是在我到中国之前几周的事，他们是应周恩来的亲自邀请而来的。周恩来是弗朗西斯的父亲、前汉口圣公会主教吴德施的朋友。

墙上挂着的乐器至少有二三十件，地上还放着一些大提琴。我所熟悉的乐器只有琵琶，这是一种类似五弦琴的乐器（其中有一把是用蛇皮做的）。

参观展览后，馆长（她本人也是一位艺术家）邀我们到接待室（这里没有陈设任何古董）去喝茶。我们谈起妇女问题。她说，象牙雕、石雕和木雕这类以前被男子垄断的工艺美术行当，现在第一次有妇女参加了。

1972年这个展览（也许是一个类似的展览）到西方巡回展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古老的紫禁城这样一个地点和用古老的古筝演奏乐由作为压轴节目，这两者是用什么别的東西都无法取代的。

考古发掘出来的珍宝

我还在紫禁城里参观了文化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展览馆里观众拥挤，但是外面庭院里人并不多。我不禁纳闷，因为紫禁城像这样对公众开放按说应该人山人海。朱砂色的旧宫墙已经斑驳黯淡，有待修理，不过比起30年代来要好一些。

仅就能看到紫禁城里的这些展览而言，访问中国也是值得的。展览馆设在1911年革命以前亡故的慈禧太后的寝宫，从前乾隆皇帝也住在这里。展品有11个省和自治区的出土文物，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人民解放军在离北京120公里的满城发现的距今2100年的西汉皇子刘胜夫妇墓。从墓内发掘出来的古物计2800件，金器的纯度达98%。我注意到陶器上

有鱼和鹤的花纹。

我曾写过一长篇研究图腾崇拜、泉和青铜礼器的论文，所以对公元前 1600—1100 年的商朝遗物尤其感兴趣。我认为商朝青铜礼器上的食人怪兽饕餮纹是图腾崇拜的标志，因此想访问某位考古学家，请教他的意见。我的译员代我向考古部门联系后告诉我，对方回答说“它的意义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在参观中，陪我参观的展览会主管人说“饕餮是图腾崇拜”，还说它具有“宗教含意，也是贵族尊严的象征”。

我还认为这类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展览会上的文字说明和我在那里进行的交谈也帮助我证实了这个看法。祭祀祖先时要供酒和食物。在湖南华容县出土的商朝文物内有一具很大的酒樽，在湖南另外还发现了一具。

展品中有一柄商朝的祭祀用斧子，旁边还有一些牙齿。我认为它同关于食人怪兽饕餮的观念以及用活人献祭或者杀人为食有联系。在湖南长沙还发现了一副弓箭，另有一柄在战车上使用的长 2.8 米的长矛。

在一座商朝古墓中发现了活埋殉葬的 6 条狗和 48 个奴隶，尸骨杂乱横陈，那柄斧子就在其间。一具年代为公元前 1600—770 年的三足商鼎据说是用来煮饭的，我则认为三条鼎足铸成人胸形状，在祭祀时具有最初是以哺乳动物作为食物献祭的含意。

贵重的展品内还有新出土的距今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卷 1200 年前的手写的《论语》；在洛阳发现的约 1000 年前的粟，颜色已呈黑色；一具计时的漏壶；金质的针灸针；战车的残骸和驭具；白玉和黄金的衣佩；一颗玺章；香炉；玉质的骰子，据民间传说是饮酒时助兴用的。我拍了一

张著名的金缕玉衣的照片，它是用金线把方形的玉片串连成的（棺木也有黄金的外罩）。

唐朝（公元 618——907 年）出土文物展出的有金币以及作为滋补品食用的金箔、珊瑚、琥珀、硃砂等等；金质和银质的狐狸，传说它们能给佩戴的人带来聪明智慧；女人穿的鞋履，从鞋尖的形状可看出当时尚未开始缠足。另外还有遮盖尸身用的丝织品。

东汉（公元 25—220 年）的铜马精美绝伦，尤其是带伞的。1973 年在欧洲展览这批文物时这些铜马最引人注目。

不但北京，在长沙和南京举行文物展览时前往参观的人也很拥挤，从这种真正的兴趣的流露中，人们不免猜想祖先崇拜至今尚点点滴滴有所残存。共产党人对此感到不安，因此在展览时总要加上一些评语，说明与“幸福的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昔日的残酷和剥削。

长城和明陵

我本不打算把时间花在旅游上，但是我太喜欢旅行了，所以决定重游长城和明陵。没有到过长城的人算不上旅行者。长城也许没有某些城墙高，可是长达 1400 英里，每隔一段距离筑有方形的带胸墙的瞭望台。它筑于公元前 228—210 年，是一位中国皇帝为防御蛮子入侵中国而修建的。

去长城要先到南口，从那里驱车从缓缓起伏的丛山中沿一道荒凉的山谷蜿蜒而上，四下只有寥寥落落的农舍，没有村庄。我在1933年第一次看到长城时是乘出租汽车从一条崎岖不平的军用公路前去的，最后一段山路汽车上不去，只能骑驴。那次我穿马裤，戴一顶为了进入婆罗洲丛林而买的遮阳帽，埃德穿的是高尔夫球装。同行的还有几位外国记者——美联社的詹姆斯·米尔斯，阿奇·斯蒂尔和他的妻子，还有路透社的弗兰克·奥利弗和他的妻子。在那个年头，出门得提防盗匪，不过这几位男记者却巴不得能遇上，因为从北京发出去的消息太少了。吉姆·米尔斯即将回维也纳，他建议埃德接替他担任驻华北记者，但是埃德拒绝了，他不愿被“拘”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当时每月只能靠大约50美元维持生活。

1933年的长城年久失修，一片凋敝景象，但是真正的旅行者仍不断来此一睹古代的奇迹。长城并未把北方和西方的“蛮子”拒于中国疆界之外，相反，这些“蛮子”跃马而来占领长城并且利用长城役使中国人。中国的历史约有一半是在外来征服者——鞑靼、蒙古人、满人——的统治下度过的，直到1911年革命。中国人的排外思想可以溯源到大约2000年前，甚至更早，而且中国直到1949年还几乎仍然是半殖民地。古代汉民族的爱国志士在今天仍然是英雄。

当我再度望着巍峨的长城时，我想到了漫长的历史画卷，想到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好不容易才幸免于沦为殖民地，这一部分原因也是亏得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持反对立场，尽管美国在1949年的确通过蒋介石对台湾建立了某种愚蠢的霸权地位。（12月28日那天，

我直到下午回到北京饭店以后才知道美国对越南恢复了猛烈轰炸，这个行动对我访问中国毫无助益。)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几次大的威胁都来自长城以北，包括日本。如今，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又来自部署在它北面和西面的百万苏军。

在长城上，我当然同陪我去的译员谈起了修筑长城的秦始皇。秦始皇从公元前 246 年执政，到公元前 210 年去世，在位仅 36 年，但是他进行了一场“文化革命”，试图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他下令，除医药、农耕和卜筮的书籍外，把所有古典书籍全部烧光。

“他做得对，”一位译员激动地说道，“我讨厌孔子。要是没有孔子这个人，中国的境遇会好一些。儒家思想必须彻底根除。”

“我也讨厌孔子。”我表示同意。“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儒家思想存在，虽然也许并不明显——它的基础是大家庭，一家生许多儿子，不仅仅是为了祭祀祖先，也为了多一些耕田的劳动力。秦始皇是法家思想，主张用法治取代族阀观念和个人的政治势力。这正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尽管族阀观念正在消除。”

有人告诉我说，秦始皇的位于他的首都西安附近的陵墓尚未发掘。我在 30 年代曾看到过这座陵墓，是个人工堆成的大山丘。延安与长城西北端相距不远，我也到过——那个村庄有个女子的丈夫被拉去做苦工死在长城脚下，她为了寻找丈夫的尸骨而把城墙扒塌了一片。

继秦而起的汉朝维持了 400 年的汉族统治，然后是三国，

直到拓跋鞑靼、匈奴和突厥越过长城征服中国。

唐朝（公元618—907年）恢复了汉族权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唐朝把首都设在西北部，从那里征服了高丽、土耳其斯坦、印度西北部和西藏。（中国人在1949年仍对其中某些被征服领土握有主权。）

宋朝（公元960—1279年）复兴了旧有的中国本土文化，加上缠足、新儒学等等，并吸收了外来的佛教。但是宋朝历代皇帝未能征服东北部辽东半岛的蒙古族契丹人，最后反而被金人长驱直入，把中国一直占领到长江边。而后，成吉思汗和善战的蒙古人建立了从1280—1368年的元朝，建都北京的忽必烈汗不仅统治中国，而且统治庞大的前蒙古帝国，西部疆界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接壤。这个蒙古皇朝开凿了大运河，其目的之一是便于运输来自南面的贡品，因为他们的部队已到达越南、缅甸和爪哇。

中国本土人的明朝（公元1368—1644年）在强大的排外浪潮中兴起。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定都北京，这里的宫殿、寺庙大部分是他兴建的。越南和锡兰都向明朝朝贡。

接下来是倒数第二次外族越过长城的入侵，即满人的入侵（公元1644—1911年）。满人原居满州，1644年入主中国后把满州作为狩猎地，不许中国人大批向那里移居，直到1911年满清皇朝覆灭。明朝亡后有些遗民曾一度征服台湾。

满清皇朝征服了蒙古、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清兵到处，缅甸、尼泊尔、安南（越南）和朝鲜相继朝贡。西方人开始来到中国做买卖。满清同欧洲强国首次缔约是1689年在澳尔琴斯克（尼布楚）同俄国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以第一个在北京派驻常驻中国使团。

最近一次越过长城侵占中国的是日本军队（1931—1945年），他们先征服满州和朝鲜（还有台湾），然后从那里南下。日本还占领了西方在1842—1860年强迫中国人出借的一些口岸。满清皇朝在1868年的天津条约中把阿穆尔河（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全部让给了俄国，以这条河作为满族故乡满州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俄国沙皇从满清帝国手中夺走的这片领土在1969年引起了中苏在边境争端中的真正的武装冲突。另一方面，满族已被中国人“同化”，因此中国人在1945—1949年恢复对自己国家的主权时认为有权领有前满清帝国的版图（不但包括满州，还有其他一些部族居住地），并对西藏行使权力。虽然并无强制性统一的政策，但是现今他们把边界以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通称为“中国人”。中国曾因为朝鲜而进行战争，但是在越南问题上则没有。

中国本土人引以自豪的是自己能“站起来了”，并且自明朝灭亡以来第一次既无外敌入侵，在国内也无外国强权势力。当你琢磨中国人为何拒绝让人数很少且又无害的外国人到他们境内居住和进行贸易的时候，应该记住上述这一点。这里面牵涉到古老的部族观念、民族观念和排外情绪所形成的心理，还牵涉到既明显又实际的帝国主义危险和他们所说的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并不能自然而然解决这一类问题。苏联指责中国人谋求建立帝国，中国也对苏联人提出类似的指责。两国都以“被压迫民族”的代战士自居。苏联感到气恼的事情之一是，当他们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中国人却迅速走入非洲、亚洲甚至古巴，向那里的人民提供援助并从而获得势力。社会主义是一把五颜六色的大伞。

人们在问：中国人有些什么愿望？他们究竟要些什么？我

认为答案是：像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尚在变化中，而美国和苏联如何行动对之有重要影响。在这期间，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相信任何国家或者个人——除了毛泽东，他是中国人为了在世界上取得立足之地而进行的斗争的化身。

我能在寒冷的12月的北风中站在中国的长城上，能使一位人民解放军军人摘下手套走过来同我握手，这并非小事。这位军人是在我已告诉他我是美国人，并问他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之后过来同我握手的。我的两位译员见了大为吃惊。人民解放军军人的脸上是不带笑容的，目光也不盯着外国人看，而是直勾勾朝前望着。我曾接连几天观察北京饭店门口的两位警卫的宛若假面具的脸上有无认识我的表情，但是在朱德将军接见我以前他俩对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午餐时，我们坐在一间接待室里吃自带的盒饭。室内用一只小煤炉取暖，一屋子煤烟味。长桌另一头坐着一群快活的日本人，吃着同样的鸡肉三明治和新鲜的苹果，喝着啤酒。27年前，他们的骠悍的军人曾在长城上站岗放哨，他们的国民曾是一个北起满州，南到南海的不符合时代的庞大帝国的特殊居民。我喜欢这群日本人的外貌，看样子是什么工会代表团的。他们的脸坦率、粗犷，经受过风霜。我很想同他们交谈，但是和在中国所有地方一样，我们连目光相接都小心避免。

我们上坡到了一家主要出售新鲜水果和各种糖果的商店。在中国，这就算是游客歇足的地方了。我怀着不可能再来的心情最后望了一眼长城，看到除了那群日本人外还有许多蓝衣服的中国人朝山顶攀登。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中

国人除了到不多几处宗教圣地朝山敬香外，很少有人到长城或者中国其他任何名胜古迹旅游。那时生活不安定，时世不太平，旅费也太贵，何况新的自豪感尚未重新萌发。长城的瞭望台上已不复有报告外敌入侵的烽火升起，但是在这里你能感觉到真正的“中国的灵魂”（这个词我在30年代是决不会使用的），这就是长期被禁锢在一道道高墙内的中国人正在试探性地走向外界的精神。秦始皇修筑了长城，而毛泽东已把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从长期同外界隔绝的蛰居状态中解放出来。

真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的？在以前那些根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中国人心地善良，毫无坏心眼，既不可憎也不憎恶别人，对社会，甚至对外国人都没有敌对情绪，虽然他躲在墙内不出来，只让你站在墙外。我喜欢中国人那种只管自己的事，不去干扰别人——即使是紧邻——的淡泊、富有涵养的处世方式。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失常。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之间是友爱的，彼此越亲近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说来并不是痛苦的考验。中国人口这么多，要不是有这个特点，生活早就不堪设想了。打个比方，中国人像北极的旅鼠，不像关在一只拥挤的笼子里走投无路自相残杀的耗子。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

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

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好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我在想起我见过或者认识的中国人的时候往往不禁独自微笑——我喜欢他们。我在想起在法国的法国人或者在日本的日本人等等的时候不会浮起这样的微笑。初次遇到一个中国人有点儿像到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镜子后面。他们用试探的眼光望着你，想同你结识，但是不会主动找你说话。

中国人是朴实的民族，然而爱绕着弯动脑筋，因此为人谨慎、多疑，通常并不天真，不容易相信人。

我们乘吉姆车离开南口的长城前往明陵。两地相距不远，但是从时间跨度上说，是从中国在长城以内开始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的 2000 年前，进入了最后一个中国非外族皇朝明朝。在满人攻克北京以前，当中国汉人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时候，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自杀于北京煤山。

到达明陵前要经过的大道两侧立着一具具石象和其他各种石兽。从前，入口处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和一座庙，后来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拆毁。

明朝把皇陵建在这一片地方是因为按从前迷信的占卜说这里是风水吉地。至今为止开放的只有一座陵墓，是 1956—1958 年发掘出来的明朝倒数第四位皇帝朱翊钧的墓。朱翊钧死于 1620 年，终年 56 岁。他在 1572 年登上龙位，从 1584 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6 年完工，耗资 800 万两白银。

“当时国民收入一年只有 400 万两，”我的译员愤慨地说，“造这座墓花的钱用来买米的话够 100 万人吃上 6 年。”

“朱翊钧之所以几乎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原因也许正在这里。他是 1620 年死的，24 年后明朝就亡了。”

陵门前有几座十分出色的石雕，目的是为了“教育青年”，让他们知道如此奢侈浪费必然引起农民起义。我喜欢这些雕塑上的农民的脸。过去中国的任何雕塑与此相比都望尘莫及。这些雕塑令人兴奋，对中国说来是新的艺术。我喜欢它们所表现的人的荣耀，尤其是在同目前充斥西方的崇尚丑陋、畸形和恐怖的风格相比之下。

墓内的宝物几乎都已搬走，只是在入口处展览着几件，如与这位皇帝合葬的两位皇后之一的头饰。这具头饰满缀翠鸟的羽毛，带晕色的蓝、绿两种颜色之美是我前所未见的。

当时也在参观这座陵墓的中国人很多，都显得很感兴趣。共产党人正式发掘一个“天子”的坟墓是需要真正的勇气的。在这座墓向公众开放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要是换在不久前的比较迷信的时代，人们一定会把这种灾害归咎于北京政府冒犯了天地。

我们从楼梯下到长 87 米、宽 47 米的地下墓室。我的陪同一路走一路告诉我，修筑这座墓共用了 6500 万个工作日，就是说每户人家要提供 6.5 个工人。我没有问清这墓有多深，但是估计至少在 100 英尺左右。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位皇后的龙座大小同皇帝的一样。三具巨大的棺木（一具是第二位妻子的）是木质的，漆着红漆，没有任何花纹。整个墓室内部装饰平淡，与埃及金字塔或者泰姬陵相比可说没有任何艺术特色。

“哦，多美的石板地！”我大声惊叹，随身带着的录音机把这句话也录了下来。地板由类似斑岩的大块绿色石板铺成，衔接得严丝合缝。

象泰姬陵一样，墓室两侧各有一间留给后裔的空墓室。“长明灯”——一具盛油的陶瓷大缸——默默立在前室，灯芯早已随着墓内氧气的耗尽而熄灭。在墓室封闭了三个世纪后被开启时，缸内还有剩油。

我们在下午3时40分回到饭店。一回饭店我就跨进了大浴盆，虽然我并不感到冷。墓室里不但不冷，而且温度适宜——我忘了地下一年四季是恒温的。

我拿起新华社的新闻稿阅读：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中国一位部长会见朝鲜淡水鱼养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

对，还有国际新闻栏：抗议美国轰炸越南……沈阳杂技团结束在加拿大的访问……中国杂技团赴芝加哥……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离纽约回国……中国贸易代表团抵达科伦坡。

北京体育学院

中国共有6所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建于1953年。

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李东敏为首的几个人在校门口迎接

了我。李 64 岁，山东人，说话带有悦耳的北方口音。

当我们在摆着坐垫塞得太鼓的椅子的会客室里坐下来喝茶时，除了我和我的两位不吸烟的译员外人人都点燃了香烟。

“天哪！”我坦率地表示惊异。“你们这个进行体育训练的地方也吸烟？”

“一般说来运动员不吸烟。”我得到的回答的口吻是矜持和耐心的。

我不揣冒昧告诉他们我是卫生饮食的信徒。我还向他们谈到世界上正在兴起天然食品运动，特别是营养价值高的饮食，如运动员应该多食麦芽。

“我父亲也是体育家，”我说道，想使气氛热烈起来，“他曾经当过芝加哥大学女子篮球队的教练。那时我还很小，练体操，是小小的体育明星呢！”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国人的健康全给毁了。”在座的人告诉我说。“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有外国运来的鸦片，造成普遍吸鸦片的恶习。你能看到，中国人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前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我说道，“鸦片害人不浅。”

“现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吸毒。国民党时代没有什么体育。毛主席在 1952 年指示大家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要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甩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东亚病夫’。毛主席以身作则。为了说明他的关心，1966 年 7 月 16 日他在武汉附近的长江里游泳，游了 30 里。在那以前他已游过 7 次。因为毛主席关心体育，群众便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夏天到湖泊和水塘里游泳。1964 年，毛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干部曾到十三陵水库游泳。那个水库是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毛主席倡导下修建的，全部靠工人、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等的义务劳动。我们学院也派了1000人在那里劳动了两星期，干得比谁都好——挑着土筐上坡总是我们的学生第一。

“解放前，资本家只顾自己赚钱，不顾人的健康。现在，在毛主席领导下，青年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变化，都立志献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

听了这些，我意识到了毛泽东的神秘性的真正深度。至少从1936年我们第一次知道他有吸烟嗜好的那个时候起，他吸烟就吸得很凶，然而到了70多岁他仍能在危险的长江里游泳。有他作榜样，谁也不愿批评吸烟的嗜好——甚至在这个体育训练中心。

中国不但不懂得吸烟的危险性，也不懂得核散落物、抗生素、杀虫剂和化肥的危险性。他们掌握了这些现代的东西，然而根本不懂得这些东西的副作用。不过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如此。

中国人对具有麻醉作用的东西容易上瘾——也许是由于某种新陈代谢上的原因，需要刺激。中国整个民族从记不清多远以前的古代起一直嗜好喝茶，现在是嗜烟。茶树和烟草比其他任何作物都更消耗地力，这两种作物正在毁坏大量的农田。

我被带去看了这个学院的模型。北京体育学院占地60公顷，建筑面积64000平方米，学生2000余人，教职员600人（1与4之比）。有一幢宿舍楼是专供外国学生用的。校内有三座体育馆，一座图书馆，一所教职员子女的幼儿园。室外游泳池长150米，宽67米。我们在一个室内游泳池观看了

训练情况。这个游泳池有一面墙壁是玻璃的，可以从那里观察水下动作。当时在这里训练的学生男女各占一半。

校内有专门的乒乓球房，但是著名的中国世界冠军不是在这里培训的。举重也有举重房。我们还参观了篮球、排球以及田径的练习。学院训练项目有垒球、足球（不是美式橄榄球）、棒球、射击、羽毛球、体操，但是没有高尔夫球——“我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网球也打得不多。“打网球花钱多，而且一次只有几个人能打，所以不普及。这种球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所学院培养的是体育教师。申请入学的人很多。“学生由人们推荐，领导批准，要选体格好、能力强、政治觉悟高的。我们喜欢工人和解放军的子女，还有中学毕业后下乡劳动的青年。对申请入学的人，我们要考虑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我院的学生中女生占四分之一——女生学体操好。我们有预备班，还有研究生。学生分两个系——体育系和运动系。”

我们走了一圈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学生对我鼓掌欢迎）来到一间特殊的小房间，坐在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大幅画像下面喝热茶。地上铺着漂亮的绿地毯。

“是的，来我们这里参观的外国人很多，”主人告诉我说，“西德的一个正式的乒乓球代表团现在正在这里。”

我问到了文化革命。

“我们正在进行大批判和改造，正在按照毛主席思想审查教科书和改写教材。例如，这里过去的学制是4年，现在，按照毛主席思想，已缩短为2年。教育需要革命。对，文化革命期间我们这里经历过红卫兵同其他人之间的斗争，不过

现在没有红卫兵了。”

我喜欢这位发言人的性格。他富于吸引力，态度和气，坦率，诚实，说话直爽——山东人往往有这些特点。

“你一定是位真正的革命者，”我说，“我想是老革命吧？”

“我1938年参加革命和入党，在山东泰山打游击。那里游击活动很多，北部和中部也一样。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是1967年成立的。”

泰山是奉献给孔子的山。孔子是山东人。

“运动是最好的友好大使，”我说，“中美和解是由乒乓球运动员开始的，我们永远为此感到高兴。”

“是的，人民之间的来往能粉碎反动派的诽谤。美中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但是过去被反动派隔绝了来往。反动派在美国的统治长不了。我们听说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已经开展起来，还听说有些反动的新闻记者惯于辱骂中国，但是在这么多美国人来过这里以后，公众已经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了。”

运动员的互访是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安排的。主人告诉我，从大约1960年以来，中国同苏联还没有任何这样的来往。

“赫鲁晓夫说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但是，在中国，毛主席说不要躺在过去的荣誉上，要去建立新的功勋。你随时都能看到老干部还在重要的岗位上继续革命。在文化革命期间，有少数红卫兵攻击老干部，但是整个说来这不过是小事，西方报刊把它夸大了。”

“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教学生要有优良的运动员风度——要输得起？”

“是的，我们教学生要输得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反对锦标主义。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政治。我们的方针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是为了锦标。资本家在比赛中损人利己，我们不。”

在我们离去时，这位发言人又重复了一遍同迎接我们时差不多的话：“欢迎你随时到我们的游泳池来游泳。我们不把你当作陌生的外国人，而是把你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愿意到哪里看看都可以。你是朋友，不是客人。你到这里来是对我们的鼓励。”

“我会再来的，来看看吸烟上有什么变化。”我说。我同他和革委会的其他人员一一握手告别。

在乘黑色吉姆车回去的路上，我回想自己如何自幼便相信做什么都要尽力做得最好，相信锦标精神，相信人的成就，相信个人的发展，不仅在体格上，而且在一切方面，虽然我本人并未身体力行。

民族学院

中国存在着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包括汉族即中国本土人在内，中国共有 56 个民族。我参观了有来自 50 个少数民族的 1200 名学生的民族学院。此外，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见见当年他们在燕京大学执教时和我认识的冰心女士和她

的丈夫吴文藻。他俩现在都在民族学院。吴是人类学家，在那里教研究生。

学院大楼落成于 1951 年，从那一年到 1966 年已有毕业生 9300 人。

冰心和一群穿着节日的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学员在门口迎接我们。年已 72 岁的冰心穿的是平常的中山装，也吸烟。她身材瘦小，头脑聪慧、思想敏捷，讲一口在美国学校里学的流利的英语。室内并不暖和，但是她穿着长裤、上装似乎挺舒服。

“你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也愉快，我很高兴。”我说。“我在 30 年代认识你的时候你不但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最美的女子之一，不过那时你身体不好。”

“对，我现在比从前愉快，身体也很健康。我有时去清华洗温泉澡。我们的 3 个孩子都生活得很好。儿子是建筑师，两个女儿一个在外交部，一个在民族学院教书。”

“我还有你的一封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你的丈夫在国民党驻东京大使馆工作。我知道你们已决定回中国。你最近一次到美国是什么时候？”

“我从 1936 年以来没有到过美国。1950 年我本打算去出席一次妇女界的和平会议，但是那时不允许我们入境。”

会客室的窗子很大，家俱一如别处：坐垫塞得太满的美国式椅子和玻璃面的矮几。

我听了介绍。类似这样的学院或学校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院分如下几部分：（1）培养干部的速成班；（2）政治系，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培养的政治方针；（3）语言系，目的是培养译员，分 5 门

专科，即藏语、蒙语、朝鲜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4) 文艺系，分音乐、舞蹈、美术 3 门专科，以便各少数民族按照本身的特长选修；(5) 文化教育课，主要是学汉语和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为学员到本校的其他系学习打基础。有些学员在文化水平提高后到别的学校上学。

干部培训的学制是 1 年到 1 年半，其他科目是 3 年。

我举目四顾，地上铺满了地毯，墙上挂着少数民族的现代风格的绘画。整个气氛不但是现代的，而且是西式的。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招生用什么方式呢？”我问道。

“学院发出通知，由国务院把它传达给各自治区，并且说明入学的条件。少数民族每个省都有，但比较集中在贵州、内蒙、新疆、西藏、广西、青海和黑龙江（吉林）。是的，这个学院的一切费用由国家出——食宿费、学费等等。”

冰心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这个学院。毛主席曾 14 次接见这里的师生。还有一些领导人曾来这里视察——董必武、周恩来和朱德。”

一位学员说：“我们学员很高兴能到这里来。我们学习努力，也很团结。在文化革命以后，我们这里进行了教育革命。是的，现在还在试验阶段。过去这里是从高中招生，现在是从工农兵中间招生，包括已从事过两年生产劳动的人。从前学制是 5 年，现在是 3 年，不过我们还在实验中。在这个阶段，问题当然是有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以求理解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改进教学。”

“我 1937 年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那里的少数民族学校，还给罗罗族、蒙族、满族和藏族的人拍了照。”说着，我取出几张照片作为礼物送给民族学院。“王震送了我一张他

在长征路上同贵州的苗族谈判一个条约时的照片。这也许是长征途中拍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印几张带来。”

在座的没有人听说过这件事，但是严肃、拘谨的气氛活跃了一些。参加谈话的有一位名叫高梦兰的腼腆的藏族姑娘，来自四川，但出生在西康，是8月份入学的，学政治。还有一位藏族男子，不那么腼腆，“汉话”讲得相当好，戴一顶垂着长长的遮耳的皮帽。

“中美之间最好的大使是你们家乡的少数民族。”我说道。“我指的是送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对熊猫，玲玲和兴兴。你们有没有看到过野生熊猫？”

“看到过，”姑娘说，情绪显然轻松了下来。“熊猫在捉到以前都是野生的，现在很少见了，只有在高山上才能找到。是的，当然，我们同所有人一样喜欢它们。”

有位广西大瑶山的瑶族男子相貌很英俊。他来民族学院已有10余年，教瑶语和“汉话”。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是侗族。

“客家人近况如何？”我问道。“我有几位朋友是客家人。”

“客家是汉族的分支，现在不算少数民族。他们属于两广语系。”

有没有种族隔离？

“在历史上汉族历来同苗族、壮族和侗族杂居而且通婚，所以语言也相通。现在也一样。隔离的事从未想到过。当然，统治者曾经挑拨离间，所以民族之间有过不和。过去有句谚语叫做‘汉人的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解放后贯彻了毛主席的平等和团结政策，关系就不一样了。”

除了那位西藏姑娘以外，在座的人都不停地朝寒冷的空

气中喷烟吐雾。所有人的手都很瘦小，不像劳动阶级的手。

“解放后，建立了一些自治区和自治县。1958年起建立了公社。”

我们谈到了节制生育和火葬。“不，我们不鼓励节育，也不实行火葬，”侗族男子说。

“是的，少数民族人口太少，不需要节育。”我的译员指出。

我听到的介绍说，有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100万，广西和云南的壮族有700万人，但是黑龙江的赫哲族（鱼皮鞣）只剩下了500人。

冰心解释说：“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6%，土地占50—60%，全是山区。”

穆斯林和满族讲“汉话”，其他少数民族则使用本族的语言。“解放后推行拉丁化拼音，有10个少数民族有了文字。”

一位穿浅蓝和白色丝绸服装、相貌端正的朝鲜族男学员说，他来自吉林，是朝鲜族。我告诉他，我发表过一本关于一个朝鲜人的书。他对我说，朝鲜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我由大家陪着参观了大楼。楼内有一个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面瑶族的鼓，已有1000年历史，上面有蛙形花纹。有一幅照片是一具在云南出土的2000年前的铜罐，是装贝币用的。还有一幅乌苏里江畔穿着鱼皮制的服装的鞣鞣人的照片，挂着节日时用的很大的银项圈。

还有一幅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员的照片，上面有一位队员是当时这个学院的藏族学员。“毛主席接见了他们。”主人自豪地告诉我。

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的四川省毛尔盖”的照片，还有学院的一位美术教师画的1934—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彝族（罗罗族）等10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图画。馆内还展览着罗罗族的服饰。

展品中有昔日西藏的刑具以及藏民用来抗击英帝国主义的武器。

还有一幅洛尼尔·托马斯在中国的照片，说明上写着此人是披着普通人外衣的美帝间谍。

陪我参观的人中间有3个是中共党员；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党，所以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临别赠礼，学院送了我一件前胸有一长排钮扣、带着一条桃红腰带的上衣。他们告诉我这是云南哈尼族（不知是否就是罗罗族）的服装。

这些部落从原始的氏族公社没有经过多少年其他过渡阶段便进入了地区性公社。中国人的发展也近似这种历史现象。少数民族并没有受到要把他们同化或者要他们全部放弃自己的文化的压力。中国歌舞表演中的“少数民族”服装和舞蹈给我的印象很深。

芦沟桥农业公社

我要求去看看马可·波罗桥（芦沟桥）的公社，因为我前些时候看到新华社消息说那里有“工业合作社”。

我们一早便乘吉姆出城，车行 10 公里到了桥头。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对华战争。

我们下车从这座有历史意义的桥上走过。桥身和雕刻着各种图样的美丽的石栏杆仍然完好。由于天旱，永定河水位很低，但河床宽阔。在 30 年代，从桥上经过的骆驼很多，甚至交通为之堵塞，我听说现在除了山区外这个地区已看不见骆驼。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辆载满军人的军用卡车。

在快上桥的地方有一堵古城墙，墙上有门，据说是最初的北京城墙和城门，但是我以前没听说过。桥的两侧都属芦沟桥村。

我们在 30 年代去马可·波罗桥只能骑马从田野上过去，经过农田时还曾付钱给农民。我还记得，那些农民的水井没有井栏，不小心的话马蹄可能踩到井里去。旧的京汉铁路还在，但是 1964 年已新修了一条铁路。我当年骑的那匹小马一看到或者听到火车来，总是带着我扬蹄便跑。他脾气犟，我拿他没办法，他也很明白这一点。我们当时是去进行有名无实的打猎，做领队的是白俄斯佩什尼夫上校，他想抓住“先生”（我骑的那匹蒙古马的名字），结果是白费时间。因为这匹马是训练来赛跑的，不是当坐骑的，所以越追它跑得越快。也许是机车上的中国人看到了马背上的外国人，反正，他们在这段路上不停地拉响汽笛。

从那些类似打“纸老虎”的打猎的往事，我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已没有赛马（除了在蒙族或者其他边境居民中间）。就速度而言，中国人正在从独轮车直接走向喷气飞机。

从前，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把进行比赛的赛马养在马可·波罗桥附近的跑马场，那里有马厩和跑道。公社里有些老人

还记得这事，就如 30 年代我们同一些农民交谈时他们对 1900 年的义和拳暴动和北京城里一些外国人和基督徒被杀的事仍记得很清楚一样。1949 年以来没有任何外国人被杀，至少新政府并未有意杀过任何外国人——除了一个犯了刑事罪的欧洲人。

在驱车进村的途中，两位译员向我介绍了这个公社的背景。

“首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只要愿意劳动也能分到一小块地。

“第二阶段是成立互助组，因为小农抵挡不了自然灾害。合作社先是初级形式，土地作为入伙的投资，然后按照土地投资的多少以及劳动的多少和好坏分配收入。到了 1955 年，中国农村全部实现了合作社。

“高级农业合作社不计算财产投资，只按照劳动量分配收入。

“1958 年开始大跃进和建立公社，这是必然的结果。例如，水利必须统一规划，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农村地区建立公社的条件的成熟，成立公社的思想迅速普及。农村需要兴办大规模的工程，越大越好。毛主席立即肯定了这个新方针。我们不知道大跃进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是从农民自己开始的，他们想尽最大的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三级形式：（1）生产队；（2）由生产队组成的生产大队；（3）公社。每个生产队是一个核算单位。于是，生产发展更快，规模更大，经济核算也更合理。

“公社不同于高级合作社，因为公社既是行政单位，也是政治单位，是最基层的政权结构。除了农业，公社也更有

利于发展工业和根据自然条件全面发展当地经济，如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副业。公社还提高了教育、商业和战备的水平。”

“公社是不是同合作社一样有基本章程和法规？”我问道。

“有，公社有章程，但是还在试验阶段，条例尚未公布。”这是我听到的答复。

（后来，我想要一份中国公社的规则和章程，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向外宾提供，还说中央政府把这作为整个法制的一部分，但是每个公社有一定的因地制宜的决定权，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表决决定自己的规则。）

我们在大院即办公处门口受到接待委员会的热情欢迎。院内有一间大房间，很干净，屋角的一只小煤炉驱散了寒意。墙上有一幅罗马尼亚地图，室内几张有玻璃罩的桌子上陈列着罗马尼亚的工艺美术品，是送给这个公社的礼物。这个公社名叫中罗友好公社。中国还有几个公社是以同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古巴和柬埔寨的友谊命名的。这个公社的社员经常写信给罗马尼亚，公社主任还在1971年访问了罗马尼亚。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也曾去罗马尼亚访问。

“有没有别的外国人来参观公社？”我问道。

“有。有位叫高尔斯顿的美国人，耶鲁大学的，今年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村里住了两星期。今年9月欧文·拉铁摩尔来参观过。以前还来过几位美国著名医生——怀特医生，罗森医生和夫人，还有一位卫生专家，好像是叫什么塞德尔。近年没有别的外国人在这里住过。”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路易·艾黎。在场的都说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公社。”当我们对着一杯杯热气腾腾的茶围坐在长桌边的时候，我说道。“我特别要求来看看，因

为我看到了关于你们搞工业的报道，而我从30年代以来一直对中国的乡村工业很关心。”

既然他们连路易·艾黎这个人都不知道，我想对“工业合作社”还是不提为好。

公社主任是位女的，但是她没有参加座谈。主持座谈的是办公室副主任，男的，戴着帽子，穿的是军服。他不用讲稿，发言如下：

“我们的名字叫芦沟桥人民公社。伟大领袖毛主席1958年8月13日曾到这里来视察。我们在1958年8月19日成立了公社。现在公社有社员10700多户，人口4.6万人，面积53.5平方米（原文如此，疑为平方公里之误——译注），其中可耕地3.7万亩。我们公社有21个生产大队，143个生产队，8座小工厂。我们主要生产蔬菜供应北京市，每年还向政府供应2万头猪，是交售的——不是白给。

“我们用现款向政府缴税2.5%。全国公社都一样，只是生产粮食的公社税率低一些。

“从公社的平均水平来说，我们公社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

“除了蔬菜，我们也种粮食（粟、稻、麦）。1971年我们养了12万只鸭，生产葡萄和梨38万斤。

“因为组织形式好，我们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从1949年土地改革起，经过互助组、高级合作社，到现在的公社，我们的产量不断上升。

“请看这些数字：1949年我们蔬菜亩产只有2000斤，1957年亩产5000斤，现在达到亩产1.1万斤。

“粮食产量：1949年亩产100斤，1957年亩产400斤，

1971年达到740斤。1958年以前我们根本不种水果，1958年以后我们利用荒地种果树，现在有果园3000亩。

“产量是怎么增加的呢？首先，我们解决了水的问题。我们使用了水车，现在我们有机井537口。我们还利用钢铁厂的废水。老的井我们已经不用，新打了537口机井。我们的农田已全部能引水灌溉。

“第二，机械化起了作用。过去用锄头犁耙，现在我们有大型拖拉机30台，手扶拖拉机68台，全部国产，洛阳造的。

“第三，运输条件改善了。过去用扁担挑，手推车有也不多，现在我们有卡车68辆，马车930辆。”

所有的人都身子微微前倾带着自豪的神色听他讲话，一面吸着香烟，喝着桌上塑料盖杯子里的茶。我抬头望望墙上一大张毛泽东画像，低头看看铺着新式的西方式的地板。

“教育怎么样？”我问道。

“我们现在有5所中学，18所小学。解放前这个地区一所中学也没有。现在年龄大的人也能上学。我们已规定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前年和去年从我们公社去上大学的有20多人。

“我两个女儿都上过干部学校。”

“北京附近有多少个公社？”我问道。

“有25个，但是供应蔬菜的只有10个。我们公社每天向城里供应蔬菜，但是每到4月、8月和9月往往供不应求，所以需要改进生产，需要多用科学方法。我们粮食产量赶不上山西的样板公社大寨。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他们靠自力更生获得高产。我们像毛主席所说的，有成绩也有缺点。”

他讲话的时候，窗外屋顶上有只公鸡昂首啼叫。

我发现桌上人人都戴着手表——我从前来中国时见到的戴手表的人极少。（后来我又发现，只要我注意，几乎人人手腕上都可看到手表。）

“你们的手表是从哪里买的？”我问道。

“从附近的商店。我们公社有许多商店卖日用品和粮食。解放前我们要买东西必须进城，不过那时我们也没有钱。”

（后来我们参观了一个商店，店内供应的商品有 1600 种，包括一台电磨和质量很好的绸缎，旁边人告诉我这是做被面用的。食品店有 250 种货物。店里除供应猪肉外，还卖公社饲养的猪。时值 12 月，暖房里还生长着黄瓜和西红柿，稻子也正在收割。）

我们乘车到不远处参观岳各庄生产队。我问了一下，一个生产队约摸等于一个村，而且，同从前一样，许多人的姓相同。

这个公社的土壤总的说来含沙多，但是东部土质优良。时值冬季，有专门的积肥队收集人粪作为明年的肥料。“不，我们不大用化肥，只用一点儿。”他们回答我说。因为靠近大城市，人粪来源是充足的。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在中国，养猪通常是女孩子的事。我注意到，她们系着干净的白围裙作为防止传染病的象征。公社“今年”养猪 5.7 万头。

社员收入一般是一年 600 元人民币，有的超过 700 元。每户人家有一小块自留地供他们自己使用。住房不用出房租，用水也不花钱。“物价稳定，生活有保障”，这是公社里的口头

语。“我们是在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

村里的房屋建筑一如往昔，唯一不同的是用作公社办公和公共服务的房子全是新式的，通常是砖房，不用土坯。这类房子包括兽医站、卡车和拖拉机运输站、“良种推广站”和农机站等等。

一如中国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每户人家都围着高高的土砌的院墙。坟堆并未犁平，死了人也不实行火葬。到了春季，还有人到祖先的坟上扫墓，但是“这是为了记住过去的苦日子，不是祭祖”，有人这么告诉我。“年轻人连什么叫祭祖也不懂。”

到处可见到栽了不久的幼树，尤其是道路两旁。

我们访问了一位身材瘦长但是筋骨健壮的农民的家。他和他妻子都是50刚出头的年纪，粗黑的脸上都洋溢着真正感到生活幸福的喜悦。主妇领我看她家院子的时候用手（粗糙有力的劳动的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使我确实感受到了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真正的中国。

院墙内有一个装满白菜的菜窖，是往地下挖一个深坑，上面用稻草和泥抹成圆顶，造得很灵巧。墙的一角是猪圈，收拾得很干净，一头好看的社会主义的肥猪正在吃特别为它种植的猪草。一畦大蒜用稻草覆盖着，几瓣收下来的蒜头挂在屋内。

屋子盖在院子里朝阳的一面。我没有发现这房子有哪里称得上好，直到主妇说道：“从前我们住的是小土屋，成立合作社以后我们收入多了，才有钱盖了这房子。房子是我们自己的。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永远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

房子是砖砌的，比较旧（我怀疑是不是从北京城墙上拆来的），有三间房，比中国常见的大一些。屋顶铺着瓦，但是地是夯结实的泥土地。三辆自行车停在专门为它们搭的车棚里。

屋内墙上挂着他们家7个子女的照片（其中两个在工厂里工作），还有一张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大画片和一张在中国各地所有农民家里都能看到的毛泽东像。在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也是在中国各地都能看到的画片——两只熊猫。在玲玲和兴兴送给尼克松总统带去养在华盛顿动物园以后，熊猫大出其名。

木制家俱寥寥无几，不过几只箱子、一张桌子和几张有背和无背的凳子而已。一只比较高的衣箱上摆着几件老式的瓷器和两只瓷熊猫，还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只闹钟。墙上挂着一只扩音器。窗上没有窗帘。

“是的，我们喜欢电视。生产大队里有两台，”主人告诉我，“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

中国北部所有家庭里用来睡觉的仍然是炕。炕是砖砌的，上面没有软垫，只铺一张苇席。炕内有通烟道，把炉灶的热气通过来取暖。在农民家里，表示奢侈的是“被窝”的数量和质量。一条条“被窝”叠着摞在炕的一头，花花绿绿的缎子、织锦和绣花被面的被子越多越体面。如今缎子在中国的用途就是做被面，不是做衣裳。枕头也是一种讲究的陈设，小小的，绣着细巧的花样。

我的中国话恢复得很快，所以走到“被窝”边数了起来，从1数到11，全是颜色可爱的丝绸被面。两位主人显得很得意。（主妇这时再次握住我的手，捏得紧紧的。）我没有问这

条长炕上睡几个人，但是想必为了暖和起见全家人都紧挨着挤在一条炕上。中国人把被子叠得像睡袋——睡觉时透开一面，钻进去一转身把自己包住，只是开缝处是在背后，如果夜间被子给蹿开了缝的话。

在无产阶级国家看到这种摆阔使我有些意外，但是在所有的火车上和饭店里都用缎子被面和绣花枕头。

“你参加共产党了吗？”我问男主人。

“是的。我们这里有 1200 个党员。”他答道，确实充满了自豪。

“我们生产队有 4 个党员，但是我不是。”女主人说。“我那个队百分之四十多是妇女。”

我爱这两位华北人诚朴、开朗的脸，爱他们对我的看来是真实的热情欢迎。我常常带着笑容想到他们。我为他俩照相时，看得出这是一对真正幸福的夫妇。“能不能让他俩再接近些？”我问译员。“哦，不行，不合适。”她吃了一惊。

这是华北冬季的一个晴空无云、阳光明亮的日子，所以我们在村里信步走走看看，经过一个个洞开的院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时我总不免朝里望上一眼。有所宅院看上去是新盖的，我要求进去看看。这户人家的男主人今年 62 岁，管理着公社使用电磨的面粉厂，年收入超过 600 元。“1 个月 50 多块钱。”主妇热切地告诉我。她的脚看得出是缠过的。

“我们每月工资也只有 70 元。”一位译员在旁注解，要我知道中国已多么民主和平等。

我看了看菜窖、猪圈和扫得很干净的院子（也是踩得很硬的泥地）。墙角堆放着一堆堆散发出清香的新稻草。屋内有一间房间铺着砖地。一大幅毛泽东画像和一张《白毛女》大

画片下面的桌子上摆着一件《智取威虎山》的瓷摆设。这户人家有一座大挂钟和一台电风扇，一张雕花柚木长几上还有几盆鲜花。

里屋的炕上坐着一位穿着老式的农民扎腿裤的老妪，是男主人的岳母，双足也是缠过的。

“没准我们曾经见过面，”我说，“从前北京常有外国人出来骑马穿过农田到芦沟桥去，你还记得吗？在30年代我常常骑马到这里来和人说话。我们还在跑马场骑马，那里有赛马的大道。”

“对，我记得有外国人骑着马从地里过去，”年老的农妇说道，“那事儿离现在还不算太久。”

“跑马场从前是荒地，现在开出来种菜了，也种别的庄稼。是另一个公社的地。”一位陪着我参观的人说。

在30年代，没有任何农民愿意让陌生的外国人进自己的院子，我们只会招来警惕的眼光，当然我们也决计不会谈论苏联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村子在30年代贫穷至极，哪怕我们只花一个铜板向他们买柿子，或者打猎的领队因为马匹踩了他们的耕地而大方地给他们几个钱作为赔偿时，他们都感到高兴。

我不禁想道：这个老妪不但记得当年的事，兴许她的父亲还是1900年大杀外国人和基督徒的义和拳里的人呢。谁知道？中国向外国势力开门以后，没过多久又在1949年向外国人关上了门，其间只经过了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长的时间，也许还不到。

生活在用泥土垒成的房子里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就像住在山洞里，或者像男女孩童喜欢做的那样只是坐在一个山洞

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一样，是一种本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学会了生存的秘密——住在四周垒起围墙，把土地搞得结结实实的院子里或者村落里，用双手制作器皿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古代的氏族公社与1958年农民们参加的区域公社并无很大不同，1949年以前的农具与古时候铁器或青铜时代的农具——金属制的锄头和金属包尖的犁——并无很大不同，古老的儒家的家庭和氏族制度至今也仍然存在。这儿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养猪文化——只是如今为了节约粮食已不允许养狗。猫也很少，即使养猫也是要它们为实行社会主义而捕捉啮齿动物。

这些中国村庄富有魅力，也是摄食天然食物的极好去处。尤其在收获季节，那时屋顶上晒满柿子，屋檐下垂着一串串红的绿的辣椒。中国的人民也富有魅力——他们天生懂得如何尽可能使自己具有魅力。

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麦迪逊的外国人坐在一条炕上同一个中国农民讨论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新事；村办工业并不是新事，它是中国文明赖以保持其生存的主要特点——但是用电动机取代体力劳动和手工制作则是新事。最重要的是法律原则取代了族阀主义和对个人的忠诚。合作社有它的法规，但是公社尚在试验阶段。共产党取代了族阀主义和家长式权威。根据儒学，不能有个人存在——每个人都是家庭和氏族结构的组成部分；按照社会主义，个人要努力摆脱这种家长统治下的子女地位，成为大齿轮上的一个小齿轮，成为大集体中的一分子。他仍旧不是自由的，而是被系在土地上和集体内，因为除非组织允许，他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职业或者迁移居住地点。

物质条件并未起多大变化，只是生产物质的制式变了，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话，决非易事，甚至不可能——一切条件更便于建立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进行的革命（即变革）要比建立社会主义更巨大得多。

中国领导人在同我谈到农业问题的时候对我说：“农民的精神状态与过去不同了，但是，为了防止倒退，他们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

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建立公社，虽然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城市里建立的是市政府、革命委员会和街道、里弄组织。

在华北农村的一个下午

我们午饭吃的是中国北方饭菜，同西方人吃的并无多大不同——饺子、白菜、豆腐、加葱和大茴香一起炖的牛肉和鸡。从前，吃饺子对穷人说来不啻吃宴席，是一年一回的奢侈。饺子类似意大利的“拉维奥利”和俄式的“匹劳什基”，传说意大利那种包馅面点的制作方法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饺子用剁碎的肉加上葱、鲜姜和酱油等作料做馅，用一个个小面团擀成薄片把馅包起来，捏紧，放在沸水里煮熟。在美国的中餐馆菜单上一般找不到这种食品，但是可以预定。饺子做起来很费事，但是是世界传统食品之一。

炖牛肉是我爱吃的菜。把牛肉切成薄片先用油煎一煎，然

后加上酱油和些许水，再加上一茶匙（多一些也行）大茴香子用文火炖，炖时要加切碎的蒜，越多越好。

我发现公社社员通常在自己家里吃饭，不过有些公社有食堂，即公共就餐的饭厅。

我一直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天天吃蒜，不料我的译员根本不吃，虽然我吃的时候她随我的便。吃蒜的好处很多，其一是能防感冒。到了冬天，蒜能给你提供你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也许没法得到的多种维生素和酶。我深感不吃蒜的人生病或者不舒服是活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在1937年因为患营养不良和痢疾需要住院治疗而离开北京的几天前才学会吃蒜的。要是我先就像中国人那样吃蒜，不至于落到那种样子。

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谈芦沟桥公社的历史。下面是我听到的介绍：“是的，我们公社里仍然有阶级斗争。解放后，地主给打倒了，但是旧思想还在。在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成立合作社的那会儿，他们破坏合作社。以前的地主、富农现在用隐蔽的手段腐蚀农民，扰乱农民的思想。

“是的，他们在公社里仍旧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推翻了地主，但是他们人还在。他们只要好好劳动，也像别人一样能多得工分。

“在1949年，八路军包围了这个地区。傅作义将军率领敌军投降了，所以这里没有打仗。但是，在土改的时候，生产大队里的地主反对土改，于是发生了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这里分两派，一派说只有他们是革命派，这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那时，干部不受信任。现在我们把干部送到干部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每期1个月，我们轮流着去。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今年9月也进干部学校学了1个月。

“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开始成立，是社员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前公社由管理委员会领导，也是选举的。干部的主要问题在于缺少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直到进干部学校学习了才有了这种觉悟。”

我问到了旧式家庭制度。

“我们还是的家庭，而且是大家庭，但是革命并不鼓励大家庭。我们拥护计划生育，大多数人在原则上接受。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拆散过家庭，现在也不设食堂，家家户户在自己家做饭吃。”

“是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正在消除这种危险。”

“我看到了几个军人。这里还有军队吗？”我问道。

“没有。你看到的是来作客的。从1966年到1971年底我们公社有军人，现在没有了。这个公社没有实行过军管，也没有红卫兵来过。”

午饭后，12位欢迎者中间有几位回去工作了，我去参观公社的工厂。

“我们的工业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的，”副主任告诉我，“现在由公社经营。我们公社由5个合作社组成。在合作社成立以前已经有一个小型工厂。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成立公社的号召，把5个合作社合并起来成了公社，合作社名下的工厂也全归公社经营，是集体所有制。我们在工厂里也实行计分制，到了年底按股分红，不是按工分计算工资。”

我听了感到糊涂。他们告诉我说工业合作社同集体所有制工业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我在广州和其他地方也听到过这种解释。可是，股份同工资是很不一样的两

回事。

我们看了几种工厂——一所修理卡车、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修理厂、一所木工厂、一所农具厂和一所烧石灰和砖的砖瓦石灰厂。像中国所有地方一样，工人们见客人来到便暂停手上的工作站着鼓掌欢迎，兴奋得发红的脸上露出因有人关心他们的工作而感到欣慰的微笑。我参观的工厂几乎全都有男工也有女工。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有机床都在转动的“发动机厂”。它年产电力发动机 2000 台，主要是农业用的。公社在 1970 年才开始制造电力发动机。现在公社使用的机械绝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对我说来这是非常重大的时刻，”我对工厂革委会的领导人说道，“我在 1938 年就认为中国应该在农村兴办这样的工业，所以我花了 10 年时间为建立工业合作社筹集经费。”

我最喜欢看的是所谓“后院炼钢炉”。当红亮的铁水在人工操作下像一股细流缓缓流出来的时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在工人操作的场院里同所有满身污黑的工人一一握手，我因在中国的这种问题上花费了自己的时间而积郁已久的怨气顿时消除了一些。

我注意到有几个妇女戴着布帽在从事制作简陋农具的又脏又累的劳动，虽然她们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兴奋，但是在不停地敲打的铁锤后面的脸容显得疲倦和未老先衰。

“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主任说道，“这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方针的成果。解放前这些工人什么都不懂。”

“新英格兰在早期也采取这样的政策，”我说道，“埃默森有篇写‘自力更生’的文章，在美国影响极大。新英格兰

人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向人乞怜或者伸手要外国援助。他们白手起家，靠的就是小小的炼铁炉、铸铁厂、炼铜厂和各种工场。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也在走美国清教徒开拓者初期所走过的路。我认为你们自力更生精神越强越好，清教徒思想也越多越好。”

这些充满烟雾和煤炭的工厂没有安全生产或者空气净化化的设备，虽然我在中国有一次也曾看到过一座把金属细屑吸走的抽风机。但是，同 30 年代的虽生犹死、成天无事可做也无事可想、呆坐着消磨生命的人们比起来，这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

（无论你到哪里参观，结束时人们总要求你为如何改进工作提出建议。我郑重其事说了一些意见，建议让工人戴护目镜和白色棉口罩，以防吸入较大的金属颗粒和煤灰。我没有提开放式的机器应该配备安全保护设备的问题，中国人在机器旁边来来去去灵巧得像猫。我听说事故很少。）

中国今天在尽可能实行权力下放，让基层享有自治权。这个公社的每个工场或工厂都有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发动机厂有 96 名工人（47 个男的，49 个女的），平均年龄 23 岁，实行计件工资，平均月工资人民币 50 元。他们在 1972 年（疑为 1971 年之误——译注）生产铜线圈 420 万个，1972 年增加到了 500 万个。

每到冬天，公社工厂里的工人当然比平时多。我听说有时候公社工厂在冬季能得到国家的帮助。另一项冬季工作是为建筑工程准备石料。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公社改善了生活条件，人口在几年内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妇女劳动力也第一次得到了解放，能

用于生产。这个公社有 147 个日托幼儿园。有了幼儿园，做妈妈的就能参加劳动。在中国，通常由奶奶照料孙儿女。路易·艾黎告诉我，他到各处旅行时常常看到农村里有 5 口之家，其中有一位是祖母。

我们参观了卫生所。它是一座大约一年前盖成的两层楼砖房，里面基本上是女人世界。我看到产科病房里有两个新生儿并排躺着，身上裹得紧紧的，都张着嘴哭得小脸通红。婴儿第一眼看到的是毛主席像（这座房子里每个房间都有）和几盆鲜花。这里也鼓励节育，还提供避孕手段。

所内也有手术室，一位男医生在当班。

“这里的多发病是什么？”我问道。

“多半是伤风感冒和眼病。肺结核不多。伤寒在解放前很多，现在已经绝迹。”

这个卫生所最骄傲的成就是它的药房，中、西药共有 500 多种，主要是中草药。它有自己的种植中草药的药圃。负责药圃的两位姑娘给我看她俩发明的玻璃容器，还要求我为它们拍张照。我从命了。

这个卫生所很大，有 13 位“赤脚医生”——不过是穿着鞋的。他们之所以叫“赤脚医生”，是因为他们是只受过不完全培训的医务工作者，经常要下乡去服务，必要时还须参加生产劳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位“赤脚医生”，每个生产大队有一个卫生所，配备六七位“赤脚医生”；每个公社有一个中心卫生院。这些所和院为增强人们的体质和促进生产做出了贡献。

“文化革命前把医疗力量大部分放在城市，忽视农村。我们批判了这条路线。我们现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加

强为农村服务。我们在 1970 年 4 月开始实行集体统筹医疗制，大医院帮助我们培养了 450 名‘赤脚医生’。”

卫生院的过厅甚至房间里充满了一种我从未闻过的难闻味道。人们告诉我这是消毒药水的气味，可是我想是 DDT 加上别的什么杀菌剂的味道。我开始淌眼泪流鼻涕，在楼内边走边咳嗽。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我不时咳嗽流鼻涕，直到回国才好。我当时想我是在这个卫生院里感染了什么疾病，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过敏，虽然我平常并没有什么过敏的毛病（除了青霉素过敏）。我现在怀疑原因在于那个地方洒 DDT 和别的同样有毒的杀菌剂洒得太多，因为后来我听说中国习惯于在厅堂甚至饭店客房里喷洒这种消毒剂，以致许多外国人闻后也得了病。

12 月 23 日

红星公社和那里的一个美国人家庭

在一个朔风凛冽、尘土飞扬的早晨，为我当翻译的邓秀梅和我坐上黑色吉姆轿车前往离北京约 20 公里的红星公社。路上遇到一处由军人站岗的路障，在出示我们的特别通行证和我的护照后才通过。我们走的是通往南苑——那里至少在 1911 年以前是满清皇室的狩猎场——的路。圣诞节快到了，

我要去红星公社拜访已在那里住了一年的寒春^①一家。她的一家我以前从未谋面，但是我认识她的哥哥——曾写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的韩丁。韩丁在1946年作为联合国的拖拉机机械师第一次到中国。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工作后，他到华北革大担任英语教师，在1948年春季和夏季边教书边研究山西太行山附近的一个村庄的情况，并根据调查所得写了《翻身》一书，是关于土改时期的真正的学术著作。他已回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利特伍德经营一个农场。

在乘车沿着铁路线行进途中，我看到一辆辆敞篷卡车把猪运往北京市场，还有农民把农产品送往北京。我的译员告诉我，国家的政策鼓励农业多方面发展，既种粮食也生产别的产品。红星公社主要种粮食。为了促进生产，他们以粮食为主，兼营林、牧、副、渔。我看到一道水渠里生长着少许好像是水葫芦的植物，但他们不用这种植物作肥料。

公社主任和寒春在门口迎接我。寒春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袄棉裤，高个子，金发碧眼，看上去身强力壮，很精神。

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我们是7个高级合作社合并成的，”主任介绍说，“因此发展很快。我们共有1.6万户人家，7.7万人口，可耕地1.08万公顷。遵照国家政策，我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副、渔，还搞工业，发展多种经济。我们主要种粮食，有稻田5000多公顷，其余的土地种麦子、玉米，还种少量的大豆、白薯、牧草、蔬菜和棉花。

“公社的组织分三级，就是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我们有9个生产大队，一共120个生产队。核算单位是

① 琼·欣顿·恩斯特·阳早之妻——译注

生产队。”

“为了发展畜牧业，我们有两个种马场。我们公社有 3200 头奶牛——荷尔斯泰因奶牛——和 4000 头大牲畜，其中马 2300 匹。我们有 3 个养鸭场，生产的填鸭销往北京和国外。猪由生产大队饲养，去年全公社饲养了 5.5 万头杂交猪，叫‘北京黑白’（我在参观时问了他们，他们说这种猪不是波兰猪与中国猪的杂交品种）。我们还饲养伯克夏猪、约克夏猪和本地猪。”

走在路上，我注意到这里用的砖有些是北京城墙的砖。

“这里土质好吗？”我问道。

“这里的土壤碱性大，含沙多。在满清封建社会里，当官的把这里作为狩猎场。解放前这里平均每公顷土地生产 700 公斤高粱，而 1971 年我们的粮食平均产量是每公顷 5500 公斤。稻子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 5700 公斤，最高达到 8500 公斤。解放以来产量提高了七八倍。”

“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我问道。

“我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增加施肥，改进落后的农具，因此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成立公社以后。”

“我注意到灌溉渠，”我说，“这里 30 年代很少见到水渠。”

“我们公社的灌溉面积达到 90%，机械化达到 70%。”

“这个公社同别的公社比起来怎么样？”

“我们进步很大，但是同先进公社比起来还不够好。我们公社规模大，但是产量属于中等。寒春同志和她的爱人到山西参观过样板社大寨，他们的条件比这里差，但是产量比我们高，玉米、高粱和麦子平均每公顷产量 7500 公斤。”

“也许大寨的土质像西北许多地方一样，是饱含有机物

的黄土，”我自言自语，“那种土壤肥极了，只要有水就行，地力用不乏。”

我们到公社各处参观。公社有一个机械修理厂，一个粮食和饲料加工厂，一个用稻草做原料的造纸厂，一座砖窑，一个制造螺丝钉和缝纫机部件的厂，一个为电线涂包塑料的厂和一个主要生产氨水的化肥厂。（公社也使用动物尿素做肥料。）

我们谈到了有机肥料。我告诉主任可以种水葫芦积肥。无论他还是寒春，都不大了解现代的有机物概念。

我们参观了学校。公社有 10 所完全小学，70 所初级小学，一所初中，所有孩子都在这些学校上学。“解放前我们这里只有很少几所小学，没有中学；绝大部分人是文盲。”

在医疗方面，政府派来了赤脚医生，但是每个生产大队有一个卫生所。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人民币的医药费，此外治病不要钱。

这位公社主任今年 27 岁，兼任革委会副主任。公社共产党党委下有党员 2300 人，其中约 1/3 是女的。公社的那所中学现在仍有红卫兵，寒春的儿子在文化革命期间也是红卫兵。

我们到阳早家吃午饭，饭菜是从公社食堂买来的。他们家在一幢楼房的底层，房间大约是两间，同公社干部家一样，只有几件简陋的中国式家俱。起居室里一张大床上靠边叠着几床“被窝”，窗台上摆着几盆仙人掌，墙上一大张毛泽东在写字的像片，书架上有一些书，其中有一两本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著作。

“想当年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用这样的煤球炉子。”我说，一面摘下手套。谁也没有脱掉室外穿的厚外衣，只脱下

一些小件的东西，如寒春头上的镶皮帽子（我的帽子还是戴在头上）。

室外的中国式厕所（没有马桶的厕所）很干净，消了毒，令我意外的是门外还用英文标明了“男”和“女”。

“我母亲不久前带了一批美国男孩女孩到这里来住过。”寒春说。

我已听说过欣顿太太带了一批黑人和白人青少年来过中国，而且还以将近 80 的高龄同这些孩子一起在红星公社劳动。

“你母亲和你们全家无疑是最杰出的美国家庭。”我说。在从厕所回宿舍的路上，我问道：“你们的生活水平同公社社员一样？”

“这个么，不是最低的。”寒春说。“不过孩子的生活同他们的中国朋友完全一样。”

我同寒春的富有吸引力的丈夫阳早和他们的两个漂亮的孩子（儿子 20 岁，女儿 16 岁）握手时心情特别激动。“我们还有一个男孩在安徽。”阳早说。

“你活像年轻时的英格丽·褒曼！”我大声对他们的女儿说道。女孩子茫然望着我。

“她根本没学过英语。”他们告诉我。“我们的儿子最近刚开始学，现在只是略懂一些。”

我惊得只顾发傻，忘了请寒春翻译一下我说的那位著名电影明星是谁。其实我本该说寒春本人像年纪大了以后的英格丽·褒曼。

他们一家全是高个子，体格健美，红彤彤的脸，十分健康，只是阳早近来患颈关节炎，所以围着羊毛围巾。一家人

都显得精神愉快，感情融洽。

后来我问寒春他们是不是真的愉快，她回答说：“是的，愉快。麻烦也就麻烦在这里。”

但是寒春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美国报刊很久以前报道说，她很可能在新疆参加核研究工作，文化革命期间他们因为是外国人而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只好到北京去要求保护。我没有对他们提这些事，但是别人告诉我说寒春跟核研究工作毫无关系，她只不过管理着一个畜牧场。我在北京听说提供给她选择的工作不少，但是他们宁愿在公社里过简朴的生活。

阳早告诉我，他的家乡在纽约州锡拉丘兹附近，他在科内尔大学和韩丁是室友，两人都在1946年到了中国。他从1946年2月以来一直生活在中国。寒春到中国较晚。1949年他俩在延安的招待所结了婚，婚后在延安附近的瓦窑堡工作。他俩在内地的陕西省边区的一个畜牧场生活了许多年。

在那期间，寒春的哥哥韩丁同他的美国妻子离了婚。韩丁的妻子离婚后带着在中国出生、也是像中国人一样抚养大的女儿卡梅丽塔继续留在中国。（1972年我在纽约一次联合国的招待会上见到了卡梅丽塔，她是在几个月前由她父亲带着第一次回美国的。韩丁在宾夕法尼亚办了一个农场，在再次结婚后又生了三四个孩子。）

我们吃了一顿味美而且营养丰富的华北风味午餐，包括一碟“百年蛋”^①（其实是用石灰和泥把蛋包起来放上一个月就成了这种样子），我们还喝了北京啤酒。阳早向我发表了短短的祝酒词：“为一位启发了我前来中国的兴趣，并且向西方

① 即松花蛋——译注

介绍了新中国的人干杯。愿你再接再厉，为促进中美友谊继续引导人们改变观念。”

他这段话和接下来的解释使我感到意外。他说：“我今天之所以会在中国，主要原因是有几本书我读了以后改变了我整个生活和思想。这些书在许多年以前带来了新中国的信息。我读过你的《中国红区内情》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哈里林·福尔曼、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和伊洛娜·休斯的著作。你们抓住了新中国的精神，而我们则体验了这种精神。①

“我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如此可爱的人，”我说道，“不知道这些老中国通今天还在世的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了。我认识的几位都已在异国去世。不久前我曾找过哈里森·福尔曼，没找到——听说他一直生活在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

“伊洛娜·休斯可能还健在，在瑞士。”

“我来看你之前心里希望你生活在自然条件中，在这方面为世人立一个榜样，”我说道。“我曾经劝韩丁在耕作上完全用天然肥料，可是他根本不感兴趣。”

“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实际上确实多多少少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寒春说道，“只是并不是有意在寻求。”

① 别人告诉我，阳早和韩丁在科内尔大学同窗攻读农科。阳早把动物人工授精技术引进了中国，对牧畜良种培育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人告诉过我，阳早夫妇的子女已完全中国化，从礼貌、习惯动作、特征甚至走、坐、吃的姿势都像中国人。但是，女孩子钟爱她的猫（我在访问中国期间看到的唯一的一只猫），这就完全不是中国式的了。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显得很安静、规矩，文静到了拘束的地步。——作者

“这个公社可以成为榜样，”我说道，“因为你们有这么多动物肥料可以堆肥，还可以利用麦秸稻草或者种植水葫芦做绿肥。使用杀虫剂和化肥会很快把土壤弄坏，毁了土壤里的生命。”

我问他们有没有遇到过排外行为，得到的回答是：“即使在最坏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人也一直受到欢迎。公社里的人很懂政治，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得很清楚。”

我们谈到了节育和火葬。革命委员会里的中国人说，他们在公社里并不强调火葬，迄今也没有人火葬过，但是他们提倡节育。（后来在乘车参观时我们看到有一批中学女生举着为公社宣传计划生育的横幅在游行。）

“我们到处宣传晚婚。这是法律。”

午餐后我们继续谈话，触及了法律和犯罪的问题。

“公社受地方领导，但是也有一些中央政府规定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久就要修改，但是必须等举行全国人大时通过。我们主要靠教育而不是靠法律。比方说，有人打架受了伤，那么打伤他的人就是犯了法，必须惩治。我们用教育的办法防止违法行为，对以前的地主、富农和某些反革命右派分子也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犯罪行为很少，大部分人已经改造了思想。有个别人抢劫和放火。对违法的人我们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同时考虑他的态度好坏。违法的人送交县法院和公安局处理，我们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公社里有负责法律的干部。我们的法律思想是要预防犯罪，而不是在出了事以后再惩罚。我们执行公社革委会的决定。公社革委会作出的决定要提交上级的县革委会批准。”

谈到旧社会的残余。“我今年53岁，”公社主任继续回答

我的许多问题，“在我小时候我们都过阴历年，还烧香。至今我对不过阴历年还不很习惯。过去我们拜财神，求他保佑我们别再受穷，可是我们照样穷。那是唯心思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放后，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我们才明白这全是迷信。思想改变了，我们也不再供奉祖先了。残余思想还有，但是祭祖的器具全扔了，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差不多全取消了。”

“文化革命使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文化革命前，刘少奇用他的修正主义干扰进步，他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那时农民想自己多，想社会主义建设少。现在我们批掉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观点，认识到干农业也是干革命。我们在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认识到我们是在支援国家。我们关心国家多了，我们的思想变了，社会主义观点强了，所以文化革命以来物质成果和产量增加了。我们将来要实现100%机械化，现在是70%。粮食产量还不够高，我们打算在两三年内使产量超过每公顷7000公斤。”

“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北京比起来还低。农民多半住上了新房，但是有些人还住在旧房子里，也没有好的家俱。毛主席提出要通过几个五年计划使面貌大变。他在一份关于我们公社的报告上批示说，在成立公社前，我们这几个高级合作社在京郊属于办得最好的。毛主席的批示还说：再来几个五年计划，你们的变化会更大。”

“现在我们公社办的工厂里实行工资制。实际上可以说是合作社的扩大。我们这里仍然有副业和手工业。总收入根据工分分配。”

我们参观了公社9个奶牛场中的一个，还参观了使用日

本机器的新式的奶粉厂，走进这个厂以前还得穿上白大褂和戴上口罩。寒春作为工作人员负责奶牛场的工作，但不算集体里的人。公社每天产奶6万斤，85%到87%加工成为奶粉，其余的制成黄油或者作为鲜奶出售。奶粉厂是1965年建的。

我们观看了打谷。一束束稻子在不停旋转的鼓状电动脱粒机上拍打着卸下谷粒，由一些人用浅底的簸箕往空中扬去，碎屑和着尘土飘飘扬扬，散发出薰人的清香。我拍了几张照片——背景是一座座圆锥形的抹着泥顶的谷仓，样子奇特而美观。谷子在平整的地上堆成小丘，一些男人和女人在脱粒机旁边忙碌。谷粒又小又瘪。今年大旱，收割得晚。

我们正看着，一位身上沾满草屑、脸庞饱经风吹日晒的典型北方汉子放下手上的活计匆匆走过来，露出真正喜悦的神情同我握手表示欢迎。这在西方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中国不是小事。

所有动物都喂养得很经心，一只只健康、漂亮——这在中国是惊人的新事。从前，我常常掉过头去不忍心看动物受到虐待和作践。我看到中国有了过去没有的高大的比利时马，或称“帕切隆”马？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拐弯处有两匹这种品种的马拉着车从北京方向过来，其中一匹昂首扬蹄，鬃毛和尾巴在风中飘拂，身姿惊人之美。

“你看多漂亮！”寒春微笑道。“它是1号——我们这里最好的马。”

“我忘不了它，”我答道。“叫什么名字？”

“哦，中国人不给动物起名字，只有号码。”

中国人对孩子也往往用数字称呼。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和过去一样不重视个性的发展。我为这匹骏马居然

没有自己的名字感到难受。

在门口道别时，我说：“仅就参观这个公社而言来一趟中国也是值得的。这里像新英格兰早期的小镇，自给自足、自己治理，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共和体，对工业——无论是使用人力的还是机器的——怀着崇高的信念。我曾用10年时间宣传这样一个思想：中国内地农村应该发展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小工业。看了这个公社我觉得宽慰（不是十分宽慰，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尤其在看到那些健壮的动物和没有名字的1号马之后。”

在新北京过圣诞节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倍觉孤单寂寞。东西方的差异在这种时候更加明显。我站立在饭店客房的窗前想起了在北京度过的另一个圣诞节：我们同埃文斯和埃特尔·卡尔森夫妇、合众社的费希尔和另外三两友好一起去海伦·伯顿在西山租用的寺院客舍的那次。当年我们一路上见到的景色之原始荒凉犹如耶稣在古巴勒斯坦诞生的时代，我感到中国的发展阶段也与封建社会前的族长制的严密的氏族社会有许多共同之处。基督教是对氏族社会及其种种血缘观念的革命，用一种以宗教集团为基础的新的纽带代替了血缘关系。

12月18日开始的对北越河内市及其附近的轰炸的升级在全世界投下了阴影。我从新华社的油印新闻稿上看到许多地方举行反对轰炸的示威——东京、也门、刚果、哈瓦那、尼泊尔、墨西哥、意大利、美国、黎巴嫩、赞比亚、突尼斯、埃及、加拿大、挪威、伊拉克、阿尔巴尼亚。美国发生的任何示威在亚洲人看来其影响要比原来大许多倍。对美国人说来，参加示威不过是根据《人权法案》行使合法权利，没有什么可怕的，而在亚洲举行这类公开集会却非同小可，意义重大。

但是，中国国内形势一如既往是乐观的，“国内新闻”总是一派光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京使馆为它的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招待会；罗马尼亚民间歌舞团、芭蕾舞和歌剧团在北京和武汉演出；北朝鲜驻京使馆举行宴会招待北朝鲜访华科学代表团和中国主人；老挝青年代表团离开北京去南方；记者从云南一个傣族村庄报道民间歌手的新编诗歌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傣族人民像需要盐一样需要歌手”。

在1972年的这个圣诞节，中国没有一件事不是好消息，至少英文的新闻稿上印的都是好消息。我看到的西方新闻则没有一件是好消息。新兴国家欣欣向荣，原来的强国每况愈下——这便是我在这个圣诞日所想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圣诞节人们可以说在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已能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在圣诞节轰炸河内这一行动显然是临危挣扎，一个基督教的大国做这种事很不体面。轰炸是承认虚弱，是政治上空虚的表现。

我对在圣诞节做些什么有个计划——去探望一些远离祖国的人，虽然我并不期望举行什么庆祝活动，因为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谁也不会愿意提醒中国人西方有这么个带有宗教

色彩的大节日。我感到自己有点类似通报西方文明的孤独的罗马哨兵。我已经到红星公社探望了阳早一家。

在我还没有时间为自己扮演的罗马哨兵的角色感到懊恼之前，马海德医生带着一件礼物——两张中国人过新年时贴在门上的红色剪纸——来了。我觉得他此举从他的职责范围而言是过了线。

接着，我去首都医院探望了住院已久的玛格丽特·特纳。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她是“神经崩溃”，但另一个人又说是股骨骨折。特纳是英国人，曾在我们的合作社运动中与彼得·汤森一起工作。

也是英国人的年已 80 的罗斯·史密斯也在北京，但是我没能安排去拜访她——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她。

外语学院的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夫妇也进了监狱——听说伊莎贝尔已经出来，但是她的丈夫还关着。他们有 3 个孩子。我记得在纽约同戴维见过一两次，是因为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事情。我记得他是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感兴趣。

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和她的丈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听说埃尔西出来了，爱泼斯坦还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国后得悉他已在 12 月我在北京期间获释，并给他在布鲁克林的父亲写了信。据说他在信中说他“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还说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比以前深得多。）

我为自己没有圣诞节去看望上述三四位我所认识的人感到内疚，但是常识占了上风。要去看他们大概不可能，我也不想向待我如此和气的中国人提出令他们尴尬的问题。埃

尔西出身美国农村家庭，在 40 年代初同爱泼斯坦结婚前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爱泼斯坦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联盟成员，后来逃到中国天津，他就是在天津长大的。据传说，他和埃尔西在回英国途中曾在俄国停留探望几位老亲戚，也许就因为这个，中国人才怀疑他同俄国有什么联系。

文化革命期间有十几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有极左行动。大概他们想表现革命热诚，却又不懂得当时形势的政治内幕。有人告诉我，要是对他们提出起诉，他们就将送交法院审判。但是，就公开知道的情况而言，他们被拘留后不能保释，没有人身保护法保护，也没有审判。

中国缺乏完备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弱点。用弱点这个词不尽妥当，因为对治理 8 亿人民而言也许是强点，不论那些在英国的法治传统下长大的人对此如何不能欣赏。英国人甚至在古时候就有一套不受政治影响的法律和审判制度，因此个人有一种安全感。中国人也有法律制度，可是这套制度还在变化中，而且，在中国决定权力的行使的历来是政治势力，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在中国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认罪、悔罪和恕罪的原则，这种原则与其说是一种民政程序，不如说是一种宗教概念。12 世纪前后天主教会在欧洲树立了在盘询时可动酷刑的忏悔原则，中国的共产党人曾努力从中排除对肉体的折磨。

我找到并且去探望了的美国人只有柯弗兰（弗兰克·科）夫妇。他们住在鼓楼区一所中国式房子里，那房子是一座看上去从前是满清王府的大院落的一部分。他们家几星期前刚从和平宾馆迁到这里，柯弗兰才出医院不久。他们请我

喝了茶，还有柯太太为圣诞节烤制的水果蛋糕和小点心。柯先生曾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俩的十几岁的女儿进来了，带来了几个中国同学，看上去相处得很习惯。柯家都看得懂中文，所以通过看《人民日报》知道最新消息。

晚上我拜访了路易·艾黎。他告诉我，文化革命前每年“十·一”中国国庆节，他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上天安门城楼，另外有几个外国人也总给请去站在后排。

中国人目前的“认罪——悔罪——恕罪”原则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并发症，我不知道中国人这种思想是从何而来的。从前，通常只有在严刑拷打下才能得到供词，至少不经拷打的供词就不可信。儒家思想的要旨是民族和家族的报复——不是宽恕。在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是不知道基督教义中的宽恕为何物的。报复是中国土生的伦理学的精髓，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西方留下了阴险残忍，总是像影子似附随着你伺机报复的名声。

到我这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的某些观察已形成固定看法：在旧社会，个人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考虑或者在体格或思想上使自己有所发展，个人遭到家庭、家族和行会制度的束缚。现在，国家帮助发展体育，国家发工资给文艺工作者、作家和一切艺术家。思考自由并不多，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人们已无挨饿之虞，而且没有任何人吸毒或酗酒。在社会主义下个人自由大于儒教社会。

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宪法的保障的，但是社会压力很大，所以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没有什么人参加任何宗教礼拜，绝大部分寺院教堂也已关闭，这样做不光是因为不鼓励信教，也

是为了安全。现在不允许任何偶像崇拜或形像崇拜。

但是中国尚在改造中。在这个庞大的社会躯体内，各种旧宗教的精华正在摆脱礼拜形式而以一种特殊方式发扬光大。举几点来说：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儒家的讲究礼仪和社交习俗的优雅风范（还带有一些自古以来的排外情绪），具有佛教的温和和女性特点，实行天主教的宽恕、慈善和认罪方式，同时如清教徒般以艰苦工作为美德，反对铺张浪费。

这些特点的混合令人目炫，但至今尚未具体成形。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问：旧的文明留下来的有些什么？

（1）我说首先是隐秘性，特别在统治上。你如何统治 8 亿人口——尤其是正在改造中的 8 亿人口？在中国，旧办法是垄断文化教育，让人民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现在的办法是对全国性的和外国的公开报道实行审查，但是鼓励地方新闻在地方上传播。现在实行义务制文化教育，但是教材由最高当局编纂。

旧中国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隐秘、藏头露尾和欺诈作为生存之道。撒谎是当然的事。除了在家族、家庭和知己朋友中间，社会上充满了互不信任。生存的条件是黑暗而不是光明，犹如古代处在被敌人包围的洞穴中。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探求光明，但是动作小心，不把头颈伸得太长。他们不愿贸然表明自己的意见，说的都是当前正统的看法。

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别人引用他的讲话？原因有许多。首先，勇敢贵审慎，否则就是愚勇。第二，相信语言（特别是文字）的魔术和力量的倾向至今仍然存在。第三，情况变化

很快，一个人今天说的正统话被人引用了，明天可能因为这些话而丢掉地位。

在有 8 亿人为职业和地位互相竞争的情况下，能让个人发挥主动精神和智慧的余地是不大的。不论什么话，只要不说出来就不会招祸。

(2) 不信任别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不安全感的生产物，看来至今仍在中国根深蒂固。产生这种心理是由于缺少法律和缺少客观的民权。总的说来中国人似乎除了毛泽东对谁也不信任——就我的记忆所及而言，中国历史上受到普遍信任的社会领袖也许只有毛泽东一个。

在先后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林彪最后被证明不能信任以后，旧疮疤上又加了一道很深的新伤痕。

(3) 喜欢正统。过去统治中国人的是正统思想——主要是孝顺父母——以及想要规定各种准则和规定人们应该想些什么的愿望。儒家思想被摈弃后留下的真空由毛泽东来填补了，他说的话已经成了典型的正统思想，同《圣经》、《古兰经》等相似。

中国人思想中最大的矛盾是，他们想要接受毛主义为正统思想，然而毛泽东又教导说事物应该变化，矛盾是好的。

“我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对的，结果发现错了。这一下，认为自己对了，不料又错了。现在，经过文化革命，我们觉得自己对了，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又错了？”有人这么对我说，道出了一种真正的无所适从的感觉。

然而，中国到处都在谈个不停，讨论个不停。“一个政府部门从外面看来可能思想一致，其实，要是你知道真相，会发现它内部分成许多观点，辩论激烈。”有人这样告诉我（当

然我还是不能说出这人是谁)。

(4) 官僚政治。这对治理 8 亿人口的国家说来是必然的。旧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与上层经济力量是认同的)在 1966 年又复苏了,文化革命把它推翻了。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儒家的士大夫类似祭司政治。共产党是政治路线的保护神,而且不但使自己成为智慧和政治正统的神,还要在行为上成为圣徒的榜样。

(5) 尚武精神。在旧中国,如果不用军事力量,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前,即使使用了军事力量,变革也不能带来重大的质的变化。文化革命是中国的不使用武力的大变革——它靠的是宣传、说服和年轻人的朝气,不过,即便如此,它还是以军队和武力威胁为后盾的。

但是,中国的军队不是对外的武器。它实际上是保护共产党的思想和百姓的武装政委。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必须兼任军事和民政双重责任,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听说,现在年轻人参军是想取得有影响的职位,因为军内的权势地位最可靠,尽管 1975 年时的正规军不过 350 万人。

(6) 真实的历史。保持政权的老手段之一是不许传播或者用文字记录有关反对势力——无论是在世还是去世的人——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至今仍有残余。这一部分是出于这样一种旧思想:一个事实只要不写成文字,就没有力量,容易淡忘。换句话说,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掌握真相。中国有 8 亿人口要治理,面对这种局面,看来他们认为掩盖真相比解释真相要容易。因此,写传记在目前是禁忌,写历史则删除不愉快的事实。人们对古今历史知识之贫乏也令人吃惊。供人

们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时参考的历史资料也不够。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不过是分析的指南，需要有材料才能分析。我问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年轻人知识这么少，怎么能从老一辈手中接班？“他们什么都不懂！”他喊道，但马上忍住了不再往下说。

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数亿年轻人很快就将走上负责岗位——而他们至今还没有什么确定的课本可学。

无论如何，事实是，在中国要弄清楚真相，或者只是弄清楚事实，都极其困难。但是同从前比起来，现在已容易多了。举例说，我的丈夫和我当年为了想了解哪怕只是一点点事实，就不得不冒生命危险亲自前往红区。毫无疑问，愚民政策是蒋介石政府维持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因为人们知道事情真相之后就马上采取行动。

一位中欧人对中国的看法

在访问期间我很少同别国人交谈，在寥寥几次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同一位对中国形势深感兴趣而又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中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谈话。他说：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公社，而不在工业方面。可是，我们对这个变化的真正性质不得而知，而这正是世界上其他人应该了解的重要方面。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可耕地从 11.

3%增加到了13%。”

“另外，文化革命以后发表的有关对外政策的言论达600万次，而以前全部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发表了300万次。”

“在过去两年里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书籍达1.9亿册。他们读斯大林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著——在1951—1952年他们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

“1965年出版了一部中国历史书——至今还在用。”

“1970年除了毛和林彪的书之外什么书也没有出版。后来，在《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后，书店里开始卖一些老书，包括杜甫的诗集之类。中国艺术品的精致的复制品、瓷器等等也上市了。1970年以前连艺术性的明信片也没有卖的。1971年还上演了一些新戏，关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书籍也多了一些。”

“这种变化发生在15天之内，说明林彪对局面已无法控制，也无权控制。但是今天仍有62%的职位在军人手中。”
“印着毛泽东语录的小红书现在成了禁忌。”

“现在对外政策的方针是联合小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不是搞世界革命。现在支持的是国家政权，不是支持革命力量反对现政权。”

“除了1966年的16条之外，1972年10月13日发表了干部问题的新纲要。”

“外国代表团和客人源源而来，国内形势已退居对外政策之次。我们看不到已成过去的文化革命，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你应该写一本书，叫《林彪死后的中国》。”

“人们认为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与别人不一样。诸如此类

的神话到处受欢迎。中国的危险性给强调了。”

我说：“冯友兰告诉我，他认为文化革命是逻辑的革命，思想方法的革命。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这种不合理的解答方式是错误的。尽管中国人与别人很不一样，但是对他们我们是还能解释的。我们能够解释中国人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看上去多么乖僻。中国人同我们一样是人，只是生活条件不同。他们的问题同我们不一样。人们总喜欢听神话。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框架里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无论他们的社会是乌托邦式的还是科学的。”

“我始终认为我基本上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过去我同共产党人或者中国年轻人交流思想从未有过任何困难。”我说道：“但是我觉得自从1936年以来，俄国人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根本不理解中国人或者他们的政治形势。如果发生大战——主要出于误解和想象出来的危险——那太可怕了。你不能用西方的尺码来评判中国人，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背景和历史来判断。我早在1934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来我一直努力了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和如何想的，然后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美国人。没有人因为想知道这些而买我的书——可是这是最可贵的了解办法。”

“对，你是唯一在研究生涯中做了这个工作的人，特别是1937年在延安对中共重要领导人的生活和个性的研究。你知道如何去接近中国人，而我们谁也做不到，俄国人尤其做不到。我希望你把你的办法告诉我们。”

“中国人不喜欢《红尘》这本书，其实书里除了引用他们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外什么都没有。这在大部分人——甚至

包括我——看来也许很不合逻辑。我认为，埃德加·斯诺和我之所以都能了解到这么多情况，是因为众所周知我们俩都是无党派的非共产党人士，没有其他企图，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不抱成见、心胸坦诚。我俩只是为了探索真相——我至今还是这样。我不停地点点滴滴了解情况。只要是真实的，零碎情况像拼图游戏一样最终定能拼出一张图案来。我从不勉强把中国人往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硬套，因为我认为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研究过像过去和现在的中国这样的社会。刘易斯·摩根的《古代社会》已在中国出版，我感到高兴。中国人应该从基础学起，不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学起。”

“我在研究西方的新左翼时遇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运动同中国的文化革命有什么真正的联系？我认为它是反对现制度的，但未必是新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重大错误的根子是什么？现制度不符合社会需要，可是新左翼什么也拿不出来。但是，他们批评现状是对的。现代人生活在很大的压力下，选择在现在是很自然的事。这使我想到你说过的第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的选择，像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好些运动。”

“完全正确。”我说。“处在初步阶段的不只是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农业国家也一样。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的同时期，农民社会发生无政府主义是很自然的。甚至法国也仍然处在工业资本主义在傅立叶的老的农民空想主义相争下所产生的某些阵痛中。乔冠华在联合国的发言否定了恐怖行动、无政府主义和与群众运动无关的个人行动，你注意到了没有？新左翼总的说来是无政府主义，没有建设性纲领作为支持力量——它是破坏性的，不是建设性的。老的马

克思主义者至少有一种责任感，认为必须有一个纲领。”

他说：“中国的文化革命必须把极左派压下去。有些极左分子反对所有干部。1967年，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要大破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可是，过了14天又出现了一个新公式，这个公式至今年还在用，就是说在整个革命中仍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有一些走资派掌了权，不过只是在某些部门。他们的结论是，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革命以前和以后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他们倾向于把1949年以前的革命往低里估计，说真正的革命开始于1966年，说需要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这是左派思想的一个例子。但是，在内部斗争中，领导当局在许多方面采取平衡政策，尤其在1971年9月林彪垮台以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林彪垮台以后的各种变化的真正内容是什么？这是你在写书时应该集中精力的问题。中国人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以后和文化革命以后他们又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其实，他们直到现在仍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说：“我的印象是，对这些复杂的变化，中国人懂得的并不比西方人多多少。他们正在随波逐流。当然，无论发生什么，都影响政策。俄国人似乎认为有密谋，我认为没有。中国人的行动是对外界的刺激作出的反应。”

他说：“在欧洲我们所在的那个部分，我们知道来自外界的任何压力所引起的主要结果是使国内更加团结。如果苏联发动进攻，团结会加强。中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对。马克思写道，万物都在变化中。只有这一点是不变的。列宁说我们对社会应当作具体分析——不是完全靠书本；也不是不要书本，但是要知道过去。我们应当比过去的

任何世代更富而不是更穷。越是弱者就越激进，越讲宗派。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正在重演。”

我们讨论了毛泽东是不是某种不是被经济力量而是被思想力量从农民社会推入现代的空想无政府主义者。

“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斗争战略家之一，”他这么评价毛泽东，“但是他成了自己经验的奴隶。他怎么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呢？他认为某些战术打了一场胜仗就能再打胜仗。刘少奇不懂得中国的特殊结构，只知道物质力量——他是个平庸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政治后果。他像遇到了鬼打墙——没有脱身之路。文化革命前，周恩来对这种矛盾形势比谁都了解得深，他知道城市的需要，也知道农村的需要。周在1964年说，我们不但需要物质稳定，还需要政治稳定。所以周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国的主要建筑师，可惜他年龄太老，工作太辛苦——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

我说：“是的，周在走向中间。到最后，这总是主流。”

他说：“中国已经做到了不可想象的事情。要发展需要政治鞭策，但是这会造成功僚主义。如果干部的行为一步步越来越像贵族老爷，群众不会喜欢，所以中国人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们实行轮换办法，鼓励群众批评，宣传群众高于干部，要干部谦虚，必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五·七”干校还有一个目的，它是对干部进行思想灌输和筛选干部的新办法。从北京送往干校的已有5万人，有些人在干校的时间很长。”

“他们还没有重建工会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有工人代表。但是这些代表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和工作，我们不知道。重建共青团的宣传已经开始，但是

从报道中看至今还停留在县一级，没有到全国一级。统战部没有取消。1972年只有少数城市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如北京、南京和上海。何香凝逝世后的追悼会规模很大，但是江青没有到场。”

“江青在毛泽东死后是不是还会有很大势力？”

他把声音放低到耳语一般（几乎每个人在提到这个名字时都这么做），说：“我看过一篇有关韶山的报道，没有提到她，那里也没有展览她的照片——只有第一个妻子的照片。欧洲人认为这件事意味深长。”

“毛是不是仍有实际势力？”

“有。有些人非常怕毛。这些人不了解真正的政治气候。文化革命使领导人吃了苦头。斯大林常拿人民和领导人的命运开玩笑，但是毛只是在客观形势成熟时改变路线，他从不杀人。文化革命前中国的情况很糟糕，干部意志消沉，作风腐败，现在不一样了。所有干部在文化革命中都吓坏了。在1970年，没有人坐小汽车上街卖东西。现在又能看到商店外面停着小汽车了。现在要求干部有更大的主动性，但是他们生怕做得不对。他们认为左比右安全。”

“在1968—1970年，文化革命发展到了农村。在这以前，文化革命只局限于城市，公社变化不大。平均主义蔓延了。”

“现在没有法律，这不难理解，但是我不喜欢。”我说。

“现在改变事情用不着法律，一个电话或者一篇文章就行了。”

“现在的变化有什么内幕？”我问道。

“大寨是样板，但是1970年以来它所提供的经验变了。1970年8月和9月，中共中央全会导致了陈伯达同林彪和极

左派之间的斗争。5个人给开除出政治局。过了1年，也就是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通过了一个新方案，主要的目的是（1）重建党；（2）恢复党的领导作用；（3）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现在干部必须学哲学。湖南省的党代表大会是1970年12月举行的，华国锋当选了，大寨的经验也变了。

“春天，出现了一篇用连载形式刊登的报道一个生产大队情况的文章，其中描写了所有制和分配的级别以及酬劳的原则，结论是反对左倾思想。现在又有一些文章介绍1968年—1970年以及1970年—1972年的情况。有一个公社，在实行物质鼓励后出工率上升了20%。现在正在宣传如何区分刘少奇以前鼓吹的工分挂帅——他主要依靠工分——与后来代替了刘少奇的林彪的‘政治挂帅’两者之间的不同。他们现在在工分与劳动质量之间划了一道区分线。有一篇文章取消了收入分配上的政治标准。在干多干少都拿一样工资的时候，人们的劳动热情下降了。但是他们现在想要在政治结构中揉进刘少奇和林彪的合理的物质因素，就是在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实行人人按劳分配。所以，他们出版了1.9亿册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里说第一个阶段的酬劳办法应该是按劳分配。他们要用这些论点来支持新领导，打击左倾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来批驳群众中间的左倾思想。他们选择一些段落加以论述以支持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也有一些是为知识分子和客观规律说话的。看了这些文章，我们现在可以在4个领域里看到政策的调整。他们想要在文化革命和对群众的政治动员同对群众的镇压之间搞平衡；同时，他们想要恢复文化革命前使用的一些措施，就是使用合理的报酬办法。如果粮食产量增

加了，不是全部都能拿走——必须给更大范围的生产需要留下一部分。穷的生产队当然赞成以前的政策，因为土地有贫瘠肥沃的差别。

“你可以读一读从去年10月16日—1972年1月《人民日报》上关于如何改进人民公社管理的文章。这些文章谈到有3个任务：(1)给生产队更大的自给权；(2)报酬要合理；(3)改善干部同农民的关系。这种宣传已遍及全国。有一个县有2万人参加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是需要学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他们希望政策能够平衡和足以应付中国的客观需要。我认为这些纠正是合理的，进步的，但是整个反应如何还不得而知。我不作预言，但我抱乐观态度。但是，成功要受一个历史条件的很大限制，那就是中国的革命的一代还没有给替换下来。老人掌握政权的精力是不够的。”

“你看一看《人民日报》10月30日的文章。他们知道青年问题，但是很难解决，因为两批年轻干部中间有许多人不是林彪提拔的就是原先那些群众组织的代表，不适合使用。他们现在比较重用老的领导人。林彪除掉了老干部，周恩来只好再去把老干部找回来，只要还能使用和不是反对毛主义的，他都想重新使用。这不是为老干部普遍恢复名誉，只是为给林彪赶走的老干部恢复名誉。在陈毅去世时有一些老干部公开露面，这就是说明接受他们。”

“工厂很重视老工人——不仅仅是在领导职位上的老工人——的作用，同时也想教育年轻干部。他们在老工人中间是成功的，年轻人究竟怎么样却很难判断。基层领导是年轻人，直到县一级都是年轻干部。以前担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的是军人，但是现在不是老军人当领导。1972年3月曾展开

过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和让妇女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宣传。

“要预测未来，我们首先必须确切了解社会状况，其次必须了解经济发展方针。”

12月31日

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午餐会

午宴从正午12点持续到将近4点。我预定在1月2日离开北京，所以时间很紧。席间的交谈坦诚、深入，涉及了一些个人的事。

出席的除了友协的林先生外全是女性。林先生是同友协的秘书长丁雪松一起来的。我的“一二·九”老友们来了——龚普生和她专门请来的李愨和张淑仪。我高兴地见到新结识的第三棉纺厂的东北朋友也来了。人们向我介绍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常任代表吴青，她最近刚参加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回来。

吴青头发已灰白，神态举止端庄大方，很有威势，很难相信会有哪个红卫兵小将敢于批判她，但是事实上她在文化革命中什么都经历过，同丁雪松、龚普生和张淑仪一样。如丁雪松所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文化革命中的经历全都一样，而且经过文化革命以后我们感到自己又年轻了。”

原来吴青还是当年新四军的女英雄，虽然她令我有点感

到敬畏，没有敢去问她个人的事。她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以及全国妇联的刊物《中国妇女》总编辑（这个刊物在文化革命后已停止出版）。她还是妇联的“五·七”干校的党委副书记。

全国妇联一直在“冬眠”，但是这件事不便问。因为，在中国，凡是与妇女有关的问题都涉及形势。“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睡大觉，我们也没有停止过存在。”有人这么对我说。

当我得知吴青尽管出了一次国但仍在“五·七”干校时，不免有些愕然。

“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五·七”干校，大家轮流着去。”别人告诉我。

“在1966—1967年，全国妇联开始斗批改。全国妇联的基本组织已经恢复并完善，省一级的妇联也已恢复并完善。旧的全国妇联将在1973年恢复工作，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妇联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任何活动。中共党委在妇女中间有一批优秀的工作人员，所以妇女在文化革命中很积极。妇女联合会的具体形式尚在研究。这个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一直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蔡畅仍是妇联主任，邓颖超仍是副主任。现在对蔡畅不称主席了。

“明天是元旦，将发表一年一度的文告。”（这个文告我后来读了，其中要求恢复这个妇女组织。）

“现在由哪些人领导？”我问道。

“有些人已经老了或者过世了，像许广平和李德全这两位副主任已经去世。在世的副主任有康克清和史良。史良年老有病，但是重要活动还是出席。她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我们还在‘改’的过程中，所以至今还没有新的、年

轻的妇女参加领导。到解决领导班子的成员问题时，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现在我们“五·七”干校的党委就是三结合的班子。”

康克清原先在妇联里负责儿童福利问题，在文化革命期间停止了工作。“她为人十分真诚开朗——仍是农民本色。”别人告诉我说。“她和朱德仍过着很简朴的生活。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这样。邓颖超平易近人，很注意小事，很关心别人的疾苦。”

我问到了联合国，并且告诉她们说，新近负责教育事业的萨利·谢利要我了解一下中国的学校愿不愿接受联合国的教育计划，或者，我是否能请某些重要官员发表一次对联合国有利的讲话。

吴青回答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向经社理事会提交了一项关于福利和儿童的决议要求通过。对这个决议比较容易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对民族解放斗争问题意见有分歧，所以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关于联合国教育问题，我听到的反应是：曾经有人向周恩来问到对联合国的看法，周请这人去看乔冠华1972年10月在联合国的发言，说这个发言中的正式声明代表党和政府的看法。据明确指出，这个声明中有一段话指出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

“我们党和政府的外交路线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虽然并不是一字一句都说得一样。乔冠华的发言是关于联合国的权威性声明，请你看一看。这篇发言代表毛主席的思想，虽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

龚普生加上一句说，《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日社论

说明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后来我又听到了一些有关吴青的事。她在大学生时代参加了新四军，在解放区政府的游击队里做党政工作，没有参加过作战。1949年以前她负责一个县，1949年以后她进了妇联，在名誉主席何香凝和主席蔡畅领导下工作。

友协总干事丁雪松对我态度之热诚超过了她的职责要求。为我举行的三次官方活动她都到场，她还到旅馆看望了我两三次。她很富于吸引力，生气勃勃，动作敏捷，性格开朗，而且聪慧。

她说，她在学生时代身体不好，又没有钱，18岁时去了延安，在那里进行了体育锻炼。“在去延安以前，我不喜欢蒋介石，想救中国，便参加了民族救亡工作。但是延安是灯塔。在延安，我们8年抗战3年内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丁雪松第一个告诉我说，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后“我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有了新的灵魂”。后来，类似的话听多了，我怀疑这话是不是最初出自毛泽东之口。但是看起来丁雪松精神愉快，一对明亮的眼睛，脸上总带着笑容。

在人们的口中，“无产阶级”这个词成了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工人阶级。“阶级觉悟”一词也赋有同样的涵义，虽然使用这个词的人几乎全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旧官僚家庭。但是，他们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确都是职业革命家，同出身的经济和社会阶级没有联系。所以，他们实际上都已“无产阶级化”了。

回忆在使用美丽的绣花桌布和餐巾的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这次午餐，我感到特别愉快。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些女子经

过了多少斗争才达到这样的地位。但是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地位呢？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

我买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双程机票，但是现在我决定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上海出境经仰光回国，中途在开罗、雅典和巴黎停留。我酷爱旅行，喜欢到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所以这次怎么也舍不得放弃在归途中趁机旅游的机会。

我需要从住在使馆区的埃及大使那里索到一张签证。大使客气地表示可以给我一张通过开罗海关——那里“迎接你的是刺刀”，有人这么对我说——的特别通行证，与此同时邀请我去饮茶或者吃午饭或晚饭。但是我避开了这些外交家，他们像生活在有 1000 居民的密封的管道里，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情况。

到这时为止我还没有会见过任何国家的驻京记者，但是我打了电话给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问他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如何得到一张到巴黎停留几天的签证，因为他的妻子刚从那里来。接了电话后，他和他漂亮的妻子到北京饭店来看望我，谈得很有趣。他对外国记者在北京受到的傲慢的对待满肚子是气，尤其是他供职的《多伦多环球邮报》给他在北京的生活费使他难于量入为出。他留着长长的头发，年轻

机灵，但是不大懂得如何避免同中国人对阵。在这里的英国记者有路透社的两个人和伦敦《泰晤士报》的戴维·博纳维亚。法新社有两个记者，西德也有两个。意大利、瑞典和芬兰各有一个。

我在路易·艾黎的家里同他和马海德医生以及他们的朋友米勒医生一起度过了值得纪念的除夕。这个节日过得远远称不上欢欣，但是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处境的独特。

我已经打点好行李，准备在1月2日傍晚乘火车离开北京，先到长沙，在那里追寻一下毛泽东在湖南的足迹，然后前往上海和南京。因为天冷，我决定不去西安、延安。我曾问邓颖超和康克清，中国有哪些地方最值得我去看看。她俩建议我去大寨、大庆和红旗渠。但是，也因为天太冷，我决定不去。这三个地方是农业、工业和水利的模范，我在友协看了专门为我放映的介绍它们的纪录片。

大庆油田在东北，从1960年开始建设，创业人是劳动英雄“铁人”王进喜，他从甘肃玉门带领了一队人来到这里开始打井。现在大庆已建成一个很大的工业联合体，有制造蜡烛和肥皂的工厂，有副业和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大庆建于苏联为了施加压力而撤消对中国的援助之后，所以成了发扬毛的自力更生精神的典型。他们的口号是“艰苦奋斗”。在文化革命期间“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砍倒它”，但是没有得逞。到1972年，油田建设是1965年的2.5倍。一位石油工人英雄谱写了一首大庆战歌。

1964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指示。1966年5月7日毛又指示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

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大庆“粉碎了某些人关于从事农业和副业违反分工的谬论”和企图把家属办的合作社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

在旧中国，42年里靠外国的帮助才打了7.1万米油井。王进喜的钻井队完成了1年钻井进尺10万米的指标。他们有时在零下30℃的低温下劳动。

石油钻井工人王进喜带着铺盖领着工人队伍来到大庆后，先筑起炼铁炉打造铁锹铁锄开垦土地。他们开辟了第一个农场，不久就有了1000多农业工人在荒原上辛勤挖土开荒，开垦了数千亩农田。

我高兴地看到王进喜的功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他在1969年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出生在玉门一个贫农家庭，当过乞丐和放牛娃，15岁时到玉门油田当小工，“经常挨工头和警察的打”。他自小失学，直到1949年以后才学写字并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按照学到的一些思想去实行，如“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等思想。王进喜说，他的目标是“使中国富强起来”。

红旗渠的电影介绍了男人和姑娘们如何用手钻劈山造渠。这个想法看上去不可能，但是成功了。

大寨是农业试验的旗帜，通过群众的艰苦劳动变荒田为沃原，成了中国展示毛的“自力更生”政策成功的橱窗。

仅仅看着银幕上的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艰苦劳动我就累极了，但是劳动的人们和看着银幕上的劳动的人们的脸上都浮现出成功的喜悦和骄傲，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新文明的神秘力量。这是在当地人自己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集体劳动开

拓新土地，创立新事业。当年少数新教徒拓荒者从英国到了美国后，在不多几个世代的时间之内征服了一个大陆，但是中国的这个过程仅仅用了 10 年时间——不过他们使用了西方的机械和发明，其中有一些是经过他们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天才地加以改造的。

在中国，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现在，手上有了现代工具，他们正在无情地劈开大山和向大地索取石油、矿物等资源。

我动身那天，龚普生到饭店来看我，告诉我，邓颖超打电话给她，说她本来想和我道别的，不料患了牙痛并着凉感冒了，只好托龚转告我要我保重，以后好再来中国，而且想到哪里旅行就去哪里。这说明邓颖超从来不出席小集会（可是我的小招待会她来了），也说明她一直在问着我的情况，而且记住了我动身的日期。

我们谈到了健康问题。龚普生曾给我送来酸奶和蜂蜜。她说酸奶很受欢迎，到处都能买到。养蜂业集中在广州一带，主要是荔枝蜜。

我们谈到了我的书，我知道了我从前认识的一些人的遭遇，知道了一些人受到了什么批评和正在如何改正错误和。

我留下一些东西托轮船海运，主要是不再穿的衣服、为麦迪逊一位朋友买的一块锦缎衣料、邓颖超送给我的一盒瓷熊猫，这是中美友好的象征；革命博物馆赠送给我的一本又大又厚的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相片册、一个月的新华社新闻稿等。这批东西经过旧金山运到我那里已是 8 月 1 日，预付的到纽约的运费超过 44 美元，使我大吃一惊。瓷熊猫完整无损，多亏得包裹严密：藏在我意外收到的礼物——一只新的格子

花纹（当然是红的）的手提箱里，手提箱又放在木箱里，木箱外面钉着铁箍，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打开。（箱子到得这么迟是因为在广州重新换了包装，否则邮局拒收。）

两位译员和我还不到下午7点钟便早早坐上黑色吉姆轿车到了规模很大的新火车站（它正好建在我们1935—1937年居住的那条街上）。车站很气派，有自动扶梯，摆着大盆的观赏植物和小树，使旅客感到气氛愉快。我作为旅客之一心情很舒畅。

我们进了仅供贵宾使团的候车室，为我送行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龚普生和她的好友丁雪松，以及龚的一两位助手，还有马海德医生和路易·艾黎。

我曾经多次从旧北京车站乘车离开北京——去西安、北戴河或者天津。

“我也许不会再来了。”我想道。我已入晚年，这种念头经常出现，使我对旅行和大事格外敏感。“别了，我年轻时的朋友们，或许有一天我们还会重逢。”我想道。

要是我留在北京，北京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等着我；但是美国也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等待我回去，这我知道。同时我也知道即使说我填补了这个位置，做得也还不够。我23岁时第一次到中国对我说来是件大事，第二次也是大事。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民的私人代表——我应当把情况告诉他们。我并没有像其他留在中国的别国人一样同中国人融为一体。我始终站在一个热爱美国历史和传统，同时感到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的美国人的立场上看中国。我站在已如此暗淡的正在失去的地平线上，经济上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体力上几乎难以继续工作，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归宿，有自

己的使命感，这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把我学到的浅薄的知识告诉我的美国同胞。

我离开北京时比到达时更高兴得多。有一件事我过去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新中国的中国人如此地希望我把中国写得美好，希望我的书能顺利送到公众面前。他们很不喜欢赛珍珠的书和她对中国的观点。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我成为他们的赛珍珠。我惊奇地发现，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我在中国都是著名人物，而赛珍珠的书除了少数受西方教育的人以外谁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我在新中国是最著名的外国女作家，像赛珍珠在旧中国一样。早知道如此，我在那个伤心失望的时期也许会写得更好些。赛珍珠用她的笔赚了数百万美元，我的著作却几乎连一本也出版不了。这种情况我很清楚，但是我的阅历是如此丰富多彩，几乎独一无二。

我上次乘火车离开北京是在1937年11月。那次我单身去天津，从天津坐船去上海。“七·七”事变后日本已占领了北京、天津、上海（中国地界）和除青岛外的整个北部沿海地区。我在10月份从被包围的延安回到北京，过日本兵关卡的时候把在延安记的笔记和拍的胶卷掖在腰际，因为当时日军还不敢搜查美国人（4年后才发生珍珠港事件）。我退掉了住房，处理了家俱，收拾了行李——衣服不多，资料和书籍却装了40只小箱子。（我丈夫在上海外滩的寒风中接我时看到我行李如此之多气得要命，但是我哪件都不舍得丢掉。）

我曾告别了随红军上前线的马海德医生。我曾在西安告别了刚从北京脱险出来的邓颖超。我刚到上海便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两位干事——龚普生和张淑仪藏了起来。在上海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路易·艾黎。

是的，我深深记得中国的苦难。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否会同日本瓜分中国还是同日本打仗，在1937年还看不清楚。在天津坐着人力车从外国租界的街上经过时，我沿着海滨高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和一些同业公会的楼房，想到了延安的对未来满怀豪情壮志的毛泽东，他的修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支日本香烟。我们曾一面凝视着他放在桌上的手一面听他告诉我说：要是我们的计划不实施，中国会亡国。当时的中国几乎一片黑暗，痛苦消沉。

但是我对研究列克墨敦和雾谷（我有一位祖先在那里得的病）以及沼泽狐狸弗朗西斯·马里恩（我的另一位祖先是他的军需官）很有兴趣。我相信人的精神力量。中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闲散的人力，这么多劳动力，没有不可能反击之理。要是中国不反击，日本就会用它的大量的人和原料征服其他地方。

我的《中国红区内情》就写于这个失败和前途未卜的黑暗时期。正如中国人至今仍然意识到的那样，这本书抓住了延安的神秘力，鼓舞了许多年轻学生奔赴延安。我始终认为，中国人应该靠自己的力量作战，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工业和奋发图强——不是低首乞怜依靠外界的帮助。我从来讨厌奴隶心理。

和我同车厢的仍是过去一个月里凡是醒着的时候几乎都同我形影不离的这两位译员。我们还将密切相伴一个月。这是我所领略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她俩今年都是42岁——也就是生在我第一次到中国的差不多的时候。两人都生长在当年划为通商口岸的海港城市，受过最良好的西方式教育和中国女孩子所能得到的最完备的教育，包括英语知识。两人都已

婚，而且都在友协工作。两人都为了陪我旅行而离开了年幼的子女，都只带一只小小的手提包，包内藏着毛泽东的小红书。（我也想要一本小红书，但是书的主人不愿意送，因为书上有她的笔注，而且一路上也买不到，后来在上海她才为我找到了一本。现在，林彪提倡的毛泽东语录已成禁忌，各处的高大的毛的雕像也已推倒，语录牌也抹掉了，而且在北京一般已看不到有人在胸前别着毛的像章）。两人的黑头发都剪得短短的直直的，一侧别着一只发卡。

资中筠女士生长在天津，但祖籍湖南（所以她对这次旅行同我一样感到高兴）。“我父亲曾在银行里工作”，她告诉我，对谈这类情况并不很热心。我始终不知道她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怎么学来的——她说她的家里不讲英语，她母亲对英文一个字也不懂。她有一个孩子，12岁。

资中筠戴眼镜，镜片圆圆的，加上她的读书人和承担一定责任的负责人的风度，特别显得严肃。她只为重要人物担任口译工作，但是对我的接待工作由她负责。听说她是友协200个工作人员中的佼佼者，懂几国语言，曾出国参加过多种会议。（尼克松访华期间她也是译员。）

她的圆脸是机警的，但是通常毫无表情，脸上很少变化。但是她反应敏捷，对什么事都不忽略，也认真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在这种时候两只黑眼睛显得深沉、激动。她十分聪明机智，在平静的外表下面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活力和对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关心。

第三部分

南京——九省之冠

到达南京

南京友协的人在南京火车站迎接了我，为首的是一位讲话很快、办事能干的山东人，名叫赵长隆。我被送上小车，沿着两侧新栽着梧桐树的宽阔马路前往丁山，在那里通过了人民解放军岗哨的检查。新修的狭窄通道为了防止路基被水冲坏，两侧都在砌上石块。干这活的是一些年老的妇女和一群来此义务劳动的青年学生。

丁山饭店在山顶的前使馆区，就在前荷兰使馆上面，据导游说以前是英国使馆（当地人告诉我，它原先是一个做大豆买卖的外国富商的住宅）。我是这座漂亮的黄色灰泥楼房里唯一的旅游者，整个二楼全归我用，两位译员住楼下。我们

有独用的餐厅和客厅。这是我这次访问期间所住的最漂亮的饭店。床单白得耀眼，处处干净得发亮，地板上和别处一样，铺着精美的地毯，写字桌上摆着蘸水钢笔和墨水。旅游者大部分住在市中心的大饭店。我给奢华的招待宠坏了，开始想到其他资产阶级式享受，例如每天按摩一次和打一针维生素B₁₂。为我按摩的女子从来没有生过病，从来没吃过中药。她相信养生之道在于吃天然食品，所以我俩一谈起这个题目就谈很久。

房子建于30年代，看上去是美国式的，造得很结实，经得起围攻。第一个在南京建造使馆的是美国，是1924年的事，听说就盖在山麓。

我想拍些从前的外国使馆的照片。导游听了我的要求感到为难，因为他们得要先了解一下哪些房子从前是外国人的。显然还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这些房子。

前美国使馆静静地藏在大围墙的后面，是一座镶着很大的新式玻璃窗的小房子（一位导游估计，马歇尔将军在为促使国共休战而努力时就住在这里）。它座落在汉口路，对面马路是前法国使馆——一幢刷成黄色的两层楼房子，几扇凸出的落地长窗可以越过矮矮的围墙眺望园子外面，现在改成了饭店和接待场所。前加拿大使馆现在是南京师范学院，光秃秃的一座楼房，四周没有遮拦（我猜想，奥德丽·托平和她父亲切斯特·朗宁从1946到1948年住在这里。他们曾在1971年访问中国）。现在没有外国人在南京长住。

美国人造的鼓楼医院还在使用，附近是宽广的人民广场。我没有要求去看金陵女子大学，但是到以前的美国教会学校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走了走。那里面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的人更少。它的行政楼已成了怪物：灰色屋顶的西式建筑物中央耸立着一座中国式高塔。赛珍珠的《大地》就是在这些阴沉沉的灰色两层楼房子里写的，但是不知道究竟在其中的哪一幢。附近不时可看见解放军军人，人行道上有几个姑娘走着。我至少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解放前这所大学只有几百个学生，解放后有六七千人。现在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过现在送来上学的是工农兵，不是尖子。那些宿舍是解放后盖的。

“这所大学在 1971 年复课——复课的是大部分系，不是全部。跟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学生曾分成两派斗得很厉害，但是到大约 1968 年就停止了，实现了大联合，把坏人揭露了出来。”

据我了解，南京没有外国居民。

但是南京充满了幽灵，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是些失败后又回来在 50 年代的院外援华集团和麦卡锡主义者中作祟的幽灵。

南京是巫士第一次想把东方和西方融合在一起而告失败的炼金炉，后来跟着失败的是台湾、汉城、西贡和金边。任凭华盛顿的黄金长匙如何搅拌，炼金炉里总是缺少一些必要的成分。因为方子配坏了，只靠美国往锅里倒黄金是炼不出金子来的。唯一能起神奇作用的成分是社会主义。

100 年里外国在南京投下了这么多资本，至今剩下了什么？只剩下赛珍珠的幽灵和她的描写中国人的书，还有可悲的结局——她死前不久曾申请中国的签证，但遭到了拒绝。

南京仍是一个归属没有解决的边疆——介于华南与华北之间，旧社会与新社会之间。在这里的古老的街道上，除人

力车外差不多任何运载工具都能看到（人力车已禁止，但是我的确看到过一辆，上面坐着两个老人。另外也有用自行车拉的，但不多）。在大街上，不但有马车（主要是运垃圾的），还有由男人和女人用绳子拉着走的大车。有一匹马很聪明，在拥挤的路上把车子掀翻以后快步往家跑，逃离这个新的机器时代的喧闹。一些大卡车运送着解放军，军人都站在车上，工厂接送工人上下班的车子上也总是站满了人，喇叭不停地叫。少数小汽车也用震耳的喇叭声要人让道。但是，在中国的街道上看不到吵架斗殴。街道虽拥挤，但是人们都显得和气、有礼貌，大批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神态泰然，并不东张西望。

“在现阶段我们仍然在使用非机动车，但是这类车子将来是要取消的。我们每年生产1万辆卡车——‘大跃进’牌（嘿！多带劲的名字！）和‘解放’牌（理所当然）。各省都在造卡车。有一种叫‘黄河’牌，还有一种叫‘淮河’牌。”

中国的卡车都漆成军绿色。印度的卡车则色彩明亮，还漆上花卉。在希腊，农村的人喜欢在冷却器上点缀一圈鲜艳的珠串。卡车司机在任何地方都是天之骄子。

晚上，一批小学生到我住的饭店来为我表演特别节目（饭店里有一个小型剧场），应邀来观看表演的还有旧金山美中友好代表团的两三位美国人和一些中国人。南京艺术学院有舞蹈课；但是这批孩子是朝阳区学校的学生，是小学校中间承担这类任务的典型。孩子们在表演时很沉着，很熟练，自始至终喜洋洋地情绪很高。表演结束时他们拥过来握住我的手，当地的摄影记者为我们照了相。我在看演出时也拍了很多张照片，还把一部分节目录了音。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到四面环湖的玄武公园去观看

熊猫。公园里一点不挤，但是多数时候这里每天有 5 万游客——他们乘火车来，再由渡船送到公园。

“当年国民党只许有钱人来，别人谁也不准进这个公园，”有人这么告诉我。“从前的皇帝在这个大湖里训练水兵，还带着朝臣到这里来喝酒吟诗乘凉。”

中国人爱熊猫，但是无论南京还是其他大城市，都不准养狗。“解放前只有少数人家养狗，是有钱人用来看门的。”

所有外国人都认为在旧中国最触目惊心的景象之一，是长着癞疮的又病又饿的狗在街头巷尾踉跄，以及人们对狗和其他所有动物的虐待。我常常一看见动物就闭上双眼。

我们还登上了紫金山气象台，在那里可以俯瞰全市，包括城墙在内，但是望不见长江。下面是孙中山和廖仲凯的墓。山谷里是南京林学院的黄色建筑。

气象台主楼建于 1934 年，“日本兵曾用这些房子的圆顶练习打靶”。解放后这里增加了三幢新建筑。

有两台很大的浑天仪看上去眼熟，像是从前我们在北京城墙上漫步时德日进常常指点着给我讲解的“旧友”。是的，这两台浑天仪都来自北京，女导游说：“这一台在 1900 年义和团时期被德国人抢到了柏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约在 1921 年送还了中国。它是在 1935 年从北京搬到这里的，另外有几台还在北京。”

这台中空的铜铸浑天仪的支脚是四条盘龙，把球体转动时可以找到一点。“中空的浑天仪是 2000 年前西汉的时候发明的（约公元前 200 年），到 1437 年明朝期间造出了复制品。”

更有意思的是这台铜制仪器能用来寻找四个方向。“这是

1800年前东汉的张衡发明的，这台复制品造于200年前。球面上按照古代天文学家测定的方位标明了星宿位置，十分精确。”星都有六个角，不是五个。球面上的点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的24个节气。

我们谈到了银河里牛郎织女星的古代神话。每年7月7日喜鹊在天上搭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可是“这两颗星相隔40亿年的路程，就算乘火箭的话，按每秒11公里计算也要40万年两人才能相会。用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计算也要走上14年。所以，牛郎和织女相会是不可能的。”

这个气象台有一所气象学校，是从山东省的齐鲁搬来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有这一学科。中国共有四个气象台（包括上海、北京和“西部”），据说它们用来“追踪卫星”。南京气象台的首席天文学家的薪金据说是教授级里最高的，月薪330元人民币。据说他从事天文工作已有40年。气象台的科技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共有230人，平均月薪60元人民币，而且是贬了值的。我只同女性职工会了面，她们占职工总人数的30%。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科学，无论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从前，虽然有过许多个人的发明和光辉的发现，可惜这些成就被守旧思想所造成的巨大的惰性吞没了。这种守旧思想是从一个人生下来开始就灌输给他的，教他不要独立思考，只能接受正统思想，只能按老规矩旧章法办事。

看来，的确如冯友兰告诉我的那样，自文化革命以来毛泽东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革命，或者至少朝这个方向打开了门户。

在中国，接替正统的旧儒家僵硬思想的是中共所说的

“买办思想”——模仿西方、相机行事，但是不去开创新的发明天地。从1921年到1966年，抱着这种思想方式的中国人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正统思想接受了下来。毛泽东的思想方式自然是辩证的、富于创造力的，但是他也差不多一生都在努力接受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其实它并不合中国国情。

现在中国人有了一种探索精神——注重科学的精神，自由追求的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寻求一种新的正统思想，想藏身在毛泽东思想的规范内。在中国，最坏不过的字眼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大声宣称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全是“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个词所表现的深恶痛绝说明了中国人古老的农民思想方式的变化程度。中国现在没有人愿在嘴上承认毛主席也可能有错。但是，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矛盾和变化的原则。如果说有什么永恒的真理，那么，可以肯定，他指出的这个原则属于这种真理。对于喜欢正统和规范的原始思想方式说来，这个原则是一种革命。

在驱车回城的时候，我注意到古城墙外侧有一大片空白，估计是原先写了字而后来用水泥或者石灰把它们涂掉了的。没错。“本来写着标语，最近听说毛主席对埃德加·斯诺说他认为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用水泥把标语涂掉了。”

这事令人吃惊。“是什么标语？”

“哦，他们称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等等。”

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是安徽人，我们下车去看风景的时候他自得其乐地等着我们。我在中国遇到的为我开车的司机我

都很喜欢，他们使我旅途增加不少愉快。

真可惜我没把眼前的画面拍摄下来：大街中央的一个停车处停放着几百辆甚至几千辆自行车，一排排井井有序，阳光在车把上跳跃。可是如果我要下车的话，后面一长串车子就会给堵塞在路上。（是的，我们都在车流中，谁也不能随意动弹。）

中山陵和廖仲恺墓园

紫金山上的共和国创立人孙逸仙博士纪念堂是蒋介石所造的最重要的纪念堂。这座陵园在 1926 年动工，1929 年春竣工，当时孙夫人从莫斯科回来参加了落成仪式，但是她始终没有赞成过她的妹夫的反革命政权。宋美龄在 1927 年嫁给了蒋介石。

我们用了一小时爬了 392 级台阶来到了孙博士陵前，中途几次停步眺望周围的景色。虽值冬季，但这天气候暖和，雾气蒙蒙。

“我爱这个地方，”我说。“这里能给人一种心灵的启迪。印度的泰姬陵十分完美，可惜不在山上，也不在世界名河之滨。这里的设计高超。想不到蒋介石能造出这么好的建筑。”

“不是他造的，”我的 6 位向导异口同声说道，声音里带着怒意。“他连钱都不愿出。经费是华侨捐的，建造中山陵主

要是华侨发起的。蒋介石从未实行过孙中山的主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当年也是华侨资助了孙逸仙，”我说，“到华侨中间奔走集资的是廖仲恺。我很高兴他的墓园也在这里，接近孙博士。”

中山陵总占地面积 8 万平方米，海拔 158 米，宽阔的石阶由底部到顶上平台高 70 米，夹道种满桂树。紫金山海拔 400 余米。纪念堂的宝蓝色琉璃瓦屋顶是中国式的，但是其他部分是新式的。圆形的墓室是西式的，设有孙中山的大理石雕像，作者是“一个外国人，也许是波兰人”。圆厅的壁上写着孙博士的施政纲领。

孙逸仙 1867 年生于澳门附近，1925 年死于癌症。他是香港一所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后来成为革命家，实行三民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他最初于 1905 年在欧洲和日本成立政党，1911 年推翻满清王朝后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但是，他的真正的基地是广州。1924 年，他改组了国民党，同诞生不久的共产党和苏联和好。廖仲恺在 1925 年 8 月 20 日遇刺身亡以前一直是他的左右手和接班人。孙、廖逝世后，他俩的夫人在汉口左翼政府里担任重要工作，直到 1927 年这个政府消失。他俩始终反对蒋介石。后者在 1927—1928 年接管了国民党右翼和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内战从 1927 年一直继续到 1936 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住，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1945 年日本战败。1947 年中国又开始内战。1949 年，蒋逃到台湾岛，左派新政府成立，建都北京。

1915 年孙逸仙在东京同刚从佐治亚州威斯理女子学院毕业的宋庆龄结婚。宋才貌出众，对孙的事业怀着一片赤诚

的献身精神，这么多年来始终为维护他的主张而奋斗。1949年起她任北京新政府副主席，到作者写此书时仍然担任着这一职务。

我买了一些鲜花献在孙博士和廖仲恺夫人墓前。孙博士的棺木放在一个圆形凹洞里。陪同我来的人叫我把花放在圆厅门口的一只高出地面的类似祭坛的桌子上，当时桌上没有别的鲜花。（日本旅客不向孙博士陵墓献花，而是向共产党烈士献上一只只很大的塑料花圈。）踏着台阶来孙博士墓前致敬的人的脚步声不绝于耳。“来的人每天都有好几百，”人们告诉我。“他们专程乘火车到南京看中山陵。这里已成为中国人的旅游胜地。”老先生老太太牵着孙儿女拾级而上。我看到有位缠足老妇人挎着一只帆布背包。每当我停下来拍照（我的代理人已取了几张卖掉了），总是围上一圈人看着我，我的陪同们只得悄悄请他们走开，告诉他们“围观外国人不礼貌”。

“你认为他们中间有没有人相信孙逸仙博士的鬼魂还在墓里？”我问道。“30年代我在中国的时候，除共产党人以外几乎人人相信祖先有鬼魂，连上海最见多识广的中国人也不例外。”

“我们当然不相信有鬼，”年轻人齐声强调，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火葬。”我说道。“凡是相信有鬼，相信祖先崇拜和孔子的人决不会同意火葬。”

“当然，我们在南京郊区也宣传火葬。火葬可以节省做棺材的木料和修坟的地——这在今天比任何旧思想更重要。”

我从上海乘火车来的一路上看到一座又一座小山上布满坟头，但是我没有提这事。

“我希望将来孙夫人能正式葬在她丈夫的边上。”我说道，自知有些冒昧，因为不知道孙夫人自己有什么想法。“我十分赞成火葬，但是孙夫人与众不同。你们太年轻，不知道她在中国的功绩，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她一生经历了中国的种种苦难——而且从1927年到1949年绝大部分时间中只身一人，只有她的朋友廖仲恺夫人为伴。她俩是本世纪的伟大女性。”

“宋庆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回答的语气是生硬的、不容置疑的。

我在又忙又累的时候为何要花时间登上这座山岗？主要是因为孙夫人。她是东西方之间失去的环节。孙逸仙博士在初期也是这样。我初次到中国听到孙夫人的事情时凭直觉就认为她是正确的——埃德加·斯诺也有同感，他和我都感到我们作为美国人对她特别欠下一份情。我们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用不着对历史的力量有很大了解也能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着未来——因为对中国说来没有别的出路。

我并不是没来由地喜欢孙逸仙夫妇和廖仲恺夫妇。我之所以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西方化的人，因为他们沟通了太平洋两岸，但是他们又站在人民的一边——这才是主要的，这是中国所需要的模式——以西方的道德站在人民一边。这个模式的最终实现是在毛泽东找到接近人民的办法之后。

站在南京中山陵的石阶顶上，我想起了中国的混乱的历史。蒋介石和除孙夫人以外的宋氏家族一直未站在人民一边，也不实行西方的道德即基督教道德，但是这一点他们即使想做也不可能做到。我明白他们的两难处境，他们在绝望时修修补补的做法始终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只能在发生激烈

的变化时保护走投无路的买办于一时。然而他们有着人民的敌人的残酷，而且自身虚弱，决不可能发善心。他们披着西方的外衣，实际上坚持中国旧制度最腐朽的特点——我认为这尤为可厌。我认为，美国人（起源于17世纪的至今已根深蒂固的完美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产物）特别不应该花力量去保护国民党这个可怜的畸形怪物。孙博士是英国式教育和道德培养出来的，孙夫人受的是美国的严正教育，在婚后信仰马克思主义。

蒋介石并没有实行，也不可能实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他是亚洲买办法西斯主义者的头号典型，是个在共产党组织里受过训练的反革命，而这种训练的程度足以使他主要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中国老式军阀。他意志坚强、顽强，而且拥有很大的指挥权。但是他心理变态，对共产党的憎恨和对人民力量的惧怕使他残酷无情。

廖仲恺的墓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圆圆的丘，但是也修在山丘上，远外可望见紫金山气象台。何香凝逝世后与他合葬，葬礼是大约4个月前，也就是1972年9月6日举行的。我上山到墓前献花时，合葬时开启的墓正在重新修整。廖仲恺的棺木落葬时旁边为何香凝预留下了空穴。何在廖去世后又活了47年。听说到这个小小的朴素的墓园来的人不多。墓志铭是新刻的，上面的字是他俩的儿子廖承志写的。何香凝的棺木是由孙逸仙夫人、周恩来夫人、廖承志夫人和她的亲属们陪送到南京的。

廖仲恺夫人终年95岁，生前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朱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孙夫

人。

在廖仲恺墓前为她举行安葬仪式时，到场的7位地方官员中有政治局委员、江苏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副主任杨广立和南京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方明。后两位曾来看望过我，但是许世友我没有见着。许是河南人，生于1906年，曾在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里任指挥官，1937年我去延安时他在抗大。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内战中他都是出名的英雄，1957年任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这几个人掌握着从1927年到1949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的9个省的权力，然而从人格和权力结构上说他们同蒋截然不同。蒋介石决不会来看望像我这样的关心中美友谊的美国小人物。他十分注重“面子”和尊卑之分。可是，为了援助他，美国不知花了多少美国纳税人的钱。

我在墓前休息了一会儿，眺望远处古城墙外的护城河。

“中国在孙逸仙集团和毛泽东领导下发生的变化比过去2000年的变化还要大。”我对身边的几位年轻人说。看来她们对1966年文化革命以前的历史不大在意。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参观了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在1381年修建的庙宇无梁殿。无梁殿因高大的穹顶全由砖砌而不用任何梁木支撑而得名，但人们也叫它无量殿，用的是佛教中无限慈悲的意思。蒋介石曾搬走三个佛龕里的菩萨，换上三个国民党去世将领的牌位，它们后给共产党扔掉了。墙上本来写着国民党的标语，现在也已涂抹得不见痕迹。

殿内很暗，只有两侧高外几扇窗户透进一些光线。高大的殿堂一片寂静，给人以深沉的神秘感和安谧，确实是逃避尘世修心参禅的好地方。它是中国的著名建筑，也是世界闻

名的穹顶大殿之一。

朱元璋的墓尚未发掘。他在打败蒙古人的元朝登基称帝以后立即为自己的陵墓寻找吉祥的地点，并且秘密拟订了计划。他死后，有 24 具棺材从南京的 24 座城门出殡，所以谁也不知道哪具棺材是真的。

我们走着看了一下公元 252 年在世的三国时东吴开国之主孙权的坟墓，墓前两行久经风霜的石兽。这里是中国最古的古迹之一。

和杨广立同进晚餐

现在是谁执掌着南京和周围 9 省的控制权？

我没有见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今天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许世友，但是两位权力仅次于他的人物来看望了我，向我表示欢迎。他们是杨广立和方明。他俩是主动来看望我的，出于希望中美和解的好意。两人都是一开头就说看过我写的《中国红区内情》。

杨设宴招待了我。事后我听说这两位人物来看望我在中国是大事，因为他们是自己想来的，没有人要求他俩这么做。杨在中国是有名的英雄，他曾是一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队长，这支游击队有许多故事在中国各地广为传说。他们当年活跃在从天津到南京的津浦铁路上，不分寒暑进行破坏活动，

使这条铁路无法运营。

杨从1968年起任南京革委会主任和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南京是江苏省会。

杨来看我的时候带着一位穿军装的副官。他天生相貌英武，身材高大挺拔，脸上总挂着自信的笑容。他精神抖擞，显得富有信心和威严，是个一举一动都透着善于指挥人的派头的人。他首先是一位天生的领导人，而且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他坦率、友好，很有吸引力。仅仅有他这样一个人在场就已令人愉快！当然，他是山东人！关于杨的许多情况请看下面。

他魁梧有力，看上去很健康。席间，我们谈到卫生饮食时，他说：“在淮海战役里，大雪纷飞，工事里落满了雪，冷得要命，又没有火取暖，我们便喝滚烫的辣椒汤，又御寒又防感冒。”

“山东人这么壮这么健康，我看是多吃蒜和大白菜的缘故。”我说。“蒜虽然不能御寒，但是能防感冒。”

我向他问到打游击的时候的事。

“日本侵犯中国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拿起武器，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打仗，一开始甚至不会开枪。我家是农民，我自己是小学生。1939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我们打游击，我们爬火车，在太行一带作战。我是津浦路的铁道游击队政委，我们属于115师。”

津浦铁路是1908年到1912年用外国贷款修建的，终点浦口在长江北侧，与南京隔江相望，火车车厢由轮渡运过江需要两小时。

在解放军里，杨参加了长江上的决定性战役。他在南京

已有 10 年。一位报界人士告诉我，杨在 1967 年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1968 年任驻江苏的解放军 6453 部队司令。

出席宴会的 12 个人中间有方明，他在 1969 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我们谈到了生产，“南京生产绒布、丝绸和象牙雕刻——还有雨花石。这种石头红得像在雨花台遭杀害的烈士的鲜血，所以叫雨花石。江苏是鱼米之乡，粮食生产已经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这里的土壤肥沃。这里轻工业发达，特别是纺织业。江苏是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接下来是四川和浙江。我们 1973 年在江苏省有力地推行计划生育，1973 年江苏省的出生率是 1.5%，比文化革命期间的 2% 降低了。”

关于工人，杨说：“我们现在有工人代表大会，将来还要有行业工会，不过差别不大，都是群众组织。县、市一级已经建立共青团，不久省一级也将建立。我们省的大城市是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徐州。”

南京在长江下游，能控制长江沿江诸省，特别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北附近。

同我一起吃饭的这两位人士完全不同于蒋介石和他的朋友们。他俩是凭能力和领导群众的工作经验上升到这样的地位的。这令人感到中国这个新领导班子的组成的要素是健全的民主制度和长期的工作经验。

这样的人比蒋介石分子文明得多也人道得多，尽管后者穿的是西方式制服，学会了作战的技术。

控制南京和长江流域必须有魄力才行，谨小慎微的人是不行的。即使是人口过分膨胀问题也足以令人惊慌失措。南京是华南华北的分界线，古老的和现代的社会力量也在此相

撞。

当我现在回忆南京的时候，冬天的雾气上笼罩着一片阴霾——雨花台的阴霾，南京城内那条曾这么多次被鲜血染红的小河的阴霾。南京不但在中国人的历史上染满了鲜血，充满了屠杀，而且还是日军1937年入侵中国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最凶残的城市。现在，在1973年，日本人正在用向烈士墓献上几个花圈的方式弥补过去的罪恶。

与南京革委会副主任方明一席谈

方明几次到丁山饭店看望我。他十分平易近人、有吸引力，态度非常友好。他在1938年加入八路军的第三野战军，但从相貌上看他要年轻得多。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杨广立一起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从1949年12月以来一直在南京工作。

在知道方明是山东人的时候我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性格正是山东人身上常见的——开朗、愉快。

他说，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3月23日，有79名成员，其中25人是革命干部，占31%；9人来自解放军，占11%；45人是群众代表，占57%。45名群众代表中间20个是工人，10个是农民，10个是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还有5个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和居民的代表。

他为南京感到自豪：“过去 20 年取得了巨大成绩。解放前南京人口包括郊区在内还不到 100 万，只有 1.6 万名工人和 36 家私营工厂（工人在 30 名以上的算工厂）。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南京积极参加社会生产，中型以上的工厂已超过 600 家，工人已有 30 万。

“解放前，南京只有一家卡车修理厂，现在我们每年生产卡车 1 万辆，有些还是跑长途的。在国民党时期，工厂多半是搞修理的，机器是进口的，现在大部分机器在这里自己制造，只有很小一部分例外；产品也有好几个品种。

国民党时期南京只有一家化肥厂叫永利，年产量只有 1.8 万吨，品种只有 3 种；现在我们年产量 100 万吨，品种超过 50 种。

“解放前中国一家手表厂也没有，现在南京每年生产手表 30 多万只，而且产量还在迅速提高。其他新兴工业有制钟、机械制造、石油和化工。”

“南京现在有 230 万人口，包括郊区 110 万。解放前种植粮食的土地是 140 万亩，平均亩产量 200 斤，而去年粮食亩产达到 956 斤。1971 年粮食总产量是 12 亿零 30 万斤。1972 年虽然雨量过多，但是产量也达到这个数字。去年我们菜籽油丰收，猪也丰产，现在我们有猪 55 万头，不包括本市居民的猪肉供应。

“在发展人工养殖后，玄武湖已供应鲜鱼 1200 万斤。仅仅玄武湖每年就产鱼 70 万斤。我们还有长江可捕捞天然鱼。”

“我们的农业正在逐步机械化，生产大队基本上已有电力。南京有 63 个人民公社，包括 739 个生产大队，8500 个生产队。在 1958—1959 年前后，毛主席指示说农业的出路在于

机械化——所以南京走了这条路。现在南京有大型和中型拖拉机 150 台，手扶拖拉机和脱粒机大约 2400 台。

“虽然我们的工农业取得了成就，但是要达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至于文教卫生，南京在解放前只有 5 所大学、56 所中学、264 所小学，现在我们有 15 所大学、295 所中学和 1500 所小学。

“南京从前只有 6 家医院，现在每个区有一家，总共有二十五家，而且每个工厂和居民区都有卫生所。解放前一共只有 360 张病床，现在有 9000 张。

“卫生环境也改善了，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好。

“解放前建房面积是 1100 万平方米，我们在解放后翻了一番，新建房屋面积达 2200 万平方米。我们拆除了 200 个贫民区，在那里盖起了新房。但是，旧房还有一些。

“南京有两条河，秦淮河和长江，在解放前都脏得发臭。解放后，我们疏浚了这两条河，挖泥 300 万土方。秦淮河从前注入玄武湖，现在注入长江，所以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死水了。

“至于交通状况，南京在解放前只有几十辆公共汽车，现在有 370 辆，50 条路线（以前只有 4 条）。”

“我感到高兴的是你们没有拆掉南京城墙，”我说道，“否则就破坏了这个历史古城的特点。”

他对拆城墙的想法很不以为然，说道：“我们正在小心保护城墙，但是以前的政府把城墙拆了一部分。南京城墙最初建于 2400 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3 世纪的春秋时期，后来经过

8 个皇帝的修补。”

“你现在负责管理的是蒋介石时期的首都。”我说道。
“你怎么估计你在这里的地位？”

“在蒋介石 1927 年背叛革命以后，南京成了反动派统治人民的中心。蒋介石是法西斯，对犯人十分残酷。犯人备受折磨，死的不少。从前的市监狱还在，我们现在也用它关押犯人，不过我们讲人道。

“南京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当然比其他任何地方多，还有一小撮人盼望蒋介石回来。国民党残余分子有多少，我们没有数字，但是上层的都逃跑了。”

“国民党的报刊上宣传说有成千万地主被杀，甚至说有 5000 万”，我说。

方明和其他在座的人听了都怒形于色。“全中国也没有 5000 万个地主可以杀。被处死的地主很少，全是罪大恶极的。蒋介石在南京就杀了十几万人，在雨花台杀的，绝大部分是政治犯——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群众。不但在万人坑那边杀，雨花台到处都杀过人。”

我当然问到了节育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尽管 1973 年元旦社论里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和省、市级正在进行具体工作。国民党时期南京的出生率是 3.6%。但是 1972 年下降到了 1.4%，城区郊区都包括在内。城区的出生率只有 0.8%。”

“在一个崇拜儒家的大家庭制的国家里，这个成绩确实惊人，”我说道，“我记得很清楚，蒋介石在 1934 年开倒车，发起尊孔运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断定他这人无可救药，中国在他那些思想的领导下是没有前途的。”

我没有向方向及他个人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情况，但是他主动向我谈到了他的经历：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挺身而出，到这里的省、市和区政府里批判所有脱离群众的干部。这样做很自然，因为有些干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文化革命，各级政府有了改进。许多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了，但是还留下了一些——不过基本上我们克服了错误。

“是的，文化革命使人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在文化革命期间也受到群众的批判，也罢了官，因为我在一开始执行的是刘少奇反动路线，而且脱离群众，也不参加体力劳动。我的错误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批判。我认识到这些错误是残余的旧思想造成的，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文化革命前我也担任领导工作，也在办公室里批评别的同志，但是批评得不对。我必须找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的根源。

“过去，我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认为群众落后，所以对群众信任不够，自以为比群众高明。文化革命期间群众帮助我分析，找到了缺点。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在革命中，如果想要完成一个任务，就必须相信群众，动员群众来完成。”

“他们是怎么帮助你的？”我问道。

“我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提高了，能分清刘少奇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了。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他们煽动两派武斗，制造混乱。但是总的说来武斗不很厉害。中国在文化革命中死的人很少。少数人死去是因为反革命坏分子挑动武斗。

“林彪是极左分子的后台，他玩弄阴谋，许多极左口号和谎话是林彪提出、散布的，他企图用这种方式进行破坏、制造混乱，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的路线是形左实右。毛主席说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但是林彪不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派，而且还指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过去我们有意见也不提，现在有进步，能把自己想的说出来了。经过文化革命，共产党员和人民敢说话敢批评了。林彪是党内的定时炸弹，挖出这颗定时炸弹是我们的胜利。他阴一套阳一套。”

“我钦佩老干部能克服障碍重新站起来。”我说道。“是不是老革命，我通常看他的脸就能认出来。”

“是的，老革命干部诚实、坦率，遇事认真。”

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桥

当年轻的陪同们向我展示新建的南京大桥和转脸看我对这座大桥是否作出恰当评价的时候，他们脸上那种对成就的绝对的自豪感是难以描述的。我本来可以仿照尼克松的说法回答：“这是由一个伟大的民族建造的一座伟大的桥……”

但是我所说是：“这不只是一座跨越地球上最重要的河流之一的桥，它是跨越300年资本主义——甚至是跨越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前的社会的桥。”

长江不是一条驯服的河，它水深流急，是一道天堑。现在，中国人不辞远途辛劳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这座新桥。在过去两千年的很大一部分岁月里，长江以它的狂滔巨浪保护了南方免遭北方骑兵铁蹄的践踏，因为摆渡过江需要花两个小时。如今，这座大桥终于成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统一的象征。然而若是有机飞机前来轰炸，它会在顷刻之间坍塌。

我们乘电梯到桥上，看了桥头堡，并从桥头堡上探头俯视这座双层桥——铁路桥长达6772米，据信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桥；公路桥长达4589米（不是世界上最长的），宽达19.5米。两座桥头堡之间的跨度为1577米，共有9个桥墩，两个桥墩之间的跨度为150米。从江底到水面是35米，沙层以下又是35米，从桥墩底部到桥的顶部为125米。

这座一英里长的桥梁始建于1960年（即苏联撤销对中国的一切援助的那个时候），完工于1968年。7000名工人参加了建桥工程，此外还有许多工农兵参加过义务劳动。

“有妇女参加吗？”我急切地问。

“我们不需要妇女。我们有足够的是男劳力。这是一项重体力活，而且是在高处施工，很危险。”

举行通车典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庆祝，公路桥通车仪式由许世友（革委会主任）主持，铁路桥通车仪式由杨杰（交通部长）主持，按照仪式，他们乘车驶过了大桥。

我抬眼望见桥头上70英尺高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有一条标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五大洲都包括在内，而非洲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江上驶过一些驳船、拖船和几艘轮船，昔日用来运载火车的那艘，又大又旧的渡轮仍在使使用，喷出浓浓的黑烟。

“我们用的震动打桩机是武汉造的”，有人对我说。“桥梁支架是东北鞍山生产的，用的是特殊钢材。这种钢材过去生产不了。刚动工的时候，我们向苏联订了一批货，但1960年他们撕毁了合同，拒绝发运这种钢材。中国工人听到此事，气愤极了，决心生产出自己的特殊钢材来。我们中国人民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原则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了这座大桥。当然，我们也吸收了国内外的经验。”

当我们坐到带花边椅套的又厚又软的椅子上休息时，我询问了这座桥的造价。“包括劳动费用在内，共花了2.8亿元。”

“一包香烟多少钱？”

“好烟5角钱一包，包括国家征税在内。但通常一个烟瘾大的人抽便宜香烟一天只要花3角钱。”

“如此说来，”我竭力想算出浓浓的香烟的烟雾耗费了中国多少钱，“如果2.8亿人戒烟，你们每两天到四天就可以建起一座长江大桥。全中国至少有1.4亿人吸烟吧，假若这些人能戒掉，那么你们至少一个星期能在中国建一座大桥，对不对？”

在场的人丝毫不觉得这样说有任何幽默之处。从理论上讲，在中国，不浪费是十诫之一，然而毛主席是抽烟的。对于不管给国家和财政造成什么损失也要抽烟的嗜好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疑义。

大桥的顶部挂满了五光十色的灯，公路桥两侧有两千盏木兰花蕾形状的路灯（我在这个国家还看到，在公路的高架桥上也挂着一串串很好看的带饰圈的灯——仅仅是为了装饰）。

许多中国旅游者漫步在大桥上。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带着深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识坐着一辆接一辆的卡车隆隆驶过。这些旅游者中有一群群人们在中国的每个旅游点都可以看到的士兵。

光华东路上的第四无线电配件厂

在出发去一个工厂区的路上，我们来到了古老的明代城墙的午门。明城墙共有五道门。我们把我们的安徽司机留在汽车里，自己步行绕着古老的西宫的废墟走了一圈。这座明代建筑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一条当年皇帝行走的路和一些斑驳破损的石兽。在一块石碑上刻有名将左宗棠的一段话，他当年曾和曾国藩一起收复了南京。

这是供皇帝使用的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宫廷大臣和文武百官就在路两侧列队等候向皇帝施礼。那些触怒了皇帝的人被带到这里受处罚。午门外面就是古代的刑场，犯人押到午门之外斩首。我们走过了一道圆形拱顶大门。

远处有一座明皇宫，它“供在政府任职的解放军军官们使用，不对公众开放”。

过去，普通人是不许到这个地方来的。传统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至今仍是一块空旷的场地。我们在这里游览的时候，人人都沉默不语，因为大家想起了以往的那些岁月和

过去那种可怕而残酷的专制主义。

在午门外的一家工厂里，迎接我的是一幅表示欢迎的大标语和由厂革委会主任朱丽（译音）带队的一批人。朱丽是一位异常可爱、彬彬有礼、模样俊俏、给我留下愉快印象的妇女。她说话很快，很有权威——不过她的女性特点极为突出，处处表现出优雅的风度。

“你一定是山东人。”我开玩笑地说，因为我见过的许多人原籍都是山东。

“对，我是山东人。”她说——我不感到意外，她倒是挺惊讶——对我的分辨能力感到惊讶。

她1947年“参加革命”，在担任目前的职务之前曾在南京的一个区政府工作。

现在正是这种类型的人，特别是这种类型的妇女在使中国保持统一并治理着基层。原因之一是他们给别人树立榜样，不仅因为代表着共产党而受到尊敬，而且凭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表现赢得尊敬。她是一位解放了的女性，肩负着重要工作，但是她保持了而不是在丧失着普通妇女值得钦佩并受到钦佩的那些基本品质。她有丈夫，有3个女儿，“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但我们现在放弃了这个想法，为的是树立计划生育的榜样。”

“这个工厂是在一座破财神庙里开办的。”她解释说。在共产党的街道委员会领导下，7位家庭妇女办起了这家工厂，生产陶制电容器——这7个人中有一位仍在这里工作，今年31岁。这个工厂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为响应共产党大办工业的号召创办的。她们没有工具，就从家里拿来桌椅板凳，她们用自己的钱买了扫帚和简单的设备。她们的工作得到了这

一个街道的党支部的支持。1959年，她们搬到了一户人家的一个房间里。

“当时它被称作‘加工组’。她们头3个月没拿工资，而是用生产收入买了设备。3个月后，每人每月拿14元钱，剩下的钱用于扩大生产。”

“参观这个工厂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说，“我曾用10年时间为在中国创办小型工业合作社而工作，直到1949年。我懂得那是一个使城乡运转起来的办法。”

“这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工厂，但是归街道组织所有。不是属于工人——而是属于街道，受街道的共产党支部领导。这个街道组织是1949年前后建立的。这类街道组织遍布南京——遍布中国的每个城市。这7位妇女学习了毛主席的‘男人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的教导，她们没有技术，就到工厂去学或请工厂的工人来教。”

“由于缺少资金，她们开始采用土办法，然后通过技术革新研究出机械化方法。开始，她们用手绕电容器线圈，后来改用机器。1958年，她们只加工半成品，1959年只能制造一种电容器，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她们已经能生产22种产品了。”

1959年，她们的电容器产量仅5万只，1961年达到20万只，1966年进而上升到150万只，而现在一年能生产800万只，有150种不同规格。我们为电气仪表、计算机以及电影放映机的晶体管生产零配件。

过去几年中，她们一直是按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政策办事的。

“我厂现有331名职工。去年，我们的总产值达165万

元。随着生产的发展，原来那间家庭房间就不够用了，所以1970年就把工厂迁到这个从前是一片荒地的地方来了。”

（我猜想，这个工厂是建在从前的刑场上。要是在过去，由于迷信，中国人会远远躲开这样的地方以避免恶运。）

这是一座大型现代建筑，光线很好，并且工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现在大多数工人都住得很远，所以，交通费得由工厂来支付。现在不再是一个街道加工组了。由于工厂的搬迁，工人们现在必然从很远的地方来上班。

在我们参观车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厂是多么清洁、明亮。工人们都穿着白大褂，干着那制造陶瓷过滤器的精细活儿。我们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热烈鼓掌，他们看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妇女占全厂职工的75%，妇女生孩子给56天产假，工资照发。生病可领取正常的月工资。1958年时的平均工资为14元，1959年为30元，现在是40元。当然，女工与男工同工同酬。最高工资70多元，是付给其他工厂来的老师傅的。

1968年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大多数工人都是会员。我们将把职工代表大会改为工会。某些新学徒是最近才来的，他们还没有参加代表大会，不交会费。”

关于节制生育，朱丽介绍说：“由于觉悟的提高，现在我们的工人大都实行计划生育。有60%的职工处于生育年龄，有15%还没结婚，有25%超过了生育年龄。我们使用避孕药或其他避孕方法。一个工人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不坚持再要孩子了。1970年，全厂工人生了22个孩子，1972年17个，今年我们估计会降到11个。当然，开始时有些人非常渴望有

个男孩，但经过教育，他们懂得了，确实没有必要多要儿子或一定得有儿子。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嘛。”

节制生育触及到中国问题的真正要害。所有在场的人——同我一起来参观的人和工厂里的人都在无拘无束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情绪很激动。我的笔记本记录下了他们的看法：“不光是女人，男人也应该节育，当然包括结扎。节育是解放劳动力的一部分，但是这必须通过教育来进行，不能用强制手段。大多数妇女应该参加生产，如果她们孩子过多，负担就会过重。这个国家的90%有劳动能力的妇女都参加了生产和体力劳动。解放前，在有些地方，妇女是没有劳动习惯的。解放后，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妇女们才被发动起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有些妇女过去有现在仍有多要孩子的旧观念，但经过教育，这种态度在改变。

“共产党一直关注妇女的福利问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但在农忙季节还是要办托儿所，让妈妈们能去干农活。我们经常给妇女检查身体。毛主席说，妇女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他还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在农、林、牧、副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公社里，各级机构及革委会内都有女社员代表。”

关于南京的火葬情况：“是的，我们南京人基本上实行火葬，有时甚至一些老年人也愿意火葬。如果老年人不愿意火葬，他们会告诉他们的晚辈，那就不火葬。”

有些人愿意把骨灰保存在家里，有些人愿意把骨灰放在专门的地方。刚解放的时候，为共产党员们建了少数老式坟包，但现在不这样做了。要知道，当年曾国藩就把著名的太

平天国领袖的尸体掘出来烧掉了。这种事，被认为是对一个人再大不过的贬损。因此，在中国，人们能接受火化那是一件非常革命的事。

（我在雨花台看到了两三个老式坟墓，安葬的是共产党要人。）

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普通西方人来说，听到或谈到中国人时时处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共产党或毛泽东或他们两者，会感到非常腻烦。但是我理解这一点，这不是形式主义，对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对妇女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实。

“假如没有共产党，我或许仍呆在山东，啥事也干不了。”朱丽说。“是党派我来领导这个工厂的。直到1958年毛主席才真正使我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了生产。她们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什么也没有，但却白手起家办起了这个工厂。只有共产党才能对经济做出规划，使人口增长保持平衡。”对朱丽的这番话，在场的其他妇女都点头表示赞同。

“那是列宁洞察到的新问题。”我说。“政党是变革的基本工具，你不必等待经济首先发生变革。我对17世纪清教徒革命着实做过一番研究，用的是第一手材料——那是典型的西方革命，是第一次真正的变革。克伦威尔失败了，因为他没有创建一个政党——确切地说，他没有失败，但那是他的主要错误。中国现在的革命与克伦威尔革命——推翻那个时代的老的封建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中国，没有人对克伦威尔感兴趣，但不管怎么说我给他们讲了一点点关于那场革命的情况。

在我们驱车经过午门返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明代在城墙里挖了十条隧道，每个隧道今天能容下一二百名士兵。这

些隧道像洞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深挖洞，要备战，这在中国不算新思想。”

南京妇女

在南京时，一直陪同我的有两位翻译——资中筠和邓秀梅，还有友协专门派的一位导游。她看上去只有十几岁，但实际上已经 28 岁了，人很漂亮，也很聪明，待人友好，她在上海外语学校学过德语，但不懂英语。断断续续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三个人，其中之一是前妇联主任，她年岁比较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

非常与众不同的是一位 30 岁的年轻妇女。她体格健壮、眉目清秀、有些傲气，还有点狂热，简直就是年轻中国的化身。我想她可能是那种可以单枪匹马推翻南京官僚机构的红卫兵式的人物。但她不是。文化革命期间她是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上升到统治南京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这样高的权位上来呢？

不，她从没当过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不在学校里，但她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1970 年上半年，这位雅典娜^①被选为管理这座城市的仅

① 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注

有 19 个成员的南京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仅有的 6 名常委之一，主管这个 230 万人口的大城市的教育、文化和卫生工作。现在正是像她这样的人在决定中国的前途——决定它同世界的关系。我所面对着的是中国的未来，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唉，我却未能同这位要人交上朋友。当我想要问她是怎样上升到这样的权力岗位时，她解释说：“我们是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妇女在革委会中占 20%。我既代表年轻干部，又代表妇女。”

她很少讲话，但很注意听我提的每一个问题。我朝她看的时候，她会露出友好的微笑，但在我不看她的时候，她那睿智的脸上就会显出严肃而权威的神情。她为我们这一行人跑里跑外，她太忙了，不能为我花很多时间。但是很显然，她是代表革委会欢迎我到南京来访问的，我抵离的时候都是她出面欢迎和欢送的。

她曾是有 16 万人口的朝阳区的领导人，那是她的政治基地。

“我们有 40 所小学，12 所中学，8 个居委会，13 个商店，59 个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有一所中心医院和 8 所区医院，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卫生所。”她一口气告诉了我这些数字，我猜想她所在的区一定是南京的样板区。

关于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她说：“是啊，我们正在倡导这件事，特别是在小学一、二年级。”

我想弄清楚她对老一辈怎么看。“有些老年人跟不上我们，因此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老年人有各种不同的兴趣。我们年轻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只要有空就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这一代是处处紧跟毛主席的，

我们信赖他。”

我发现，她所谓的娱乐是指装配无线电元件，她有一批朋友就是干这个的。

“你们恢复共青团了吗？”我问。

“我那个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团组织恢复了，我们是1972年12月23日开始恢复共青团的，并成立了团委。不过，共青团始终是存在的，它只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断了活动而已。经过整顿后，选举了支部新成员，在基层的工厂和其他单位现在都建立了团支部。”

“虽然共青团在文革期间停止了活动，但团员们参加了文化革命，有些团员加入了红卫兵。我那个区恢复共青团活动后，我们开展了教育，促进大联合。我们号召大家‘学雷锋’，还为青年人组织文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我们还组织了新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小组，区分两条路线，提高他们的觉悟，以便进行斗争和实现大联合。青年人懂得他们必须学习，青年工人希望增加生产，商业部门的青年人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组织青年人受教育和参加两条路线斗争。我们批判那些违法分子和某些坏分子。有些坏分子是右派和地主，他们惧怕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想竭力破坏这些成就，因此我们要反击他们。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以后，有些坏分子在两派之间播弄是非，散布不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是必然的，我们不能丧失警惕性。”

她讲话时，常常会突然把嘴闭上，两眼炯炯发光。

此时人们正在谈论台湾，认为中国大陆仍然存在亲国民党分子。

“当然喽，总是有一小撮人盼望国民党回来；地主——大地主曾是国民党的支柱。”人群中有一人说。“日本刚投降时，有那么6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很有威望。但是他的部队劫掠农村，城市里的官吏与人民作对。由于人们以为和平就会到来，物价一度下降，可是不久就出现物价飞涨，结果通货膨胀比以前还严重。……正如毛主席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斗争的继续。”中国的“资产阶级”定义是不容易理解的。

“是的，现在仍然存在着某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有钱，有证券。他们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天生软弱，由于竞争太激烈，他们不可能强大起来，因此，他们既反帝，也反工潮，反对劳工。南京的化工厂过去就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所有。”

“当然喽，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存在，这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既有资产阶级思想，又有封建主义思想。”另一位女士毫不含糊地插话说，“不愿从事体力劳动、鄙视体力劳动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这就是为什么老干部要下乡劳动——要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思想是纯洁的。”

我试图弄明白，谁是这些妇女的楷模，但是她们心目中似乎没有什么楷模。大家都钦佩中国著名的左翼作家鲁迅。邓秀梅则钦佩邓颖超，特别是她在长征中得了肺结核还继续工作的那种精神。资中筠提到古代抗御外敌保卫国家的女英雄花木兰（她在郎世宁的画中被画成身披盔甲的人），她也钦佩居里夫人。所有的人都敬佩伽利略，因为他为真理、为科学

而献身。本杰明·弗兰克林受到赞颂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事实上，中国人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钦佩多才多艺的人。

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难道除了共产党人外就没有别的妇女值得这一代人效仿了吗？甚至孙逸仙夫人和何香凝的那一代出现之前，我想不出我还钦佩过任何别的中国女人。

有一位陪我游览南京的人在文革前是妇联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她仍然在妇联参加“斗批改”。在公社里呆了3个月后她被调到革命委员会工作。

“我们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她解释说，“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妇女的任务是生孩子，而不是参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妇女应该是家庭主妇，而不应该出去工作；希望妇女不要独立，不要有自己的工作和财产。修正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谬论是，妇女应该受剥削，并认为剥削有功。然而，我们认识到，妇女也应该搞阶级斗争。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曾一度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各级党委暂时停止了活动，妇联也停止了活动。这是1966年的事，这样可以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革命一度形势很好，但是后来受到了政治骗子林彪的干扰。他蓄意煽动人们打内战，制造分裂与不和。打内战妨碍了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的整顿。假如在建立革委会之后没有这样的干扰，群众组织本来会早一些整顿好。在斗批改阶段，首要的任务是把共产党整顿好，然后努力整顿群众组织。”

“这里的共青团组织已经整顿好了。”

“至于妇联，文化革命期间没有人支持修正主义路线，但

我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影响呢？因为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还有某些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例如，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们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马克思告诫说，被推翻的阶级还会复辟。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懂得了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南京的妇联有一个 30 人的委员会，但是我不知道妇联共有多少成员。现在江苏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 20% 的妇女。在县一级，有时妇女还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已开始了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文革以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文化革命当中，党和政府对节制生育给予极大的重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这件事已提到了总路线的高度——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我们把避孕药具送到家家户户，采取各种措施。有关避孕的医疗照顾是免费的。

“江苏省 1972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为 1.5%”，这位妇联发言人继续说：“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时达到 2.5%，还有一年达到 3.2%。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比较好，南京 1972 年的增长率为 0.8%。”

“这是我到中国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评论说。

“江苏省实行计划生育的 10 个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 1%，而这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第四部分

新旧上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两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

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由我的翻译资中筠为我翻译的毛泽东的这些语录，是现在指导中国青年的语录的一部分。

全世界独此一处

我们抵达上海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这是一个给乘客提供各种便利的大型车站，就像伦敦的滑铁卢车站一样。

车站上照例有友协的几个人迎接我，其中有蔡凯伦小姐，她是这个城市的特派导游兼翻译；关建，她是一位革委会常委，年纪大一些；李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女英雄。

1973年我两次到上海。第一次是个星期天，每周例行的节假日，就好像它的600万城市居民（郊区还住着400万人口）中的多数人都涌到街上了似的。这种拥挤不堪的劲儿真

让我吃惊，尽管有 1100 万人口的东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我无法拍照，因为我的身边总是很快聚起一大堆人，赶也赶不开。在其他地方，我的翻译们只须微微挥挥手，说一句别看了，这样不礼貌，人群就会顺从地散开。

我本来不必感到惊讶。我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1940 年 12 月），是允许战争难民进城寻求外国保护的。当时你简直无法在街上行走，除非乘坐出租汽车。那时有 112 万多中国人挤在公共租界里，28583 名外国人混杂在这样稠密的中国人中是不显眼的，这么多的人全挤在 5584 英亩的土地上。^①

旧上海由三个独立的的城市组成，它们是：公共租界（设有包括中国成员和日本成员的市政府）；法租界；和 1937 年日本占领前一直在中国人管辖下的大上海（人口为 1925127 人）。

① 在 1937 年，即日本在 1941 年完全占领上海之前，这座城市有大约 3485998 人，超过在人口方面仅次于它的天津的两倍。这两座城市都是根据条约开放的口岸，都由外国对来自内地的难民提供保护。法租界有 454629 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孙逸仙夫人，23398 名外国人。全上海的外国人的国别情况如下：

美国人：3808 人（全中国约 7000 人）

法国人：2554 人（全中国约 4000 人）

英国人：9603 人（外加 2391 名英籍印度人，全中国约 20000 人）

德国人：1934 人（全中国约 4000 人）

俄国难民：14845 人（全中国约 150000 人）

日本人：20679 人（全中国约 1200000 人）

这些数字不包括 1931 年被日本占领的满洲，那里约有 100 万日本臣民（包括朝鲜人）和 8 万名其他外国人，几乎全是为逃避革命而跑出来的白俄。——作者

这些地区根据 19 世纪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优惠权由外国人占领。这种条约规定外国（总共 12 个国家）享有治外法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不享受这种保护——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没有签订治外法权条约的国家也不享受保护。

英法美等国的人在这个根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就像帝国主义诸侯一般，几乎没有听说有什么针对他们的犯罪活动。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茧壳里的这 31000 个幸运儿中很少有人看见在墙上书写口号的事情（尽管过去和现在这都是中国的一种户外运动），并从而意识到西方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行和解——为数极少的有这种见地的外国人差不多全是美国人。

所有这些外国人，除了一小撮（按中国人的说法）外，在共产党 1949 年接管政权后全部离开了中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只是在 1972—1973 年期间才有少数人为了做生意而再度来到上海。只有波兰在上海的领事馆仍然存在，因为朝鲜和越南的领事馆在文革期间关闭了。少数英国人回来居住下来了。法国航空公司只有很少几名工作人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也是这样。

虽然我曾在上海度过了短暂的美好时光，但我从来不喜欢这座城市，对它也没有特别的兴趣。那时唯一称得上了不起的东西，是著名的外滩和江上行船的景象。它可能更像纽约而不像任何别的外国城市——起码可以说，它是一座多国籍、多难民的城市。

此次来上海，我根本没想到它会对我发生什么影响，可是我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令我震惊，以致我都有些瞠目结舌了。

这不仅是因为人多得使我喘不过气来，也不仅是因为我所熟悉的旧街道上的那些行人。一个如此繁荣与权力集中之地竟能这样容易地消逝，除了从前盖的高楼大厦外，往昔的一切荡然无存，真是令人伤感。这些高楼大厦还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显得灰暗、凄凉，笼罩着吉卜林^①作品中的悲哀与绝望。看到这些建筑就像看到了玛丽·安托万内特^②被砍去了头颅的躯体。这里本是西方投资最多的东方地区，可现在活着的只有孙逸仙夫人的助手耿丽淑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位教授的美国妻子了。

上海曾是处于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语）的国际金融资本的精华所在。对外国人来说，这里有的只是发财的机会。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31年，即世界笼罩在1929年大萧条的黑暗中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就像一枚新铸造的硬币（当然是银币）一样闪耀着繁荣兴旺的光辉。到处都充满活力，到处都是发展的喧嚣和法国人那种及时行乐的狂热情绪。那时，厄运正悬在它的头上，那是由内地飘过来的一片乌云。在内地，因历史的必然而爆发的内战正打得不可开交。

当然，人们初到上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上上海大厦顶楼（过去称百老汇大厦）去领略一番著名的风光：黄浦之风从那条供游艇停泊的江上习习吹来；苏州河就在脚下，河上点缀着几叶舢板。远处的港内几乎无法看到任何船只，但

① 吉卜林（1865—1936年），英国作家和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② 玛丽·安托万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于1793年同他一起被绞死。——译注

是那里也有同样陈旧的舢板以及现代化的江轮。当年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第六大海港，各国国旗迎风飘扬，挂着星条旗和英国国旗的炮艇以及“日出之国”日本的各种军舰在江上游弋。旗舰上还有为舞会伴奏的乐队。

上海外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亚洲最重要的高楼大厦群集之地。外滩公园是自巴比伦花园以来地球上最有名、最有争议的一片这样的地产，这是因为一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虚构的牌子的缘故。

俯瞰外滩上的那些高楼，你可以看到那座老式而气派的英国总领事馆座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内。那里曾是身穿时髦礼服、头戴意大利草帽的贵妇们前去参加公园舞会的地方。（今天那里成了友谊商店。在该商店我曾看到一枚贵妇人戴的钻石胸针，要价 78000 美元；还有一块刺绣挂毯，标价为 58000 美元。有些大楼被改成了海员俱乐部。）

建于 1911 年，有着世界上柜台最长的酒吧的上海俱乐部，现在是用来接待中国游客的东方饭店。

中国海关大楼现在仍然是中国海关所在地，海关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机构也设在这里。

东方银行、汇丰银行的大楼像古代的太后一样伫立在外滩。后者建于 1864 年，现在是革命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还写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从前，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这座大楼里，现在仍然是这样。

老的 PALACE 饭店座落在外滩的一角，以前那里是王后们聚会吃茶的地方，如今成了“和平”宾馆。

上海最高的建筑、20 层的沙逊大厦，现在是接待外宾的和平饭店。它在 1931 年时是一幢新建筑，是富有的英国人沙

逊家族盖的，他们是巴格达著名商人。沙逊家族 30 年代在上海有巨额投资。

接着你会看到中国银行，它建于 1936 年，现在仍是中国银行，是少数没有改变名称的建筑之一。从前的交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字林西报》（创办于 1864 年）等几幢大楼紧挨在一起。在一英里长的外滩的尽头是曾一度很现代化的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经营壳牌汽油、润滑油、煤油、沥青），怡和有限公司。这些公司体现了老中国通们的真本事（航运、酿酒、缫丝、冷冻、码头，以及充当公司和货栈的代理人）。

外滩的这些高楼大厦没有美国人的份儿。我们来得太晚了，没有资格得到外滩最好的位置，但这里设有我们的航运和保险公司办事处。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在外滩是不允许开设零售商店的。

从前的美国总领事馆，我的导游竟不知道，而我们却驱车从它的旁边驶过了。它在距外滩只隔一个街区的地方。这是一座陈旧、凌乱、现状颇为寒怆的红砖建筑。那些晾晒着衣服的窗户曾是不甘落后于英国的美国维护它在上海的尊严和面子的地方，也是我担任过社交秘书的地方。离外滩更近一些的一幢灰色混凝土大楼据说是后来的领事馆所在地——现在是广播中心。

上海现在远非齷齪之地。过去，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城”被认为是一种冒险行为。我们只能结伴而入，并且睁大眼睛、闭紧嘴巴（为了不把恶臭吸入体内）。

南京路和静安寺路是主要街道。由中国人开办的两家门对门的百货商店仍然矗立在那里——永安公司仍然是一家百

货商店，先施公司则是一家“时装店”（我不清楚“时装店”是什么意思）。新新公司现在是第一食品商店。在这种地方，还跟从前一样，拥挤的人群你推我搡，常常会把人挤出人行道，只不过现在稍微文明了一点而已。另一个由中国人经营的有名的地方是“大世界娱乐公司”，它仍然用作娱乐场所，但是文化革命期间被关闭，现在仍在修理。这里一向喧闹、肮脏、拥挤，一个外国人能从这个地方脱身会感到幸运。所有这些街道的两侧，窗外都晾晒着衣物。

在大世界和西藏路附近曾有一家著名的四川风味饭店，叫锦江饭店，经理是位女士。

1938年梁士纯就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晚宴（他出的钱），并在这次晚宴上创立了我们的工合委员会。锦江饭店还在，只不过搬迁到法国俱乐部附近的十三层楼去了。以舞会名噪一时的法国俱乐部如今是一所公寓。

在著名的跑马厅对面的静安寺路上是中国联合公寓，如今是一家华侨饭店。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和我的丈夫1937—1938年间居住过的麦德赫斯特公寓，它位于泰兴路和南京路（中段）交汇处。工合计划就是在这里构想出来的——这项计划的开创者之一约翰·亚历山大在这里也有一套居所。如今这所公寓是办公大楼，名叫泰兴大楼。正门上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找寻当时远东最有名的老饭店——礼查饭店也费了很大的劲儿。我的导游们从没听说过这家饭店。这座由一位快速帆船船长建造的饭店，仍然屹立在苏州河桥附近。它同那些偌大而无人居住（于1964年被封闭）的沙俄领事馆隔街相

对，同上海（百老汇）大厦（现在是一家接待内宾的饭店）隔另一条街相对。这座用大块沙岩垒砌的礼查饭店，现在是接待内宾的浦江饭店。它看上去没住什么人——只有边门是开着的。

上海最重要的一座私人花园是长条形的哈同花园，它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巴格达的叙利亚犹太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从前，这座花园是用一道沿静安寺路砌筑的砖墙同外界隔开的，据说没有任何外人跨进过它的大门。现在这块地方盖满了房子。赛拉斯·哈同刚来中国时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后来他通过购置房地产、收租金——亦即通过外国保护发迹，成了上海最富有的外国人之一。

用大理石建造的埃利宅邸（这家人现住香港）今天成了以孙逸仙夫人名字命名的少年宫。我记得，这一家人也属于那些获得英国国籍并在上海成了富翁的许许多多叙利亚犹太人之列。

有少数外国人盘算过，怎样在花园高墙的后面过极舒适的隐居生活。一座这样别致的英国房产现在成了国际俱乐部，但自文化革命以来它一直关闭着。

在从前的法租界内的法国皮卡迪公寓，现在是接待外宾的衡山饭店。有人告诉我，它是上海最好的饭店。我的译员和我住在高层，从那里可以俯瞰一条两边刚植了树的宁静的街道。室内有华美的地毯、镶花边的沙发、鹅毛笔和绸缎被等。我们的门卫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他沿着院墙种了一排红花。一大桌不友好的北朝鲜人在我访问期间同我们在一个餐厅用餐。他们头发剪得很短，身着非常正式的黑色西装，总是整整齐齐像是刚刚熨过。

所有原来的外国名字统统改掉了。由于共产党政权下长大的中国人从不知道那些外国名字，所以你现在在上海非常容易迷路。例如，长长的爱多亚路现在叫做延安路。

你常常可以看到古老的、带拱形门廊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红砖大楼。这些大楼是在上海全盛时期建造的，如今仍完好无损。

在上海的全盛时期人们常说，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城市是1842年大不列颠和中国满清王朝之间签订的南京条约的得天独厚的产物。条约规定了五个通商口岸，包括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

英国领事一到就永久性地租下了黄浦江岸边150英亩沼泽密布的土地，因为外国人是不能买地的。他们每年付一笔土地租金。这块租地是在一个11世纪就有了的小渔村的外面，面积曾两度扩大，最后一次扩大是在1899年。

第一次扩大是在1854年，那是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缘故。中国的富人们从内地逃到上海，在外国人门前吵吵嚷嚷要求保护。外国人通过为他们建房子或把房租给他们，并且通过用这些难民的钱作银行资本而发了财。每次动乱都给上海送来更多的难民，如1918年的俄国革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及1937年的日本人入侵。在那次入侵中日本占领了上海由中国人掌管的那一部分。

由于上海是地主、沙皇分子和欧洲帝国主义冒险家的避难所，很难想象有哪个城市在政治上会像上海那样反动。诚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掩护过左翼革命分子，但公共租界保安头目帕特·吉文斯更有可能把他们抓起来，押送到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法租界因保护难民而变得富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公共租界。它是 1849 年在 60 公顷沼泽和荒冢之上开始建设的，到 1914 年已扩展到 1022 公顷。法国和英国在黄浦江上的炮艇不是仅仅为了舞会。有钱的中国人也雇佣白俄做保镖。

为适应一座保护者城市的需要，最大的预算项目是用于警察^①。同中国人一起当警察的主要是锡克人和来自法属印度支那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在这个人口稠密、语言混杂、非单一民族的社会里，人们却如此情愿地遵守法律与秩序。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保护感恩戴德，根本不想胡来。

在公共租界内，大个子的锡克人辛辛苦苦地维持交通秩序。9990 辆公共黄包车和 10005 辆私人黄包车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来穿去（现在黄包车已被取缔），参加空间争夺战的还有 39550 辆自行车、15463 辆手推车和 5779 辆当地特有的独轮车。神气活现的大班及其太太们乘坐的出租汽车则属于 9930 辆机动车之列。今天的上海根本不允许私人汽车存在，出租汽车是属于国家的。街道上挤满了自行车、行人和一些不停地按喇叭的卡车，间或会有一辆小汽车。

上海过去主要是一座商业寄生虫和难民充斥的城市，是一座丑陋、贫穷和非生产性的城市，在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眼

^① 1936 年公共租界有 4739 名警察（只有 457 名外国人和锡克人，其余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法租界有 2235 名警察（只有 158 名法国人，46 名其他的外国人，主要是俄国人，还有来自法属印度支那的 470 名东京湾人，其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市政当局也有 5079 名警察从事保护工作。市政当局是 1927 年建立的，它管辖 494.96 平方公里的土地。它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23335 辆黄包车、467 辆自行车、6518 辆私人汽车、891 辆出租车和 1579 辆卡车缴纳的执照费。——作者

里没有任何值得遵守的社会准则。我过去把它看成是中国身上的一个毒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里兴办了工业，中国人拥有 24 家纱厂，英国人拥有 4 家。日本人在他们的 30 家纱厂里已经利用起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了，结果在本国造成了失业。上海的造船业在远东曾是首屈一指的。

路易·艾黎曾负责努力改善公共租界里的工厂的条件，这里的条件比其他地方工业革命初期时的条件还要糟糕。

尽管只有这么一点点工业，上海却已是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了，并且自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上海大大加强了它的这种地位。

夏天，潮湿的气候简直无法忍受，1934 年的华氏 105 度可算作创纪录的高温。上海人的主要死因是肺结核、伤寒、痢疾和脚气病。所有这些病现在都得到了控制。

近些年来没有人写出什么有关上海的好书。它可曾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来证明它这一个世纪没有虚度吗？我想不出哪个外国居民的名字——如果人们不屑于提及“中国人”戈登和华尔镇压太平天国的不光彩的冒险行动的话——依然为人们所铭记，可能除了 J·B·鲍威尔（虽然他在自己的祖国美国并不出名）和新西兰的骄傲——路易·艾黎之外。基督教女青年会从来不出名，但是她们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至于过去在这里的中国人，许多人没有根基，也得不到创造性的谋生手段，他们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少数左翼作家是上海著名的产儿，如鲁迅，丁玲，还有林语堂，后者后来变成了右翼分子。一位上海女演员叫江青，她嫁给了毛泽东，成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

宋氏家族可谓一座上海纪念碑。它的主要成员孙逸仙夫

人几乎一生都在那里生活，直至 80 多岁依然愿意住在上海，尽管她作为共和国副主席有一部分时间在北京的一座宫殿里度过。从母系来说，宋家的先辈可谓地地道道的老上海。

龚家姐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上海造就出来的。她们曾在圣玛丽女校就读，并在基督教女青年运动中受过教育。

从任何意义上讲，在上海的外国人都过得不开心。他们缺乏魅力，也缺乏效能。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人们还记得从帆船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奇妙而令人高兴的东西，主要是洋泾浜英语，诸如 Chop-Chop（赶快），Walla Walla（闲聊），maskee（不要紧），Cumshaw（小费）（现在在中国任何地方都不许收小费），tiffin（午餐），chop（商标）。

另外，除了坐黄包车外无论干什么事都是签张便条而不付现金，在商业活动方面奉行绝对诚实的准则（不订合同，交易是大班们在上海俱乐部的酒吧柜台上达成的）。

外国人在各条战线上都生活在极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他们靠不列颠——苏格兰的禁欲主义信条和面对一切的勇气（用威士忌鼓起的勇气）来对付这局面。台风正从日本刮来，内地内战的乌云在向上海逼近。更有甚者，一场来自“本国”的雷电交加的黑色暴风雨威胁着他们，要求“放弃租界”，也就是说要把上海（或中国）还给中国人——这是早已许诺过的事情。

在中国，除了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的租界外，不允许商人拥有任何财产，无论什么财产（通商口岸是租借的，随时可能收回）。只允许传教士（也是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拥有财产和居住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所有条约规定的对外口岸，连同根据条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在 1943 年都

放弃了，还给了中国。（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皆知的。）截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已有33个租界地外国列强的归还了中国，还剩下13个租界地，外加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有两样东西使上海别有情趣，也使人们在那里还能生活得下去。一是跑马厅，那是一座规模蛮大的公园，处在最重要的商业区的正中央，离外滩不远，周围有一条骑马和赛马的跑道。这里是外国侨民在管弦乐和喇叭声的伴奏下举行活动的地方。1932年，我是负责在这个跑马厅（它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热闹起来的）组织7月4日庆祝活动的美国侨民委员会的秘书。我保留着一件过时的、带黑色天鹅绒腰带、饰有花边的礼服和一顶很大的游园帽，这是专为在公园里聚会穿的服饰。我在跑马厅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是1938年庆祝英王诞辰。这是第一次人们胆敢穿短衣服出现在这样正式的盛大集会上。别人倒罢了，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可使英国大使夫人冒了风险。自那以后，人们对她都侧目而视。

当我发现这片可爱的绿地变成了一大片沥青——变成了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经常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人民广场”的时候，我惊呆了。不过，总算保留了一部分绿地作为公园。然而，考虑到中国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象到在这种拥挤的城市的中心保持那么多的公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现在，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出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块不动产。它是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抑或是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革命——的根源。这就是面积只有1英亩的小小的外滩公园，现在叫黄浦公园，在中山路（即外滩）上。这座公园所引起的情绪至今仍然很强烈。我和

我的导游们发生的唯一争执的起因就是这里的一块想象中的牌子。

“外国人把中国人比作狗。他们挂上一块牌子，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她的情绪很激动，“他们竟然不让我们中国人进入自己的地方。”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牌子，”我说，我是非常注重事实的人，“虽然不让狗进来，也不欢迎中国人进。所禁止的是英国狗。英国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鄙视狗，他们是非常爱狗的。不准带狗到这个公园散步，那是剥夺了他们的很重要的权利。”

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把人与狗相比更严重的侮辱了。中国人之所以对这块虚构的牌子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愤恨情绪，就是因为它提到了狗的缘故。但是这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件捏造的东西能产生何等的威力，也许它的影响永远消除不了了，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

大约 100 年前作出了填平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约 1 英亩地方，建造这座公园的决定。公共租界建在一片沼泽地之上，打了许多很深的基桩，对建筑物的高度和重量都作了仔细的估算。刮台风的时候，外滩附近街道上的水能涨到齐汽车底盘，虽然堆起防水沙袋，楼的底层仍会被水淹没。（我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批照片，拍的就是上海的一场这样的台风。）

为了在上海造一个尽可能近似伦敦那类公园的小公园，特地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苏格兰园艺师，还从英国运来了各种苗木。英国人喜爱小型公园，其程度仅次于爱他的狗。早先，这个公园是人数不多的英侨的活动中心，可以把小孩（但不是狗）带到那里，外国大班、巨头和他们的太太们可以

坐在长凳上听音乐和观看他们的快速帆船在地平线上出现。在这座臭气熏天、闷热难忍、疾病流行、贫穷不堪的城市的滨河一隅，总算能享受到一丝海风的凉爽。（大多数上海人都呆在家里不出来，而且门窗紧闭，因为夜间的空气被认为是危险的，会使人生病。）

难民是上海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外滩公园是外国人能避开中国人群，避免在公共场所染上传染病的实际危险的少数地方之一。（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上海街上总有许多许多的乞丐、已死或快死的难民以及被遗弃的婴儿。）

1881年，市政府收到一位有胆识的中国人的来信，信中抱怨道，中国人像外国人一样向市里纳税，不准中国人使用租界公园是不公平的。市政府作出了反应，下令让这座公园对“衣冠整洁的当地人”开放。但是很少有人利用这样的机会，因为人们不大明确“衣冠整洁”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危险发生在四五年后，即在日本人到达上海并决定使用这座公园的时候，因为日本人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这激怒了中国人，市政府给“持票者和团体”发放通行证，于是中国人带来了一大批一大批亲戚、朋友和佣人，他们主要是想看看这些奇怪的外国佬在社交场合是什么样子，因此总挑外国人要使用公园的时候来。通行证必须停止发行，因为外国人正在被挤出公园。同时，这些身着绫罗绸缎的“衣冠整洁”的中国人对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被允许使用公园长凳而感到愤慨。

1899年采取了一种新的做法，即按中国风格建了一座公园，而且既对中国人开放也对外国人开放。一位英国富翁让出了这片对着苏州河的土地。市政府提供了一万美元，同用

于外滩公园的数目一样多。“但是除了那些苦力外没有中国人到这个公园来过。”这完全是一个“面子”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新的阶级意识。

卡尔·克劳 1910 年作为一位美国报人来到上海。他写道：“尽管‘华人与狗’的牌子从来不曾有过，但是中国人是被拒之门外的，只不过不是以那块虚构的牌子所用的那种无礼的侮辱方式罢了。事实上，这样的牌子是不存在的。在据认为立过那种牌子的那个时候，我就住在那座小公园附近，我每天都要从公园中穿行好几次。公园有许多规定，其中的一条是不能把狗带进公园。另一条规定的大意是，中国人不准入内，除了外国人的私人佣人外。这一条可能是为带外国孩子来公园的女保姆而定的。局外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保姆的乡间俱乐部呢。这两条规定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写在一起的，使中国人感到受了侮辱。”

不仅中国人对这块传说中的牌子那样气愤，以致那位导游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这件事，外国人对这种排斥态度甚至更加气愤，因为直到他们在郊外办起乡间俱乐部之前，他们是迫切需要这块静谧的土地作为心理寄托的。世界第六大港这滨海一隅本来是世界上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地块之一，然而它却是至圣之所，在那里金钱是忌讳之物。英国人可以在那里独自沉思，即便是他的爱犬不在身边也罢。在外滩 1 英里多的范围内不准建码头设仓库，这大概就是为了保持这里的景观和这座芳草如茵的公园。结果必须出动驳船到汹涌的江里把货船上的货弄上岸——浪费的时间无法计算，且不说一年还要花费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金钱。

许多中国人常常由于“面子”问题而自杀，英国人也会

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到上海去的人几乎没有不纯粹是出于商业目的的，然而，深深地扎根于英国文明中的那种尊重自然的意识不惜任何代价地保住了这一小块地方和外滩的滨河地带不受侵犯。（我可以提及一点：最初是美国领事坚持要把外滩滨河地带变为一块不受商业主义影响的神圣之地的。）在今天的伦敦，小型公园仍然占据着任何城市的某些最有商业价值的地皮。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原则对于外国人是多么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如此憎恨这个原则——但是他们从不理解这个原则。在中国，任何坚持个人不受侵扰的人都被视为精神病患者，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不过，共产党一直没有允许在外滩和外滩公园建码头设仓库。但是他们却允许在那里开设了至少一个零售商店，那就是设在前英国领事馆原址的友谊商店。在那里你可以买到要价 15000 元的珉琅质手镯。在外国人控制时期，整个外滩是无论什么零售商店都不许开设的，那时它是银行和“批发”商行的圣地。

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景观对于在上海居住过的年迈的帝国主义分子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现在筑起了一道颇高的混凝土墙，把这里的景色完全挡住了，街边还架起了很高的竹篱笆。当我 1 月份散步走到那里时，我惊奇地发现那里一点儿也不拥挤。有人告诉我，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在入口处付一点钱都可以在里面散步。（英国人的“面子”不允许采取这样简单的办法。倘若他们当年实行收费的办法，那就不会有什么人愿意付这个钱了。）至于狗，1949 年后全给杀死了。不仅在上海，所有大城市都这样。

1931年我抵达上海的时候，又有了其他一些公园，例如极司斐尔公园。卡尔·克劳断言：“不久以后，在所有公园里都能见到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中国人了，不知怎么的，人们已不记得他们曾经被排斥在外的事了”^①。

但是，中国人却记得很牢，即使那块虚构的牌子从没有存在过。

我没有拍下一张拉塞尔公司著名的19世纪的红砖货栈，因为我没乘汽艇到江上去游玩。也没有人能帮助我肯定地认出这些货栈，尽管它们是归中国政府所有的。耿丽淑有一张1952年的地图，地图标明，在宁波大厦隔壁，从苏州河桥起的第五幢大楼，是中国招商局。正是这家招商局买下了拉塞尔公司——这是一家美国公司，它在1834年以来一直垄断着对中国的贸易。从外滩公园的隔墙望过去，我能看见那些低矮的红砖建筑，如果这是原来的建筑，那它们便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早期活动的最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了。

^① 这些引语都引自卡尔·克劳所著《鲜花王国之中的洋鬼子》一书。他在上海做广告一直做到1937年。那一年中国轰炸机打算轰炸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结果反而在PALACE饭店和沙逊大厦周围误杀了数百名平民，包括几个美国人。沙逊大厦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在一周之内，5000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撤离了上海。——作者

最后一批“老上海”

耿丽淑和路易·艾黎是从20年代就开始同中国打交道、至今仍生活在中国的老中国通中的最后两位。耿丽淑是1926年奉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派遣来中国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38年，当时她参加了我们的工合委员会在上海创办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她非常漂亮，举止优雅，和蔼可亲，很有教养，一句话，她的的确确是我历来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之一。我们美国人在中国有这样一位榜样，是一件荣幸的事。

“是的，我在这里确实感到快乐。”她1973年这样对我说。看起来也真是如此。她身着蓝色的棉布中山服，双眸明亮，肤色红润，虽已75岁高龄，仍每天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她从1930年起除了回美国的时间外一直住在上海。

“你怎么会到中国来的呢？”我问了这个通常的问题。

“我生在匹兹堡，后来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和辛辛那提以及印第安纳州住过。父亲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读高中时，我在州的卫生委员会当过公共卫生和细菌学的技术员。我学过植物学，为了增加学分旁听过一门细菌学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我选修了一门医学社会服务课，并在贝勒大学选修了另一门暑期课。当我学满3年从学校毕业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一个为田间劳作的人工作的机会，干这

份工作需治的患者中有许多都是农村的穷人。

“当时，马萨诸塞总医院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前头的。蒲爱德当时刚刚毕业。有人告诉我们，她将来印第安纳考察社会工作，因为她将去中国为洛克菲勒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一个社会服务部。这是大约 1923 年的事。她在印第安纳逗留了一周，其中有一天是我和她一起到处参观。蒲爱德在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时，她问我：‘你愿不愿跟我一起去中国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然而，我已经同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我以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做学生工作的干事的身份于 1926 年来到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在上世纪末开始那项计划的，该计划既在中学又在大学里实施。我学习中国生活方式的第一课是这样上的：珍妮·沃德给我们这些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外国干事们带来了在武汉的莫德·拉塞尔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吃的大米是配给的，我们睡觉时洗脸盆就放在脑袋旁边。几天前，当我徒步经过一个窗子前的时候，一颗子弹从旁边飞过，而我被什么人给按倒躲过了子弹，因为我衣服的颜色同对方军队军装的颜色一样。莫德是 1917 年作为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来到中国的。

“基督教女青年会试图使学生们对现实的经济状况，包括工业情况和乡村的惨状采取批判态度。在夏季讨论会期间，我们将以此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把学生和产业工人结合起来，并让学生深入到工厂去。女青年会为产业工人制订的计划没有宗教内容，它还为工人们开办了文学讲习班，启发他们的觉悟。

“我在 1931—1932 年期间第一次回美国休假的时候，在

苏联作了停留，并在莫斯科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在1936年初再次回美国，同年8、9月间返回中国。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在华北进攻中国的时候，我正在上海。

“1940年底，我回美国居住，但是1946年7月基督教女青年会要我重返中国，于是我又在中国呆到1947年底，总共1年半时间。后来我奉命回国向设在纽约的全国委员会报告工作。我在返程中在印度作了逗留，住在设在德里大学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分部。

“在那次纽约的委员会会议上，给了我5分钟时间要我概述一项有关中国的计划。我说，在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应该努力为一个革命中的国家培养青年领袖。全国委员会主席吓得急急忙忙走出了会议厅。

“直到1951年，全国委员会还没有重新雇佣我，虽然我还不到55岁这个最早退休年龄。我把一生中25年的光阴献给了基督教女青年会，而如今我的事业被终止了。他们说，我在60岁之前不应当退休，因此他们这样做就是在减少我的生活费用；唯一公正的事情是继续支付工资，直到60岁为止。后来我收到了一封信，说已经这样办了。还有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子也是在该会工作25年之久的老成员，委员会也通过了一项向她支付工资直至60岁的决定。到65岁将开始付年金。但是我在中国分文没有拿到。这钱是记在一个冻结的帐户上。律师认为应当记在纽约的一个帐户上。财政部只批准可以扣除个人资产保管费。我甚至付不出给艾拉·戈拉宾的律师费。”

我一到上海，耿丽淑就到宾馆来看望了我，后来又去机场为我送行，但是直到有天晚上我在她家吃饭之前，我们没

有时间交谈。那天晚上，她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对我谈中国福利会的情况和与我的《近代中国妇女》一书有关的某些更正和新信息。她住的是高墙大院里面的一所私人平房，小花园里建有一个防空掩体，一个管家住在一间后屋里。起居室里有一个非常老式的小煤炉，烟囱很长。她不断地给炉子加煤，房间够暖和的，可我却穿了一层又一层驼毛毛衣，因为曾有人告诉我耿丽淑的家总是很冷。晚餐我们吃的是从美国弄来的梅子布丁罐头。以此作甜食未免太奢侈了。她通常还是吃中国饭菜。房内的陈设很简单，有些书和花草。她每天早上仍然到少年宫去上班，有时候在她狭小的住所里款待一些游客。自她 1952 年在上海定居后的这些年来，只有两个外国人——她和谭宁邦——在中国福利会工作。

耿丽淑在中国最黑暗的严酷年代——1927 年、1937 年和 1947 年——都呆在中国，而且，按她的说法，她一直是“中国人的朋友”。她有同中国人和好相处的诀窍——具有魅力，机敏睿智，自我约束和堪称楷模的清教徒行为。当然不论讲什么语言，美丽——不仅外貌美，人格也美——肯定是有帮助的。她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真心谦恭的美德。我记得，很早以前，她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如果我没有到过中国，我永远也不会对社会主义和所有这些事情有所了解；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文化革命期间，开始时让这两个外国人参加了学习，但后来不让他们参加了。

“不，我对 1952 年返回上海定居并不后悔。我来中国首先是为了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过得很愉快，我在这里比在美国更容易适应。”

1952 年她刚到上海的时候，鲍威尔（J·B·鲍威尔的儿

子，《密勒氏评论报》总编辑，后来成了麦卡锡的受害者）曾邀她住到他们家去。但她起初住进了“宋子文的旧居”，那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孙逸仙夫人不愿让这所房子空着，所以中国福利会的其他几对夫妇搬了进去。1966年有通知说计划把这所房子恢复原样，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所有的人都搬了出来。我当时搬到了汪精卫故居对面豫园路（现在很繁华，且建了一些工厂）上的一座洋房里。”只是最近她才搬进她现在的私人住宅。

我知道，耿丽淑1930年左右在上海一直是那些探索解决中国所有难题的办的社会工作者之一。这些人中有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易·艾黎那些人就属于这类，另外一些人就是像加利福尼亚海沃德的莫德·拉塞尔这样一些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子也参与这方面的努力。一个又一个事变使人们认识到，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一项激进的纲领。

“我对我1946年或1947年抵达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记得很清楚。我的住房在一条弄堂里，一次我出门去给一位教师——一位女青年会的女子——送个口信。但是在弄堂里，她被两个带左轮手枪的男人推进了一辆出租车。他们盘问过她之后，把她投入监狱，并发配到了别处。他们是在搜捕一名真共产党员，此人先前曾在女青年会呆过一阵，名字也与这位女教师相似——但这毕竟是一桩张冠李戴的冤案。在女青年会的努力下她获释出狱回到家里，可是得一星期作一次汇报。最后她到了香港。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报道。”

耿丽淑从最一开始就是孙逸仙夫人圈子里的重要一员。“‘保卫中国大同盟’于1938年即孙逸仙夫人从上海移居香

港后在香港建立，她派梁士纯作为代表在上海同进步人士会谈。我是他举行的午宴上唯一的外国人，并当上了英文秘书。

“1940年我回美国的时候，设在纽约的援华理事会要我到该委员会工作——他们向孙夫人的大同盟提供援助。该委员会秘书米尔德丽德·普赖斯和菲利普·贾夫想同中国联合救济署亲民主势力和基督教徒等继续保持联系，但是，大约就在我于1946年准备返回中国的那个时候，我们撤了出来，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呼吁会，从香港迁到了上海。我当时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执委。1947年我回美国时，孙夫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我解释说，我已做好退休的准备，退休前我就在美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工作。‘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同我们一道工作。’她说。

“这对我是一段宝贵的经历。我在纽约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国际处工作过，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还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社会保险分会工作过，负责同全国委员会谈判。我1948年1月到纽约时，我们开了一次分会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合同期满后，我们应当退出这个全国组织，参加别的组织。我们意见没被采纳。”

当时，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争取对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耿丽淑是主要组织者之一。我是大力举荐她的人。她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资格主持这样一个联络机构。他们出版了《远东通讯》，由莫德·拉塞尔担任执行秘书。“全国委员会开了会，宣布解散这个委员会。莫德说，我要继续出这个刊物。她一直出到现在，自愿帮助她的人却寥寥无几。她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下来。”

我听说莫德是用她自己的钱加上订费来出这份刊物的，

而且自掏腰包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波。1973年她已80高龄。正如耿丽淑所说，自她成年之后，她的全部心血都用在为中国工作上。

我心中暗想，中国是否感谢她，甚至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成问题呢。

“你遇到过排外的问题吗？”我问耿丽淑。

“没有。中国人确实是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的。”

“中国人还把基督教女青年会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有吗？”我又问。

耿丽淑的回答很客观：“最初创建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为了帮助英格兰工厂中的女工。它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有。女青年会在中国的贡献是，当妇女在社会中没有地位的时候，青年会使她们有一个发挥领导作用的渠道。青年会从未自认为是传教集团的一部分。我们不同传教人士打交道。我们帮助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中有些人成了反动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我们确实也为产业工人做了一些工作。”

在上海时我听说女青年会的委员会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她们的纲领在当地受到严厉的批判；还听说女青年会夜校的一位教师被警察抓走了。

耿丽淑现在的工作是担任中国福利会的“顾问”，她是孙逸仙夫人最亲密的知己。因此，她说话总是很谨慎，对有关孙夫人的事噤若寒蝉。不过她主动地讲了这样一件事：孙夫人1951年荣获斯大林和平奖之后，把这笔钱捐给了中国福利会，用来修建一座妇幼保健医院。大约从1949年起，孙夫人还发起创办了《中国建设》，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俄语等几个版本，但是杂志上从来不写编辑部成员的

名字。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一座很宏伟的建筑，地址是常熟路157号。这座硕大的房舍是在1949年接管的，以前那是上海妇女俱乐部一年一度演出歌剧的地方。少年宫中有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剧场，还办有一份中国杂志。

“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们也吸收工人家庭的孩子到这里来。而在那以前，到这里来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少年宫里有舞蹈班、芭蕾班和乒乓球班。自文化革命以来，舞蹈表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这些舞蹈中最受欢迎的大概是《采茶舞》和《洗衣舞》。

孩子们从事的手工包括剪纸、素描和油画。此外还学习中医、造船、造火箭以及农业方面的知识。在农业方面，孩子们还研究920生长素。自文化革命以来，有经验的工人也到少年宫来教孩子们学习使用车床。这里很重视体育活动，托儿所内正在进行让孩子洗冷水澡和为了健康起见到户外睡觉的试验。

耿丽淑是极少数已经完全适应了在中国人中生活的外国人中的一位，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她也有点中国化了。作为临别赠礼，她送给我一枚纪念章，上面写着毛泽东的那句曾惹得俄国人不喜欢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

要想估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们以往所做的艰苦工作和发挥的真正影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莉莉·哈斯已于几年前作古；梅·巴格维尔住在一位朋友马里兰州桑迪斯普林斯的休养地。伊迪思·莱里戈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做过学生工作，她出身于菲律宾的一个传教士之家。我的朋友、马尼拉女青年会干事波利·巴布科克同安妮·格恩里一样曾协

助工合委员会在马尼拉开展工作，她们都是具有社会良知并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事的人。

孙逸仙夫妇在前法租界的旧居

我很想再次见到孙逸仙夫人，但是人家告诉我说，她正在接受治疗，现在身体不好，不能见任何人。她托人带了一件礼物给我，还有一些我的《现代中国妇女》一书所需要的新材料。我那本书中有一些写到她和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姐姐孔祥熙夫人的章节。蒋夫人现在仍是台湾的第一夫人，孔夫人自 1949 年以来一直住在美国，即在靠近纽约市的里弗赛德。

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多重革命合而为一、同时又分成不同阶段的国家才可能有一位像孙夫人这样代表着自 20 年代和孙中山时代以来的连续性、并受到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敬重的人物。孙夫人于 1949 年当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并担任此项职务至今，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

这栋有 5 个房间的房舍位于前法租界的一条以前叫莫里哀路、现在叫香山路的街上。“孙中山和宋庆龄是在 1920 年 1 月搬进这座房子的，”这个展览馆的馆长说，“这房子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为孙博士买的。”当时孙夫人还是位年轻的新娘，刚从佐治亚州的威斯理安学院毕业不久。

“这座房子仍然属于宋庆龄。她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要来这里看看。她是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的属于中国人的部分时离开这里去香港的。日本投降后她从香港回来，没在这里住，但她常到这里来。”

房子里的陈设还同孙逸仙博士生前住在这里的时候一样。他是1925年3月12日因患癌症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医院）的。

我们顺着宽大的楼梯朝楼上走的时候，馆长说：“孙博士在这楼上的房间里接见过共产党的代表，讨论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问题。”

卧室内挂着一幅镶在玻璃框内的丝绣，绣的是一只极可爱的猫。还有一幅木刻，表现的是苏联第聂伯河的一个建设工地的情景。

墙上挂着孙博士和他夫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一般都是穿着西装的，直到他发明了中山装为止。自从他发明了中山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员就一直穿这种衣服。有一幅照片拍的是这令人艳羡的一对站在中国政府所拥有的第一架飞机旁边。还有一张是他们在1923年结婚纪念日那天拍的。1922年的一幅照片是“广东叛变”的时候拍的。另外一幅照片是1924年11月孙逸仙举行群众集会发布北伐命令、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拍的。还有一幅是年轻漂亮的孙夫人，身穿领圈带花边的衣服，坐在那里读书。

你若研究一下孙逸仙的藏书目录，你就会了解他的为人。这个藏书目录表明他的兴趣很广泛。我抄下了一些英文书籍的书名——有关于医学的、法律的、造船的；有关于海军事务的、关于合作社的（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因为孙夫

人曾帮助我们发起工合运动)、关于各国宪法的,其中包括《印度联邦政府文集》;有关于朝鲜、俄国、英国、美国的;有关于法国革命的。还有莱基的《民主论》,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罗伊斯的《逻辑学》,柏格森的著作。狄更斯和莎士比亚的书籍很多。我还看到埃利斯的五卷本的《性心理研究》。

我在1932年的时候也来过这里,那是在我们即将乘船到东京去举行婚礼的时候。孙夫人在这座房子里请我们吃了晚饭,还送给我一只银制咖啡壶(我保留至今)。

埃德加·斯诺主要是由于结识了孙夫人才有兴趣弄明白中国的真相和实情,而不拿政府免费发给的新闻通报。那时我阅读了他写的关于孙夫人的文章,了解到她的生平,我才第一次开始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我立即思考,孙逸仙夫人在她的一生中要选择什么就可选择什么,然而她选择了危险和自己孤立的荒凉道路,为左派举起火炬。为什么呢?当我不断地研究中国时,我越来越认识到她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赏识她,我也尊重她的意见,她是完完全全真诚和爽直的。

这幢盖得像一座要塞、结构简单的方形房屋隐藏在一堵高大的院墙后面,前面有一个可爱的花园。“1922年9月在这个花园里开了一次会研究改组国民党,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有共产党党员。这幢房子是我国政府十分宝贵的纪念物。”

当我们在花园里行走时,管理员又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树木被砍,地板被毁,一些纪念物被偷,日本友人送给孙博士的一把剑也被偷走。日本投降后,那把剑还回来了。”这把剑陈列在那里。在中国,人们总要在某处碰到牵连日本的事情。

这幢房子是件活生生的纪念物，使人回忆起 20 世纪最伟大的婚姻之一，也是 20 世纪最有吸引力的名人中的两个。

在我穿过这幢房子时，我确实非常激动地认识到我属于孙逸仙夫人的时代，虽然我是较年轻的一代。“工合”运动的最初成员全都如此，不仅我的丈夫和我，路易·艾黎和耿丽淑如此，而且其他在生活中只简短接触过孙夫人的人或只通过看报了解到她的人也如此。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如 1927 年的文森特·希恩和同年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或一些英国人，如詹姆斯·伯特伦、约翰·利宁、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洛蒙利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在埃德加·斯诺于 1972 年逝世时，孙夫人发表了颂扬他的悼词，她说：“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感激埃德加·斯诺打开到中国的大门。”

在我参观孙逸仙故居的同一天，我前往 1921 年 7 月 1 日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那幢房子，因为这幢房屋也座落在以前的法租界。由于我在此之前已跟随毛泽东的足迹游历了湖南，这次游历使我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另写一本书，因此我将在那本书稿中叙述这次成立大会的情节，因为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少到上海去，这是其中的一次。

我 1940 年 12 月离开后再次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休伯特·梁和他美丽的妻子到我下榻的旅馆来看望我，畅谈往事。休伯特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斯诺在中国的经历的一部分，他对我们的大多数计划予以帮助，还成为“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他是我们在 1934 年后最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也是知道我在中国做了多少工作和我是花了多少力气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但是，我将在我正在写的关于我所了解的人的另一部书

中叙述他的情况。

我要求见“工合”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弗兰克·林，可他患癌症动了手术，病得太重，见不了客。

鲁迅纪念地

在中国现代史中6个最有吸引力的中国知名人物之一是鲁迅，他于1936年10月在上海去世。他不仅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出了光明，而且咒骂了黑暗。早在1919年新文学运动时期，他同胡适博士和陈独秀一道发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像毛泽东和林语堂这样不同的人物都认他为导师。他是那些心地正直和诚实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牢牢地掌握一个真理。他是中国现代文艺和现代评论的祖先。他懂得西方文明的价值，尽力把它带到中国去。他不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们仍然认他为导师。他在上海的故居已成为一个里程碑。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他在日本读医，但是转而以从事文学和杂文作为他的职业。在1925年，他同许广平结婚。许广平成为一个妇女领导人。她于1968年在北京与世长辞。他们生有一个独子，名叫周海婴，他现在是北京的一个电台技术员，担任他所在的部门的副主任。许广平在1925年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同鲁迅结婚，鲁迅当时在她的学校里任教。

1926年，鲁迅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而许广平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这是广州的革命活动处于高潮时期。

1927年，他们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那里居住到1936年鲁迅去世。他的妻子继续住在那幢房子里，在那里出版两份杂志。据说，在1937年，她由于搞地下活动而被日本兵抓走，并遭到严刑拷打，可是，我不能确定这是真实情况。据说，在1937年以前，她同郑振铎一起在上海组织复社。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史学家，我有时同他谈论那个题目。

我参观了座落在以前日本租界的鲁迅故居，郭沫若书写了标明鲁迅故居的题字。这个寓所是1950年修复的。那是一幢小小的住所，在一堵墙的后面，楼上有一间房，鲁迅像显得栩栩如生。

管理员说：“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他在1933年4月搬到这里，三年之后与世长辞了。据他的妻子说，这些摆设同他去世时这里的摆设一样，大部分陈设是他的。”

家具全是西方式的，十分简陋。我记得那个可怜发黄的旧藤椅，椅上放有坐垫，他在病中坐在那里努力工作。他的书桌是西方式的，桌后放着一把转椅，床有铁栏杆。保存着他的旧时钟，旧日历上的日子是19。一只玻璃书柜里摆着一些书，14本木刻书装在一一只旧皮箱里。他的妻子的缝纫机放在一个角落。地板是木头的，对一个快要死于肺结核的人来说，排除潮湿是最重要不过的。新添的唯一东西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关鲁迅的一段引语。这幢房子靠近山阴路，是一个现代化大院中最后一幢老房子。“许多日本人来这里表示他们的敬意。”

“40年的码头工人进城来” 成了上海滩上的常用语

当我在我下榻的衡山饭店一套优美雅致的房间里同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老码头搬运工人交谈时，我清楚地明白了中国的革命。在法租界时代，他连进这幢大楼都是不允许的。40年前，人们管他叫码头“苦力”，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一个人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虽然这些码头搬运工对这个世界第六大港口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我忘了问他以前是否曾同任何外国人交谈过。有人对我说，“他感到紧张不自在。这些老工人通常不愿谈，他没有见过多少外国人。”

他几乎是我曾经见到的最高大的中国人，肌肉发达，身体强壮。他看上去聪明，性格坚强。他是由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介绍给我的，名叫刘复之，做了40年码头搬运工，现在在杨树浦路上海港3区第8号码头工作。他邀请我参观这个码头，真正显示出自豪和好客，我喜欢他。

在我们交谈时，他的脸部使我感到困扰。我看到那张脸上有许多伤疤，甚至他的眉毛上也有疤痕。我得知，这些伤疤是由于皮鞭抽打他的脸而留下的，他的身上也由于遭到这种残酷的虐待而伤痕累累。

他的脸部和太阳穴静脉曲张隆起，我料想他的两条腿上

也有好久以前我在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腿上见到过的那种静脉曲张造成的可怕肿块。

他是苏北人。我不知道在长江流域竟有人长得那么高大魁梧。

“我们码头工人很高兴能同一位美国朋友交谈。”他说道。他说话时显露出他的牙齿由于营养不良或年老或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坏得很厉害。他接着说：“在旧中国，我们有一个说法，有18层地狱，码头工人生活在最底层。那时还不称呼我们为码头工人，大多数人叫我苦力和野小子，官僚资本家叫我们臭苦力。我们背重负，可是还会有更恶劣的遭遇：失业。当时那么多人寻找工作。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

“他们把我们的帽子形容为花儿帽，破帽沿像花瓣。他们把我们穿的衣服称为条纹衣，因为补钉上打补钉，看上去像图案。我们吃猪狗食。我们穿的鞋被叫做‘山羊线凉鞋’，因为这些鞋是稻草编的。”

我说，“你现在看上去很帅。”他穿一件漂亮的蓝色衣服，茄克衫的袖口扣紧，式样新颖，我以前从未见过，好像是一种宽大的短外套。

他笑着说：“我现在每月挣94元，而码头上平均工资只有75元。再过4个多月，我满55岁退休，到那时我将领取工资的70%。我现在当教员了。我带年轻人，教他们做维修工作。我给他们‘忆苦’，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我们在旧社会是怎样生活的。”

“1949年以前你在什么地方干活？”

“在汇山码头。那是日本人的码头，始终是这个名字。在日本人以后，那里成为一个美国军用码头，在那里卸武器支

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解放前，码头工人没有工资。没有工头的同意，我们根本工作不了。我们有‘四怕’——怕雨，怕冷，怕病，怕被解雇。要知道，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干活时死去。”

他逐渐喜欢同一个外国女子交谈了，谈得越来越起劲，开始生动地比划起来。他的脸部表情显得诚实坦率，有感染力。

“工头同资本家勾结，随心所欲地骂我们，打我们。我们遭到十分苛刻的虐待，于是就编了一个顺口溜：码头，码头，我们的悲惨生活没有尽头。我们常常说工头：你们吃人肉，不吐骨头。

“我可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知道是怎么回事。洪塔是个壮年汉子，在我20岁时他40岁。他身强力壮，一次能背400斤东西，可是，这样一个体格强壮的人却谋不了生。我们挣计件工资，但是，到头来我们所得甚少，因为我们遭到层层剥削。在日本占领时期，洪塔身体衰弱，因为他已年过45，再也背不了400斤，连200斤也背不动了，所以日本人把他解雇了。隆冬的一天，工头对他拳打脚踢，逼他离开码头，他无处栖身，只得呆在公共厕所里。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他冻死了。据我知道，像洪塔这样的情况有许许多多。

“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遭遇最惨。我们本来指望日本人投降后生活会有所改善，可以，接着美国帝国主义从后门进来了，我们遭到残酷的虐待，生活没有保障。1946年到1947年，青红帮取得控制权。他们同反动派勾结，我们连计件工作的工资也挣不到。他们要我们去上工，想给我们多少报酬就给多少。美国军舰靠码头的时候，我们就更遭罪了。一天，正在卸一些非常重的弹药箱，这些弹药箱是美国人运给国民

党反动派的。有一个人背不动，弹药箱滑到黄浦江里去了。他们说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于是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指控我们这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些人挨了毒打。他们说，这背后一定有共产党人指使，要我们告诉他们是谁要我们这样干的。每个码头上有牢房，在里面毒打码头工人。我和另外许多人被捕，他们对我们严刑拷打，想查明谁要我们把货物投到江里去的。我被带到警察局。

“他们对我上刑，把我捆在一条长凳上，把头颈固定在凳子上，把四肢系在长凳的四条腿上。他们把自来水浇在我的脸上，水流进我的鼻子和嘴巴。我的肚皮膨胀起来，耳朵遭到损伤。在把我摁在长凳上时还用装在一只茶壶里的辣椒水和煤油灌我的鼻子。他们一个劲地追问谁要你们把这箱弹药扔到水里去的。我说我们不知道。本来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他们还把我放上电椅，用通电的电线烧我的眉毛，所以在那儿还留有伤疤。在电椅上，通上电流后，我颤动得非常厉害，连口内后面的两只大牙也松动脱落了。

“我在监狱里蹲了 56 天，我不知道有什么要说的，即使有，我们也不会说出来。这是舟山路华德路监狱。在这个监狱里，我见到许多人，大都是劳动人民，拉车夫、小贩等等。那次逮捕是在 1947 年。

“解放前，我们认为我们生活悲惨是由于命苦。后来，我们终于懂得，根源在于剥削。共产党第一次教我们思考：谁养活谁？谁维持谁的生活？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剥削阶级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解放后，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想我应停下来讲几句话。我说，“我肯定上层阶级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老害怕风潮、绑架等等。他们住在中国什

么地方都怕。在 30 年代，具体说，在 1931 年和 1932 年，后来又在 1937 年至 1938 年和 1940 年，我住在上海。也许我在码头上见过你当装卸工搬运行李。”

“那么你会记得，当时许多人死在街上，特别是冬天，那是司空见惯的。解放前，我们无处栖身，不得不在街上游荡。当时的政府是腐败的，国家权力不掌握在工人手中。但是解放以后，一切的一切都变了。1950 年，我生病卧床 1 年零 12 天。要是在解放前，我早就死掉了，但国家为我治好病以后，我又挣得全工资。医生给我注射了许多青霉素，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我患病是由于过去伤了身体，工作过分劳累，挨打受刑，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我几乎瘫痪了，发高烧。”

他没有说是不是有哪个美国人打过和虐待过他。1945 年，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援助返回来，接管了整个上海，包括警察局。我想我应发表点意见：“你知道，青红帮在 1946 年以前很久，至少从 1927 年起，就在上海控制了码头搬运工人。他们控制了上海的工人，也控制了嫖赌行业。蒋介石 1927 年得以从工人手中接管这个城市的唯一办法是依靠青红帮的流氓及其头子杜月笙。当时他们屠杀了大约 5000 名工人。这就是工人的境遇如此糟糕的原因。不仅你们劳工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和最受虐待的，而且除此之外，劳方和资方都必须向流氓支付‘保护费’。”

这位老码头工人点点头说，“当然，青红帮一向控制码头，这是我们处境恶劣的一个原因。但是 1945 年以后，境况更恶劣得多，因为那时准许他们为所欲为。”

我很感兴趣，这个人没有谈到完整的部类，而是把他们

分成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者”。革命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改变命运，一种崭新的心理产生了。

“现在，码头工人决心更好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以更高的工作热情为人民服务。工人在对待偷窃的态度方面发生了一大变化。解放前，我们有偷窃行为，但是现在很少了。广大码头工人非常强烈地反对这种行为。如果一个人偷了一点儿东西，广大码头工人就会感到那是大家的耻辱，而且那损害运输局的名声，给整个工人阶级丢脸。我们认为，偷窃是资产阶级思想，无论什么人偷窃，都将受到广大工人的批评。

“解放前偷窃活动比较多，因为码头工人遭到残酷剥削，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去偷。在码头的出口处，他们总被搜身。现在我们根本没有搜身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企业和国家的主人。现在这种案子很少，因为舆论反对很强烈。”

我没有提及我在1945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书。在那些日子里，几乎不可能同任何码头工人交往，如果一个人向任何外国人提供情况供发表，他会立即丢掉工作，或被那些流氓惩罚。

使我感兴趣的一件有关中国劳工的事是：中国劳工势力很强，不容任何外国人，包括朝鲜人、日本人、白俄难民或任何黑种或白种码头工人或水手在港口出现。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从任何中国人手中抢走过工作，非中国人不准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在外国租界，用一些外国人当警察和雇佣“志愿兵”，一些朝鲜人开起了自己的杂货店。1949年以来，可能也没有一个外国人从中国人手中抢走过工作。准许外国人担任外语专职，雇用很少“专家”，准许他们教中国人学外

语。到 1972 年，全中国只有大约 150 个外国“专家”，他们中有些人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

在中国古时的部落民族中，外国人除了享有来宾的礼遇外享受不到任何权利。因此，中国人往往对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任何国家的做法表示同情，不管那些外国人已在那里呆了多久，虽然许多中国人已移居到地球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并发现在那里的境况是同当地人竞争。全世界古时的部落少数民族都是这样：一个陌生人一露面就可能被杀死。这是内部集团生存下来的手段之一。

《海港》

码头的一大帮人在他们的革命委员会一个姓许的代表带领下，同那位老码头搬运工一起到衡山饭店来拜访我。他们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码头，并要演出一个特别节目。可是，在这时我感到太仓促太疲劳，无法在一个刮风寒冷的日子长途跋涉到杨树浦去。许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我，他说，他读过《中国红区内情》，还在报上了解我，留有好的印象。他开始说起来：“我们是代表上海港的全体工人到这里来的。上海港有 13 个装卸区，这批人来自杨树浦路三区。现在三区有 2700 名工人，其中有 400 名女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装卸上海至青岛、大连和天津的货物。”

“我想那包括有名的青岛啤酒。”我说道。我已在中国到处见到这个商标。

“是的，不但有啤酒，还有矿泉水。我们还为进港的一些外国船装卸货物。1952年以来，我们区的码头工人一直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和掌握主动权的原则。在解放前，仓库和码头几乎被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毁掉了。这个码头是1949年之后的20年中重建的。五分之一的仓库是解放后重建的。解放前，不管货物多重，不管距离多远，样样都是由码头工人用扁担挑、用肩扛的。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期，码头工人的社会主义热情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用双手制造机器。我们现在有170台机器——起重机、小型拖拉机以及一台多种用途机器。

“现在，装卸和陆上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不管楼房多高，所有货物都用机器搬运。现在几千吨重的货物用机械轻而易举地就吊上去了！”

“有关上海码头的第一部戏剧是1960年编成的，名叫《海港》。它让人们看到我们创造的奇迹，我们的码头和港口多么雄伟壮丽，一排排机器准备战斗。”

我在记笔记，抬起头来看到桌子周围一双双炯炯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除了那位码头搬运工人外，他们都穿蓝色棉中山装，戴一样的帽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戴在头上（士兵也这样）。

“你们喜欢这出戏吗？剧本切题吗？”我问。“在美国没有人歌颂码头和码头工人，没有人写赞美他们的戏。”

他们自豪地异口同声说，“我们喜欢。”

“我们把剧中主角的真人带来见你了。她名叫张凤芝，苏北人，她是共产党委员会的书记，现年42岁。”

中国现在不使用“女英雄”或“英雄”这个词，因为个

人主义色彩太浓。

她在回答问题时说，“我14岁就随我父亲到码头上工作。我最初的活是铲煤，那是在1945年，即解放前4年。”

“她现在是码头上第一批女驾驶员中的一个，开起重机、卡车、多种用途机器等。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减轻了劳动强度。1952年我们的码头刚建成时，年装卸量为23万吨，现在每月的装卸量就是32万吨。

“我们的日装卸量相当于解放前40天的装卸量。生活条件由于生产率提高而改善了。文盲基本上已经消灭，许多码头工人组成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由于进出口业务的发展，我们还组织了英语和日语学习小组。

“我们还组织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和业余文艺小组。在业余时间，文艺小组编写了有关工人自己的小说和剧本。虽然我们的演出水平不高，但是码头工人喜爱这些剧。如果你喜欢看这些剧的话，我们邀请你去看。”

“你们有报纸吗？”我问道。

“没有，我们没有专门的报纸，但是我们有医务所、小卖部、幼儿园和澡堂。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有时候，货物受到损坏，发生诸如轧断手指头等这样的事故。总的来说，机械化水平还不太高。”

戏剧主角现在有发言权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已被码头工人选入区革命委员会。她说：

“我不是老工人，但是我了解解放前的码头，当时成千上万工人病死饿死。我父亲在码头上做了50多年临时工，他养活不了全家。我的两个姐姐当童工，现在一个姐姐已退休。我父亲现在70多岁了。

“解放前，我们不住在一起。我的两个姐姐住在工厂里。我14岁时，父亲带我到码头上去铲煤，为的是不丢掉饭碗。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时，通常会被解雇，我父亲靠女儿帮着完成工作才保住饭碗。现在我身体强健，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弱不禁风，工头瞧不起我。我每天工作15或16小时，工头经常骂我们两人，我们脸上粘满煤灰发黑，他们叫我们‘黑炭’。

“我母亲也在码头上工作，另外还有几个妇女。她们也有刘先生告诉你的那“四怕”，还加上一怕：如果她们怀孕了，她们就要丢掉工作。

“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人瞧不起，特别是妇女，受到很大的轻视。但在解放后，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

“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受过任何技能训练，但在解放后，共产党培养女工，给我机会去学习掌握一门技术。我感谢党使我有机会接受教育。

“解放后，老师傅说，你过去只是个低贱的工人，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你过去铲煤，现在有了技术，他们这样说时，我内心激动万分。在老工人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操作几种机器。这些机器减轻了码头工人的重担，我为能帮助他们而感到骄傲。我开一次机器，能做78个到80个码头工人的工作量。

“当我开动机器时，我确实认识到我们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像毛主席说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一直勤奋努力工作，毛主席和共产党充分信任我。我作为劳动模范几次上北京见毛主席。我在1956年4月24日下午4点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见到了他（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月，毛主席几次

出席了会议，并同我们交谈)，我同他握手，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说不出话来。接着他又问，我回答说，‘在上海码头上。’我非常紧张和激动，所以讲不出第二句话。我回想在旧社会我被称为又肮又臭黑咕隆咚的苦力，如今，我成了国家的主人。

“当我们站起来排队准备照相时，毛主席出来了。你知道他多魁梧，一双手多大，脸色多健康。他情绪很高，我们很高兴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在前排只有5名妇女。当毛主席走过时，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他把手伸向我旁边的女孩。她比我矮，所以我从她头顶上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而没有让那个女孩握他的手。在握手之后，他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非常高大魁梧。有一支中国歌曲，名叫‘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是见到毛主席’。”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为她鼓掌，可以看出他们分享着那种表露出来的荣誉感，神秘气氛顿时充满了房间，并且非常现实。（我注意到，没有人戴毛主席的像章，只有那个老码头搬运工人戴着一个大像章。这表明他们对新的形势很敏感，在北京现在不戴像章了。）

“你挣那么多钱，余下来的钱怎么办？”我问道。

“我们不把挣的钱全花完，我们把它存入国家的银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银行付给利息，但我并不是为了利息存钱，而是为了帮助国家的建设。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我们曾经在睡梦中想的还要好得多。就我来说，妇女的地位也提高了。上海的革命委员会现在由工人参与组成，其中有女工。我们在1972年7月举行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工人的问题。”

“我想知道你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我知道提这样的问题是很不礼貌的。”

她高兴而自豪地告诉我：“我们在银行里大约存了1000元。我们还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我家离我工作的地点很近，走走过去就行了。我们还买了一台收音机、一只木料很好的衣柜、一台缝纫机……”

“上面有熊猫吗？”我问道，我在中国到处看到熊猫。“中国去年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的那种熊猫。”

“喔！有的。我们喜欢熊猫。我们知道玲玲和兴兴的情况。”

她看上去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脸蛋儿富有吸引力，性格逗人喜爱。

我说：“对我来说，甚至同一个不发牢骚、不诉苦、不感到不满意的人坐在一屋也是一大乐趣。在纽约，在街上捡垃圾的人一年收入12000美元，即超过24000元。而你们拥有用金钱永远也买不到的东西。”

她的两眼闪闪发光，微笑着点点头说：“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您明白，我不会忘记解放前我们住在草席搭的茅屋里。现在我们住三间房。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间房已经是座宫殿了。我们将来会住得更好。”

我抬头看看我的翻译邓秀梅，她是中国第一流的女子精修学校上海圣玛丽女中的毕业生，她向我笑了笑。资中筠曾在最好的天津学院学几种语言，她像通常那样思考问题，正向无产阶级“学习”。

本来以为这样一个女子会冷酷无情，倔强、失去女子气、粗俗，作为女性令人讨厌，但是，这个妇女显然丝毫没有这

些习气。她有风度，非常聪明，手脚伶俐，特别是有可爱的性格。

新上海

我的主要陪同来自上海友协，名叫李莉，头发灰白，是新四军的女英雄，在上海教育局工作。当我们驱车游览市容时，我通过我的翻译蔡凯伦小姐记笔记，她是上海人。（真是件稀罕的事，她就像纽约市人。）

“上海有1万家大中小型工厂和190个农村公社，有100万产业工人，其中妇女约占35%。”

“上海革命委员会是在1967年文化革命的1月风暴中诞生的。它由老中青三结合组成，还结合老干部、工人和农民。副主任周丽琴是女的，来自嘉定公社生产大队。另一位女副主任是工人代表王秀珍。”

“上海市内有10个区，郊区有10个县（农村公社在县里）。”

上海在1967年发明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政府形式，现在全中国使用这个形式。在上海，革委会有100多名委员，掌管将近1000万人。女干部占委员的25%。

在上海，有人告诉我，该市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在

别处，有人对我说，沈阳名列第一。^①产业工人提供强大的政治基础。

上海太大了。

李莉告诉我说，“离开上海的人正兴建卫星城。”

这是重要的，因为上海在遍布各地的一个网络中有一种校友关系。到1972年，已有100多万青年人离开该市，分赴偏僻的地区。北京政府1974年说，已有800万青年人离开大城市前往农村。

李莉解释说，“1968年底，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到1971年底，有80多万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前往农村。离开城市的许多青年在各地当选担任了省、地、县政府机关的领导职务。

“到1971年底，在上海市一个地区上山下乡的21万青年人中，我们收集到这些数字：2339人加入了共产党，31706人加入了共青团，14389人被选入公社和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一大批青年当上了教师和赤脚医生。”

“这个数字表明青年人是在健康地成长，特别是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他们在健康地成长，他们继承了他们的先辈的光荣传统。”

^① 上海人口有1082万，包括郊区；而东北的沈阳人口为241.1万。纽约市的城市区有11528649人口，东京有11454000。

沈阳的实权人物是陈锡联，湖北人，属老一辈的军人。他随第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从1959年起，他任沈阳军区司令。从1968年起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1973—1974年的改组中，他被调去掌管北京军区（包括内蒙古、山西和河北省，这些地区存在来自苏联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不像他以前掌管的同西伯利亚接壤的东北地区那么大。）——作者

这些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它们意味着，在城里的年轻人抵达后，乡下人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但是，这些青年人不是出城去影响内地的产业无产阶级。就我所能查明，工厂没有派遣任何工作队到农村地区去，这只是通过共产党进行的。

“上海现在是中国最先进的地方吗？”我问道。

“在某些方面，上海处于领先地位。你可看到上海的工作发展不平衡，因为起点差。当然，上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变革之后，但是人民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我们有许多医院，在市、地、县、甚至街道委员会都有它们自己的医院和诊所，公社和生产队也有。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应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既训练赤脚医生，又培养专业医生。”

“文化革命以来，国家建造了许多新住房，主要是为工人盖的，四分之一的工人现在迁入了这些新房子。”

李莉是一位青年和教育问题专家。

“由于上海的人口集中，我们有许多文教机构。我们有1000多所中学和中等学校，自1949年以来增加了14倍，学生人数的增加远远超过14倍。中学生有130万。在5000多所小学中有160万学生。我们有15所高等学府，其中包括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和3所医学院。1949年后，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

“（一）改变教育部门的领导。如毛主席所说，过去教育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现在我们增加了工农子女的入学人数。在文化革命后，工人阶级进入教育

机构，参加管理。他们同年老的和年轻的干部一道工作，他们带去了新思想。在文化革命前，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学校工作的重点放在分数上，学生更注意升学的机会。在文化革命和工人阶级来到之后，进行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还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为人民服务，不争个人名利。

“（二）学制已缩短。大学现在读3年到5年，中学读4到6年，小学读6年。实行了10年普及教育。

在文革之前，学生偏离正道，追求个人成名成家。有些工农的子弟受到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忘记了真正的工农的优秀品质。有这样一个说法：他们在第一年生活简朴，第二年成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到第三年，他们认为他们的父母不值得一顾。

“（三）在文革后，重视了思想教育，因此确立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学生上山下乡，同那里的工农相结合，现在这是很普遍的。自文革以来，已有1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主要是去经受劳动锻炼和接受工农的思想再教育。这不是指‘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培养干部的。这些青年人上山下乡，去开辟一个社会主义新天地和改造他们的思想。在农村经过几年的生产劳动后，有些青年将进大学读书，有些青年将分配到工厂工作。”

上海群众对一个外国人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不敌对也不友好，这可以容易地感觉到，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前的买办文化已消失，但有些心理依然存在。外国统治时代的中国人现在大多已去世，但他们的孩子依然在。有人告诉我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当然有危险的资产阶级分

子。”

上海一度是半个中国的贸易出口口岸，现在仍有巨大的潜力。虽然1949年后外贸几乎中断了，到最近才大规模恢复，但是沿海贸易一直没有中断。上海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工业基地，又是政治权力中心。

突出的事实是上海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虽然这个城市以前从来不是他专门管的地区，而更倾向刘少奇。他依靠他的妻子江青领导的青年运动施加了影响。过去很少从上海的买办结构中产生创造精神，甚至劳工运动也充满了流氓行径。

作为权力基地的上海的重要性在于上海的王洪文在1973年举行的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上被挑选担任次于毛泽东的副主席。这意味着他成为毛泽东，甚至于周恩来的最终接班人。他在年轻时看上去很像毛，甚至表情也一样。当毛在紫禁城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王洪文在门口迎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继任的袈裟正披到王的肩上。

上海是操纵中国的前途的杠杆，而王掌握着这根杠杆。王作为在部队中一级级升上来的领导人把杠杆转向“无产阶级的”方向。

王是上海国营17棉纺织厂的一名共产党干部。他在那里贴出了第一张墙报，不仅攻击上海的共产党官员，而且攻击北京的共产党官员。他是1967年“一月风暴”的领导人，也是接管上海共产党总部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创始人。他在1967年2月领导组织中国第一个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1968年2月起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任。1969年4月，他被选入共产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

当我于 1973 年 1 月在上海时，王是上海市党的第三把手。然而，几个月后，他成了全中国党的副主席，站在毛泽东旁边，在第 10 次代表大会上致词。他穿着一身军装，这向 800 万人表明，他对武装部队行使权力。据报道，他曾是上海的一个保卫干部。

王是 1973 年选入政治局常委的唯一年轻人，时年约 48 岁。摆脱论资排辈的死胡同的最好办法也许是，完全绕过这条死胡同，及时挑选“新青年”中的一个，由年迈的毛泽东亲手把自己的袈裟披在他身上。王可能已在暗中被培养了一些时间。在北京有人告诉我说，正在为将来培养“几个人”。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女、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当有人会晤毛时，她通常在场。毛的权威很大，光同他在一起就使这个人带有一种使徒传统，就像罗马圣彼得的情况那样。

王洪文是东北吉林省人，但在他年轻时他一家迁往上海。吉林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自毛泽东夫人和她的年迈保护人康生的故乡山东省。这两人的政治经历起源于上海。

1973 年 21 人政治局内的重要人物是 1966—1969 年的文革新人。3 人（王洪文、姚文元和张春桥）是上海的，江青和康生属于同一个核心，他们同 1969 年政治局的另 13 个委员一道再次当选。

这 5 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过，在共产党第 9 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的老一辈人中，我在 1937 年记下了 10 人简历，还有另外 34 人的简历。319 人的中央委员会统管 2800 万共产党员，我认识这届中央委员会的 20 名委员，除唐闻生外全是老一辈人。

在中国，所有执政机构都使用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

看看这次代表大会的照片，感到有点向老一辈人告别的味道，很可能在下次代表大会时没有一个还活着。

1973年1月25日与关建 谈妇女、流氓、毒品等问题

在上海，我抵达时到火车上迎接我、离开时送我去机场的主要官员名叫关建，她是友协的“领导成员”，也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会的成员。上海革命委员会这个市执政机构有125名委员，妇女占24%。她也是虹口区的区党委书记，曾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朋友，许广平住在虹口区。

关建是1961年后上海最重要的女领导人，当时她任上海妇联主席，但在文化革命后停止了这一职务，她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她在“五·七”干校呆了3年，从事体力劳动和学习。妇联1973年仍处在“改”的阶段。

很难想象哪个红卫兵小将敢批评这个崇高的、有权威的、头发灰白的天后式人物，她是新四军的女英雄。

“是的，起初我接受不了红卫兵小将的批评，即使他们在关心老干部方面是可爱的。我并没认识到我在追随刘少奇，直到红卫兵小将向我们这些老干部大声高呼：‘同志们，你们一定不要追随刘少奇的路线。不要滑下去！’”

新四军（后改名为解放军）的陈毅将军在1949年占领了南京，一个月后占领了上海。他是上海第一任市长，从1949年担任到1958年。1958年他任外交部长。关建在陈毅手下工作了多年，干危险的革命工作。她在同驻伦敦大使宋之光及

其夫人一样的新四军地区工作。宋之光和他的夫人在伦敦请我吃过饭。

在我的询问下，她给我讲了一些有关她的经历：

“我在1938年年底参加革命，是小学教师，毕业于武汉的一所中学。后来我随新四军前往江苏省中部，在与您交谈过的李莉所在的同一个区。发生1941年事变时我不在，当时许多人被杀害。我那时在桂林。当时，西南当局的白崇禧和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有内部矛盾。蒋介石扩充他的地盘，革命活动分子被清除，所以共产党组织决定迁往香港，然后又到江苏。这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所谓合作时期，但是他打算摧毁共产党，杀害共产党员，虽然这不是公开干的。通常共产党员被勒令清除出党，在离开时被暗杀。共产党获得有关这个阴谋的情报，通知我们不要乘坐公共运输工具，而沿着通往汉口的小路走。

“我在江苏中部呆到1949年解放。接着我去南京工作，1953年调到上海。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上海呆过，只是路过，因此对这里了解不多。约在1934年到1935年，我在上海的大街上走，钱包被偷了。我同一个访问团在一起，团长去拜访上海的流氓头子。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拜访，否则在上海不会安全。这件事使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深刻的印象。

“1953年后，我担任共产党区党委书记。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天堂，是工人的地狱。劳动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官僚资本主义是大资本家和统治者——主要是四大家族的结合。他们同买办一样，在全中国包括在上海有资本。”

我说，“当我在中国时，主要的工业家族是荣家。我听说他们支持共产党。我参观过他们的纺织厂，并同那位老父亲和他的继承人一起照了相。”

“是的，我知道申新纺织厂的荣家。荣德生是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是他儿子。上海是个半殖民地的工业城市。中国总体上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上海也一样。这里的帮派流氓是封建分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勾结，互相依赖。

“上海、北京和天津是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三个城市，但它们不是独立的。它们处于同省一样的级别，享有同省一样的特权。上海是人口众多的大工业基地。以前上海的资本家最多，但在1949年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厂成为公私合营，逐步纳入国家所有制。我们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同时给他们一点利息。在文化革命前已建立了国家管制，在1956年建立了公私合营企业。

“解放军开进上海时，表明中国全部解放了。美帝国主义当时说，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将在3个月内垮台。上海确实很复杂，在这里留下了旧社会的渣滓让新上海去处理。但是，社会制度改变了，这个城市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当然，流氓头子同蒋介石一起逃走了，但小喽啰留下了。反动组织被摧毁了，但残渣余孽还在。上海解放后，我们根除了帮派流氓和娼妓的基础。我们必须作很大的努力在他们中间做工作。我们必须改造他们，我们成功了。

“1949年后，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吸鸦片和种植可提制鸦片的罂粟。鸦片问题在1954年之前被消灭。

“妇女积极协助，但有鸦片瘾的人，男的多于女的。1952

年动员群众消灭吸鸦片，并宣传禁吸鸦片的主张。有一夜我们逮捕了 500 名吸鸦片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动员群众揭发所有鸦片烟鬼，揭发出 20000 多个。在各地区公审了 300 多个鸦片销售商和烟瘾严重的人。对各人处理不同，罪大恶极的人被判处死刑；有些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普通有瘾的人和小鸦片商处以教育；有些人病症较轻，前往诊所。那些中毒太严重的人被送进医院。在有鸦片瘾的人中，有受鸦片销售商欺骗的劳动人民。举个例子，一个工人患胃痛病，住在二楼的鸦片烟贩诱骗他说，鸦片可治他的病。这使他误入歧途。胃不痛了，而他还吸。这个工人太穷了，买不起鸦片，所以在他上瘾后，死于这个问题。他的妻子养活不了自己，不得不为住在二楼的烟贩销售鸦片。她在解放后没有被捕，对她进行了教育，纠正了她的恶习，她非常感激。

“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注意对流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一部分。”

“很难想象象纽约这样一个城市如何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说。

“按照我们的经验，进行这项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意思是深入地动员群众，只有靠大规模宣传和群众监督才能取得成果。另一点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头目应该给予严惩，其他人则根据各人的情况受到处理，一般人员主要给予教育。我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条件是深入群众，像毛主席提倡的那样做调查研究。

“依靠社会主义，旧社会的渣滓逐渐被改造，许多人有了新的生命。共产党和政府给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被改造

成有用的人，他们把精力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整个行动是一大成功，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规的道路。”

“妇女起什么特殊的作用？”

“上海妇女联合会成立于1949年，10个区和10个县都有自己的妇女联合会。会员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都在全国妇女联合会领导之下。每条街道都有妇女联合会的女干部。上海妇联的第一任主任是章蕴。^①我在1961年起担任主任，是最后一个主任。可是我现在不是主任，因为妇女联合会还没有恢复。今天上午，我们开了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的干部会。大约在1966—1967年改名为“会议”。我们在基层始终有妇女组织。在市一级，我们称它为妇女联合会。”

我说：“1973年1月的元旦文告说，将再次发展妇女群众组织，上海服从这个指示吗？”

“服从，根据元旦文告，上海将在群众组织方面走在前列，但是现在上海还没有工会，只有工人代表大会。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有解放前和解放后有长期斗争历史的工会。在文革后，我们改为工人代表大会，但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

^① 章蕴是江苏无锡人，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1949年4月被选入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950年担任上海分会主任。从1952年起，她还任共产党市委委员和华东局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1952年，她任上述中华妇女联合会总书记。她在1953年出席了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哥本哈根会议，还分别在1954年和1958年率领代表团去巴黎和维也纳。1956年，她再次当选为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7年任中华妇女联合会副主任。1956年她任第四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妇女部主任。同时，她在1949年后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过。我弄不清在文化革命后她的情况如何。——作者

是名称上的不同。原来的工人联合会还在进行斗批改。从1973年元旦文告中看得很清楚，现在名称将是工会，不是工人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工人阶级中，妇女占大约40%到45%，在重工业中妇女现在约占20%，包括钢铁业。在重工业中男人比妇女多，在轻工业中妇女人数超过男人。许多妇女担任公共汽车和电车司机，另有许多妇女当上交通警。在军队中妇女在医务部门工作，担任无线电操作员之类的职务。大老吊的操作员通常由妇女担任。

“毛主席说，老干部应向青年人学习，青年人应向老干部学习，所以领导机构现在是老中青三结合。”

我说，“我想妇女一定在节制生育方面担负特别的责任。”

“在上海我们做节制生育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由卫生部和各级群众组织做。在市和县的各级政府机构中都有节制生育诊所，每个城市的里弄和工厂也设有节制生育诊所。”

同王一平的一次交谈

王一平到衡山饭店来看望我，他说，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派他来给我送行。这样的人通常根本不愿谈自己的经历。这次我决意从他口中探出些情况。他是上海本地人，“在1932年还是年轻小伙子时就参加了革命，当时韩复榘将军正屠杀许多革命者。”

我告诉他，（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益友和“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导师黄敬向我谈过这件事。由于黄敬的舅舅在国民党中居于很高的地位，又是法西斯蓝衫党的“四老”之一，黄敬才好不容易从狱中死里逃生。

“韩复榘于1935年冬在山东下令进行大屠杀。我被列在要抓的人的主要名单上，但是我于1935年逃到北京。在路上花了好几天时间，所以到我抵达北京时，“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已经举行过了。我知道很少外国朋友支持学生运动，我不会忘记你对学生运动很感兴趣。我于1936年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西安事变时我在那里。我于1937年2月前往延安，我知道你在延安，我还听说斯诺先生早些时候曾在保安。我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大学学习，于1937年底前往山东，在那里参军，同南京的杨广立从事同样的工作。

“在解放战争初期，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合成第三野战军。1950年我们解放舟山群岛，解放后我仍在军队工作。我于1952年离开军队来到上海，在上海做好几种工作。我在共产党上海市委组织部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我从事科学工作的时间不长，后来我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职务，我身体不好，一时不能工作。”

他脸色不好，在一生中经历过多次危险，饱尝过苦难。

“你30年代在上海，因此你是少数几个能作比较的外国人之一。中国青年人对旧上海也了解不多。我们组织老干部向青年人讲过去的境况。

“虽然在过去20年中上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旧上海的一些痕迹。我们的工作进展不平衡，所以你见到先进的、中等的和比较落后的。

“1967年2月5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全中国第一个。革命委员会现在有160名委员，35名是女委员。我们有两种结合——老中青三结合和群众、干部、解放军三结合。我们有15名56岁以上的老干部，97名36岁到55岁的中年干部，45名35岁以下的青年人。我们在革命委员会中有27名解放军代表，30名干部，103名群众代表，其中43名是工人。在最初成立时，我们有14名副主任，主任也算在里面，现在我们有16名副主任。主任是张春桥，第一副主任是姚文元（他现在约41岁或42岁），这两人现在都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

“上海组织得很好，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和市场供应，情况都很好。由于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组织交通和市场供应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同纽约相比，你们工作做得很出色，犯罪是纽约最糟糕的问题。你们有多少警察？除了交警外，我从来没有见到警察。”

“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我们有些警察是负责交通的，有些负责社会治安，有些负责消防。我们的公安局依靠人民开展工作，主要由公众自己维持治安。我们有民警，以前我们设想每千户人家需要两个警察，现在每千户人家只需要一个民警。我不知道市内每一个街区需要多少民警，他们得到群众组织和各区的基层组织的协助。”

“我想让几位美国市长访问上海和别的中国城市倒是个好主意，例如纽约市长林赛，我们还有几位黑人市长呢。上海市领导欢迎他们吗？”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此刻无法答复，但这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访问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安排。总的来说，随着友好接触和互访的增加，外国朋友是受欢迎的，但是，至于哪种朋友，那是另一个问题。毛主席说过，不仅欢迎左派来，也欢迎中立派或右派来。既然尼克松总统来了，其他人也能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欢迎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来，也欢迎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人来。

“但是，你们的美国市长理解不了我们的体制，目前在贵国的城市中也实行不了这样的市政管理。只有在工人阶级担任领导后才能解决犯罪问题。我们愿意讲述我们的经验，有些人可能接受这些经验，有些人可能不接受这些经验。即使贵国的城市采取这些措施，它们也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才能取得成功。有些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形势有利，如果它们改变制度，它们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根据我们在上海确立这种形势的经验，我们制定了一个在别处建立新城市的计划，新城市不要那么大。”

我说：“有人告诉我，已有 100 万人被遣送出上海。”

“为了使人口不继续增加，我们对允许进入本市的人实行限制。我们还派送一些人去加强农村生产和改善中国的其它城市。我们还实行节制生育。人们不能随意来上海居住，只有经市政府批准后才能迁入。每个家庭的成员都有工作谋生，但他们不能随意放弃他们的工作。所有工厂和经济单位都有思想教育，并懂得需要受这种教育。

“由于各种原因，纽约市就不同了，特别是它的社会制度不同。在上海除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外，生产都是国家所有的，两者都按比例纳入国家计划。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城市建设计划。由于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人

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工作，所以他们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组织群众和干部参加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在上海犯罪活动很少，几乎没有凶杀或抢劫，因为公众不允许犯罪活动。”

“在上海不是还有 100 万工人和 500 万消费者吗？”

“我们现在制定了一项改进上海的生产的政策，使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在先进的水平上生产高精产品。同时，我们的政策是不让人口增加。文化革命以来，生产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我们现在对内地工业发展的关心超过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关心，以便工业有合理的布局。”

“在 30 年代，上海几乎完全是逃亡地主和寄生消费者聚居的一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生产，只盼望钱生钱，利滚利。”

他不十分同意我说的话，他说：

“旧上海在两个方面留给我们一笔遗产。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剥削人民的大基地。另一方面，上海是毛主席在 1921 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地方，但它也有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具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又有阻碍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我们在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成功地克服各种困难。我们在消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反动思想和旧思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执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另一种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敌人是隐藏的秘密敌对分子或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

“上海发动了文化革命，现在有多大的变化？”我问道。

“文化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的变化。它也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文革时期，那是站队问题，你支持还是反对这条路线或那条路线，保持中立只是暂的。你要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要么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有左中右三种人。”

我判定这个人很值得了解。他在回答问题时举止文静，态度尊严，说话慢吞吞，不慌不忙。看上去他并不幸福，也许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还有一个哲学爱好，几乎可称它为精神爱好。

“你有重要的个人经历吗？”我鼓起勇气问。

“当然有，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场文化革命触及人们的灵魂。在开始时，我对文革并不理解。我坦率地告诉你，在开始时我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我的职务是上海共产党书记处书记。我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方面我的觉悟很低。我在估计自己时不能使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我只看到我的优点。我参加革命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我尽力完成我的工作。但是，我看不到我的错误或缺点。在解放后我没有严格遵守毛主席关于要谦虚谨慎的教导，我并没有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不理解这一点。”

“一分为二是什么意思？”我问道。我注意到在场的其他人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并记笔记。

“一分为二的意思是从两个方面分析自己——优点方面和缺点方面。由于我同人民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脱离他们，因此，我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不了解他们的真正要求，所以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

“特别是在文化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运动那么猛烈，我接受不了。我看不到主要的方面，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发展趋势，我却注意这个运动的次要方面。我只看到过火的行动，没有看到他们的运动的主流，所以我站在红卫兵运动的对立面。我的言行阻碍了文化革命的健康发展。”

“在经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批判我的官僚主义作风，批判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这些批评是很重要的，使我受到一次真正的教育。在我认识到我的错误后，在我的觉悟提高后，红卫兵和年轻人表示尊重我过去的工作。同时，这些红卫兵和青年人通过自我教育提高了他们自己的觉悟。在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上来后，革命群众和青年人对我很热情。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连那些批判我最严厉的人现在也同我关系很好。这不仅仅是我的经验，其他许多人也有同样的经历，这是一次大震动。”

大家围着桌子交谈，兴致勃勃，充满生气。那几位妇女赞同说：“是的，老干部变得年轻了。”

“你原先是什么阶级出身？”我问道。

“我于1914年出生在辽东半岛山东的一个落后的村子里。我感到除了参加革命外没有出路。我参加革命出于两个原因：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我认识到国家处于危亡之中，其次，我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我参加革命以便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并且改变现状。我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我很天真，只进行斗争，不注意策略。我年轻，敢于造反。我们处在封建主义旧礼教的枷锁之下。我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农家庭，在生产和供应方面自给自足，但是我经受

了家庭的封建社会习俗之苦。我在孩提时代并不相信拜祭祖宗，但是由于旧教育，我拜祭祖宗，并且一开始就接受了。我在上学之前没有学到任何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我在年轻时经历过可怕的遭遇，那是我身体垮掉的主要原因。”

“竟然发现一个山东人身体不好，我感到惊讶，你在那里吃那么多大蒜，大蒜能治百病。你在家以什么为主食？”

“我们为了身体健康天天吃大蒜，主要以吃玉米、馒头和白薯为生。在村子里我们饮用很好的井水。”

“你反抗你的父母吗？”

“在过去，我们有旧的观念，只允许年长的教训年轻的，不允许年轻的教训年长的，所以红卫兵对所有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是一大震动，在文化革命开始时，毛主席用一出古代京剧中的一句词应用于老干部：母亲教儿子，现在轮到儿子教母亲了。那是这出戏的名称，这个概念包括父亲。当我回顾时我认识到我知道得多么少，我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得多么少，我现在从文革经历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从来不接受他父亲的管教，”我说，“他恨他父亲。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是一个青年领袖。”

中国人往往认为一个人能通过改变世界观而“无产阶级化”，因此资产阶级背景或“封建”背景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加以克服。中国的革命由于其三重性，在一个人身上可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轻快地跳越前两个阶段。在城市中自然推向资产阶级革命，它可能是刘少奇的“经济主义”和物质

刺激的性质。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并不走出城市到农村去教育农民和其他人，这项工作由青年学生进行，他们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共产党称它“代表”无产阶级。换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停顿的，而试图分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在文化革命时期，共产党几乎全党接受十几岁青少年的再教育，他们引用毛泽东向他们说的话教育全党。但我在那里时，老干部正陆续复职，根据1973年元旦的决定，老干部复职的进程加速了。邓小平是一个复职的领导人的例子。人们可以从我同那些属于文化革命的对象的人的交谈中了解文化革命的性质。

关于林彪、民主及其它

以下是我同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中年共产党员的谈论：

“在30年代张国焘攻击毛主席后，张独自一人逃跑了。连他的警卫员也没有跟他走。林彪也是同样的情况，在他离开时没有人跟他走，他没有追随者。

“刘少奇和林彪都是两面派。他们假装同毛主席意见一致。人人知道林彪的阴谋。情况扣押了片刻，到掌握全部事实和证据后才宣布。

“毛主席的威望非常高，因此无论一个人地位多高，都不能批评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批评他，甚至没有想过朝这方面议论。但是我们比其它任何国家更能了解政府的政策，因为每个具体步骤是在基层讨论的，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表明局势稳定，充分信任人民。

“如果有人反对毛主席，不管这个人地位多高，人民听到后，就警觉起来，但是批评林彪就没什么。

“林彪早已挨批评，他在逃跑时知道他的阴谋已败露。

“中国的群众性大民主也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要全国找岔子，哪里有毛病就到哪去找。在文化革命中，干部受到了批评，他们接受了批评，作为对人民和对共产党的忠心。干部这个词不仅在狭义上指共产党员，它也指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每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被称为干部。

“文化革命开始时，群众用大字报批判领导人。文化革命一度过激，但基本上是革命的和正确的。领导人没有准备，感到突然。接着，刘少奇撒谎，对一些领导人说，这是反革命暴乱。刘说，他们在制造骚乱以图推翻共产党。他诽谤群众。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些领导人接受刘的命令，说这是反革命。这就是‘黑线’，但它只持续很短时间。毛主席发现了这件事，召开了共产党第11次中央全会，在会上通过了16点决定。这时，刘少奇的工作小组被召回。群众组织了自己的小组。

“起初，刘少奇主张先在城市慢慢地建立大工业，他不支持大跃进。他主张仿效外国的城市，所以我们称这为蜗牛爬行哲学。

“苏联当时的情况比中国糟，既有外国的干涉，又有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列宁当时是英雄的。

“苏联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废黜赫鲁晓夫，谁都不知道为什么。

“干部靠边站接受批判，是正确的。在他们接受黑线时，

群众批判他们。大多数干部对此感到后悔，因为他们起初不理解毛主席的路线，于是，他们乐意同群众一道批判和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多数干部并没有丢掉他们的职务，但许多干部调任别的职位。现在青年人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我们必须培养青年担任领导工作，这项工作现在很迫切。中国的学生不再脱离实际。毛主席说，在游泳中学游泳，不是研究游泳。我们不在乎青年人犯错误，他们需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老干部受到了批判，但他们也不大在意。他们原谅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没有经验。

“共产党一贯进行整风运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没有人进行报复。当共产党员意味着要求更严，所以他受到更多的批评。”

“在旧中国，没有人公开发表自己真正的意见，甚至在会上也不发表，通常是保守秘密。样样事情都搞秘密外交。在美国，我们在选官员时或在会议中也有秘密投票。但是，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你们没有投票。”我探索地问道。

他回答说：“现在，革命委员会是通过充分讨论选出的。他们不投票选举，而只通过协商一致。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只经过协商。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比别的办法民主。我们谈这个人的履历、优点和缺点。通常起初有几个候选人，然后商定一个。一个团体先领头讨论，然后再讨论，接着再开会再讨论。整套方法叫做民主集中制。可望领导人采纳群众的意见。”

“文化革命是如何发动的？”我问道。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教授吴晗。但是，在北京不能发表批判这部剧本的文章，因为当时彭真掌权。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到上海去发表这篇文章。他从这件

事中发现北京情况非常不正常。这是前奏。

“于是，毛泽东发出了发动文化革命的号令，但是这个号令只向共产党公布。刘少奇没有控制全党。这时，共产党基层党员不知道刘少奇和毛主席有分歧。共产党员可能接受他们认为毛主席发来的指示，而实际上这些指示是反毛主席的。青年人受旧机构的约束较少，所以他们采取了行动。他们富有生气，看问题比较尖锐。清华的学生首先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毛主席写信支持他们，要他们同人民团结一致。”

“我倒认为保密是造成这种误解形势的一个原因。”我大胆地说。

“教训不在于反对保密，而是要多学理论，这样你就知道如何独立思考。在你接到一个错误的命令时，你就知道那个命令是否正确。这就是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总是先讨论然后作决定。如果你不善于识别，你就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河内和北越遭到“圣诞节轰炸”之时，我没有要求见毛泽东，也没有要求见周恩来。在这一年，毛泽东只见了五六位外宾。考虑再三之后，我觉得要求见他不适合，并且我也不愿意要求遭到拒绝。周恩来非常忙，看来要求见他也是

不对的，因为我没有特殊的理由要求见他，何况他的夫人邓颖超特别关心我和我的旅行。有人告诉我，她的关心“如同周恩来的关心”。坚持要见周恩来是对他的夫人和负责我的访问的中国其他女领导人的一种蔑视。

圣诞节前夕，我在北京饭店我的写字台旁坐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在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并去韶山之前，写这封信向您问候致意，我祝您身体健康。

“我回想上一次我于1937年在延安见到您的情景，自那之后我游览了陕西的万里山水，这片广阔的历史性土地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您为这片土地制定了宏图。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7本书，加上6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气氛变了。20年中，我未能出版新书。

“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30年代，我在中国呆了将近10年。我感到旧的历史阶段现在结束了，帝国主义完蛋了。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同1936年至1937年的两个青年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每一个美国人了解美中友谊的这个短短历程，并由于这种个人的经历而感到同您和同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我随这封信送去我的著作《革命生涯》的中译本，信内还附一张斯诺在北京盔甲厂13号写《西行漫记》时的照片。

他穿着打高尔夫球的灯笼裤，显得年轻快乐。

我抵达长沙后，我的翻译在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他带来一个大正方形信封，这是信使从北京送来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973年1月3日。内容如下：“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签名）毛泽东。”

外国人难得接到毛泽东的私人信件，若有的话，也很少，他给中国人写的私信也不多。我在次日早晨把这封信给六七个友协工作人员看时，他们都要摸摸这封信。这对欧洲人来说就像摸摸一件真的十字架。不用说，这种态度表明在中国真正崇拜毛泽东。

后来，我告诉一位中国大使说，我没有要求见毛泽东，他说：“你应该要求，他会见你！”也许这是我一生中失去的许多机会中的一个，但是在经过全面考虑后，我感到这是对的。

差不多同时，我接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打来的电话，感谢我在北京时送给她的“镶有老硬币的珍贵手镯”。她说，他们将把这些东西交给革命博物馆。我也没有要求见她。

这些小小的银币是1931年至1934年在江西存在的中华苏维埃政权铸造的，属世界上最稀有的钱币。毛泽东于1936年在保安把这些银币作为礼物送给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接受了这些钱币，为我打了一只银手镯，链条上镶着这些老硬币。

大约4天后，我在长沙接到信使送来的另一封公函。那是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973年1月7日。

信上写道：

“你在去年 11 月 14 日通过驻联合国大使黄华送交我们的信和短剑到 1 月 4 日才收到。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将把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短剑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 1930 年从张辉瓒统领下的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长征时期把它带到陕北，后来你把它带到美国，现在你又把它归还给中国人民。它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象征。

“在你这次访问期间，我没能会见你。在你离开后邓颖超同志向我谈起你时，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来时仍能见我。祝你新年快乐，一路平安！邓颖超同志也向你致意。（签名）周恩来。”

这把短剑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的纪念品，是在江西被当成一项荣誉送给德国人李德的^①，他在长征中带着它，1937 年在延安把它作为临别纪念品送给了我。可是，中国人现在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据认为他是毛泽东的死对头，他迟至 1965 年还继续在东德攻击毛泽东。

在英格兰的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之屋正对面的一家商店里，我给邓颖超买了一条漂亮的马海毛头巾，给龚普生小姐也买了一条。在北京，邓颖超送给我一盒 9 只瓷制大熊猫。在把送给尼克松总统的珍珍和兴兴一对大熊猫放

^① 1973 年，一位访问东德的美国学者获悉，李德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即将出版，但是他拒绝同任何人交谈，也拒绝接受采访。他已重新结婚。在中国，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最温和的措辞。——作者

进华盛顿动物园后，熊猫已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9只瓷制大熊猫是用船运送的，到8月1日才运到美国，但是这只50磅重的木箱里装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在1973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联络处第一任主任黄镇举行第一次招待会的次日，我们在吃饭时我把第一只熊猫分送给黄镇和他的夫人朱琳。

“我送给你我分送的第一只大熊猫，记住保持这种新的友谊，不让它破裂。”我对黄镇说。

他圆圆的脸露出微笑，他说：“我有样永远破不了的东西送给你。”

那是一只逗人喜欢的、毛绒绒的、会拥抱的雪尼尔花线熊猫，在她咀嚼一枝青竹时从她的眼神中显示出对美国人极其和睦友好的样子。

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感到同美国的和解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这种和解。

我还带着一只熊猫准备送给亨利·基辛格或尼克松总统，可是他们两人没有在招待会上露面，虽然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到场。

在埃德加·斯诺和我的分工中，他专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另一两个人。我掌握了其他34人的资料，已写下了他们的身世。所以我从来没有写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并不是由于缺乏思想。在我1972年至1973年的旅行中，我跟随毛泽东的足迹，从他在韶山的出生到他在紫禁城的老年。但是这将单独写。

我很清楚毛泽东在世界史中所占的地位。中国是从一个错综复杂的混合制度中出现的，既是原始宗族拜祭祖宗制

(这是基督教革命在 2000 年前在东方和整个欧洲革除的对象)，又是中国人所谓的“半封建制”(这是克伦威尔的清教徒革命在英国和美洲革除的对象和法国革命要革除的对象)，又是一种特殊的半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制(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的对象)。

毛泽东凭着他自己的首创精神和他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从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阶段中诞生出来，并在“文化革命”中加进他自己的重要内容，他发动“文化革命”来消灭上述各阶段的残余。中国的社会各阶层不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本钱上都认识到这一点。他是新中国的化身，新中国的创始人，新中国的象征。自 1949 年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敢公开地或影射地反对或批评毛泽东，连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或任何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也不敢。要攻击毛泽东也必须假装支持他，尽可能勉强地挥动那本小红书。苏联攻击毛泽东，那比犯罪更严重，那是大错。这表明完全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这场社会和政治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本身是这场革命的性质的一部分，是这场革命的统一体。中国形势的实质在于这句普通话：“除了毛泽东外，我们不信任任何人。”

美国和中国之间在 1947 年至 1949 年的决裂是不必要的，这毁掉了美国人一个世纪来在亲善和友谊方面的投资。如中国人所说，那原先是华盛顿的“一小撮”人策划的，当时杜鲁门总统甚至没意识到出面干涉社会主义发展趋向和支持明显的失败者蒋介石会带来长远的历史性后果。但是，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孤立，结果却有利于中国在多方面出现变化。它创立了健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不是鼓励更多依赖工业发达的西方或日本。但是它也造成了对西方和所有西方人的

长期不信任和对立态度。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干涉中国和亚洲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取灭亡的一部分，这使美国的物力财力付诸东流，白白浪费掉。

帝国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自取灭亡也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美国以堂·吉珂德的姿态从尘土中捡起它的旗帜时，帝国主义从历史上说已经垂死。如果美国在 1949 年同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那本来会延长美国和别处的资本主义的生命。使中国强盛起来，而不是把我们的物力财力浪费在战争上，把剩余物资倾倒在朝鲜和越南的战场上，那本来会更有可能实现共处，更有可能在全世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换言之，在各地出现一个更加文明的世界。

苏联和中国在 1960 年的决裂以及随后发生的边境冲突带有更深刻的性质，表示社会主义前的沙皇制和苏联正统家长制的残余和中国社会主义前思想的残余的长久对抗。这一决裂发生在核时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不同阶段的时期。中国和苏联都还没有解决创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固有的问题，这是因为它们在敌对的环境下处于危险的境地，也因为它们从社会主义前的过去继承了有害的旧思想，它们无法治愈这种坏疽就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实际情况不能用批评来对待，而只能由双方改变态度来处理。我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大跃进，因为文化革命在使中国人具有同西方人共同的逻辑方面改变了他们的头脑，虽然苏联本身还没有现代西方式思想和逻辑，而仍然用沙皇专制的思想进行思考。

周恩来在本世纪 20 年代在法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最高层经过了长期复杂的共产党经历。他是一个政

治上的天才，但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人。他肯定是今天世界上活着的最有经验和最老练的行政长官。他的思想开阔丰富（毛泽东也这样），但他还有细致的头脑。毛泽东是播种人，他在中国播下了社会主义的种子，因此种子成长起来像他那个样子。但是，周恩来保护种子的成长，在所有斗争和混乱的时期使种子不遭损毁和践踏。周恩来治理国务，而毛泽东掌管共产主义革命。

动身回国

1973年1月31日，友协的5位官员送我到虹桥机场，塔利塞·格拉克同时抵达。这个飞机场在30年代已经有了，我们通常骑着马沿虹桥路在手推车和人力车中间跑，在一座大宝塔旁边下马休息。

我是最后一个登上法航大型飞机的旅客，法国乘务员提着我的红帆布袋和沉重的阿伯克龙比和菲奇公司虎面购物袋，我肩上背着沉重的相机包。我站在舷梯的顶端向遥远的送客挥手，不晓得我是否会再访问中国。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可是我的归途更加艰难，虽然我爱这次旅行中所到的每个地方的每一个时刻。

我来到二等舱，坐在四川来的一个工程师旁边，飞机上的中国人似乎大多来自四川。在每一个座位上放着一套崭新

的黑色西装和一顶新帽子——可能他们都是第一次乘飞机。这批中国人是去索马里修筑公路的，这真有点奇怪，因为四川本地公路很少。机上有——一个小小的头等舱，英国肯特郡西德克普的斯坦利·C·哈钦斯夫妇坐在里面，丈夫三周前在苏州做了阑尾炎手术，目前正在恢复。还坐着三四个德国人，衣着讲究，神态傲慢，心情不愉快，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还有位富有魅力的南斯拉夫姑娘，穿一件白毛线衫，披着长长的头发。

我已决定放弃我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旅游双程票，所以我可以从不同的路线回国，虽然我损失了大部分票值。我不想花费头等舱机票或甲级旅馆的钱。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太疲劳，以致旅行不了，可能永远不会。

我们抵达缅甸的仰光后，乘务员要我们把所有行李都拿下飞机，在机场等候。一号发动机必须修理。我们被困在仰光16个小时，处在华氏88度的炎热下，没有空调，而我穿着丁雪松的红毛衣和驼毛外衣。（我没有地方放这些衣服，因为我的行李已经超重。）在我提着全部拎包和外衣在烈日下挣扎着朝机场走很长一段路时，没有人表示愿帮忙。这些中国人年纪太大了，当不了红卫兵，也太怕羞，甚至不向一个外国人瞧一眼。

我同头发灰白的哈钦斯夫妇交谈，他们两人都由于炎热和耽搁而精疲力尽，可是他们还死不承认。他们把1870年巴黎公社的纪念物带到中国去展览，要我一定上巴黎卡纳瓦莱特博物馆去要求参观那面原先的红旗（我确实要求参观，但却遭到拒绝。那面红旗保存在一只抽屉里，只供贵宾参观，贵宾不包括中国大使馆的秘书，他们陪送我去，也从未见到过。）

在整个旅途中，哈钦斯先生尽可能同每一个人交朋友，他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最开朗热情的英国人。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伦敦本地人——我所认为的伦敦佬。我喜欢他们，也喜欢缅甸——在缅甸见到的一切。

晚间，大轿车把我们送到仰光最好的旅馆因亚湖饭店去睡几小时，由法航付旅馆费，这家宽敞的饭店是俄国人在1964年建造的。它座落在湖畔，非常美丽，到处是花卉。一位联合国官员到孟加拉国去执行公务，在那里停留，他给我出点子，要我在开罗和雅典时到希尔顿饭店下榻，不要住到别处去。

仰光的早晨优美可爱，香气扑鼻，真是一个热带天堂，到处是香蕉树，漂亮文雅的非做生意的人穿着围裙和凉鞋。商店不急于向我推销胶卷，每卷竟开价10美元。我记起我在孩提时代常常在学校里背诵“走在通向爱德勒的大路上”，我渴望能上那儿去。

飞机到中午12时才准备就绪，我们都喜欢驱车去机场。沿途有寺院，漂亮的别墅，碧绿的花园，小小的商店。每个人都显得高高兴兴，对他们周围的世界亲切友好，不管是贫是富。

在飞机场，一批中国梳小辫的姑娘和身体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型客机，这是一个体育代表团，中国驻缅甸大使在那里为他们送行。

由于海关给30名脸无笑容的孟加拉国难民办理手续，我们在机场被滞留了片刻，海关人员搜查他们有没有携带黄金或鸦片。哈钦斯夫妇和我曾同其中的某些人交谈过，他们滔滔不绝地叙述印度的暴行。

下午4时半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大城市卡拉奇，数十人站在机场附近欢迎孟加拉国难胞。气氛的改变明显地打动了我。这是大男子气概的文明，这些人是有男子气概的。他们的刺刀和手枪闪闪发光。漂亮的机场姑娘穿着莎丽服，更注意她们戴的耳环，不那么注意旅客，商店营业效率高，店员硬向顾客推销，他们以2美元卖给我一顶银白色小帽。

迄今为止有一件事确实使我在这次旅行中感到十分高兴。在仰光，当我提到我是美国人时，机场的年轻助理经理主动捡起我的旅行包和外衣，在中午的烈日下同我一道走到飞机上，把我安顿在座位上。他个子很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彬彬有礼的举动远远超过本职工作。这使我对缅甸人留下真正的感情。在巴基斯坦和埃及的伊斯兰世界，妇女是幸运的，竟然获准出去旅行。

在缅甸遇到另一件事，在仰光我遇到一个很漂亮的缅甸乘务员，她显露出对工作的喜悦，并流露出希望别人注意她，但是她既不会讲中国话，又不会讲英语。无男子汉气概的中国筑路工人连瞧都不瞧她一眼，如果那不是反革命，那也肯定是修正主义。他们都深深地蜷缩在他们毛式的蚕茧里，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也没有向我笑一笑。这个姑娘赋有女性的才能。她决定取下每一个中国旅客佩戴的毛泽东像章，把它戴上。她要我帮忙。这对社会主义时代前的中国人是一件费力的事。当我设法从坐在旁边的严肃的工程师衣服上摘下宝贵的像章送给她时，这个工程师肯定吓呆了，在这个“联合国”辩论开始前，坐在过道对面的一个漂亮的中国小伙子迎合这种形势，把他的像章摘下来送给这个女乘务员。她把像章高高地别在她的衣领旁边，趾高气扬地在过道上往上方

走去。满飞机的筑路工人顿时涨红了脸，兴高彩烈地笑起来。（中国代表团总是这样作出反应，像一群小鸟）。

从格陵兰到火地岛，冰块融化了。每个男子小心翼翼地不看这个姑娘，只在她从旁边走过后偷偷地扫一眼，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这个姑娘擦了化妆品，涂了眼脸膏，戴着珠宝首饰。她是在中国禁止的那种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没有穿超短裙。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称为“美人计”，美女（或美男子）勾引人被认为是政治错误。在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里，把精力集中于各种生产（只有生育除外）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刻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双眼充满了热泪，这又把坐在我旁边的四川工程师吓了一跳。我拿出我自己的毛泽东像章，这枚像章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北京别在我的衣服上的。那是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给毛泽东拍的著名的照片。我告诉离我最近的中国人我是谁，他们的整个态度改变了。没有一个男子表示愿拿我的行李，但是在开罗有两名妇女帮了我的忙，她们是前往墨西哥到大使馆工作的。我的红帆布包装着我的全部胶卷和磁带，我不得不用埃及驻北京大使的信来通过刺刀和士兵林立的机场，中国大使馆的一位秘书到机场接我，把我送到埃及人开的二等尼罗饭店，这家饭店在尼罗河畔，靠近希尔顿饭店。

清晨6点半，我听到一声鸡叫，河对面一座伊斯兰寺院尖塔顶上的报时器放出动听的乐曲，穿着咖啡色裤子和戴着圆筒形无边毡帽、行额手礼的旅馆服务员大声地敲我的房门。我走到阳台上，俯瞰这条狭窄繁忙的河流，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宁静美丽，沿河边停泊着可当住家的船只。尼罗

河是地球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河流，它流着埃及的血液。在它的两岸记载着七八千年的历史。

我简直等不及，就在顶层用早餐，并随同旅游观光的波兰旅游者和英国旅游者一道观看开罗洁净的白色尖塔。波兰旅游者乘坐两辆大轿车，英国旅游者乘坐一辆。我曾想住在最普通的旅馆牧羊人饭店，可是这家饭店关掉了。像所有美国人一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旅店服务是洗上热水澡，但是，虽然我在尼罗饭店里搬动了三次，我却从来没能从我的阿拉丁神灯中祈求出一次。我并不抱怨。有这么美妙的尼罗河景色，住了三天，连带一日三餐，只付 25 美元，我怎么能抱怨呢？

在我乘坐电梯时，一位年岁较大的高贵的男子说了一声“早安”。在他走出电梯后，开电梯的小伙子转身对我说，“他是个俄国人，很坏的人。埃及人恨所有俄国人。”他的语音中带有真正的敌意，因为他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以为苏联在帮助埃及。”我说，虽然我知道苏联技术人员最近已奉命离开埃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俄国人同别人相处不好。中国人也恨他们。”

他耸耸肩膀说：“连真主也恨俄国人。”

埃及学生几天前在开罗闹事。全市似乎极度紧张不安。

有一天午餐时，一个穿着超短裙的漂亮女郎同两个男人走进门，七八个青年侍者抢上前去争着要她坐到他们的桌子那儿去，每一个侍者都说“请这边走，请这边走”。这三人坐到一张桌旁，可是另外两名侍者用手臂抱住她，把她从她坐的椅子上提起来，强迫她坐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去，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他们始终搂着她的腰，态度非常无礼

傲慢。侍者总管不但一声不吭，而且看上去吓坏了，怕攻击他自己。这不仅仅是大男子气概——这是绑架，鲁道夫·瓦伦蒂诺式的绑架。

埃及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在行额手礼掩盖下的天生匪徒，青年到处无法无天，老干恶作剧。

我也被一家商店的年轻店主所表示的好意诱拐了，他免费驱车带我在市内转，我着迷似地听他讲述埃及动乱的故事。我从他那里买了三条粗糙的项链，这种项链是模仿金字塔陵墓中发现的项链制作的。（我不让中国人看这些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反革命的装饰品。）

在埃及第四王朝之王基奥普斯大金字塔，当我同一个赶骆驼的人讨价还价时，他把我一下子提起来安放在趴下的骆驼的鞍座上，这完全出我所料。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大胆地要他让我下来，赶骆驼的人都不答应。直到他吓唬我们大家，一边牵着骆驼紧张地兜圈子，一边伸出手要钱。在这块沙漠地，除了坐在我们汽车里的人外，杳无人影，三名武装警察从地下什么地方跑出来。赶骆驼的人抓起我的照相机，给我照了一张坐在鞍座上的相片（照得也很好）。在发生这次恶作剧之前，我已经给他照了一张亲他的白色骆驼的照片。他这段时间始终乐乎乎的，一口白牙闪闪发光，露出十足的匪徒相，特别在我还给他两倍于他要的钱的时候。

中国大使的夫人李友锋和秘书薛启伟（译音）坐使馆的汽车送我到吉萨金字塔去玩。他们还驱车带我游览市容和参观奇迹般的博物馆。我在看到公元前1292年的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金发和鹰面时呆住了，博物馆周围到处堆着沙包。“喔！是的，我们仍然同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博物馆馆长

兼向导解释说，几个月之后的10月份，情况似乎就这样。

我在雅致的伊斯兰式大使馆同柴泽民大使和他的夫人一起吃饭。他们两人都是陕西人，已到开罗两年。柴泽民在此之前在非洲的几内亚担任了一任大使。我的老朋友黄华在1966年下半年曾在这里担任大使；在那以前，驻埃及第一任大使陈家康是我的朋友，他大约在1971年回中国外交部后死于心脏病。我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写下了陈家康的简历，当时他是董必武的助手。他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喜爱的和开朗的中国人之一。

“我于1933年在陕西参加革命，你到延安去的时候，我在西安。”柴大使对我说。“我于1935年至1936年间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期和之后，我都在那里。我始终在敌后工作，从来没有去过延安。”

我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们竟然还活着，我们竟在开罗大使馆里会见。你想，有几个人像你这样在那么危险的时刻在西安。”

原来我们都是体育爱好者。他们两人都富有吸引力，夫人要年轻得多。那天上午他到机场去给中国运动员送行。我们在饭桌上谈到有机生命和保健食品，一致认为大蒜比其它任何蔬菜建造了更多的金字塔（确实，金字塔的建造者如果在食品中没有大蒜就工作不了。这是埃及的真正香味，不是玫瑰油。我在一家小商店中试闻了他们所有的各种香水后买了一瓶玫瑰油）。

我主动同两个从约旦来的年轻妇女乘坐一辆观光大轿车去参观孟菲斯、狮身人面像和公元前3000年最古老原始的佐萨金字塔。（吉萨金字塔是公元前2900年建造的。）我拍摄的

最好的照片之一是我们身穿白袍的旅行向导阿布杜勒·萨拉姆的，他在一个地下通道托着两支蜡烛为我们引路。他是吉萨人，在金字塔当向导 25 年多了，在当向导之前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工作。像所有其他埃及人一样，他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官，不错过向我进行宣传的任何机会，他是非常亲美的。

死者城给我留下的印象超过其它一切。在死者城，陵墓仍有人看守，因此允许家属住在里面。这些死者之屋同沿尼罗河搭盖的农民土茅屋相比简直是宫殿。拜祭死者的习俗在埃及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已不存在了。在金字塔的阴影下，身穿黑袍的农妇生活还像 5000 年前一样。可是，在明陵，有一个新的大水库，农民穿着最新式的中山装，在他们自给自足的公社中实行自治，谈论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尼克松。

科普特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现在都把他们的死者运到开罗的这些屋子来埋葬。适应死者的头脑配合不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即使埃及人渴望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像希特勒那样。

向导自豪地对我说，“我们有 3500 万埃及人，其中有 1600 万是科普特基督教徒，如果你不记得古代基督教在这里的影响，你就了解不了埃及。”

同中国人一道游览埃及是有趣的，中国人代表地球上最古老的现存文明。他们自己的父母信仰并实行祭祖的习俗。当你心中纳闷，为什么中国人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感到同埃及和非洲那么亲近时，你应该记住这一点。（在埃及和非洲，祭祖是现行的信条。）

我在埃及发现一件既可爱又重要的事情：最古老原始的寺院和陵墓的壁画给人看到一幅当时工艺美术方面的生活全

景。从比例上看，他们描绘劳动人民，而不是描绘贵族。看来埃及文明是颂扬和赞美工匠和农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劳动的；而中国只有儒教贵族和他们的思想才能进入工艺美术作品中去，劳动人民不准成为所有艺术作品的主题，虽然他们创作了工艺品。

自从我阅读了一位德国女作家写的《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屋子》以来一直想访问开罗。通向（撒拉丁于1177年建造的）城堡的狭窄街道依然在那里，他于1811年（原文如此——译注）在这个城堡屠杀了马穆鲁克成员。我拍下了马穆鲁克成员的墓地的照片。

1882年，英国人占领了开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罗是他们的临时大本营。

开罗的建筑无限迷人，居民中种族的差异也这样。在1877年以前，努比亚人和黑人沦为奴隶，阿拉伯人始终是世界上主要的奴隶贩子，尽管美国黑人信奉伊斯兰教。

在我游览开罗之后8个月，同以色列的圣战爆发，两个闪米特民族之间打仗，种族和阶级同中东和印度的残忍与狂热的宗教报复相比似乎处于次要的地位。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从仰光飞过加尔各答上空，越过印度到卡拉奇、德黑兰和开罗，现在我必须乘坐一架埃及的飞机前往雅典，这架飞机晚点一二个小时起飞。在机场坐在中国使馆秘书和我旁边的是一批漂亮、脂粉涂得均匀、服装时髦的苏俄女乘务员，穿着近乎超短裙，中国人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这种超短裙，认为这是苏联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组成部分。我们两人都在想中国班机上的女乘务员都穿着有衬垫的、宽松的上衣西裤

服和梳着小辮。

我们从开罗飞越亚历山大上空，越过地中海岛屿，抵达雅典，两名秘书在那里迎接我。另一个山东人朱贵玉曾同我的朋友黄华在加纳呆了5年。苏万成曾是广东的一个红卫兵，仍然很年轻。他们两人都理着一种头发长得浓密的小平头，同他们在一起真感到高兴。他们到希腊才两个月，也是代办抵达的时间。他们很高兴有一个借口驾驶新的闪闪发亮的黑色梅塞德斯轿车自己探索一下希腊。可是那位希腊司机炫耀他的本事，一小时开80英里，当他驱车疾驰而过时，鸡、鹅、羊和穿黑袍的女巫四散逃窜。

我的行程是在中国计划好的，我知道外交部向沿途各使馆发去了电报，但是，我感到大大出乎意料，他们竟陪我一起旅行，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比同这几个中国人一道游览希腊更有趣了。我总是要求住一家富有传统的老式旅馆，一家具有当地特色的旅馆。在雅典，他们把我带到大布列塔尼旅馆的一个套间，这家旅馆是世界上剩下的少数几家老式旅店之一，保持旧的舒适环境——铺着亚麻布床单，两间房内都摆着香花，一个专职女侍戴着边帽甚至为我放洗澡水，送早餐到床边。我只在雅致的餐厅里吃过一顿饭，当我查明价格时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由于菜单上没有标价格，我不得不问）。我匆忙跑到服务台去问我住的房间的价格，可是计算不出这些德拉克马^①到底合多少钱，但是看来这对约翰·格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旅馆管理员说，中国大使馆坚持要他把帐单送给他们，不要把价钱告诉我。

① 希腊货币单位——译注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点可以免遭核弹的灾殃，那么就让巴台农神庙^①免遭灾殃。这座神庙高高地建在卫城顶上。它不仅仅是历来建造的最完美的建筑，而且坐落在天地之间，由牢固的支柱加固而常存，是人类最崇高的纪念物和人类的精神，是宣告生命，不是宣告死亡。仰望这些高大的大理石圆柱，就感到人类已从黑暗的洞穴和恐惧以及不知不觉的毁灭的阴湿城堡中解放出来。人们很高兴它自公元前 438 年起就坐落在那里。

我在孩提时代一遍又一遍地读希腊的神话和历史故事，我现在依然全都记得住。

我们驱车前往白色大理石的波塞冬海神庙，此庙于公元前 440 年高高地建造在苏尼翁角上，俯瞰着蓝绿色的爱琴海和海中的岛屿。

在前往德尔斐的途中，我拍摄了一张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帕那萨斯山的精彩照片。我们在杏花丛中饮着帕那萨斯山泉水，我拍摄了德尔斐的空心石青铜三脚祭坛，在那里神谕宣示所的女祭司凭嗅觉同里面的蛇商榷。下山时，我们可以看到港口，希腊人从那里带着礼品去祭阿波罗神。我们有一个向导，名叫多拉·特尔齐，中国大使馆的两位秘书同我一样享受到它的乐趣。总而言之，这是我在别处从来没有度过的最美好和有趣的旅行日。在德尔斐，人们确实感觉到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根源，这是别的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应该使希腊全国成为受保护的国际古迹，免得它遭到战争和交通的破坏，不让公寓房子破坏整个史诗般的海岸线。

① 祭雅典娜女神的神庙——译注

我同代办和三位秘书在一家中国餐馆用餐，他们送我到法航去乘班机飞往巴黎。班机晚点，代办递给我一束玫瑰花以示告别。这位代办是联合国的唐明照的朋友，唐明照是我的朋友。论资排辈，他是八路军的一个小鬼。

我们在机场等候时，我向一秘朱贵玉问起他的身世。他懂一点英语。

“我于1929年出生在山东济南附近的临沂县，”他说道，“是的，我常常爬泰山。我父亲带我到那里去祭拜孔夫子，因为他有封建思想。是的，毛泽东的夫人也出生在那附近。

“我于1945年在山东参加革命。我从7岁到13岁在学校念书，13岁时我离开学校为一个地主干活，因为我父亲在我11岁时去世。我父亲并不很穷，可是在他死后我们很苦。一位老师给我传播了新思想，自那以后我开始抓紧学习。我在14岁时同我本村的共产党接触。我属于一个雇工协会，该协会同共产党有联系。我干的活是犁地、运水和劈木柴。

“我在济南的政府中工作，在上海为共产党做政治工作，后来我到了北京的外交部。我从来没有上过‘五·七’干校。”

他承认大使馆的希腊语翻译出身于“干部”家庭。当过红卫兵的年轻英语翻译是工厂工人的儿子。

在我批评红卫兵的排外行动时，他强烈抗议说：“当然，我们不能头脑狭隘。一个马列主义者必须考虑世界上的一切。全世界的人民必须获得解放。”

我们从飞机上饱览了意大利及其罗马式的城市，这些城市造得像带有辐的轮子的轮毂。我们从佛罗伦萨和米兰在5—10分钟内飞越了覆盖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太阳出来，光芒四射，我拍下了布朗峰冰川和马特峰的精彩照片。

在巴黎，中国大使馆的一秘曹（译音）和英语翻译林崇斐到机场接我。他们两人都是上海人，司机也是上海人。两人都是老于世故的巴黎式人，不拘礼节，衣着讲究。曹，51岁，农民的儿子，“年轻时参加了革命”。林是木匠的儿子，1966年当过红卫兵，虽然他已经从学院毕业。这两人先带我到大使馆去吃茶点。大使馆是一幢十分优美雅致的老房子，就他们所知，世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大使馆。

我下榻于塞纳河畔埃菲尔铁塔对面领事馆区古老的迪安娜饭店，在那里我是唯一的美国人。休息室里挤满了日本旅游者，他们背着相机，留着长发，穿着伦敦裁缝的衣服。在角落里放着乔治·华盛顿的骑马雕塑像，街道是以肯尼迪、威尔逊和纽约命名的。

“你戴着一顶中国帽子（实际上是指头巾——译者）！”这是中国领事馆秘书的惊奇发现。

我解释说，“我戴了两顶，这两顶帽子是在长沙时的礼物——羊毛保护我耳朵不受寒。”我戴了一顶，里面还套一顶。

因此这两位秘书毫不介意地带我去买一顶巴黎帽——最新式的驼毛帽子，两根长长的绶带系紧，价目标签令人吃惊。他们驱车陪我游览市容，虽然我在以前参观过。我们在拿破仑墓停下，在最佳的中国饭馆用餐。但是，我们大家都在塞纳河上巴黎城岛对面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过得很愉快，这也许是法国任何中世纪建筑中最具有法国特色的，建于14世纪或14世纪之前。人们在这里感受到名副其实的法国神秘气氛，就像人们在伦敦塔感受到英国的神秘气氛。这是监狱，是对上层和下层的人上刑的地方，最著名的是玛丽·安托万内特王后，她在被押送到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之前关在这里。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吉伦特派成员和罗兰夫人也关在这里，还有夏洛特·科黛、罗伯斯比尔和米歇尔·内伊。（罗兰夫人现在是对中国妇女的一种鼓舞。）

中国大使馆的秘书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这是我的主意），也没有去过卡纳瓦列博物馆，他们通常带来客到拉雪兹公墓去，在巴黎公社社员纪念墙向1870年巴黎公社致敬意，在那里一天内枪杀了147个男人、妇女和儿童，儿童成批地遭处决。他们还带我到鲍狄埃的墓地，他谱写了《国际歌》。沿着巴黎公社社员纪念墙，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庄严墓地，有些墓地上放着鲜花，但是，当我显示出摄像的兴趣时，中国人并不喜欢。除了阿尔巴尼亚人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几乎是孤立的。

法国的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实际的，我在孩提时代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三剑客》和仲马的其它小说以及维克托·雨果的《悲惨世界》。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同历来所知道的最残忍的敌人进行斗争，而一点不关心人的生命，其实对他们而言，并非如此。他们规定了人的标准，毛泽东不允许报复。在共产党或它的联盟内部没有出于政治原因而处决对手。然而，苏联像法国革命那样在党内执行处决。中国人的思想是清教徒的道德标准——对于敌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人，可望通过体力劳动“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对中国上层阶级来说，体力劳动是一种可怕的惩罚，因为他们过去常常轻视劳动。

我同黄镇大使和他的夫人朱琳在塞纳河畔讷伊的大使官邸吃饭，这个官邸一度是一位摩洛哥亲王居住的地方。黄镇自1964年在巴黎就越南问题和缓和问题举行错综复杂的谈

判的中期以来一直担任大使。他作为中国高级外交官在几个月后于1973年被派往华盛顿开设第一个联络处，在华盛顿，我在他举行第一次招待会的次日，即10月2日，在五月花饭店同他和他的夫人一起用餐。

黄镇长着圆圆的面孔和圆胖的腰部，但十分聪明、敏捷和灵巧。他的思想广阔丰富，不让树木妨碍他看到远处的森林。他讲话具有真正的权威。他不仅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而且是因资格老而享有声誉的老革命，是在中国国外的外交使团中能遇见的唯一的长征英雄。

他是安徽人，于1934年至1935年跟随毛泽东的队伍艰苦跋涉了6000英里。他的画是长征的唯一当代记录，因为没有拍摄照片。^①在抵达北方后，他被派到徐海东的第15军团去担任宣传部长。他的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年接待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来到甘肃的沙漠，成为进入红色地区的第一个报人。黄镇出来迎接他，在朱王堡致了欢迎词。后来在1965年和1970年，他安排了埃德加·斯诺的最后两次中国之行，是他特地鼓励埃德加·斯诺作这最后的访问，当时埃德加·斯诺有些犹豫，因为他的某些写作受到批评。

当我们在巴黎彼此介绍时，黄镇说，“我知道你在延安，我同刘伯承一起在云阳。我很高兴经过所有这许多年后终于见到你了。我知道你写的书。”

我解释说，“只差了几小时，我没有遇到你。你们的军队

^① 我在《中国共产党人》（1972年格林伍迪出版社）一书中刊载了黄镇的一些画。——作者

在我清晨抵达之前的夜里出发去打日本人了。”

黄镇和他的夫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刘伯承和聂荣臻一起在山西的太行山，在那里，黄镇是共产党政治部主任。在黄华于197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前，黄镇是选入党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在国外的外交官。

他是1949年后建立的首批外交使团的第一个大使。他从1950年至1954年出使匈牙利，1954年至1961年出使印度尼西亚，自1961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

黄镇不歧视妇女，他的夫人是驻巴黎大使馆的参赞。在1963年，她被任命为中华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该联合会在文化革命时期“冬眠了”，直到1973年。

我在法国的最后一天驱车穿过法国的谷仓博斯平原，在严寒和潮湿的气候中研究卡尔特教团修道院的奥秘。人们必须体验欧洲的大教堂才能了解东西方缓和的问题。

在巴黎机场，一名法国专职女服务员从头至尾照料中国人的旅行，她告诉我，她已担任这个职务8年了。在747飞机上，我坐在两个中国人张凤仪（译音）小姐和蔡大诚（译音）先生的旁边，他们是第一次到纽约去，在联合国代表团供职的。

1973年2月10日，驻联合国副大使庄焰的秀丽、开朗的老革命夫人闵自强（当时黄华在中国旅行）和三秘陈思群到肯尼迪机场迎接我，我感到出乎意外。陈思群讲一口流利的通俗英语。在我们吃汉堡牛排加番茄沙司和喝可口可乐时，科内尔·卡帕带着惯常的笑容同另一个摄影师出现在我们面

前，她拿了我沉重的胶卷包去洗印。^①科内尔是关心摄影师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

到这时，我由于乘坐喷气机高速飞行引起生理节奏破坏而头昏眼花，精疲力尽；不过我为在排得紧紧的旅行中周游了半个世界而感到欣喜若狂，一幕幕景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进行各种对照和比较。

《哈特福德新闻报》的琼·赖斯和她的丈夫唐一直照管着我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小屋。他们在零度以下的恶劣天气下到纽黑文接我。我作为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去中国的使者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处在—批为我感到惊奇的朋友的包围之下，其中有历来首次当选的第一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女委员维拉·达拉斯和第二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男委员乔治·伊根。之后不久，一只漂亮的桔黄色的豹猫穿着四只白色长统靴跑到后门廊，不肯离去。它在第一天抓了两只老鼠，放在我的脚边，在地上打滚以表示它应该有一个永久的家。

我在此行中看到了许许多多事物，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得写到这里，但是有些经历与其他旅行者是共同的。在30年代，我做的几乎全部调查研究是最初的开拓工作。现在到中国去了解情况和旅行要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不再感到报道中国的情况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了。重要的问题是始终展望中

① 我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担心发生飞机劫持事件。在我启程后不久，沿途的机场——仰光、开罗、雅典和巴黎，都是阿拉伯恐怖活动和暗杀行动猖獗的地方。倘若没有中国人，我装满胶卷和磁带的帆布包肯定会遇到麻烦。在把胶卷冲洗出来之前，我不知道这些胶卷是否遭到X光的毁坏。——作者

国，从历史中和世界图景中，从它自己的历史中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历史中观察中国。不论我上哪儿去，萦绕我脑际的一种想法是：中国艰巨的任务只有靠作出努力才能完成。

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以前从未见过或想象过的世间罕事。这是一桩伟大的冒险事业，他们正享受着它的乐趣。

附录

按：为表彰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所做出的贡献，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于1991年9月20日授予她“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

爱泼斯坦在海伦·福斯特·斯诺荣获 “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庆祝会上的发言

今天在北京举行发奖仪式是十分合适和恰当的。

从3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里，海伦·斯诺一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文学忠贞不渝的朋友。

她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在团结青年乃至全国人民保卫国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像她丈夫那样，她很早就认识到，抵抗侵略以及中国复兴和进步的希望，是寄托在谁的身上。她用笔名——尼姆·威尔士——以报告文学的体裁先后写了《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在让国外人士认识并了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这方面，她单独地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

献。这两本书现在被认为是重要的史料。

在文学领域里，斯诺和她也是最先向世界介绍中国新的人民文学的。他们的译书《活的中国》使国外读者能够听到中国革命作家先驱的声音。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功绩：在那些可怕的年代里，国民党谋杀这些先驱者，企图堵住他们的嘴。而这本书却将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全球。对该书作全面介绍的《附录》是根据左翼文化运动参加者所提供的材料写成，作者便是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士。

海伦·斯诺在延安时，除了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外，还经常同朝鲜革命者交谈。在她写的《阿里郎之歌》一书中，她通过一个朝鲜革命者的事迹来描述朝鲜人民在爱国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朝鲜人民当时的斗争，是为了打断日本殖民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的镣铐。

1937年，英文月刊《民主》在北京创办。海伦·斯诺是主要创办人之一。同年7月，刊物因日本侵略中国，被迫停刊。在它发行的短短的几个月里，它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广泛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大举入侵。它还呼吁国际方面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来支持这种团结。

抗日战争开始后，海伦·斯诺同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以及一些中外朋友一起，发起并开展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有效地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运动，使深受战争祸害的中国人民能够在经济上自己帮助自己。它为抗击侵略提供军民所急需的物品。它还使中国人民能够以受人尊敬的形象出现在外国人眼里。那个形象便是，中国人民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

海伦·斯诺在40年代离开中国。她在国外继续为工合运

动工作，并写文章报道这个运动。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出现内战阴影时，她大力支持由民主的美国人组织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反对政府支持蒋介石，后来，又主张美国早日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在30年代初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海伦·斯诺。那时，我只有18岁，是个初出茅庐的新闻工作者。我感到她和埃德加·斯诺对待年轻人很热情，而且毫不吝惜把时间花在年轻人身上。（我才21岁，他们便邀请我参加《民主》月刊的编委会。）许多年之后在美国，我的书《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在她的帮助下出版了。她把这本书介绍给当时在世的安格斯·喀麦朗，他是位卓越而又英勇的进步人士，当时担任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总编辑。

我加上这段个人经历，为的是更清楚地说明海伦·斯诺的另一个特点——关心和尊重年轻人。

这位中国人民忠诚的老朋友，在间隔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于1972年重访中国。在《重返中国》这本书里，她写下了这次访问的情况和获得的新印象。她要用文字和电影把迄今在中国发生的巨变记录下来。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
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伊思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9月

（麦少楣 译）